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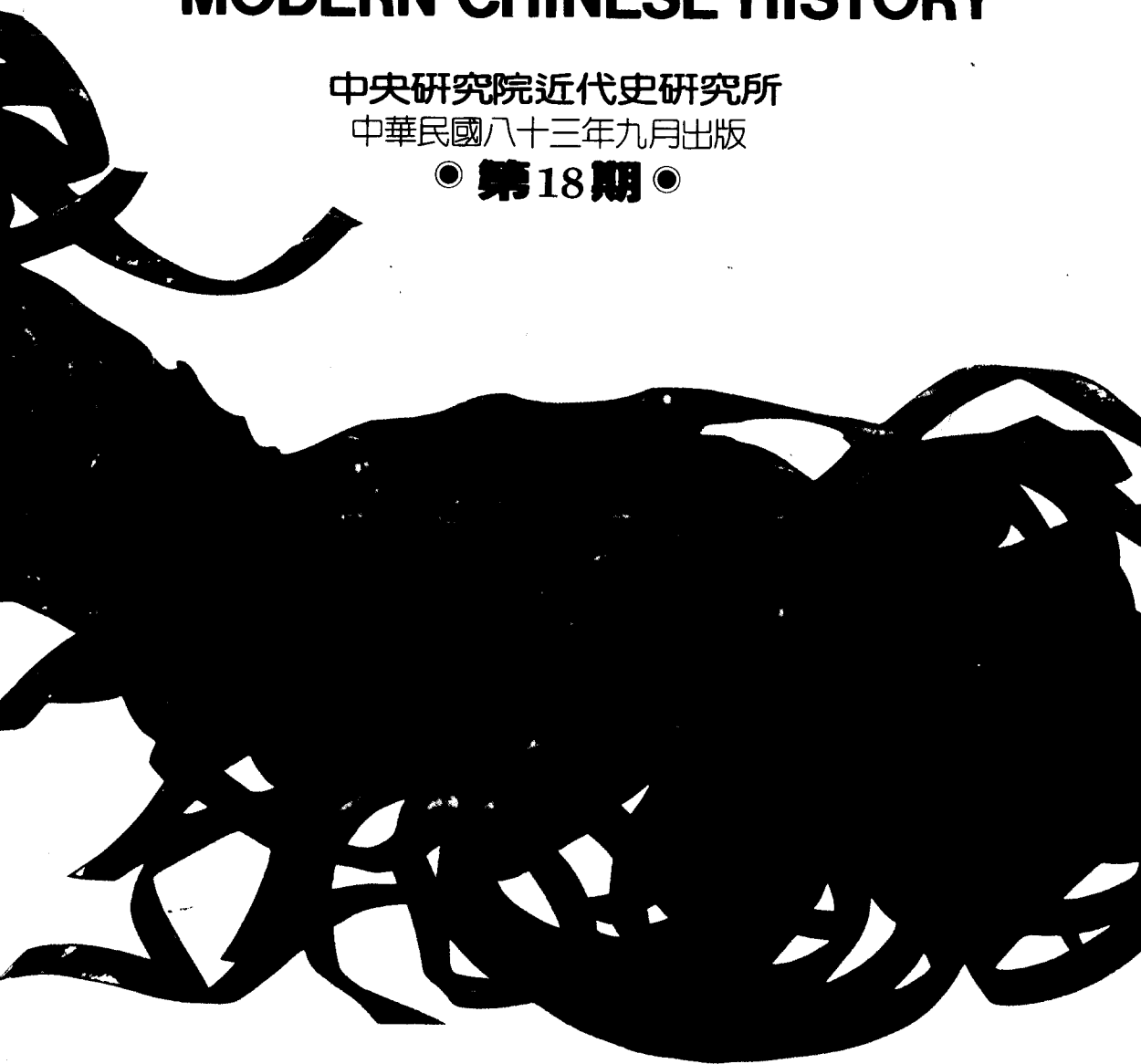
#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NEWSLETTER FOR  
MODERN CHINESE HISTORY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九月出版

● 第18期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諮詢委員會，本（83）年7月2日假該所研究大樓召開第二次會議，由劉廣京院士主持

出席會議人員包括（前排右起）全漢昇、李遠哲、劉廣京、孔復禮（Philip A. Kuhn）、（後排右起）熊秉真、黃福慶、許雪姬、李國祁、陳慈玉、王曾才、王壽南、陳三井、魏秀梅、呂芳上、張瑞德



#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目錄

第十八期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九月出版

<b>學術會議</b>	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 .....	吳翎君	1
	近代中國歷史檔案研討會 .....	楊翠華	8
	「東南亞華人教育」國際研討會 .....	朱泂源、鄭秀萍	18
	甲午戰爭一百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 .....	吳志鏗	22
	商人與地方文化研討會 .....	蔣竹山	27
	「國際亞洲歷史學家學會」第十三屆會議 .....	陳國棟	42
<b>學術演講</b>	台海兩岸史學發展的異同 .....	張玉法	47
<b>學人簡介</b>	楊雲萍 .....	許雪姬、賴惠敏	77
	島田虔次 .....	森紀子	96
<b>研究概況</b>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諮詢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11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進行之專案研究計劃 .....	江淑玲輯	112
	中國大陸民國史研究述評 .....	張憲文	117
<b>史料介紹</b>	上海版《民國日報》與基督教大學史料 .....	邢福增	131
	關於《許壽裳日記》 .....	北岡正子、黃英哲	140
	菲律賓華僑義山碑文的史料價值 .....	吳文煥	161
<b>新書評介</b>	黃著《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啓超調適思想之研究》 .....	潘光哲	168
	評《明實錄類纂》 .....	邱仲麟	17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中琉關係檔案選編》及 俞玉儲《清代中國和琉球貿易初論》 .....	張存武	182

	Barend ter Harr, <i>The White Lotus Teachings in Chinese Religious History</i> .....	康豹	185
	James W. Tong, <i>Under Heaven – Collective Violence in the Ming Dynasty</i> .....	巫仁恕	203
<hr/>			
大事紀要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 (1993年10月—1994年9月) .....	江淑玲輯	210
<hr/>			
出版消息	新書出版消息 .....	張珍琳輯	216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編輯委員會□

主任委員	陳三井				
編輯委員	陳三井	王樹槐	陳慈玉	林滿紅	張瑞德
	呂芳上	陳秋坤	賴惠敏	范毅軍	
執行編輯	賴惠敏				
助理編輯	江淑玲	張珍琳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sub>半年刊</sub> 第十八期

編輯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臺北市南港 郵撥帳號 1034172-5
印刷者	永裕印刷廠 臺北市西昌街168號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九月出版	

定價 新臺幣250元



學術會議

## 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 學術研討會

吳翎君\*

自秦漢以降的中國政治格局，幾乎是以《三國演義》所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環模式進行，中國人的政治觀也大多無法跳脫大一統意識體制。國家起於爭，大一統則是爲了息爭，這種思考模式使得「分裂與統一」成爲中國歷史發展永恆迴圈的命題。國人值此分裂階段，是否能跳脫傳統中國分合窠臼來思索當前歷史發展的嚴肅命題？或歷史上的分合經驗是否可做爲今後我們思索國家發展方向之借鏡。爲嘗試做上述命題的解析，由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主辦，並邀集了國內歷史學界，包括中研院史語所、近史所、台大歷史系所、師大歷史系所、政大歷史系所共同參與協辦，於七月十三日至十五日假台北中央圖書館召開「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會中，與會學者討論熱烈，盛況爲近年所罕見，此一現象也說明了史學界對這一次大會議題所具有的現實與歷史意義的關注。

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博士於開幕致辭中，提出「地球村」觀念，爲中國大一統政治理想做衍生性的註解。李院長指出，邁向廿一世紀的同時，國家邊界漸次淡薄，主權國家觀念亦在改變中，「地球村」的形成將指日可待，這是世界的大一統。李院長的談話，爲此次會議做了深具意義的引言。

此次會議計發表論文廿二篇，另邀請美國普林斯敦大學講座教授余英

---

\* 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時先生及匹茲堡大學講座教授許倬雲先生發表專題演講，講題分別是〈中國史上政治分合的基本動力〉及〈體系網絡與中國的分合〉。廿二篇論文，分八個場次宣讀，第九場次為綜合討論。其中有十篇論文撰稿人為大陸學者，由於議題的敏感性，大陸學者的參與，使得此一學術會議增添不少「新聞價值」，儘管「學術的歸諸於學術，政治的還諸政治」，且大陸學者之論述並未直指海峽兩岸的未來出路，卻被冠以「政治宣示」或過度聯想，使會場偶有出現尷尬氣氛。不言可喻的是台灣史在中國史的定位及兩岸關係的發展，最為學者所感觸，此由台灣大學黃俊傑教授的〈歷史意識與廿一世紀海峽兩岸關係的展望〉一文所引發的熱烈回應可看出。

九個場次的論文發表內容豐富，就史學專業的細密分工而言，實為「大題小作」，惟撰稿人大多能掌握問題核心，評論人的補充與引伸也至為允當。其中與清代及近現代史有關的論文，計有十一篇。篇目如下：吉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李治亭〈論清代邊疆民族的離心運動〉、北京大學歷史系王天有教授〈如何評價清朝的統一和南明的抗清鬥爭〉、東北民族學院關捷教授〈清代前期少數民族在實現與維護國家統一中的作用〉、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王爾敏先生〈滿清入主華夏及其文化承緒之統一政術〉、南京大學歷史所所長張憲文〈試論袁世凱的集權政治與省區的地方主義〉、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胡春惠教授〈聯邦主義與民國的分與合〉、南京大學台灣研究所所長茅家琦〈地方勢力擴張與晚清政局〉、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林滿紅〈1895年——兩岸關係上的重要年份〉、台灣大學歷史系黃俊傑教授〈歷史意識與廿一世紀海峽兩岸關係展望〉、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李國祁教授〈由中國歷史發展論國家分合的理論基礎〉、政治大學歷史所蔣永敬教授、陳進金先生〈民國以來政權統合的方式與主張〉。在大會所安排的議程中清代及近現代史的部分，從第四場研討會開始，為方便陳述自由討論時學者們的意見，本文以場次為經緯，做一提綱契領的介紹。

吉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李治亭〈論清代邊疆民族的離心運動〉，發表於第四場研討會，本文論述清代邊疆民族的離心運動與中央政權的大一統戰爭間的拉鋸戰，清廷最後平息叛亂，收之版圖，隨後因地制宜對邊疆各區實施不盡相同的行政區劃和管理方式，包括名稱各異、組

織形式有別，建立了大一統王朝。

第五場研討會，北京大學歷史系王天有教授〈如何評價清朝的統一和南明的抗清鬥爭〉一文。指出從中國十六世紀後的內外形勢看，須肯定清朝統一的歷史作用，否則中國可能會被外來勢力肢解；另一方面，標幟漢民族反抗異族征服的南明政權，也是正義的，值得頌揚。南明的抗清，對統一後清朝（特別康熙親政後）的政策產生深遠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上的民族戰爭具有推動歷史的前進的功能」。評論人台灣大學陳捷先教授，則以為明末東來的葡萄牙人和沙俄的入侵西北，是否真能分割中國？作者在行文時用了唯物史觀的階段論，有再商榷的必要。本文多次強調「中國歷史上多次統一是通過征服手段，捨此不能完成歷史的飛躍」，陳教授以為如果歷史果真能鑑古知今的話，作者的看法值得吾人深思。東北民族學院關捷教授〈清代前期少數民族在實現與維護國家統一中的作用〉一文，指出「居住於邊疆地區的少數民族在堅決反擊來自北京的沙俄入侵和西部的廓爾喀入侵鬥爭，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為維護國家領土的完整，有一定的貢獻」。評論人故宮博物院研究員莊吉發先生，指出本文提到清朝前期的統治，過度強調了武力征服是主導國家統一的力量，而忽略了文化的同化及民族的融合等其他因素。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王爾敏先生〈滿清入主華夏及其文化承緒之統一政術〉，指出滿清雖是異族入主，而其列朝帝君，則以宗奉中國固有道統為宗旨，措施遠邁前朝，表現其繼承正統之真實。自由討論時，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蘇雲峰教授以為王天有教授強調「民族戰爭具有推動歷史前進的功能」，這是霸道論，難以令人信服。而關捷先生認為清之統一帶來了各民族的團結和親密關係，文章用字誇張和情緒化，如「極強的向心力」、「親密聯繫」等，都是言過其實。中興大學歷史系黃秀政教授以為，關捷先生文末尚且引用周恩來的一段話作為結語，可見大陸學者仍未跳脫歷史為政治服務的框架。政治大學蔣永敬教授發言，我們對大陸學者要有歷史的同情與諒解，過去台灣史學也曾受到政治壓力，台灣學者要耐心看待大陸的史學研究。

第六場研討會。南京大學歷史所所長張憲文〈試論袁世凱的集權政治與省區的地方主義〉，從袁世凱的集權與省區的地方主義，析論民初政局混亂的關鍵因素，指出建立在剝奪地方權力基礎上的袁世凱中央集權制度，

與從清朝後期滋長起來的地方勢力間的嚴重衝突，而袁去世之後，北洋軍閥集團的矛盾更加激化，地方主義和省區獨立意識也更為強化。對於一般過去有關袁世凱的負面評價，本文除予以保留外，並從另一方面肯定袁氏對於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正面作用，尤其是袁氏統治時期所制定的財經政策。評論人中央研究院研究員林明德指出，打擊地方分權勢力與地方主義和省區獨立意識之發展有關，但與北洋軍閥集團的矛盾加劇，似無必然的關係。作者在論述上出現邏輯上的跳躍，例如集權政治是否必定走向帝制不可？對於作者能以客觀材料重新論述袁氏的地位，予以肯定，而關於袁氏與中國軍隊現代化有促進之功的觀點，誠屬創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胡春惠教授〈聯邦主義與民國的分與合〉，本文大致上延續作者所著《民初地方主義與聯省自治》一書基礎上，而進一步發揮聯邦主義與民國初年中國政治分合的作用。民國九年前後，由於軍閥割據的事實，知識界提倡「聯邦式的民國」呼聲達到頂點，欲以聯邦主義各省自治為起步，而後再由自治省的聯合，達到和平統一的目標。作者以為這一運動雖因知識分子的無力與大軍閥們的反對而未能成功，而這種以迂迴方式而代價最小的和平方式，造成中國統一的想法，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的創新，對今後海峽兩岸思索統一問題，也是一個取徑的方向。國立政治大學邵玉銘教授回應此一觀點，認為中國應實行聯邦制，且應避免武力統一，但是聯邦制不見得可避免流血戰爭，美國內戰就是一個有力的例證：內戰最大的目的就是要維持美國聯邦（Union）的統一，因此採行那一種政治制度不見得就能避免流血。南京大學台灣研究所所長茅家琦〈地方勢力擴張與晚清政局〉一文，認為中央政府權力削弱，地方勢力的擴張，帶來正負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使得國家沒有足夠的財力抵禦外侮，另一方面地方勢力的擴張，與晚清近代工業的創辦、新式文教事業的興起、立憲運動的發展等，都有直接的關聯。此外，作者以為清末地方勢力擴張、中央削弱與清朝的垮台無必然關係，而是清末的假維新，強化專制集權之實，加速了清廷的滅亡。針對此點台灣大學歷史系古偉瀛教授有所補充，他引Craine Brinton在《革命的解剖》一書，提到歷史上的革命並不是在最黑暗衰弱時發生，往往是在情況有所改善，人們對未來充滿期待時，頓遭挫折而起的，若由此來看清末的改革（如諮議局的設立等），爾後因一些突發事件（如光緒之死



和攝政王的失策)和新憲遲遲未果,使一些支持改革的人轉而投效革命。

第七場研討會,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林滿紅〈1895——兩岸關係上的重要年份〉一文,探索過去四百年來兩岸經貿關係的分合及其政治、文化意涵。得到的結論是,1895年日本的佔領台灣,為兩岸關係的長程,投下兩大變數。(一)日本強化了台灣人民的跨國經貿能力,促進台商與大陸、日本、南洋間的多邊貿易關係;(二)日本領台造成以後兩岸政治、文化認同的諸多困難。由荷、西、鄭領台時期到十八、九世紀之清領台時期,大抵是同質社會的結合。但1895年後,台灣人日本化的傾向、兩岸生活的分歧與文化差異等等,這也是228事變產生的背景。評論人台灣大學歷史系黃富三教授,指出由本文看來1895年日本領台是一個「原罪」(original sin)。黃俊傑教授〈歷史意識與廿一世紀海峽兩岸關係展望〉,本文從歷史意識的角度,分析當前兩岸關係「急統」和「急獨」的主張,認為兩者皆有其歷史思維的盲點,「急統派」未能掌握四百年來移民台灣的漢人追求自主的理想,而「急獨派」則忽略近百年來中國大陸人民所經歷的民族挫折,以及隨之興起的民族主義情緒,雙方這種歷史思維的盲點,導致在思索台灣與大陸的未來關係時有嚴重的障蔽。作者提議從「歷史的／人民的立場」出發,在時間的深度中尊重「人民的意願」,跳出「統一／獨立」的二分格局。台灣大學政治系胡佛教授針對黃文的評論,暢所欲言,欲罷不能,應可單獨成一專文。胡教授指出本文的「文化認同」大致是指「祖國愛」及民族精神,這種對國、族的認同,在政治文化學上即是所謂「國家文化」的主要內涵,可包含在文化認同裡,而本文的「政治認同」,則是一些政治的「現實」,特別是一些社會及經濟方面的功利考量。此外,本文對急統派與急獨派的界定並不周延,目前恐怕主張急統的人並不多,倒是主張統一者,多主張中共應先放棄共產主義。由於此一場次論文內容的政治敏感性,使得與會學者紛紛發抒一己之見。

第八場研討會,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李國祁教授〈由中國歷史發展論國家分合的理論基礎〉,探討中國過去的分合理論及形成這些理論的基礎,並提出對近代中國分合的看法。就中國歷史發展的脈絡而言,國家分合的理論,可從地理形勢論、經濟的依存與抗爭、政治與社會文化的統合與分離等方面來觀察。而近代以來的國家分合理論不同於近代以前。例

如海權的興起，傳統的地理形勢論有了巨變；西力的衝擊，中國屢次戰敗，產生對天朝大一統世界觀的質疑；近代以來，小傳統（地域鄉土）的盛行，對長久以來的大傳統（國家民族性）形成挑戰。基於上述因素，作者以為將來「中國的『合』似不可能再遵循傳統時代的歷史發展而規律進行」，「應該是一種多元的邦聯式的，而絕非是大一統的，完全一致的」。政治大學歷史所蔣永敬教授與其博士班學生陳進金〈民國以來政權統合的方式與主張〉一文，清晰勾勒出民國以來分裂政權的種類及其統合形式，對於統合政權的主張（如分治合作、聯省自治等言論）予以歸納，舖陳出民國時期國家分合學理上的探討。此一學理上的討論，評論人香港科技大學齊錫生教授以為值得再做日後深入的研究。對於本文所言「民國以來歷史的經驗，採用武力方式者，並不能達到真正的完全統一」。齊教授另有看法，他以為1912-1917年歷史經驗是，凡是想和平解決的卻沒有和平結果（如孫中山的讓位等），北伐是半武力、半妥協下達成的和平，結果導致軍閥的頑抗（如中原大戰），1949年國共和談，也無和平結果。強求統一，最後只得依賴武力。

第九場次為綜合討論，由大會總召集人也是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執行長邵玉銘教授主持。三天會期氣氛融洽，而以這一場次的討論最具挑戰性，除了對發表論文內容的再補充外，對近代國家性質的界定、台灣史的定位問題、武力統一或和平統一，乃至質疑大會是否有預設統一立場等等，最具爭議。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張存武先生指出，這次大會對外力干預談的不多，事實上近代以來外力與中國的分合影響至鉅，例如英國與民國元年袁世凱的進，中山先生退；蘇聯援助與北伐；國共關係與美國等等。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鄭欽仁，提出國家型態在各個階段的不同，談「統一」，應避免概念上的混淆，商周時代是城邦代型，秦併六國，我們稱之為統一，隋代結束魏晉南北朝，稱為統一，另外異民族侵略的朝代，我們也稱之為統一，如以此籠統的觀點，是不是日本的殖民入侵占領，也可以得到合理化解釋？史家看待近代國家的形成，應避免「中國」概念的簡單化，並應釐清主權國家的概念而自覺性地跳脫《三國演義》「合久必分」的循環史觀。逢甲大學鄭梓教授指出，談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應先釐清分與合的對象，係文化上的認同或國家認同或政權的分合，就政治認同而言，亦即「

國家觀念」的轉化，如何從「大一統」到近代「民族國家」(national-state)以至於當前後冷戰時代的國家概念，每一歷史階段宜有定位。此外，對於不少論文提到中國歷史上武力統一的必然性，若依此主張是否落入「成王敗寇」的歷史法則下，如此歷史的悲劇如何突破？在這種歷史宿命觀裡，台灣歷史是否會被矮化？台灣史的分量在大會安排的議程中明顯不足？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副研究員陳儀深與許文堂先生，先後回應近代主權國家概念與古代社會國家的概念絕不相侔，以古證今可能造成混淆。針對上述質疑，主持人邵玉銘教授答覆，大會絕無預設立場，秘書長王壽南教授表示，就中國歷史長河的演進，台灣史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是中國人在台灣的一段歷史，至於將來是合是分，大會並無預設任何目的，原本邀稿函中希望學者就中國政治、經濟、文化融合等問題撰文，但學者們似乎對政治的分裂最感興趣。台灣大學歷史系韓復智教授則認為，中國歷史重道德精神，中國的大一統，對人民最為有利。政治議題的關注成爲綜合座談的最後焦點，有些已非學術認知的問題，而是個人價值觀及政治文化的認同。

儘管在綜合討論時，會場上稍有統獨論戰的煙硝味，但大會最後終於在祥和氣氛中閉幕，顯現學者們回歸學術本位的氣度。與會學者多肯定此次會議深具意義。籌委會召集人邵玉銘教授表示，當他翻完這廿二篇論文時，不自覺地有種力透紙背的感動。他希望大家本於民族的大愛，共同爲中華民族找尋一條出路。大會秘書長王壽南教授表示，不能否認中國歷史上分合的事實，但「合」的因素，不全靠武力，民心之所向也很重要，然而在分裂政權的對立下，老百姓之間並沒有對立，少數執政者應考慮人民的最大利益。分與合是歷史過程，漢代「安南」(越南)是中國的一部，而今安南何在？讀史者要有宏觀的視野。王教授的這段話也爲大會並無設定任何政治立場做了有力的補白。中研院院士張玉法教授則表示，本次會議最大的成就是兩岸學者共處一室，兩岸史學過去都曾受到政治壓力，台灣學者應以同情與了解看待中共史學，而兩岸史學互補之處甚多，學術交流不是「武力統一」，無庸操之過急。至於中國的分或合，並不重要，如何帶動中華民族脫離貧苦，在地球村上活得更有尊嚴，這才是最重要。吳楓教授代表大陸學者發言，肯定這次會議的歷史任務，認爲分與合的命題是當代史學應做而難做的事，而這次大會都做到了，令他們留下深刻的印

象。

國家起於爭，國家也起於利，一統可以息爭，分裂也可能興利，「分」或「合」只是應運歷史發展形勢的過程。此次「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提供了先秦以來「一統」政治文化的形塑及政權體制的分合，應有助於國人思索未來中國問題的參考。

---

## 近代中國歷史檔案研討會

楊 翠 華\*

### 一、緣 起

現屬「中央研究院中美科學學術合作委員會」之「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自民國五十五年成立以來，即與「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簡稱 ACLS) 和「美國社會科學研究協會」(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 簡稱 SSRC) 展開長期之合作關係。民國八十一年，中美雙方各自召開了一次會前會，討論就在台灣與大陸公家機關保存之中國近代歷史檔案，如何由台灣、大陸以及美國合作促進其管理與運用，據以籌備舉行三邊參加之「近代歷史檔案管理研討會」。在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召集人馬漢寶教授的積極推動之下，中美雙方復於次年二月在美京華盛頓特區，邀請了中美學者專家十餘人集會，討論召開此會之可能性。與會學者肯定了召開此會之意義，並議定由中美雙方各自組織籌備委員會，由我方先行擬具開會草案，以為進一步討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論和聯絡之基礎。

我方籌備委員會於民國八十二年四月組成，成員有馬漢寶（召集人）、管東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陳三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吳哲夫（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處長）、朱重聖（國史館主任秘書）、李雲漢（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主任委員，民國八十三年一月加入），另請楊翠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擔任執行秘書，負責與美方聯絡工作。美方籌備委員會亦於日後成立，成員如下：Frederic Wakeman（魏斐德，召集人 Director,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C. Berkeley），Jason Paker (Executive Associate, ACLS), William Moss (Archivist,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Archives), Mi Chu Wiens (居蜜，Senior China Specialist, Asian Divisio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Avra Michelson (Digital Libraries Technologies, The MITRE Corporation), 以及執行長 Wen-hsin Yeh (葉文心，Chai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C. Berkeley)。

雙方各自討論並交換意見以後，確定了開會主題：(一)檔案運用與研究計劃或成果，(二)檔案典藏之現況（內容與特色）、維護與管理、以及立法工作。為兼顧會議的廣義範圍與主旨，將會議名稱改訂為「近代中國歷史檔案研討會」(Conference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ical Archives)，並擬訂大陸方面之邀請名單。由於現階段大陸學者不便來台出席「國際性」會議，乃決定在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舉行，由該校東亞研究所負責邀請、接待、議程安排等等相關工作。

## 二、會議概況

民國八十三年八月十九至二十一日，「近代中國檔案研討會」在柏克萊加州大學召開，歷時三天，共發表報告二十五篇，茲就報告宣讀的場次與順序，略述如下：

### (一)檔案的開放與利用

#### 1. William Kirby, "Notes on the Opening of Archives and Western Scholarship on Republican China"

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柯偉林討論檔案的開放對西方學者在民國史研究

上的意義與影響，他首先綜述二十世紀幾個政權的垮台所帶來大量檔案的開放，不但鬆動了政府與史家之間對檔案的緊張態度，同時也造成史學研究的新趨勢。在早期西方漢學界中，絕大部分有關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著作是在沒有或很少檔案資料的基礎上撰寫的，因為民國檔案不為政府所重視，同時也不開放。直到1970年代末期，台灣與大陸才逐漸開放民國檔案，對全球中國研究造成極大的衝擊。以往的著作中，外國檔案扮演重要角色，這種「檔案缺口」(archive-gap)尤其在研究中國的國際關係上最為明顯。隨著各國對外交檔案的大量開放(例如德國開放外交檔案至1989年)，作者呼籲海峽兩岸政府也能開放胸襟，歡迎史家利用檔案。

## 2.楊冬權，〈境外學者對中國大陸檔案的利用〉

國家檔案局業務指導司副司長楊冬權，以業務指導的立場，介紹中國大陸對境外學者利用檔案的政策和規定，提供利用檔案的形式和渠道，報導境外學者到中國大陸利用檔案的情況，檢討現存的問題，並提出改進的方法，是一篇政策性的宣導。

## 3.Frederic Wakeman, "Chinese Archives and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魏斐德教授〈有關近代中國史的中國檔案及美國學識〉一文，將美籍學者研究中國史的過程分成四段時期，每段時期反映著使用檔案之相對機會及其對美國學識的影響。第一段，1950-1960年：美籍近代中國史學者完全無直接使用中國檔案之機會，只有利用已出版的檔案資料，展開對十九世紀中國外交關係之研究，形成「西力衝擊」學派。第二段，1960-1965年：台灣檔案的初步開放，造成美籍學者對中國地方社會及法律、自強運動、民間對西化之反應等等做了更深入的研究。第三段，1965-1979年：故宮博物院檔案的開放，使得史家開始注重中國的內部歷史，而不再強調西力衝擊的解析。第四段，1980年-現在：中國大陸各種檔案的開放，使得中國史的各方面，特別是十八世紀和二十世紀新社會史和二十世紀上海市史，有了更上一層的研究。今後需要更多有關政治檔案的開放，才能促成史家對近代中國政治史的見解之進展。

## (二)查尋資料

## 4.Evelyn Rawski, "Pursuing Social History Through the Archives: Historical

### Detection as a Research Mode”

匹茲堡大學歷史系 Rawski 教授，以她自己的研究歷程，現身說法的將自己如何開始透過檔案來研究社會史的經驗，當成一個範例，來說明如何用一種「歷史偵探」( historical detection ) 的方法，去研讀檔案。從 1987 到 1991 年，她每年春天都在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鑽研檔案一個月，發現內務府檔案比《大清實錄》、《欽定大清會典》等公家紀錄更能表露清代皇族在「私」領域的面貌，是研究婚葬禮俗、家庭結構、和社會關係等的絕佳材料。於是她用「歷史偵探」的方法，從不同的片斷與枝節之中，拼湊出問題的答案。同時她也呼籲能有管道接觸清宮文物，藉著地圖、實物的接觸了解，以補足文獻檔案之不足。

#### 5. 邵銘煌，〈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史料之典藏與運用〉

黨史會秘書邵銘煌以其服務該會十餘年之工作經驗，敘述黨史會從南京到陽明山的歷程、該會典藏史料的內容、史料運用的情形、以及黨史會對檔案開放之立場，其目的在增進國外史學界對黨史會的了解，同時也以今年六月剛剛開始實施的「擴大開放史料實施辦法」（開放範圍擴大至民國五十五年）為例證，來重申黨史會開放檔案之一貫立場。

#### 6. Wen-hsin Yeh, “Paper Chase: Archival Sources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葉文心在〈有關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的檔案材料〉一文中，自檔案材料的出版，早期黨史材料的收藏情況，以及非檔案性材料的收集等三方面，探討史料與史學在研究早期中共黨史這個領域裏的關係。其結論是：(1) 黨史研究素來陳義過窄，往往為黨史大人物傳及路線發展史所掩蓋，若將非檔案性材料多作運用，則可將中共之發展史結合於中國近代社會文化變遷史的大潮流之中。(2) 早期與中共黨史相關之檔案材料散見於世界各地，當多做交流開發。

#### (三) 擴大編目檢索檔案技術

本組討論涉及檔案專業之課題，主旨在探討新的資訊技術在檔案界的運用及影響，其中心議題在於：如何取得外界的資助？如何協調全國乃至國際化之合作？如何召集多學科之團隊？如何標準化？等等問題。

#### 7. Francis X. Blouin, “The Vatican Archives Project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 Case Study in Archival Description in the A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密西根大學本德禮圖書館 ( Bentley Historical Library ) 館長Blouin 此文，主要在介紹該校應用電腦技術來解決歷史文件檢索問題的梵蒂岡檔案工作計劃。他們已編就教廷五百餘機構的簡史，由此可見教廷的組織歷史。也就梵館所藏各項卷宗，按美國檔案機讀目錄標準 ( MARC-AMC )，製成卡片 1700 餘種，並已輸入美國學術圖書館資料庫 ( RLN )。此項工作預計於三年內完成，其所選定的編述標準，應對管理近代複雜的歷史檔案有所助益。

**8.Larry Dowler, “The Impact of the Archives and Manuscripts Control Format on Access to Archiv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olicies and Politics”**

哈佛大學 Widener 圖書館館員Dowler，在此文中敘述美國的檔案專家十餘年來從事改進檔案檢存取方法所做的努力，經由全國資訊系統專案小組 ( NISTF ) 所設計的檔案管理格式 ( AMC )，是經過一些策略性的運作，才被美國檔案界所接受。如今檔案界已採用 AMC 格式，建立了一個全國性的資料庫，已有 400,000 多件檔案存入此系統。

**9.Anne Van Camp, “Enhancing Access to Russian Archives: A Joint Project with the Hoover Institution, the Research Libraries Groups, and the Russian State Archival Service”**

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員 Camp，介紹該所與研究圖書館組織，以及俄羅斯國家檔案局的合作方案。此方案的目的，在於發展一套方法和體系，將儲存於俄羅斯各處的檔案資料，加以整理編目，並將編好的紀錄，輸入研究圖書館資訊連線系統 ( Research Libraries Information Network RLIN ) 的國際線上資料庫 ( international on-line database ) 之中。參與此方案者，不但可以分享連線系統中的各種資訊，亦可將分別儲存在西方與俄羅斯各處的類似相關資料，合并使用。

**四)清代檔案之一**

**10.沈景鴻，〈國立故宮博物院清代檔案的整理、利用及其成果〉**

故宮博物院研究員沈景鴻一文，首述故宮典藏清代檔案的播遷及整理經過，再敘檔案的內容與出版情形，並概述檔案之利用及其成果，以借閱清



史檔案的人次和冊數之統計，來證明該院史料公開的效益。最後並指出該院整理文獻檔案的未來方向：以全文輸入的方式，製作光碟，服務讀者。

11.葉志如，〈概述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明清檔案工作之現況〉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輯研究部副主任葉志如，在這篇工作報告之中，簡單的介紹了該館的歷史回顧、1949年以後的檔案整理工作、以及目前的工作概況。強調只有在1978年改革開放的政策實施以後，才為明清歷史檔案工作注入了勃勃生機，實現了「過去幾代人連做夢都不敢想的翻天覆地的變化」。

12. Beatrice Bartlett, "Archival Management in the Late Imperial Era: Possibilities for Using Ming-Qing Archivists' Tracking Methods for Our Own Purposes"

耶魯大學歷史系白彬菊教授〈明清管理檔案制度：如何利用明清檔案方法索查文獻淺議〉一文，是從她即將出版的專書*Archival Sources of Ch'ing History*（清史的檔案史料）中摘錄出來，主旨在告訴我們應該學習前人的檔案管理方法，才能順利的找出所要研究的文獻史料。首先應該把外朝和內廷檔案區分清楚，明清時代的外朝檔案多半沒有次序，但是國史館的長編檔，以及線裝裝定的史書、實錄、起居注等，都是極有用的研究史料。內廷檔案比外朝檔案管理得有次序，可是今天，除了宮中檔奏摺以外，我們很少看到早期內廷的史料，軍機處的隨手登記，即是查詢的最佳線索。

(五)清代檔案之二

13. 韋慶遠，〈《明清檔案》與順治朝吏治〉

人民大學檔案學院教授韋慶遠此文所稱的《明清檔案》，是專指張偉仁主編，正在陸續出版中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現存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一書。韋慶遠根據該書所刊出的數百件順治朝有關檔案，對當時吏治問題的幾個橫切面作了初步的論述，其結論是：兩千多年來官僚政治積澱下來的消極傳統，絕非幾道嚴峻諭旨所能攻克。吏治欲肅而未肅，弊政當改而難改，在順治朝發生和存在的陋弊，不但當時未能真正禁革，而且幾乎每一項都延伸到其後各朝，甚至更惡性發展，以至於清末。

14. 張偉仁，〈歷史語言研究所現存內閣大庫原藏之明清檔案〉

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張偉仁因眼疾未能與會，這篇報告由魏斐德教授

代為宣讀。本文主要在介紹作者整理《明清檔案》的諸項工作，由其十多年的工作經驗中，得到兩點重要認識，可為從事檔案整理工作者之參考：(1)整理工作應與研究工作分開，否則不僅將減緩進度，並且容易使檔案紛雜、毀損。(2)檔案宜按年月日編列、度藏，不宜勉強分類，以免支離分割，分類應賴索引。

15.吳哲夫，〈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清代檔案及其保管概況〉

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處長吳哲夫一文，除了介紹清代檔案以及其他相關文獻的收藏概況以外，重點在概述檔案的保管工作。故宮處理保管清代檔案的方針如下：1.防患人為的損傷；2.杜絕自然界的災害；3.防止檔案的老化；4.加強檔案的維修。作者企盼在檔案之保管、維護、研究、出版及服務方面，海峽兩岸的相關收藏單位能夠相互學習與互相合作。

16.R. Bin Wong, "The Importance of Archives to the Study of Qing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加州大學 Irvine 分校歷史系教授王國斌〈檔案材料對於研究清代政治經濟的重要性〉一文，強調檔案材料的運用是研究清代政治經濟的重要環節。以往學者對清代政治經濟的研究，一直受到西方政治經濟模式的局限，但是從檔案材料中，作者發現清代的農業體系大不同於歐洲基於商業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這兩個體系各自根植於特殊的歷史環境之中。從以往刊印出版的材料之中，我們很難了解清代糧食系統及其所涉及大小城鄉百姓生活之複雜性，惟有在常規性的檔案資料中，才會發現此一複雜的系統，其實只是清帝國維持、發展農業經濟的諸多政策和制度中的一部分。

(六)典藏與維護

17.居蜜，〈美國收藏有關中國的檔案〉

美國國會圖書館中國專家居蜜此文，主要在介紹美國所藏有關中國的手稿、檔案之情況。其著眼點為：(1)美國總統檔案，以美中關係、美國對華政策為主。(2)外交人員及美中關係檔案，此等檔案以國家檔案館收藏最多，國會圖書館手稿部私人檔案亦有國務卿檔、大使、公使檔。(3)傳教士檔，目前最詳細、易檢索的工具書為：Archie R. Crouch, *Christianity in China: A Scholar's Guide to Resources in the Libraries and Archive of the United States* (Armonk, N.Y., M.E. Sharpe, 1989)。(4)其他專門檔案，首應了解檔案中心

在全美分布情形，Raymond Nunn ed., *Guide to the American Archival and Manuscript Sources Relating to Asia and Oceania* (London: Mansell, 1985)一書，可見端倪。

18.趙雲鵬，〈中國遼寧省檔案館典藏歷史檔案及其開發利用述略〉

遼寧省檔案館副館長趙雲鵬，首先介紹該館所藏檔案的內容與特色。清代檔案有十六萬多卷，王朝形成的有：滿文老檔、玉牒、實錄、和聖訓，盛京及東北地方軍務旗務形成的有：盛京將軍衙門檔、盛京內務府檔、及三姓副都統衙門檔。民國檔案達九十多萬卷，占館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主要有：東北政務委員會檔、遼寧、熱河省政府及財政、交涉等機關檔案、奉天總商會檔案、遼寧各縣級機關檔案、以及東北行轅檔案。此外，尚有豐富的滿鐵檔案，是研究日本侵華史、東北亞近代史、中國東北史等的寶貴素材。

19.簡笙簧，〈國史館對國家檔案管理概述〉

國史館史料處處長簡笙簧，報告該館進行管理國家檔案的六個步驟：徵集、保護、整理、統計、利用、編輯與研究，其重點放在檔案的保護與整理工作之上，並提出對檔案管理工作的期許和展望：(1)檔案管理當以統一規劃、集中管理為原則。(2)檔案管理應以培育檔案管理專業人材為優先。(3)檔案管理應與現代科技相結合。(4)檔案管理應重視館際間的合作。

20.吳性儒，〈淺議中國四川歷史檔案之現狀及管理〉

四川省檔案局局長吳性儒，介紹四川省現存歷史檔案之內容，較特殊的有清代巴縣檔案，以及自貢鹽業檔案。而重慶市檔案館所保存的近五十萬卷民國檔案，其數量和完整度僅次於第二歷史檔案館，其中的陪都檔案，更被列為國家重點保護的檔案之一。總之，四川省的歷史檔案，資源豐富且具有很高的研究參考價值。站在檔案局的立場，本文強調檔案的保管、保護和搶救工作，對檔案法規體系、法制機構、執法網絡的建立，以及增強社會檔案法制意識等等，亦做了政策性的宣示。

(七)近代史之一

21.楊翠華，〈台灣現存教育部檔案簡介〉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楊翠華，簡介教育部現存的民國時期檔案，分別就教育部木柵檔庫以及國史館所接收的教育部檔案，介紹其內

容與特色。並對歷年來運用這些檔案所做的研究及其成果，做一分析與報告，進而期盼海峽兩岸的相關單位，對此類檔案做進一步的開發與合作。

#### 22.朱重聖，〈國史館現藏檔案之運用與研究成果〉

國史館主任秘書朱重聖一文，主要在分析館內人員與館外人士利用該館檔案的情形，從國史館出版的史料叢書，以及館內人員所發表的學術論文之統計，可以看出運用檔案的研究成果。最後並指出國史館今後的努力方向：遷建館舍、制定檔案法、加速檔案整理、擴大檔案的運用範圍。

#### 23.史梅定，〈近代上海歷史檔案的概貌和開發利用〉

上海市檔案館副館長史梅定，介紹該館所藏 105 萬卷檔案的類型如下：(1)政府機關檔案，抗戰時期及戰後上海地區政權機關所形成的檔案，該館收藏較全；(2)企業檔案；(3)行業組織檔案；(4)文化機構檔案；(5)社會團體檔案；(6)租界檔案；(7)革命歷史檔案。該館除了編制指南與目錄以外，還建立了上海歷史檔案目錄中心，把上海地區各級各類檔案館以及有關部門的歷史檔案目錄集中起來，方便讀者參考。

#### (八)近代史之二

#### 24.呂芳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的典藏與運用〉

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主任呂芳上，介紹該館所藏外交檔案、經濟檔案、院史資料及其他檔卷之內容與特色，同時也報告運用檔案的研究成果。最後提出兩點建議：(1)編印特定檔案聯合目錄；(2)加強檔案館館際交流與合作。

#### 25.萬仁元，〈讓歷史檔案走出歷史檔案館——介紹本館近代檔案史料工作概況〉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副館長萬仁元，介紹該館檔案的內容與特色，以及檔案史料的整理出版情形。目前的重要問題是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目錄體系，其工作方針如下：成立全國民國檔案目錄中心，出版《全國民國檔案全宗一覽》，編製和出版館藏檔案的地區目錄和專題目錄。他對海峽兩岸檔案史料和合作的意見如下：(1)互相交換檔案目錄、索引、和縮微品；(2)各自為兩岸的研究中國近代史學者提供方便；(3)舉辦一些具有共識的檔案史料展覽陳列；(4)共同合作編輯同一專題的目錄和史料。

### 三、綜合討論與閉幕

葉文心主持綜合討論，總結此會之雙重意義在於：此會既是一個學術會議，也是一個檔案工作會議。從史學或檔案利用者的角度來看，史家學習到各種檔案工作的辛苦與困難，使得史學與檔案學界之間，更容易展開彼此合作、協調的關係。從檔案管理者的角度而言，本會提出了一些有關館際合作與交流的建議，可為今後繼續推展檔案工作之方針。綜合三天會議之討論，葉文心提出三項議題，以為討論之基礎：(1)檔案分散四處，協調工作可能相當複雜，如何擬訂一些具體可行的方案，以便推動交流與合作。(2)有關修裱、管理技術、典藏法則等高度專業問題，如何互相提供經驗？(3)檔案管理之電腦化，連線網絡之國際化，美國經驗或可提供進一步參考。

美國檔案界對檔案機讀格式標準化過程的進一步解釋，引起會場熱烈且持久的討論。與會者對新的資訊均感興趣，惟對機讀格式在中文檔案中的適用性或可行性提出質疑，希望美國檔案界能就美國現存的中文檔案的基礎之上，先行測試。有關兩岸檔案合作之議題，萬仁元、韋慶遠都認為檔案問題仍是政治問題之一部分，檔案合作與國家統一問題一樣，都是急不來的，史梅定也認為宜掌握「先易後難」的原則，先做些可行性高的工作，例如聯合編目、編寫史料等。葉文心總結討論的結果，雙方再次肯定交流之意願，惟當前的政治環境非書生之力所能及，目前也只能以漸進的方式，做些紮實的合作計劃。此次會議在柏克萊召開，也絕非偶然，希望有關檔案合作的會議能夠繼續舉辦。

閉幕式由馬漢寶、魏斐德共同主持。馬先生首先綜合本會所討論出的幾點共識，重申其意義，並站在籌備會召集人的立場，期許本會不是一個結束，而是一個開始。魏斐德首先敘述他個人籌辦此會之心路歷程，由疑慮擔心到肯定欣慰。此次會議的成功，遠超過原來的預期，因為會議的結果，將會對近代中國的研究產生深遠的影響。他認為我們所面對的是一個資訊革命的時代，資訊之落後即代表研究之落後，面對新技術之高速發展，浩瀚的中國檔案亦應儘快接受新技術來整理利用。兩岸之間，也不宜有過高或不切實的期望，在雙方尚不能直接解決問題之前，美方學者或能起個

仲介作用，或製造機會，或找尋財政資助，以幫助兩岸檔案合作計劃之順利推動。

---

## 「東南亞華人教育」國際研討會

朱浚源\*、鄭秀萍\*\*

為瞭解東南亞各國華人教育及華人學校之情況，並加強國人對東南亞地區炎黃子孫教育問題的關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及僑務委員會委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研究員、刻正借調屏東師院、擔任社會科教育系系主任的朱浚源，主辦「東南亞華人教育」國際研討會。這次會議由於國立屏東師範學院院長何福田教授的大力支持，責成初等教育研究所與語文教育系，會同社教系教師，合組執行委員會，並投注學校行政部門相當人力物力，因此得以順利召開，成為該校創校48年來的首次大型國際會議。

本研討會的籌備委員會，成員包括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秘書長黃石城、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章孝嚴、中央研究院院士李亦園、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陳三井，以及國立屏東師範學院院長何福田、教務長林顯輝、訓導長劉慶中、總務長王龍錫、語教系主任侯秋東、社教系主任朱浚源，並公推何福田擔任主任委員，朱浚源擔任總幹事。

研討會自民國八十三年六月六日至八日舉行，第一天地點在屏東師院國際會議廳，第二、三兩天在墾丁青年活動中心。與會外國學者專家分別來自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越南、香港、澳門以及美國、澳洲等國家與地區，與我國學者齊聚一堂，總計約一百名，提出論文三十篇。另有專題演講三場（中山大學校長林基源、中研院李院長、近代史所張

---

\* 國立屏東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學系主任

\*\* 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計劃助理

存武教授)。會中學者們針對華人教育所遭遇的各種問題，各就其瞭解以及立場，提出感想與建言。(議題附後)他們的意見大致上分成兩派，一派主張「當地化」最重要，要用當地語文或英語英文來傳播中華文化；另一派則認為學習中文已成新的熱潮，因此不須化成當地語文，直接傳授華文即可。兩股力量勢力相當，前者有王靈智、洪玉華、Charles Coppel等，後者有沈慕羽、周虎林等。

會議進行當中，部分與會人士，由於對本次研討會的主旨並不十分了解，因此對會議的名稱有異議，認為「華人教育」改以「華文教育」，似乎更加貼切、適當，讓討論的焦點集中，容易達成共識。其實大會所關心的是華人的各種教育問題，其中當然包含華文教育，但焦點並非僅限於華文教育；換言之，是以華人作為整個的關懷對象，而不是以華文為對象。綜觀會中所發表的論文內容，多贊成與鼓勵海外華人積極融入當地國社會，成為其中一分子，在各方面合作交流，然而華人教育亦須將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加進課程裡，讓華人子弟得以學習、認識中國文化，進而傳揚於華人社會。有爭議的地方是：究竟是不是該把這些華人當成華僑，由僑委會去輔導？許多人主張應該重新定義，把他們當成外國人，不可以當做華僑。但仍有一股聲音，維護著目前的僑務政策。

第三天下午的綜合討論為全會的總結，由朱法源擔任引言。以〈東南亞華人教育發展之我見：兼論『台北學校』的設立〉為題，引發大家對「台北學校」設立與否的踴躍發言與建議。學者們多認為台北學校的設立為可行之道，惟仍有許多現實問題，有賴海內外華人攜手來克服。另外，朱法源主張由中央研究院擔負起上游學術領導的角色，各大學負責中游的研究與教學，師範學院負責下游的研究與教學，也引起爭議。

閉幕式中，並邀請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博士作專題演講。李院長現身說法，以自身經驗為題，探討美國華人的教育問題，為大會的結束畫下一個圓滿的句點。

報告人	題 目
沈慕羽	專題演講：馬來西亞華文教育奮鬥史篇
盧增緒	菲律賓華文學校之困境及其突破
周虎林	菲律賓華語文教學的過去與未來
朱榮智	菲律賓小學華語課本的新編與審修
夏誠華	戰後菲律賓政府非化政策對華文學校之影響
張上財	華語族群資本發展對東南亞華人教育之影響
郭譽玫	“TWO WAY CULTURAL INTERVENTION : AN URGENT MISSION FOR TODAY'S CHINESE EDUCATION IN SOUTHEAST ASIA” (美國與東南亞華人教育之比較)
周正偉	淺論美援與中華民國僑教之關係
陳欣欣	澳門教育現況與問題 —— 普及義務教育推行的困境
李美燕	香港新亞的人文教育 —— 由新亞書院到新亞研究所
Charles A. Coppel	“SHOULD THERE BE CHINESE SCHOOLS IN INDONESIA ?” (印尼應有華文學校嗎?)
唐潤洲	印尼華人社會問題之探討
Margaret Bocquet-Siek	“EDUCATION AND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IN INDONESIA” (印尼教育與中華文化認同)
郭全強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展望
鄭永常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回顧與展望
林水樓	馬來西亞小學及中學華文教育的發展
L. Ling-chi Wang (王靈智)	“INTEGRATION OR SEPARATION IN A SHRINKING WORLD :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AL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緊縮世界之整合或分離：後冷戰時期海外華人教育政策與策略)



報告人	題 目
鄭良樹	論大馬華人教育的落地生根
張榮輝	正視南向政策中一顆最燦爛的明星 —— 談馬來西亞華人文化教育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 一個異域文化教育的現實、理想與希望
Teresita Ang See (洪玉華)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PHILIPPINE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菲律賓的華語教育: 問題與前景)
吳文煥	華文在海外的實際使用價值
崔貴強	新加坡雙語教育政策的推行、成效及影響
黃建淳	檳榔嶼中華學校 (1904-1911) —— 兼述與清末政局的關係
古鴻廷 顏清梅	新加坡「南洋大學」的創立與關閉
劉黎芬	泰北華文教育之現況及展望
Supang Chantavanich & Somkiat Sikharaksakul	“PRESERVATION OF ETHNIC IDENTITY AND ACCULTURATION: THE CASE STUDY OF A HAINANESE SCHOOL IN BANGKOK” (民族認同的維繫與濡化: 海南學校的個案研究)
Elsa Gibbons (鍾燕傑)	“CHINESE STUDIES IN AUSTRALIAN SCHOOLS” (澳大利亞的中文教學)
阮祿	胡志明市華人接受華文教育實況
杜進參	當代越南華人教育情況的概述
朱宏源	東南亞華人教育發展之我見; 兼論「台北綜合討論學校」的設立

## 甲午戰爭一百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

吳志鏗\*

「甲午戰爭一百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所主辦，於一九九四年六月廿五日至廿七日假該校綜合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行三天。由於今年適逢甲午戰爭一百週年，而甲午戰爭對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影響至深且鉅，師大歷史系主任兼所長王仲孚先生早在兩年多以前即有構想，擬針對此一影響重大的歷史事件做一回顧檢討，遂有此次會議的召開。

會議由王仲孚主任主持開幕式，接著由師大校長呂溪木博士致詞，向與會的中外學者致意。隨後即由師大歷史系李國祁教授作專題演講，並展開為期三天十一場次的研討。大會邀請出席與會學者共百餘名，另有關心此次會議的專家學者自動參與，將可容納二百人的會場擠得水泄不通。除本國學者外，尚有遠自加拿大、日本、韓國及大陸等地區的學者參加。與會學者共發表三十二篇論文，茲將各篇論文作者、篇名及論文要旨依序簡介如下：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李國祁教授專題演講：〈中日甲午戰爭的時代意義〉，認為甲午戰爭中敗日勝的結果，象徵屬於日本的新時代的來臨，以中國為主體的傳統時代業已結束。此後中國改採模仿日本的近代化模式，而日本則成為中國的頭號敵人。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林明德發表論文〈甲午戰爭與近代國際關係——評李鴻章的戰時外交〉，從國際政治的觀點出發，探討甲午戰爭時期國際情勢的演變過程及清廷肆應此一變局的始末，認為甲午戰爭的

---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爆發，係在英俄對立的形勢下，日本利用這種矛盾，取得英美的支持所發動的侵略戰爭。

加拿大 New Brunswick 大學徐乃力教授發表論文〈約翰福斯特與甲午戰爭前後之中美關係〉，以退任的美國國務卿約翰福斯特（John Watson Foster）為中心，探討身為中國政府顧問的福斯特在馬關議和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從而觀察當時的中美關係。

山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戚其章教授發表論文〈中日甲午戰爭與遠東國際關係〉，分析英俄兩強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介入甲午戰爭，致使遠東國際關係益趨複雜。而日本當權者應付裕如，清朝則病急亂投醫，終至走上屈辱乞和的道路。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張啓雄發表論文〈近代日本改造「中華世界帝國」世界秩序——以《清國征討策案》為中心〉，認為日本自古即有爭天下的傳統理念，其發動甲午戰爭的目的，係欲取代清朝而成為「中華世界秩序體制」的領導中心。

中興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王良行發表論文〈甲午戰爭與中英經貿關係〉，對甲午戰爭前後中英經貿關係的變化予以數量化的比較分析，所得結論是：中英經貿關係在資本流動方面有相當顯著的變化，至於此種變化受甲午戰爭影響的程度則仍未能確定。

韓國梨花女子大學教授全寅永發表論文〈中日甲午開戰與俄國外交政策〉，採「甲午戰爭是國際關係的產物」的觀點，探討俄國的遠東政策。本文指出俄國對朝鮮政策和立場主要在維持現狀，其對中日甲午的開戰並無確立堅定的方針，只是密切注意英國的動態而已。

韓國全州大學教授金鐘潤發表論文〈東學農民戰爭與中日甲午戰爭〉，從東學黨的宗教團體性質轉為斥倭洋的排外團體著手，檢討日本出兵朝鮮乃至發動甲午戰爭的目的。作者認為保護日商在朝鮮的經濟活動亦為日本出兵之重要原因。

故宮博物院莊吉發教授發表論文〈甲午中日戰爭期間翰詹科道的反應〉，探討甲午戰爭期間翰詹科道的言論，發現這些言官的議論亦頗具參考價值，可供朝廷集思廣益，因而認為將中國的失敗歸咎於清議的不負責任，是不客觀的。

淡江大學歷史系鄭樑生教授發表論文〈甲午戰爭前夕中日兩國動態〉，說明日本蓄意挑起對華侵略戰爭及其處心積慮的佈署，而清廷則完全處於被動的、自衛的應戰。

國防部史政局傅應川局長發表論文〈中日甲午戰爭陸戰型態之比較研究〉，從軍事學的觀點出發，指出日本明治維新的建軍能掌握戰爭型態的發展趨勢，而清朝則僅止於學習西方的船堅砲利，故面對日本的挑戰只有一敗再敗了。

三軍大學高級教官方一鳴上校發表論文〈甲午戰爭之戰爭指導〉，從戰爭指導的宏觀角度，比較中日雙方在認識戰爭、戰爭準備指導、開戰前指導、戰爭遂行指導、終戰指導等之優劣。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王家儉教授發表論文〈李鴻章的海軍知識與海權思想〉，認為李鴻章不斷吸收海軍知識，發展出遠洋防禦的海權思想，與日漸成長的日本海軍力量產生黃海制海權的爭奪，而為控制黃海制海權，必先求控制朝鮮半島，中日衝突遂不可避免。

中興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王英男發表〈北洋艦隊與甲午海戰〉，綜述豐島及黃海海戰的經過。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吳志鏗發表論文〈甲午戰爭中吳大澂與所部湘軍的表現〉，透過吳大澂及所部湘軍參與甲午戰爭的過程，觀察湘、淮軍等勇營在晚清的變革，發現勇營為求「經制化」而「綠營化」，因而沾染綠營習氣，以致在甲午戰役中不堪一擊。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王爾敏發表論文〈甲戌日軍侵台清廷之援防因應〉，探討日軍侵台後清廷之軍事應援及佈防情形，發現台灣官吏俱能克盡職守，情報訊息密集，未嘗稍有疏忽，關鍵只在清廷決策儒緩。

日本中京大學教授檜山幸夫發表〈戰爭終結條件と講和外交 — 割地條項をめぐって〉，從日本內部對停戰條件要求的不斷擴大至馬關條約的締結，探討甲午戰爭的歷史意義及其時的外交特色。

政治大學教授藤井志津枝發表論文〈中日甲午戰爭與日本的大陸浪人 — 其思想及行動〉，說明大陸浪人的思想及行動具有極端之優越意識和劣等意識夾雜的狹義愛國犧牲精神，日軍當局加以利用因而挑起甲午戰爭。

大同商專教授林子候發表論文〈中日和議與三國干涉〉，從甲午戰爭

中和議的醞釀、進行乃至條約簽訂的過程，了解列強的出面調停或干涉還遼，全是出於自己的私利。

中山大學教授葉振輝發表〈台灣割讓前的外援交涉〉，討論清朝方面於割讓台灣前後企圖在外交上尋求俄、德、法、英等國的支援，希冀保全台灣。

台灣師大講師邱榮裕發表〈從日據時期台灣官方史蹟調查報告談乙未戰役〉，根據台灣總督府史蹟調查報告重點介紹日軍侵台經過。

中興大學歷史系教授黃秀政發表論文〈劉永福與乙未反割臺運動〉，探討劉永福在乙未反割臺運動中的地位與表現，認為劉永福支撐殘局，出面領導台灣紳民抵抗日軍，迫使日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這是劉永福的重大貢獻。

台灣大學副教授吳密察發表論文〈乙未台灣史事探析〉，探討台灣割讓、台灣民主國的成立及台民抗日等問題，企圖對當時台灣社會做一個解釋性的說明。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吳文星教授發表論文〈民友社與台灣〉，研究「民友社」在日本取得台灣和治台初期所扮演之角色和作用，從而斷定日本的知識分子對鼓吹領有台灣，實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員李恩涵發表論文〈中日甲午戰爭後列強對中國鐵路、礦務利權的攫奪〉，探討列強在甲午戰後十年間對中國鐵路與礦務利權的攫奪，認為列強之所為，絕非單純的經濟性投資，對中國之主權與自辦鐵路、礦業等，都發生非常不利的影響。

福建師範大學林慶元教授發表論文〈甲午黃海戰役的結局及其在近代海戰史上的意義〉，從中日雙方的海軍軍備、戰術、戰略等著手，分析勝敗之由，並申論其時代意義。

中興大學歷史系蔡慧玉教授發表論文〈保甲制度撤廢論爭：從「寓自治於撤廢」到「寓撤廢於自治」〉，討論地方士紳於終戰前夕推行撤廢保甲制度運動之實際效益與歷史意義。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張玉法院士發表論文〈甲午戰爭對山東的影響〉，析論甲午戰爭對山東所造成的直接、間接影響，及地方政府所作的善後與復員的工作，認為甲午戰爭對山東的影響基本上是負面的，直到一

九〇〇年後始有開創性的建樹。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劉德美發表論文〈馬關條約與杭州之發展〉，探討杭州人受馬關條約開放杭州為通商口岸及設立租界的刺激，有識之士遂積極行動，致力提倡新式教育、發展實業及交通，奠定近代杭州教育及經濟發展基礎。

國史館卓遵宏處長發表論文〈甲午戰爭與清季貨幣金融改革潮（一八九四～一九〇〇）〉，認為甲午戰敗，清朝不僅財政陷於困境，且導致列強爭逐在華經濟利益，國人為挽回利權，乃興起改革貨幣金融之要求，對近代中國貨幣金融的發展具有劃時代的影響。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李國祁發表論文〈清末國人對中日甲午戰爭及日本的想法〉，析論當時及事後國人對此一戰爭及日本的想法，認為其時唯李鴻章對日本野心及中國實力有較清楚之認識，並認為黨爭對戰爭失敗應負相當責任，而割台的影響則潛伏了中國遺棄台灣的怨尤。

日本愛知學院水野明教授發表論文〈日本侵略中國思想的檢證〉，說明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思想的形成，是豐臣秀吉以來四百年來的傳統思想。

國民黨黨史會副主委陳鵬仁教授發表〈論日本學者對甲午戰爭之看法——評介信夫清三郎的《日清戰爭》〉，評介《日清戰爭》一書，分析該書甫出版即遭禁止，乃因引用日本外務省的資料證明日本如何炮製甲午戰爭，提供了反日本帝國主義的最有力的理論武器。

大體而言，此次與會出席學者多為國內外中國近代史及台灣史的專家，各篇論文分就甲午戰爭的四個議題「戰前的國際外交局勢」、「海戰與陸戰」、「馬關議和與割台」、「結果與影響」進行討論，從各種歷史的角度切入觀察，探討此一複雜的歷史事件。

議程最後為綜合討論，由王家儉、王啓宗、李國祁、王仲孚四位教授共同主持，與會學者發言熱烈，認為此次會議學術討論氣氛濃厚，一致肯定這是一次成功的學術研討會，並建議師大歷史系所往後繼續辦理類似研討會，俾便國內外學者齊聚一堂，共同研討，以促進學術交流，提升研究水準。

## 「商人與地方文化」研討會

蔣竹山\*

### 一、會議緣起

「商人與地方文化」研討會，係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主辦，華南研究會協辦，於一九九四年八月八日至十一日，在香港科技大學所召開的國際學術討論會。這次研討會為科大人文學部華南研究會「華南歷史與文化研究計劃」的一部分，該計劃是前科大人文學部徐泓教授與講師蔡志祥博士聯合發起的，華南研究計劃一方面希望透過對官方、民間文獻的研究和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對包括閩、粵、港、台等華南地區的歷史和文化有深度的了解；另一方面希望藉比較及交流，把華南地區與中國以至世界的文化、政治、經濟體連在一起。一九九三年一月於香港科大舉辦的「民間文獻與華南地域社會」研討會，就是該研究中心根據上述方向所召開的首次學術討論會。

有關近代對商人和貿易的研究有三個取向：史學家研究明清以來商人與國家的關係，社會學家嘗試描述企業精神和商業經營，近代中國的研究者則嘗試解釋八十年代商業活動的發展。這些不同研究的一個共同點是，這些研究都與文化有關；但是，由於對中國商業的長期發展缺乏深入的探討，加上對商人和地方社會的互動關係缺乏細緻的研究，所以商人與文化的問題，尚未達成共識；而本研討會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夠為達到此一共識做點貢獻。參加此次研討會的學者，除了香港、海峽兩岸外，還包括美、英、日、澳洲、加拿大、及新加坡等地的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者及傳

---

\*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研究生

播界人士。會議進行前，大會請到了徐泓教授做〈明清商人與城鎮社會變遷〉的專題演講，徐教授分別透過社會關係、價值觀念、及社會結構的改變，描繪明清時期的這些社會變遷與商人的關係。三天的會議一共分為十個主題，共發表了二十八篇論文，其中三篇沒有文章，只以口頭報告方式進行，以下則針對論文主旨，概略介紹如下：

## 二、會議議程

### 第一場 創造生意

主持：劉志偉（中山大學） 評論：錢江（香港大學）

1. 〈香山商人的投機傳統〉 黎志剛（新英倫大學）
2. 〈商業社區：香港新界一移民社區的建立〉 廖迪生（香港科大）
3. “Peasant Entrepreneurs and State Institutions in 1990s: Cas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一九九〇年代的農民企業和國家制度：珠江三角洲的個案〉 麥鴻輝（匹茨堡大學）

(1)黎文為未完成的論文提要，其章節名稱分別如下：1.投機與現代企業家精神、2.香山商人冒險精神的源流、3.香山商人對現代企業的投資、4.流寓澳大利亞的香山商人對近代百貨業的投資策略、5.香山商人的投機傳統與中國經濟現代化。作者主要參考歷代刊行的《香山縣志》、《中山文史》、《申報》《廣肇公所檔案》、《雪梨中華商會檔案》、香山商人的文集及回憶錄、和近人研究香山縣的成果來探討香山縣商人為何能成爲一群具有冒險奮進；獨具創新精神的現代企業家。本文主要想引發一個問題：香山商人是不是有一個投機傳統？若有的話，這一傳統對不同地區的香山商人及中國工商交通企業的發展有何正及負面的影響？

(2)廖文論述新界元朗深灣海邊的一個移民聚落流浮山的形成過程，這一聚落的形式與普通的鄉村聚落不同，其發展與商業有密切的關係。流浮山的發展是建立在蠔業的基礎之上，1949年後，一些沙井蠔民在流浮山一帶定居，從事養蠔行業，以生產蠔鼓及蠔油爲主。1962年流浮山公路接通之後，運輸到市區的問題獲得解決，鮮蠔便成爲流浮山的特產，運銷至市場及酒家，由於流浮山是香港唯一的產蠔地區，故成爲吃海鮮的地方；另



外加上一廈村地方領袖也在該地開辦一家以吃生蠔為主的酒家，所以流浮山的飲食業隨之興起。1980年代以來，流浮山由於水陸方便，加上蠔民在兩岸的關係和他們已發展的水路網絡，使流浮山成為珠江口沿岸的一個活海產批發中心。流浮山的移民大多來自沙井，並且是同一宗族成員，但他們並未以宗族模式來整合社區及直接挑戰廈村大宗族的權威；而僅以蠔會、街方會及商會的名義來組織，這種商業性色彩，使得流浮山並未有任何代表在廈村的地方諮詢機構「鄉事委員會」中。流浮山蠔業的發展特性與廈村地方領袖的地方發展模式相吻合，在相互依賴的情況下，形成了一個以商業為主的新社區。

(3)麥鴻輝一文主要是以1990年代珠江三角洲中山縣的一個匿名村為個案，探討在鄉村經濟已大量市場化的情況下，農民企業家如何與國家制度（地方政府、國家和集體企業）打交道？其結果如何？作者認為珠江三角洲的官商交易相當頻繁，國家權力已經滲透至「村」級政府，此地區的商人在一些例行的商業經營中必須與政府接觸，其情況有三：1.必須在國家的法律規章的局限下從事商業行為，2.商人必須利用公共財產經營商業（例如：土地使用權的轉移），3.有時必須與國營企業進行貿易。從實際的探訪當中，作者觀察到一些鄉村企業發展過程中的有趣現象，例如：政府幹部私下經營企業，個體商人成為國營企業的股東，商人租用集體財產，政府部門的貪污現象。雖然農民企業家必須不斷地與擁有重要地位及資源的村政府／幹部建立關係才能從事商業，這之中包括必須投資大筆資金在雙方關係的建立上，但最後所獲得的利益遠超過所付出的「公關費」；此外，擁有這層關係的商人亦較無關係者有利。這顯示了，此地區的國家社會主義促進了個體商人與國家代理人的互動，這些實際有助於鄉村資本主義的興起。

## 第二場 超越鄉土

主持：鄭振滿（廈門大學） 評論：張瑞威（牛津大學）

馬木池（香港科大）

- 1.〈清代天津商人與社會慈善〉 邱仲麟（淡江大學）
- 2.〈寧波商人的運棺網和雇傭網〉 刈帆浩之（東京大學）
- 3.〈由「會館、公所」到「商會」：試論清代蘇州商人團體中的「同鄉關

係」) 邱澎生(臺灣大學)

4. “Township Business Networks and Religious Processions in the Making of Local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Taiwan”〈臺灣的城鎮商業網與宗教活動對地方文化與認同的塑造〉 Joseph Bosco(香港中文大學)

(1) 邱仲麟一文主要透過探討清代天津商人與社會慈善活動的關係，觀察天津在清代歷史過程中，商人社會地位的發展過程；並與近代學著所研究的重心——長江流域慈善活動做一比較。清前半期，天津商人在慈善救濟的角色，雖然有不少是士紳邀商人共議，但大多數是官僚、士紳先倡議，而商人處於配合、協助的次要角色；但到了清中葉，漸多紳商協力的事例；清末，則商人主動的例子較以前明顯增多，最特殊的例子就是「水會」，水會為天津治安、公共安全的重要力量所在，其組織的出現及其擴大，成為商人在社會救濟中地位日益上昇的指標。總體來看，商人在天津社會慈善中的地位，是有所上昇。此外，在商人參與慈善活動的行業類別上，也從清初鹽商為主的局面轉變至由各業商人參與。當清末商人在社會慈善活動中扮演主導地位時，官方並未完全退出，例如天津地方官僚仍以補助經費的方式來呈顯官方的地位；另外像純由商人辦理的「水會」，在巡警局成立後，也納入其監督之下，分區而不得串連，體現了官方對善會並未完全放任其發展的立場。

(2) 刈帆浩之一文，是他1994年發表於《社會經濟史學》59卷6期〈清末上海四明公所の「運棺ネットワーク」の形成〉的中文節譯本。作者透過對寧波商人運棺活動的分析，進一步考察其間同鄉網絡的社會及經濟性功能。在寧波商業網絡中，四明公所的運棺網與雇傭網路徑一致。運棺網絡形成的意義，是在寧波商業活動圈中形成一種具有組織性、安定性的網絡，對寧波人的生命、財產及產品達到一定的保障。在此網絡上，要打工的寧波人，可以順著網絡的途徑到達外埠；在外的寧波人故去之後，也可以順著運棺網絡回到家鄉，入土為安。對要打工的寧波人來說，具有保障安定生活作用的同鄉關係是重要的戰略資源，寧波幫的商業網絡在交通運輸體系的發達條件之下，促進同鄉人的大量移動而形成有組織的運棺網絡。這是寧波幫勢力壯大的重要因素。同鄉會館的運棺活動是明清時代以來，商幫共有的，但上海四明公所這樣有組織性、且大規模地發展，並形成運棺

網絡的運棺活動，其大量性與組織性，在同鄉網絡中，可說是相當具有近代性性格的。

(3)「會館」、「公所」和「商會」是不同型態的商人團體。但是，歷來學者在論述其間差異時，卻喜用「同鄉關係」的強弱或有無，來作為區分的一項重要標準。邱文的主旨即在質疑此一論點。第一部分首先討論商人團體由「會館、公所」到「商會」的演變過程。作者認為：此演變過程所反映的重要社會變遷意義，並不在於「同鄉關係」是否由強變弱，而在於商人團體形成發展的制度條件出現了鉅大轉變，特別是政府對商人團體態度上所起的鉅大變化。第二部分則討論「同鄉關係」在不同制度條件下對「會館、公所」和「商會」所作的不同作用。作者認為：「同鄉關係」的有無或強弱，並非論證商人團體成員在心態上偏狹抑或開放的標準，而只是「同鄉關係」在不同制度條件下的不同運用方式而已。

(4) *Bosco* 一文，主旨在透過現今臺灣屏東萬丹鄉的宗教活動實例，說明在政治力及商業力的影響下，地方精英如何藉由地方宗教活動達到對地方文化的認同與塑造。作者從萬丹鄉受商業關係所驅使的每年兩次宗教遊行為切入點，發現萬惠宮（媽祖廟）是遊行的贊助者；亦是全鄉的對外象徵及祭祀中心。遊行是一種表達地方認同的最繁複的宗教形式，這些廟宇、遊行都是由地方商人所主導，萬丹鄉的商人網絡除了媽祖廟管理委員會以外，尚有扶輪社，透過廟宇的管理及舉辦宗教遊行，這些商人從中獲得了地位；此外，當政治人物需要創造出一種支持及代表地方居民形象時，地方派系亦會利用宗教活動所帶來的地方認同象徵。

### 第三場 東南亞的華商

主持：Brown R. (倫敦大學) 評論：李培德 (東京大學)

1. "Hokkien Merchant Society in Manila since 1945" 〈一九四五年以來在馬尼拉的福建商人社會〉 Edgar Wickberg (加拿大哥倫比亞大學)

2. "Merchants and Sojourning Communities: the Hokkiens in Java during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十七、十八世紀爪哇的閩南商人與僑居社區〉 錢江 (香港大學)

(1)馬尼拉是菲律賓最大的華人移民地，擁有約 50 萬的華人，Wickberg 一文主要在探討 1945 年以來，馬尼拉的福建商人社會與文化。作者以 1945

年為分野，敘述華人社會的改變及沿續，雖然文中涉及到家庭生活、教育、語言、文學、宗教、及通俗藝術等等，但焦點乃在商人的自願性組織與認同問題。

(2)本文乃作者博士論文的一部分，主要探討十六、七世紀移居爪哇的閩南商人的商業、政治及人際關係網絡問題。早在歐人東來之前，閩南商人在爪哇的僑居社區就已有自己的僑領——「甲必丹」，直至荷蘭東印度公司來此才設立較嚴密的甲必丹制度。以甲必丹為首領的這一權力中心對內負有維持秩序、傳達並執行荷蘭東印度公司指令之責，對外身兼維護僑居閩南同鄉的利益。與此同時，巴達維亞的閩南商人僑居社區在十七、八世紀一直扮演著爪哇各閩南社區領導中心的角色，可見爪哇的閩南商人不僅有自己的商業網絡，而且還建立起自己的政治網絡。為了密切保持與閩南家鄉以及社區內廣大閩南同鄉的良好關係，僑居社區的權力中心還大力倡導建立各類形式的廟宇，使之成為與權力中心相互呼應的社區活動中心。閩南商人成功的祕訣在於他們擁有各類關係網絡，首先是人際關係網絡，正是依仗著這些關係網絡，他們才得以在明清政府的歧視下，以及東南亞歐洲殖民政權的迫害下，成功地立足於海外。

#### 第四場 南中國的女性形象：聲音與緘默

主持：洗玉儀（香港大學） 評論：淨尾葉子（大阪外大）

白得雲（匹茨堡大學）

1. "Images of Mother, the Place of Women in South China" 〈母親的形象：華南地方的婦女地位〉 David Faure（牛津大學）
2. 〈女性形象的重塑：「姑嫂墳」及其傳說〉 劉志偉（中山大學）
3. "Does Sixth Aunt Have an Alternative? – Women and Marriage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清末民初廣東木魚書中的女性與婚姻〉 程美寶（牛津大學）
4. "Locating Woman's Voice: Chinese Bridal Songs in its Social Context" 〈婦女聲立的位置：中國的婚歌及其社會脈絡〉 陳永海（耶魯大學）

(1)在嶺南社會和文化逐漸歸化到統一的「中國文化」過程中，對女性形象的重塑，是士大夫在地方社會進行「教化」的重要手段之一。劉文即是透過廣州北郊一處宋代女性墓葬——「姑嫂墳」及其傳說的轉變，表現

這種歷史文化過程。有關姑嫂墳傳說的文字紀錄，共有三個版本，這三個版本的情節是「姑」矢志不嫁，與嫂相依為命。其中乾隆《番禺縣志》與民間口頭流傳的類似，所強調的是一個關於姑嫂之間相處融洽的故事，凸顯了以女性為中心的主題；至於《姑嫂墳碑記》及《書外海陳姓家譜後》的記載，則加入了姑嫂孝敬父兄及姑嫂共同撫育遺孤的情節，如此，原先故事中女性為中心的主題轉換成一個男性中心的主題；故事主角——姑和嫂原有的土著文化傳統體系中的女性形象，被按照士大夫的倫理價值規範重新塑造之後，成了正統士大夫文化體系中的女性形象。

(2)科文的主旨在透過文人為紀念母親所寫的傳記、及族譜資料，來探討15世紀以來華南地區的婦女地位及其轉變。作者解釋使用這些文人資料的原因是較易詳述個人對母親的感覺，這些資料包括了家庭情況，它給予我們婦女具有妻子及母親的雙重管理角色的印象。作者關心的焦點在於藉由比較由作家與不同社會背景所描繪的母親形象，來分析在商人家庭的母親與在士人家庭的不同。作者的結論是無論婦女是否處於商人家庭，母親的形象都是被描述成傳統中的一部分，而非特別的類型，母親是家庭安定的提供者、優美的典型、及家庭的管理者。

(3)廣東地區的方言文學——木魚書有許多是記載地方的風俗習慣，程美寶透過木魚書中的兩個特殊主題「三姑回門」及「六姑回門」內文的分析，探討婦女從口頭傳統到書寫傳統的角色轉變。這兩個主題內容都是集中在描述廣東的地方結婚習俗，其中婚歌歌詞佔了三分之一強。在香港大學所收藏的158本木魚書中，超過100本有團圓的結局，這種對待婚姻的看法，反映了「三姑回門」及「六姑回門」的故事如何從口傳的婚歌傳統簡化成書寫傳統。作者最後反駁了先前學者認為木魚書是民間的、地方性的、及女性的三點看法，第一、木魚書故事中的和諧的家庭關係及適當的婚姻關係代表了士大夫的道德期許。第二、說木魚書是地方性的，可能忽略了木魚書中的語言並沒有地域特色；以及木魚書只在幾個大城市印刷，其商業特質歪曲了地方習俗。第三、說木魚書是女性的，可能太過強調它的商品化聽眾層面，而忽略了它的作者及出版者，木魚書的口語傳統是來自女性，但很可能是由男性將其簡化、理想化成書寫形式、透過重新詮釋木魚書的文本脈絡，作者認為「地方文化」的概念研究必須再加思索。

(4)婚歌是本世紀 60 年代香港農村地區的中國新娘在離開娘家，前往新郎家前唱的歌。陳永海這篇文章根據在新界農村的田野調查和文獻研究，以人類學對儀式歌的研究角度，對婚歌的儀式現象提出了與先前兩位人類學家 Fred Blake 及 Emily Martin 不同的解釋。作者認為研究婚歌時，應把婚歌置於它的社會脈絡中，Martin 的缺點是完全忽略了儀式的社會背景，及剝離了婚歌的社會脈絡；Blake 則認為：「對新娘來說，婚姻使她“不可逆轉的完全脫離她的娘家”」，作者認為這種論調是不準確的。陳指出，中國婦女在婚後仍與娘家繼續保持關係，並未完全脫離以前的社會關係。婚姻有許多種形式，但只有那些以正統形式結婚的新娘才有權唱婚歌。作者對婚歌的兩個顯著特色提出了自己的解釋，首先，她以為婚歌中有關死亡的比喻和新娘與娘家的關係有關，這種比喻可能與娘家在婦女死亡時的角色扮演此一風俗有關，死亡的主題實際上是指出娘家的靈位。其次，婚歌中死亡、地獄的主題戲劇性地劃分了新娘的娘家與夫家的界線。透過婚歌的討論，作者強調，研究儀式時，應把它置於社會脈絡中，而且儀式行為與權力之間的複雜關係不僅適用於統治階層；也適用於被統治階層中的個人及團體。分析者應注意不同權力關係的交錯，婚歌既是處於社會系統之內的婦女聲音；亦是團體的聲音。

#### 第五場 擴展的空間：在邊緣的活力

主持：劉義章（香港中文大學） 評論：程美寶（牛津大學）

1. “Abandoned into Prosperity: Women on the Fringe of Expatriate Society” 〈走入繁華：海外雇員社會邊緣的女性〉 Carl Smith（香港皇家亞洲學會）
2. “The Women Traffic in the 19th Century: Women as Traders and Women as Commodities—a Paper Based on the Testimonial at the Pok Leung Kuk Archives” 〈十九世紀婦女的販賣：女性的商販及被賣者——根據保良局檔案的難民口供資料〉 洗玉儀（香港大學）

(1)施其樂一文主要透過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香港的一些海外僱員社會邊緣的女性的個案，來探討在如此特殊的歷史情境下，這些女性的角色扮演與傳統中國父權體制下的有何差異？十九世紀那些「走入繁華」的大部分女性是來自中國的邊緣團體，例如蜑民。根據作者所舉的六個例子，

當一個中國婦女與非中國人的男性連姻後，中國婦女獲得了一種較無局限的獨立角色。這種異於傳統中國父權家庭的新關係，使得她只對一個男人有責任。大部分時間，她的保護者／丈夫在忙自個的事業，因此有時間經營她的事業；有時雙方短暫的分開，有助於婦女對可能的永久分離關係做一經驗培養。這些婦女有許多機會在商業及財政上經營，除了投資地產外，尚有資助貸款公會、放貸、開妓院、買賣小孩、收養女孩賣淫、及做外國人妾等等。

(2)洗玉儀的報告是延續作者有關香港東華醫院與保良局的研究，會中她透過保良局檔案中的難民口供資料，介紹了十九世紀香港的女性商販與被賣者；並探討有關妓女的組織化企業問題。

#### 第六場 農民的女兒、商人的女兒

主持：David Faure（牛津大學） 評論：麥鴻輝（匹茨堡大學）

1. "Breaking Through the Family Boundary: Women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Southern China" 〈超越家庭：十九世紀晚期及二十世紀初期的南中國婦女〉 蔡志祥（香港科大）
2. "Transplanted Identities: Women Migrant Workers in Shekou" 〈殖入的認同：蛇口的移民女工〉 譚少薇（香港中文大學）
3. "Charming Power: Women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魅力：香港的專業婦女〉 蕭鳳霞（耶魯大學）

(1)蔡志祥的論文只是口頭報告，主要關心層面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南中國婦女如何走出家庭。透過這個時期潮州、珠江三角洲的土地契約，我們可觀察到若是夫婦共買而非繼承，以女子為名比例較高，但基本上婦女所處的仍是「家庭」世界，無法向外跨出。相對地，在外國制度（非中國傳統）環境之下，才會在商人家庭出現婦女超越家庭的情形。

(2)譚文是以 1988-1989 年在廣東蛇口工業區作的田野調查為個案，探討移民女工——「打工妹」的個人認同問題。「打工妹」此一名詞包含了新的階級及家庭關係。當外來女工進入蛇口經濟特區被貼上打工妹／外來妹的標籤後，象徵了一種新的社會存在形式、生存策略的改變的需求、新社會資本的累積、及不同文化資源的控制的出現。當他們參與工業區的文化（蛇口文化）建設時，他們即可享受到新的權力，在這一過程當中，打

工妹正經歷了一場「文化轉換」。作者透過下列幾個單元來分析，1.工作生活的例行化、2.休閒生活的例行化、3.香港通俗文化的影響、4.宿舍生活：階級及性別的場所、5.婚姻、暫時的抵抗、家長的控制、6.目標蛇口：意圖及能力。

(3)蕭鳳霞一文是篇未完成的文章，首先探討在毛澤東解構了中國多元、商業化的地方文化及今日的南中國的變質後，這些轉變對政治邊緣兩邊的婦女有何影響？其次，分析香港的職業婦女與地方文化的關係，以便和譚少薇所研究的蛇口女工的經驗及自我形象作一對照。何者是香港職業婦女的特質？雖然經過數十年的不斷改變，香港婦女已獲得不尋常的地位，但大眾輿論仍然將他們的嶄露頭角與其專業能力不相干的因素相聯想。少有「女強人」像1993年被任命為香港政府主要祕書的Anson Chan一樣，受到輿論如此的尊敬及崇拜。Anson Chan的特質在哪？在香港歷史及發展的特別結合，它們如何反映社會的關注及期待？作者認為其中一項重要因素是，香港專業婦女齊集了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專業能力婦女的特性於一身。

#### 第七場 在外國制度下的華商

主持：濱下武志（東京大學） 評論：Lisa Fisher（威斯康辛大學）

- 1.“The Transplantation of British Company Law to Chinese Hong Kong 1900–1930”〈英國公司法在香港的華人社會中的植根〉 鐘寶賢（牛津大學）
- 2.“Chinese Network and the Rice Industry of South East Asia, 1870–1941”〈東南亞米業及華商網絡〉 Raj Brown（倫敦大學）
- 3.“The Strategic Alliance of Wing On and Ssiyu”〈永安和西友的策略性聯合的發展〉 王美玲（香港城市理工）

(1)鐘文主要在探討1900–1930年殖民地香港商業習慣中的兩種集資傳統；以及在當時政治環境的影響下，這兩種方式如何在香港及南中國運作。作者所謂的兩種集資方式，分別是1.前現代時期，易受各種政治的、宗教的、及道德勢力檢驗的財富累積，是在家庭、宗教及共有組織的保護範圍下（例如：家族）。2.現代資本主義時期，財富累積的基本形態是眾人在契約關係的建立下，以聯合股份合作的實體形式進行，這種合作的觀念，



最後形成一種以公司法來保障的方式。透過 1987 年的實際法律案件看來，作者發現中國公司在遇到爭端時並不以英國公司法來解決，顯示了英國公司法對於中國公司的日常運作的影響力相當有限。在檢視英國公司法植入香港的過程中，作者得出三點結論。第一、當英國公司法與亞洲殖民地舊有的習慣相衝突時，中國不同於英國另一殖民地——印度，中國傳統信用在英國的統治下，未享有法定認可。第二、香港的公司法只被少數中國商人利用，由於缺乏股票市場和便易的銀行貸款制度，其信用是透過具有「有限責任」( limited liability ) 的連鎖姊妹公司所建立；然而，在資本累積的過程中，公司法的採用，並未削弱家庭及區域性商會的重要性。第三、爲了保護在中國的商業，而非由英國法律保障，中國商人必須仰賴他們在中國所培養的「政治性援助」。

(2) Raj Brown 一文首先探討中國商人在檳榔嶼、新加坡、及西貢的稻米網絡；其次，以 Lam Sam 爲例，分析中國米商在錫蘭應付外商（印度、泰國）競爭的商業策略。直到 1920 年代，稻米網絡的建立才顯現出對中國商人經營制勝的重要性。但到了 1930 年代初期，中國米商面臨了更改結構的局面，他們以縮減稻米網絡至次級位置的方式來因應。例如 Lam Sam 採取一種聯合組織、吸取外資的方式進行擴張策略，但這些都在中國家庭的控制之下，這反映了東南亞華商的企業是以家庭爲基礎，所強調的是家庭網絡的重要性。

(3) 王文的焦點在於探討香港永安企業與日本西友集團策略性聯合進行國際性冒險投資的背後動機？在與西有合作超過四年後，這些策略性聯合如何影響永安的發展？爲何永安作這些改變？與之前作策略性聯合研究的學者不同，作者研究的主題以本地公司——「永安」爲主。永安與西有聯合的動機是在外國百貨強敵環繞的壓力下，利用西有這個有勢的投資資源，在聯合之後，永安可以到中國及東南亞投資。由於與西有聯合，永安已改變許多百貨公司經營的方式。例如組織國際化，及與不同的次要伙伴建立交錯的股東網。此外，它可冒較少的風險，與聯合伙伴分享資源及負較低的稅。策略性聯合使永安可將資本移出至大陸投資，並可將資金分散至其他地區，最後永安則變成有利潤的公司。

第八場 地方認同的再造

主持：蕭鳳霞 評論：黃永豪（香港科技大學）

1. 〈晚明徽州商人的文化活動 — 以徽商族裔潘之恆為中心〉 林皎宏（台灣大學）
2. 〈吳城商鎮發展中的神廟系統演變〉 梁洪生（江西師大）
3. 〈1930—40 年代天津獨流鎮商人的宗教與社會活動參與 — 以在理教為例〉 蔣竹山（台灣清華大學）

(1)林文主要是透過晚明徽商族裔潘之恆生平交游及其參與文化活動過程，探討三個主題：1.晚明商人階級的興起與當代社會、文化變遷的關係。2.晚明徽商「賈而好儒」現象表現在文化活動的參與特色。3.晚明徽商文化活動的特質及其探討。在徽商文化活動的特質方面：首先，從文化活動的參與與經營方式來看，徽商重視家族，以宗族或鄉誼組成交際網絡的特色同樣表現無遺，例如潘之恆整個家族幾乎均熱衷於投入「刻書」的文化活動。其次，徽商在參與文化活動或經營文化事業時，經常表現出求新求變、不拘門戶之見，容易接受新生事物的獨到眼光；此外，徽商對當代新思潮或域外新奇事物的興趣同樣表現在其文化活動上。最後，最難評價的特質是徽商在從事文化活動時，往往是千金一擲，傾囊相搏的。

(2)梁文所述，旨在說明江西吳城鎮這一社區中，民間神廟際祀如何隨著商運業的發展而演變，以展示當地的經濟 — 社會 — 文化史的進程。首先，作者認為商鎮的早期發展與由經堂寺、龍王廟、令公廟組成的東部神廟群有密切的關係，該神廟群加上望湖亭合作吳城這一商運市鎮的外在文化象徵。之後，商運口岸的最終形成，造成了自身商業區的繁榮，也創造了新的文化形象，例如萬壽宮即代表了吳城工商業匯集活動的中心所在。到了咸、同以後，傳統大庾嶺商道逐漸衰敗，商運日益倚重木材業。這種轉變維持了商鎮一定程度的繁榮，也刺激了一部分資金較為雄厚的商人的發展，並使他們在地方事物的管理中，凸顯了地位。代表地方政府的管理層，出於加強稅收、治安的考量，顯然對這些商人給予支持。原本為外來小神的聶公逐漸成為主神，就是二者結合後控制社區生活的象徵。最後，作者在結語中提到，雖然本文對吳城商鎮的三個神廟系統做了歷時性的線條描述，但是直至民國，他們仍在互相影響。

(3)蔣文主要是以《近代中國の社會と民眾文化 — 日中共同研究華北

《農村社會調查資料集》中的獨流鎮在理教訪問資料為主，並參考方志、教內文獻及學者研究等材料，透過兩部分：(一)獨流鎮在理教的源流、組織與儀式，(二)獨流鎮商人與在理教，探討天津獨流鎮地方商人的宗教與社會活動參與。1930-40年代獨流鎮的商業活動相當繁榮，可視為中國近代化的典型象徵之一。在這個以商業活動為主的市鎮中，卻展現了獨有的地方文化風格，其特色是，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民間宗教「在理教」在地方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在理教之所以會在獨流鎮盛行，除了當時社會上吸食鴉片的情況氾濫，吸引了相當多的人加入在理教以外，最主要的因素是地方商人的熱烈參與及經費提供。獨流鎮商人是在理教信徒中，比例最高的階層，他們不只例行性的參與在理教參佛求順的宗教活動「捧齋」；而且日常生活中也奉祀聖宗古佛「觀世音菩薩」，嚴守在理教忌煙忌酒的戒律，及下參的道規。此外，在「在理教」舉辦慈善事業，促進社會大同的宗旨影響下，本鎮的一些自發性及組織性的社區自治活動，舉凡戒煙酒觀念的推行、地方慈善活動（掩骨會、慈善救濟會）、教育（慈善學校）、及消防（水會）等，都是地方商人透過在理教的名義直接參與其中。在宗教信仰與社會活動不斷循環的互動與影響下，在理教成為獨流鎮諸多教派中，最受民眾歡迎的教派。透過獨流鎮在理教這個具體而微的例子，我們看到了地方文化的塑造與商人角色扮演之間的緊密關係。

#### 第九場 商人與地方整合

主持：徐泓（台灣大學） 評論：張小軍（香港中文大學）

- 1.〈明末戲劇與城市民變〉 巫仁恕（台灣大學）
- 2.〈商人廟宇與地方化：樟林火帝廟、天后宮、風伯廟之比較〉 陳春聲（中山大學）
- 3.〈鄉鎮商人會館與地域關係：涵江天后廟研究〉 鄭振滿（廈門大學）

(1)明末發生的多起城市民變，最主要的是反礦稅與反閹黨民變，巫文透過明末清初留下的時事劇本，探索明末民變時大眾階層的態度與看法；另外將這些與士大夫在文集、筆記與小說中的看法做一比較。作者認為士大夫在面對民變問題時，雖然都是站在同情的立場，但是他們卻不贊同這樣的作法，基本上，他們還是希望以合法呈請上控的方式來表達不滿；至

於一般大眾對民變的態度，不僅相當支持，而且極力支持民變領袖。由劇本與小說中所塑造出的民變領袖豪俠形象，充分說明大眾階層喜愛英雄主義的心態。

(2)陳文是作者參與「華南社會史研究計劃」所做的潮州樟林古港調查報告之一的提要。乾嘉年間，樟林港貿易發展繁盛時期建立的三座與商業有關的廟宇——火帝廟、天后宮與風伯廟，被視為該社區歷史上商業和商人活動發展的重要標誌。作者試圖通過對這三座廟宇的比較研究，討論傳統商業社區中「坐賈」、「行商」和地方官員不同的文化行爲，及其與地域社會間複雜的互動關係。全文分爲四部份：1.火帝廟與八街商人、2.新圍天后宮與洋船商人、3.風伯廟與地方官員、4.社會變遷中不同廟宇之命運。樟林作爲一個完整的社區，是八街出現後才逐漸整合形成的，商業和商人活動在其中起著重要作用，隨著八街商人影響力的提高，建於清乾隆八年的火帝廟終於成爲全鄉的主廟，火帝成爲全鄉數十個神廟中唯一可以游遍鄉境的神明。新圍天后宮始建於乾隆五十二年，建廟的費用來自船戶、槽船舵公及嘉應、大埔等韓江上游地區的信眾，天后宮的規模在廣東省首屈一指，但與六社八街內部社會生活似乎未有密切關係。至於嘉慶二十四年由澄海知縣尹佩紳倡建的風伯廟，始終是座官方色彩濃厚的廟宇，尹氏先後五次於嘉慶、道光年間捐款爲風伯廟購置廟產，該廟的司事、和尚亦由其指定，其本人一直把建立風伯廟作爲其任上最重要的政績之一。

(3)鄭文主要是依據福建現存碑刻資料，探討莆田涵江鎮商人組織的演變，及說明鄉鎮商業社區的整合情形。涵江鎮是明末興起的港口市鎮，清乾隆四年，當地商人發起新建了一座天后宮，並創立了相應的興安會館；清後期，興安會館已成爲社區的權力中心，作者認爲興安會館不同於通都大邑的外籍商人會館，其成員都是本地商人，他們不僅關注同業利益，更注重對當地社區生活的有效控制。興安會館對社區的控制，除了像嘉慶十二年，涵江十餘家行商以保護天后宮爲名，要求興化知府禁止附近居民開設灰窯的例子外；更集中表現於涵江天后宮的祭典儀式。

#### 第十場 商人的形象

主持：黎志剛（新英倫大學） 評論：邱仲麟（淡江大學）

1.〈賬簿裡呈現的廣東商人歷史像〉 濱下武志（東京大學）

2. 〈知識分子企業領袖的核心價值、社會參與及文化使命 —— 新加坡兩代華裔企業人生命觀的初步調查、比較與省思〉 楊應正

(1)濱下先生的論文只以口頭報告進行，其大綱如下：1.賬簿研究的課題，2.地方市場與記賬法，3.廣東商人與賬簿，4.廣東商人與交易、金融網。

(2)楊應正是新加坡的傳播界人士，本文配合新加坡的兩個「帶職思考型」知識分子的個案，針對人們對「知識分子從商的挑戰」、「從商的知識分子是否還能保有其氣節」等有關問題作反思、探討及分析。文中嘗試探討1.知識分子的原義、變義、新義和使命，2.知識分子企業領袖的定義，(3)知識分子的生命觀、生活觀與工作觀，4.知識分子生命之根的探索、類型與解說，5.士魂商才的歷史性反思，6.知識分子企業領袖的認知意識及其使命，7.帶職思考型與投入式思考型兩類型知識子的共同使命，8.新加坡知識分子企業領袖思考點子爭議。

### 三、後 記

經過三天十場的論文討論，最後在Edgar Wickberg、David Faure、陳春聲、濱下武志、蕭鳳霞五位學者所引導的綜合討論下，分別就商人定義、商業網絡及地方文化等概念做進一步釐清，雖然引起了與會學者的熱烈討論，但最終仍未能形成共識，做出一致的結論；不過會中學者所提出的各種不同個案研究，的確讓所有與會人士開拓了研究視野。除了三天在香港的論文討論會外，科技大學、華南研究會與「興化民俗文化研究中心」（莆田市社科聯與加拿大麥吉爾(McGill)大學東亞研究所合辦）聯合策畫成立了為期七天在福建莆田、廣東潮州田野調查的工作室，分別考察了福建、廣東商人與地域社會中的宗族、宗教關係，以及商人的商業、社會網絡，使得與會學人對促使商人和地域社會發展的社會經濟環境有了實際、深切的了解。

## 「國際亞洲歷史學家學會」 第十三屆會議

陳 國 棟\*

「國際亞洲歷史學家學會」的宗旨在於組織亞洲的歷史學家，使大家有一個交換亞洲歷史、文化研究心得的機會，而以舉辦國際會議為最直接的手段。自1960年以來，包括今年在內，每兩、三年舉行一次會議，已舉辦過十三屆。

該學會組織的核心為各次大會選出之執行委員會，由一名主席、三名副主席構成。三名副主席分別代表亞洲的三個地區——東亞、東南亞與南亞（西亞的穆斯林世界未參與這個組織），輪流接任主席的職務。主席則負責組織一個籌備委員會，在其任滿前，在所屬的國家主辦一次國際會議。前中央研究院院長王世杰先生曾擔任第二屆主席，因此「國際亞洲歷史學家學會」第二屆會議便於1962年在臺北舉行。此後臺灣不會再有人進入執委會，因此該會也不再在臺北召開。但華人在這個組織中始終扮演重要角色。例如，王賡武教授就曾兩度擔任主席，主辦過1968、1991兩次會議；香港也在1964、1991兩年成為會議地點。1994年的第十三屆會議由日本主辦，會場在東京上智大學（Sophia University）。下屆會議已決定於1996年在泰國曼谷舉行，地點在朱拉隆功大學（Chulalongkorn University），主席為該校文學院歷史系系主任 Piyanart Bunnag 教授。

舉辦會議為該組織最主要的活動，此外「國際亞洲歷史學家學會」並無任何其他定期活動或出版品。因此所有亞洲歷史學家或對歷史研究感興趣者皆得報名參加會議，沒有會員資格的限制。

---

\*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

個人直到今年四月間接獲東京大學岸本美緒教授之邀請，才由她代為報名參與在九月五日至九日間召開的第十三屆會議。岸本教授的邀請其實是受東京大學另一位教授櫻井由躬雄（越南史專家）的轉託。櫻井先生負責籌組會議的一個主要小組（panel）「十八世紀東南亞洲史」，個人因研究主題與十八世紀東南亞貿易有關而幸獲與會，發表論文「1780年代：中國與東南亞貿易的關鍵性年代」，並擔任第二場次（session）的主持人。由於會議分成十一小組同時舉行，因此不可能參與大部份的議程。以下謹就見聞所及、參照會議資料略加介紹，並提供一些個人感想，以供同好參考。

九月五日上午的開幕式由第十三屆主席石井米雄（上智大學亞細亞研究所教授，泰國史專家）主持，由辛島昇（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專門研究中世紀南印度社會史）擔任主題演說（Keynote Lecture），講題「南印度的寺廟碑銘：新研究方向」。當天下午為不分組的研討會（colloquium），總主題為「原生的東南亞歷史學術」（Indigenous Southeast Asian Historiography），共發表七篇論文，分別為：

- 1.Reynaldo Ileto (James Cook University), "The Agenda: From National Histories towards a New History of the Region."
- 2.Taufik Abdullah (Indonesian Institute of Sciences), "Rewriting National and Regional Histories."
- 3.Thanet Aphomsuvan and Charnvit Kasetsiri (Thammasat University),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 History in Thai Historical Practice."
- 4.Maria Serena T. Diokno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Philippine National Historiography and the Challenges of New Paradigms."
- 5.Pham Duc Duong (Institute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Hanoi),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and the Vietnamese Experience."
- 6.Shaharil Talib (University of Malaya), "Singapore (1824-1958): This is My Island in the Sun."
- 7.Mohammad Raduan bin Mohd Ariff (University of Malaya), "The Sulu Sea (1750-1990): The Regionalization of National Histories."

從研討會的主題與各篇論文的題目不難發現：東南亞的歷史學家在最近數

年來對該國或該地區的歷史研究，曾經做過深刻的反省。在過去四、五百年間，東南亞地區大都曾為歐、美列強的殖民地；即便幸免，其經濟、社會與文化也廣泛地受到強勢文明的影響。從地緣與歷史的因素來看，東南亞又受到其腹背的強權——中國——的牽引，因而東南亞的歷史頗具國際的性格。在邦國的統一與文化的獨立發展長期受到威脅的情形下，在國民的經濟與文化能力落後的情形下，東南亞邦國的歷史在過去幾乎都由該地區以外的人來撰寫，使用外國文獻為主要資料。由於非由本土歷史學者主導其歷史寫作，因此撰述的方向也就不以各國的歷史發展為中心，照顧到的問題層面也不完整。例如，華人學者偏重使用華文資料、處理華人在該地區的奮鬥歷程，但往往不能充分處理周遭本土人士所參與的政、經、文化活動。又如歐洲的學者大都對當地的進出口貿易以及該貿易活動對內部經濟變遷的影響感興趣，可是東南亞內地依循自身經濟條件而發生的經濟轉變就沒有被適當地處理。這樣的研究方法，所得到的畢竟是不完整，甚至免不了有所偏頗的看法。現今東南亞歷史學家已有這方面的自覺，他們雖然仍需參考東南亞以外地方對東南亞研究的成果，但是他們更著手去開發本土的文獻，並且以邦國搏成的軌跡導引其思考、研究的方向。這樣的一個發展取向，值得臺灣的學者重視：一方面，臺灣歷史的研究可能也有類似之處；另一方面，臺灣這一、兩年來開始重視東南亞研究，過去在此一領域本地的研究成果極端有限。要朝那個方向展開臺灣的東南亞研究，應當是開拓此一領域的先決問題。如果我們仍究要以仰賴中、西文研究為主，那就免不了無法整合東南亞的「原生」歷史學研究成果；如果我們打算兼顧東南亞當地人對自身歷史、文化的重建與認識，那就該加強東南亞語文及歷史語文的訓練。其實，即使要在中、西文文獻的基礎上建立起對東南亞地區的認識，我們也應培養歐洲語文的能力，特別是西班牙文、荷蘭文、英文與法文。統治過東南亞地區、使用這些語文的殖民母國擁有為數龐大的歷史記錄，並且一直在這方面有新的撰述。

自九月六日至八日，前後三天為分組、分場討論。各小組的主題分別介紹如下。人數較多的兩組均在上智大學中央圖書館舉行。第一組（也就是個人報告論文的一組）討論的主題包括「十八世紀東南亞洲史：現代初期的國家及其組織架構導論」、「東南亞與國際組織架構的轉型」、「東南



亞洲的港埠政體」、「南中國海的華人活動」、「東南亞的華人社會」、「東南亞的政治統一」及「臨海東南亞地區社會生活的變遷」等幾大議題，論文報告人有 Kathirithamby Wells、Anthony Reid、岸本美緒、濱下武志、李塔娜、Pompen Hantrakool、Balai Chandra Barui、Adrian B. Lapian、鈴木恒之、Gerrit J. Knaap、陳國棟、增田 Erika、Dhiravat Na Pompejra、黑田 Keiko、菅谷成子、Leonard Blussé、Vu Minh Giang、加藤 Kumiko、Helen Creese、小泉順子、伊東利勝、Maria Fernanda Garcia de los Arcos 和 Josep Fradera 共二十三人、二十三篇文章，涉及東南亞各國在十八世紀政治、經濟與社會方面的問題，並且也包括了當時的國際關係與國際貿易。第二組討論的主題與日本在二次大戰中佔據東南亞的問題有關，議題包括「從國際關點看日本的佔領」、「民族主義與日本佔領」、「二次大戰中的馬來亞與新加坡」、「二次大戰期間的社會、文化生活」及「戰時日本在爪哇的電影宣傳傳」（最後這項以錄影帶和幻燈片介紹）。

此外的其他九個小組的議題皆為較專門性的問題。第一組為天主教與基督教在東南亞的活動；第二組為東南亞國別史及東南亞史學史；第三組為東南亞政治發展史；第四組為日本史及日本在亞洲的地位；第五組為殖民時代的東南亞史；第六組為東南亞地方史史學回顧；第七組為東南亞的工業化、貿易與其他產業；第八組為東南亞貿易盜、婦女問題及印度教在東南亞的發展，最後一組主要為東南亞古代的聚落與交通網路。這些小組由於問題較專門，聽眾較少，有時只有報告人到場，甚至其中一、兩場更因報告人（大陸學者，有報到，但找不到人）都缺席而被迫取消。我個人出席了有關貿易盜的幾場討論，人數確實很少，但頗有意思。歷史上東南亞地區雖然是中國東南沿海窯場陶瓷產品的一大市場，但中國的出口貨在數量上並不能滿足當地的需求，而且因品質高、價錢昂，不是一般人消費得起，因此東南亞本地所製造的土器和粗瓷仍在區域間貿易上扮演起重要的角色，甚至於出口到西亞的阿拉伯世界。這樣的一種商品雖然與當地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然而文獻的記載卻很貧乏，因此有賴地下遺物的挖掘以取得研究資料。大多數的東南亞、南亞乃至西亞的國家經濟、學術條件並不好，而考古工作既曠日費時，又要大筆經費。在過去一、二十年間，所有的挖掘工作大都在日本人出錢、領導的情行下進行，再結合當地學者

從事分析與研究。日本學者因此在此一主題上表現得十分出色。如金澤大學的佐佐木達夫教授和他的夫人佐佐木花江在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舊港口祖法兒（*Julfar*）所挖掘到的越南及泰國陶瓷，不但有助於亞洲區域間貿易的瞭解，而且也有助於對近五百年來東南亞科技水準的研究。

總而言之，從以上各小組的議題不難發現：東南亞研究正是本次會議的研討中心。這也說明了東南亞研究正受到國際間廣泛的注意。這一方面是東南亞在未來國際經濟體系中會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同時也是因為東南亞的歷史學者對他們的本土文化與歷史有了前所未有的自覺。外國人參與東南亞研究貢獻最大的自然有日本學者在內，此外則為東南亞舊殖民母國的學者以及對東南亞歷史極感興趣的澳洲人。最近幾年荷蘭東印度公司（1602~1799）檔案廣受重視，研究十分熱烈。本次會議中我們也看到利用這批資料及東南亞各港口的港口記錄所作的，如中式帆船出入港口的數字、貿易結構的變化等有趣的研究成果。我們因此也想到英國東印度公司（1600~1834，1834以後該公司仍存在到1858，但已停止商業運作）的文獻尚未好好開發，而該公司在東南亞前後設置過數個商館（*factories*），其龐大的記錄也可作同樣的研究。國人如使用東南亞本地文獻有語言的隔閡，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檔案倒不失為一個好的出發點。

東南亞問題仍將是「國際亞洲歷史學家學會」下屆會議的中心議題之一。目前已決定包括以下幾個主題：(1)全球化時代的泰國；(2)亞洲的王權與社會宗教傳統；(3)亞洲內部的影響力：文化、政治和經濟的交流；(4)亞洲環境史；(5)十九世紀以前亞洲史研究的新方法與新取向；(6)南亞、東亞與東南亞史前史及早期歷史的問題；(7)亞洲的歷史小說；(8)亞洲軍事史；(9)亞洲婦女與家庭的歷史；(10)移民及少數民族；(11)二次大戰後亞洲的政、經發展。開會時間訂在1996年五月二十至二十四日，有興趣者可寫信至以下地址聯絡：

Department of History,  
Faculty of Arts,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Bangkok 10330, Thailand



學術演講

# 臺海兩岸史學發展之異同 (1949～1994)

張 玉 法\*

- 一、前 言
- 二、1920至1940年代的中國史學
- 三、1950至1990年代的中國大陸史學
- 四、1950至1990年代的臺灣史學
- 五、結 論

## 一、前 言

中國以文字記載歷史，如果從文字普遍使用和史官設立為起點，當始自夏商時期，<sup>①</sup>距今已三、四千年。中國有歷史學，可以溯源至孔子所著的《春秋》，到唐劉知幾著《史通》，正式建立史學體系，距今已有一千二、三百年。歷史與歷史學不同。歷史有兩類：一是已發生的事情，在理論上，永久客觀地存在，不會因任何因素而改變；二是對已發生的事情所作的記載，或利用遺留下來的各種史料對已發生的事情所作的解釋和描述。前者是歷史的本體，後者是對歷史本體的認識；歷史學家雖然不斷努力，希望他們所認識的歷史就是歷史的本體，或接近歷史的本體，但沒有誰能知道，歷史的認識與歷史的本體之間究竟還有多少距離。歷史學包括歷史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① 杜維運：《中國史學史》（臺北，1993），頁41。

的本體論、歷史的認識論和歷史的方法論三方面；歷史學是研究用什麼樣的方法，幫助我們認識歷史的本體，不僅研究史學方法，而且研究認識歷史的過程，和歷史本體的性質。本文的討論，是以歷史學為對象，不是以歷史為對象。

歷史學在中國，在十九世紀及其以前，都是中國人自己建立的。中國人自己建立的史學，可以稱為傳統中國史學，有幾個特徵：①記事以基本史實為主，②沒有普遍追尋各種史實之間的關係，③歷史有嚴格的道德標準，④以政治、軍事及社會上層人物的歷史為主。自二十世紀初葉開始，中國不斷引進近代以來西方的史學理論和方法，而以「新史學」或「史學新論」名之，可以稱為近代中國史學。由於西方史學不斷創新，中國引進來的「新」，亦不斷更新。自1920年代以來，主要有兩大派：一派來自德國的歷史哲學，偏重歷史定律的建立；一派來自德國和法國的實證哲學及美國的經驗主義，偏重歷史史實的建立。後者又融入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除史實外，亦重歷史解釋。兩派在中國起自1920~1940年代，到1950年代以後，中國分裂，大陸學者走歷史定律的路，臺灣學者走歷史實證的路。

## 二、1920至1940年代的中國史學

傳統中國史學，有幾千年的歷史；近代中國史學可以梁啟超於1903年提出的「新史學」開其端。到1920年代，近代史學的著作和翻譯大量出版，李泰棻著《史學研究法大綱》（1920年）、梁啟超著《中國歷史研究法》（1922年）、何炳松著《歷史研究法》（1927年）和《通史新義》（1928年），都參酌中外著作，嘗試建立史學方法；而何炳松將美國歷史學家魯賓孫（James Harvey Robinson）所著的《新史學》（The New History）（1912）翻譯出版（1921）、李思純將法國朗格諾瓦（Langlois）和瑟諾博司（Seignobos）所著的《史學原論》（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Historiques）（1897）翻譯出版（1923）、黎東方將法國施亨利（Henri Sée）所著的《歷史之科學與哲學》（Science et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1928）翻譯出版（1929）、何炳松和郭斌佳將美國紹特韋爾（James Shotwell）的《西洋史學史》（The History of History）翻譯出版（1929），更介紹了西方的史學發展、史學方法、以及史學

與社會科學的關係。

梁啓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其主要知識來自傳統中國史學，偶爾也引外國的例證。梁啓超認為歷史是記述人類的社會活動，這個社會活動不僅與別的社會發生關係，也與後來的社會發生關係，歷史學家應在這些錯綜複雜的關係中，找到因果關係，作為現代人的借鑑。梁啓超又認為，西漢的司馬遷是中國通史的鼻祖，寫了一部《史記》；東漢的班固是中國斷代史的鼻祖，寫了一部西漢的歷史《漢書》。他們的書中，都包括大事記、人物傳記和制度史，後來又出現專門寫大事記的書（如宋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專門寫人物傳記的書（如《隋書·經籍志》中載有《東方朔傳》、《魯國先賢傳》等書），和專門寫制度史的書（如宋宋樵《通志》）。由於以前的歷史只在記錄，不問讀者愛讀不愛讀，而且歷史記事常以一個人、一個家族、一個國家為中心，非常主觀；梁啓超特別呼籲歷史要為今人而寫，不要為古人而寫，歷史要客觀公正，需尊重別人、別家、別國。為使歷史客觀公正，要盡量搜集各方面的史料，除文字記錄外，還包括遺物、圖片、口述歷史（口碑）的史料。史料搜集來之後，要把錯誤的史料加以考訂，把假造的史料加以辨別；梁啓超舉出許多原則和例證，說明正誤辨偽的方法。在把搜集到的史料經過正誤辨偽之後，可依據真實的史料，將歷史有系統地寫出來；有些複雜的史實可以用圖表表達，更可把相似的史實歸範出一些類型出來，如封建社會、帝國主義等。<sup>②</sup>這些是七十多年前梁啓超所建構的歷史研究法，到現在仍為研究歷史的人所通用。何炳松的《通史新義》，分為上、下兩篇，上篇介紹社會史料研究法，下篇介紹社會史研究法，故該書實為史學方法的書，對史料的考訂非常注意，提醒研究者，有些史料出於故意偽造，有些史料因遺留者無知而發生錯誤，必須細加鑑別。至於撰寫歷史，要注意橫的相互關係、縱的因果關係和演化現象、以及歷史中的共通性和特殊性。作者又強調，由於歷史知識非由直接觀察而得，係由推理而得，方法更應細密。<sup>③</sup>其他有關歷史研究法的著作不一一介紹。

<sup>②</sup> 參考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附補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1年臺八版），頁1-128。

<sup>③</sup> 參考何炳松，《通史新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臺一版）一書。

何炳松譯的《新史學》是集合八篇論文而成，基本上是要用科學的方法，擴大歷史研究的範圍。作者反對只注重政治史，主張以科學的態度，利用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等社會科學的方法與觀念，研究人類政治、經濟、社會、思想等各方面的歷史。作者反對把古代受迷信影響的神話、中古時代受宗教影響的神蹟、以及近代受愛國主義影響的情緒，寫入歷史，也反對專寫驚天動地的大事或離奇的怪事，主張以客觀理性的態度，寫人類生活的各方面。作者希望歷史避免文學的描寫，應據實記載；應避免道德的裁判，就事論事；應避免為宗教和政治服務，回復歷史的原貌。歷史不能只用宏觀來寫，要先以科學的精神，將各種史實分類研究，譬如政治、戰爭、法律、宗教、科學、文學、美術等，都分類研究清楚，並找出其中的關係，再來架構大的歷史。歷史對人類文化價值的保存很重要，以前的史家喜寫君王、大將軍，把君王和大將軍的歷史價值保留下來，對一般人民的歷史價值便沒保留下來。作者認為，近代以來是平民的時代，應多寫平民的歷史，保存平民所創造的歷史價值。另外，作者也強調歷史是促進進步的，不是鼓勵保守的，因為歷史喜歡記載創新的事物，不喜歡記載因襲的事物。<sup>④</sup>何炳松在七十年前所譯介的《新史學》，其基本論點，迄今仍為史學家所信服。

李思純所譯的《史學原論》，為史學方法的專書，注重由外形和內容鑑定史料的真偽。他認為史料的搜集、考訂，是歷史研究的第一步工夫，沒有史料就沒有歷史，對於近代的歷史，還主張用口述歷史的方法採集史料。為了便於研究，他主張一切收藏的史料都要公之於眾，並編出詳細的目錄。為了能充分利用史料，並了解史料，他還主張治史的人應盡量多習語言文字，並用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的知識。作者特別提醒治史的人，注意遺留史料者的個人背景和動機，是否故意貶抑別人、誇耀自己，其國籍、黨籍、派別、家族等背景，均影響史料的客觀性。歷史學家最好不要以一個人的證詞為定論，證人愈多愈好，但要注意各證人是否為獨立觀察，抑或都是一個消息來源。衝突性的史料必有一偽或皆偽，不能折衷使用。史家經常碰到的難題是：確定的史實很零星，要將零星的史實建構成一個完整的歷史圖像，需要一些歷史的聯想。但應盡量讓讀者知道，那些是史

<sup>④</sup> 何炳松譯，《新史學》（臺北：文星書店，1965年重印版）。

實，那些是作者的聯想。⑤

黎東方所譯的《歷史之科學與哲學》，主要論述歷史的科學方法和哲學解釋。在十八、九世紀，把歷史視為科學的有兩派人，一派人認為在歷史中可以找到定律，譬如法國的孟德斯鳩著有《法意》和《羅馬的興亡》等書，認為在人類社會中，因果律能決定一切；歷史中的事變，沒有一件是偶然的結果；孔德(Comte)著有《實證哲學》，以進化解釋一切人類的歷史。一派人專注歷史的考據，使用嚴格和精密的方法。除用科學方法研究歷史者外，尚有人以哲學的道理解釋歷史，譬如德國的黑格爾，認為歷史是一種理想的實現、精神的實現，強調國家有至上的權力，個人的幸福權利可以犧牲。有人用科學方法解釋歷史現象，也有人以哲學方法解釋歷史現象，作者希望建立一個以實證為基礎的科學的歷史哲學，不贊同空想的歷史哲學。為了使史實更有涵蓋性，作者介紹了歷史的比較方法，即比較各國歷史中的有關現象，然後加以綜合。作者也討論了歷史中的進化觀念，以比較先後的歷史現象，但不一定要找出進化定律。⑥

何炳松與郭斌佳所譯的《西洋史學史》，主要介紹中古以前歐洲的史家與歷史著作。作者明確指出，猶太史、早期希臘史受神話和文學影響，到希臘化時代，即以「求真」界定歷史，頗重視史料的考訂。希臘史家希羅多德(Herodotus)的校訂工夫極為謹嚴；修昔的底斯(Thucydides)更被視為歷史家中的法官，持論嚴厲，無偏無黨；波里比阿(Polybius)則強調歷史求真的目的在以真實的事情教訓後世。希臘史家的客觀態度，自然影響羅馬；羅馬史家也鼓吹愛國觀念，李維(Livy)即為代表之一。中古的史學受宗教影響大。近代史學承襲希臘羅馬時代的務實傳統，更趨重歷史的解釋，借助於心理學及其他社會科學者頗多。在歷史的解釋中，出現唯心論和唯物論兩大派。⑦

由上面所學各書可以看出，近代中國史學，或透過對西書的翻譯，或透過融會東西學術的著作，無論在史學方法上，還是在歷史解釋上，在

⑤ 參考李思純譯，《史學原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年臺二版）一書。

⑥ 參考黎東方譯，《歷史之科學與哲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臺一版）一書。

⑦ 參考何炳松、郭斌佳譯，《西洋史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年臺一版）一書。

1920年代，都已奠定了相當厚實的基礎。當時正是五四運動以後，中國努力引介西方學術，而國民政府完成北伐後發展教育，尤有助於學術發展。

1930年代，前半段為片面抵抗日本侵略時期，後半段為全面抵抗日本侵略時期。中國在史學方面，繼續有新的譯著出版。向達翻譯了斑慈(Harry Elmer Barnes)的《史學史》，1930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該書論述歐洲史學發展，認為希臘時期注重取材正確，羅馬時期興起愛國史學，中世紀為盲信的基督教史學所籠罩。到十四世紀文藝復興以後，又恢復希臘、羅馬的傳統，不僅考訂史料，力求撰寫信史，而且把撰寫重點從神蹟移到塵世上。到十五、六世紀地理大發現後，歐洲歷史超出地域限制，而有世界史的趨向。十七、八世紀理性主義興起，助長了史學中的懷疑精神；十八、九世紀浪漫主義興起，史學感染了對國家的熱愛，對國家過去的美德懿行，大肆編纂出版有關史料。該書最後論述近代的新史學或綜合史學，即利用各種社會科學的專業知識，撰寫綜合性的專史，如思想史、科學史、工藝史、經濟史、社會史、政制史、文化史等。<sup>⑧</sup>此外，董之學翻譯出版了斑慈(Harry Elmer Barnes)的《新史學與社會科學》(The New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tudies)，1933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因原書未見，此處不作介紹。

梁啟超在1936年寫的《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除重新給歷史作一定義，認為歷史的目的在求得真實、予以新意義、予以新價值、供吾人活動之資鑑外；並認為史家應有史德、史學、史識、史才四長。該書主要內容在論述五種專史的寫法，僅完成人的專史和文物的專史部分，事的專史、地方的專史、斷代的專史並未著墨。所謂人的專史是指傳記；所謂事的專史，是指某一方面的事情；所謂地方的專史，是指地方志；所謂斷代的專史，是指朝代史；所謂文物的專史，是指經濟、文藝、學術、宗教、民族史之類。<sup>⑨</sup>

張蔭麟於1933年著〈傳統歷史哲學之總結算〉，依照黑格爾(Hegel)、

---

⑧ 參考向達(改名向通)譯著，《史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臺一版)一書。

⑨ 參考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附補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1年臺八版)補編部分。



孔德 (Comte)、尼采 (Nietzsche)、斯賓賽爾 (Spencer)、穆爾剛 (Morgan)、亨丁頓 (Huntington) 等人所探求的法則，論述目的史觀、循環史觀、辯證法史觀、演化史觀、文化變遷因果律、地理史觀等。所謂目的史觀，指人類全部歷史，是有一世界主宰者（如上帝）按照預定計劃與目的，逐一實現，代表人物為黑格爾。所謂進步史觀，是指歷史是直線進步的，孔德即認為思想發展，由神學進入玄學再進入實證，是進步的。所謂循環史觀，是指歷史會不斷重演，尼采即認為宇宙間，無論大小事物，都是循環的。循環史觀認為歷史循環而無進步，如治亂、分合。所謂辯證法史觀，源自黑格爾正、反、合的哲學，馬克思將之用於歷史，認為歷史的事情，先有正面的發展，然後出現反對的勢力，最後反對勢力取代正面的勢力，但仍保有一些正面的勢力，此即歷史的辯證法。所謂演化史觀，指歷史不斷變遷，不斷有新異的成分出現，但未必是進步，此派學說倡自斯賓賽爾，集大成者為穆爾剛。所謂文化變遷因果律，唯心論者以思想為因，他者為果；唯物論者以生產工具為因，他者為果。所謂地理史觀，認為地理和氣候為歷史的決定因素，亨丁頓曾主張之。<sup>⑩</sup>

1930年代，尚有其他史學的論著出版，如周容的《史學通論》（上海，1933）、李則剛的《史學通論》（上海，1935）、胡哲敷的《史學概要》（上海，1935）、常燕生的《生物史觀研究》（上海，1936）等，不一一介紹。

1940年代是戰爭的年代，前半期為抗日戰爭，後半期為國共勢力大對決，但對史學的發展似乎影響不大。翻譯出版的書，有 Gaetano Salvemini 著、周謙沖譯的《史學家與科學家》(Historian and Scientist: An Essay on the Nature of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1945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撰寫的史學論著有：①陸懋德《史學方法大綱》，1945年重慶獨立出版社出版。②魏應麒《中國史學史》，1941年長沙商務印書館出版。③金毓黻《中國史學史》，1941年教育部出版。④朱希祖《中國史學通論》，1943年南京獨立出版社出版。⑤蔣祖怡《史學纂要》，1944年在重慶出版。⑥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1947年南京勝利出版公司出版。

<sup>⑩</sup> 原文發表於1933年1月出版的《國風雜誌》二卷一期，1953年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印單行本，題名《論傳統歷史哲學》。

上列著作，可分為史學方法和史學史兩類，在史學方法方面，只有陸懋德的《史學方法大綱》。該書原為作者任教於清華大學、西北大學的講義，分為論歷史、論史料、論考證、論解釋、論著作五編，廣泛參考中西史學論著編寫而成。在論歷史編中，論及民族主義史學對民族衝突所造成的影響，並呼籲撰寫一般平民的歷史，不要專寫帝王將相和武人政客的歷史。論史料、論考證、論著作三編，前人言之已詳，茲不介紹。該書最大的特色，是在論解釋方面。作者引述古代希臘哲學，分為靜觀(Static)和動觀(Dynamic)兩派，認為如以靜觀解釋歷史，則人類社會所有之思想制作，無論外表變化如何，基本上是不變的；此點史家多不接受。史家每以動觀解釋歷史，從歷史是否進步的角度，可分為三派：①退化觀：如中國推崇堯天舜日。②循環觀：如中國常說一治一亂。③進化觀：如達爾文主張優勝劣敗、適者生存。從任一階級為社會的歷史重心來看，亦可以分成三派：①統治階級史觀：從君主、貴族、士大夫的立場解釋歷史。②資產階級史觀：英、美、德、法等資本主義國家，以資本家和資產階級的立場解釋歷史。③無產階級史觀：馬克思主義學派，特別在蘇俄和其他共產主義國家，以無產階級的立場解釋歷史。從決定歷史方向的終極原因來看，也可以分為三派：①由鬼神、上帝、天道決定歷史的變化：近代以前的史家，初民時期迷信鬼神，後來由迷信鬼神發展為信仰一神的上帝；不信鬼神、上帝的，亦歸因於所謂「天道」。②由人類的意志力決定歷史的變化，即唯心論，以德人黑格爾為代表。③由生活環境或生產工具決定歷史的變化，即唯物論，又可分為兩派：A.認為氣候、地勢、人口、物產可以決定歷史的變化，以英人巴克爾(Buckle)為代表。B.認為生產方法決定歷史的變化，以德人馬克思為代表。巴克爾著有《英國文化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1857年刊行。馬克思採費爾巴哈(F Feuerbach)的唯物主義和黑格爾的辯證法，倡唯物辯證法，認為任何事物，先有正方面的發展，再有反方面的發展，最後正反歸於合，而達於均衡(Equilibrium)；均衡則治，不均衡則亂。⑩

在史學方法方面，北京大學教授朱希祖的《中國史學通論》主要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分論述中國史學的起源，包括未有文字以前的記載、有文

⑩ 參考陸懋德，《史學方法大綱》（臺北：華世出版社，1975年初版）一書。

字而後有記載的歷史等；第二部分論述中國史書的類別，包括編年史、國別史、傳記、政治史、文化史、正史、紀事本末等。<sup>⑫</sup>中央大學教授金毓黻的《中國史學史》較有系統，分十章論述自古代以迄近代的中國史學，包括古代的史官、古代的史家與史籍、司馬遷與班固的史學、魏晉南北朝以迄唐初私家修史的本末、漢以後的史官、唐宋以來官修諸史的本末、唐宋以來的私修諸史、劉知幾與章學誠的史學、近代史家述略、最近史學的趨勢等。基本內容，為論述歷代的史官、史家、史書、以及修史體裁。<sup>⑬</sup>顧頡剛的《當代中國史學》專論述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中葉的中國史學，包括金石、甲骨、銅器、竹簡、檔案史料的發現與利用，通史、斷代史、專史的撰寫，以及對古代史料的懷疑等。<sup>⑭</sup>其餘各書，不一一介紹。

1920至1940年代的中國史學，留下兩個傳統，為後代的史家所承襲：一為力求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方法寫歷史，走實證的路，就是胡適所說的，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一為用哲學和社會科學的理論寫歷史，以史料為理論的註角，對不合理論的史料加以捨棄，可以唯物史觀為代表。大體說來，1950年代以來的中國史學，大陸地區的學者，因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是以唯物史觀寫歷史；臺灣地區的學者，因受歐洲實證主義和美國經驗主義的影響（部分是透過胡適的宣揚），注重基本史實的建構，沒有大的理論架構。

### 三、1950至1990年代的中國大陸史學

1949年10月中共在大陸建立政權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即指示「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認真的研究中國歷史」。<sup>⑮</sup>在這種情形下，自1920年代以來以實證為主流的中國史學，為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主流的新史學所取代。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主的史學，1919年李大釗曾加以介紹，包括唯物史觀和階級鬥爭史觀兩部分。所謂唯物史觀，

<sup>⑫</sup> 參考朱希祖，《中國史學通論》（臺北：莊嚴出版社，1977年初版）一書。

<sup>⑬</sup> 參考金毓黻，《中國史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臺三版）一書。

<sup>⑭</sup> 參考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香港：龍門書店重印本）一書。

<sup>⑮</sup> 遼耀東，《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臺北：時報文化公司，1979），頁1。

是認為生產力與社會組織有密切的關係，生產力一有變動，社會組織必然隨著它變化，並認為生產關係所構成的社會經濟構造是社會的基礎構造，凡是精神上的構造，包括政治的、社會的、法制的、倫理的、哲學的，都隨著經濟的變化而變化。所謂階級鬥爭史觀，是指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在歷史上是不斷地鬥爭。馬克思推動無產階級革命，號召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鬥爭；由於資產階級因資本主義而產生，故馬克思是反資本主義的。追隨馬克思的列寧，更發現資本主義發展成帝國主義之後，侵略別的國家或地區，在世界各地廣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因此，反對資本主義擴張，應從反對帝國主義做起。十九世紀後半期以後的中國，依照馬克思的歷史五階段，是在原始共產社會、奴隸社會以後的封建社會，原應由封建社會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再進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但因受到帝國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侵略，使中國變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在馬列主義者看來，中國革命的任務就是反帝反封建。1922年中共在二全大會宣言中分析1839年以後的中國歷史，即明確指出近代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並號召人民徹底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1930年郭沫若著《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肯定中國西周社會存在過奴隸社會，此制度由原始公社轉化而來，本身後來又轉為封建制度。1933年中共黨人李平心（署名李鼎聲）著《中國近代史》，明白指出近代中國史發端於鴉片戰爭，此後中國為國際資本主義的浪潮所襲，使中國社會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1937年呂振羽著《中國政治思想史》，從殷商寫到鴉片戰爭前，整體檢討了各個階級的階級鬥爭思想。<sup>①⑥</sup>因此，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早在1930年代即有學者開始嘗試。

1950年代迄1990年代的大陸史學發展，約可分為五個時期：①1950至1958年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學習時期，②1958至1966年為標舉史學革命、全面建立馬克思主義史學時期，③1966至1976年為文化大革命、利用史學搞政治鬥爭時期，④1976至1986年為批判文革史學、重建馬克思主義史學時期，⑤1986至1994年為史學無用論興起、史學界努力引進西方史學理論與方法時期。茲分述如下：

<sup>①⑥</sup> 張玉法，〈中國大陸學者對民國史的研究〉，《興大歷史學報》第三期，頁37-38。

其一，馬克思主義史學學習時期，1950~1958：儘管早自1920年代以後，即有人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階級鬥爭史觀撰寫中國歷史，絕大多數的中國史學家並不知如何用馬克思主義寫歷史。1949年中共建立政權後，企圖推翻原有的中國歷史解釋體系，政學界一面努力學習馬列主義，一面試圖利用馬列主義，從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中作出總結。到1954年2月，由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主編的《歷史研究》雜誌出版以後，這方面的研究成果陸續發表。他們提出了中國歷史解釋的五朵花，即以馬克思主義解釋漢民族形成問題、農民戰爭問題、封建土地所有制問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中國歷史分期問題。關於漢民族的形成問題，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民族隨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資產階級的興起而真正形成，因此把漢民族的形成推到唐宋或明末清初，甚至鴉片戰爭以後，但也有人根據史大林的說法：民族的四個條件是共同語言、共同文化、共同經濟生活和經濟聯繫，而認為漢民族在秦漢時期即形成，並認為中國民族不是資產階級的民族，而是獨特的民族。關於農民戰爭問題，認為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是封建社會最主要的矛盾。關於封建土地所有制問題，認為無論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都是土地國有制；至於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的分界，或謂在西周，或謂在春秋或戰國，或謂在東漢或魏晉。關於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認為是在鴉片戰爭以前。關於中國歷史分期問題，胡繩在《歷史研究》創刊號發表〈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問題〉，以階級鬥爭的觀點，舉出中國近代史中三個革命的高潮：第一個是太平天國，第二個是義和團，第三個是辛亥革命。孫守任在《歷史研究》1954年第六期發表〈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的商榷〉，本毛澤東的〈矛盾論〉（認為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認為近代中國歷史的發展有兩大過程，第一個過程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1840~1919），是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過程，即是毛澤東所謂的小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第二個過程是反封建和反半殖民地的過程，即毛澤東所謂的無產階級新民主主義時期。1950至1958年間，大陸學者在近代史的研究上成果無多，但編輯了成套史料，如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太平天國、捻軍、農民起義、洋務運動、戊戌變法、中日戰爭、義和團、辛亥革命等。<sup>①①</sup>

<sup>①①</sup> 遼耀東，〈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頁2-8；遼耀東，〈史學危機的呼聲〉，頁

其二，標舉史學革命、全面建立馬克思主義史學時期，1958~1966：1957年2月，毛澤東重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史學界出現反對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依據研究歷史，宣揚史料就是一切，像雷海宗、向達、榮孟源等；更有人批判農民革命，歌頌帝王將相，如吳二、翦伯贊等。1958年，《歷史研究》第九期提出了史學革命的口號，主要的目的，是要打破歷史上朝代史的局限，以農民革命的立場對歷史人物重新評價；並以毛澤東思想為準則，重新塑造中國歷史解釋體系。更認為革命的史學工作者，必須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重新研究和改寫全部的歷史。史學革命有兩大口號，一為厚今薄古，指解釋歷史必須符合現代的政治需要；二為先紅後專，指要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立場來解釋歷史。隨之而來的是「興無滅資」，即頌揚無產階級，貶抑資產階級。<sup>⑮</sup>

其三，文化大革命、利用史學搞政治鬥爭時期，1966~1976：文化大革命時期，利用史學搞政治鬥爭，主要的課題為批孔揚秦和儒法鬥爭。所謂批孔，是批判孔子的儒家理論擁護即將崩潰的奴隸制度；所謂揚秦，是指秦始皇為新興封建社會大地主代表，根據法家的理論統一了中國，使奴隸社會過渡到封建社會。因此又衍生以儒法鬥爭，解釋春秋戰國迄於近代的中國歷史，認為代表儒家的是保守、倒退、厚古薄今的路線，代表法家的是革新、進步、厚今薄古的路線。另一方面，文革集團也吹捧女皇（影射江青），批判宰相（影射周恩來），形成「影射史學」。「影射史學」一詞，是文革過去之後，新任中共主席華國鋒於1977年8月在中共十一屆全國代表大會上作政治報告時提出的。所謂影射，就是將歷史的解釋和現實政治互相遷就，為了政治的需要，將歷史納入現實政治的框架之中。在1966年停刊的《歷史研究》，到1974年12月22日復刊，亦從事建立儒法鬥爭的歷史解釋體系。<sup>⑯</sup>

其四，批判文革史學、重建馬克思主義史學時期，1976~1986：1976年文革四人幫被捕，文革結束，政治上開始大審四人幫，大陸史學界亦開始對四人幫利用歷史進行政治鬥爭的罪行加以揭發。1977年4、5月間，

---

85-87, 101.

⑮ 上引遼耀東第一書，頁10-15；第二書，頁4，18-20，63，103-105，106。

⑯ 上引遼耀東第一書，頁19，24-27；第二書，頁2-3，26-27，44，106-107。

《歷史研究》編輯部分別在北京、南京、武漢、長沙、哈爾濱、長春、瀋陽等地，邀請當地歷史學者開會，除揭發四人幫的罪行外，認為「祇有認真貫徹百家爭鳴方針，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對學術問題展開嚴肅的討論，才能達到真正探求真理、發展學術的目的」。類似的活動，於是年8月中共十一全之後繼續舉行。1978年7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天津召開中國歷史學規劃會議籌備會議；1979年3月，正式在成都召開中國史學規劃會議。史學規劃會議的目的，一方面在掃除影射史學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決定發展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軍事史的研究。當然，研究的指針，仍然是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一位著名的近代史家黎澍於1983年在一篇文章中說：「繼續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做好現代史研究的根本保證。」另一位著名的近代史家李新於1985年在一篇文章中說：「研究民國史，一定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方針。」惟自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共採取開放政策，提出「實事求是」的方針，到1981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又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史學的發展空間，較前大增。<sup>20</sup>

其五，史學無用論興起、史學界努力引進西方史學理論與方法時期，1986~ 1994：1986年以後，大陸史學界受改革開放的影響，不斷發生史學危機的呼聲。史學危機可以包括兩方面：①馬克思主義史學，只講求人類社會發展的共性，而忽略人類社會發展的個性。如果歷史只是一條定律，只是找史料填在定律中，史學便死掉了。由於不少大陸史學家向多元的方法與方向走，使馬克思主義史學發生危機。②中國大陸史學，以前強調為政治服務，歷史隨著政治需要而改變，如是便不成為歷史。由於不少大陸史學家強調史學脫離政治而獨立，使歷史由有用變為無用。儘管如此，由於官方仍堅守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大多數史學家亦不敢否認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史學受政治影響達不到高的學術成就，而自四人幫垮台、實行改革開放後，政治上不像以往那樣看重歷史，加上學歷史的人沒有好的出路，伴隨而來的便是「史學無用」論。此處撇開史學無用論不談，大陸史學界已因改革開放形成兩大派意見：一派反對歷史為政治服務，甚至企圖擺脫馬克思主義的框框。譬如1987年中華書局總編輯李侃說：「在歷

<sup>20</sup> 上引遼耀東第二書，頁108-113；前引張玉法文，頁39-41。

史學寫作的體裁和表現形式上，不應該也沒有必要拘泥於一種現成的和固定的框架和公式。」又說：「事實已證明，片面的強調歷史學為政治服務，為現實社會需要服務，效果並不好。……把歷史學變成政治宣傳工具，乃至變成配合中心任務的工具，更是要不得的做法。」又譬如1991年西北大學校長張豈之說：「在學術或科學上，不再在固定地由某個人或幾個人是真理的裁判者的狀況。……馬克思主義本身也可以進行討論，她也不是禁區。」另一派仍然堅守馬克思主義、歷史為政治服務的陣地。譬如1988年7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史學界第四次代表大會，主要議題之一是「根據黨的十三大精神，研究如何加強與改進歷史研究工作」；修訂後的中國歷史學會章程，其宗旨仍然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提倡實事求是、理論聯繫實際的學風，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以促進歷史科學的繁榮和發展。」又譬如河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唐史專家）胡如雷於1988年在接受訪問時表示：「解放以前，利用馬克思主義研究歷史的人為數有限，解放後情況有了明顯的改變，但這種工作也只進行了三十多年，而且受到左的和右的干擾。應該看到，這方面做得不是過頭了，而是顯得遠遠地不足。當然繼續在經典中尋章摘句，以便在自己的論著中貼標籤，……是會陷入危機的，但運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創造性地進行研究，得出新穎的科學結論，肯定會受到大家的認可。」<sup>①</sup>

從前述五大時期來觀察，可以看出大陸地區四十五年來的史學發展變化多端，影響所及，使歷史撰寫的內容，五花八門。此處僅以對近代中國歷史的研究為例，作一說明。近代史研究基本上是持革命史觀，主要的解釋約有幾方面：① 1839至1919年五四運動的八十年間，是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結合，把中國變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過程。② 1895年孫中山開始了資產階級革命；五四時期以後，共產主義革命開始了反帝反封建反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革命。③ 1924年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推動革命，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加上聯俄、聯共、農工三大政策，形成新三民主義；中共堅守此主義，中國國民黨於1927年與中共分裂，是背棄新三民主義；1937年中共與國民黨合作抗日，仍是以新三民主義為基礎。<sup>②</sup>中共革命史觀對近代中

<sup>①</sup> 前引張玉法文，頁35-42；前引遼耀東第一書，頁69-72，82。

<sup>②</sup> 參考前引遼耀東第二書，頁172-173，176，181，182-183。



國歷史所作的解釋，近年大陸史學界已不太強調，但並沒有放棄。

1949年以後的大陸史學，在馬列主義高漲時代，除了引用馬列的理論和方法外，很少討論其他史學理論和方法，即使寫中國史學史，也依照馬列主義的歷史分期，如1985年尹達所主編的《中國史學發展史》，即將遠古至春秋時期的史學稱為「奴隸社會的史學」，將春秋戰國至清代乾嘉時期的史學稱為「封建社會的史學」，將鴉片戰爭前後至1949年的史學稱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史學」。在敘述鴉片戰爭前後至1949年的史學時，將資產階級史學和馬克思主義史學分別敘述。<sup>②③</sup>另一方面，自1978~1979年中共實行改革開放以後，大陸史學家對於以單一的理論與方法研究歷史不滿意，力圖吸收蘇俄及西方各國的史學理論和方法，或說是以馬克思主義史學為指導，採外來史學之長，或說是該理論和方法，並不違反馬克思主義。

有的學者論述1949年後的大陸史學，分為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三部分。所謂本體論，是指歷史過程本身的性質和特點；所謂認識論，是指歷史認識的性質和特點；所謂方法論，是指歷史研究方法的性質和特點。作者認為本體論就是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認識論討論歷史研究者與歷史本身的關係，要依照馬克思的普遍規律，才不致太主觀；至於方法論，作者仍然強調辯證邏輯的科學方法最好。<sup>②④</sup>

關於歷史的本體論，有人強調馬克思的「歷史的多樣和統一性的辯證關係」，認為多樣之間必然存在着統一性，而不可能是互不相關、絕對排斥的狀態。因此歷史要在多樣中求統一的規律，再從統一的規律表現具體的事實。<sup>②⑤</sup>有人闡釋馬克思主義的「生產方式」為歷史的終極原因，並闡釋生產方式所引動的其他變遷為相互作用，認為唯物史觀，把終極原因和相互作用有機地統一於自己內在的邏輯體系之中。作者並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生產方式」及其「相互作用」，符合自然科學中新近的理论——系統論、

<sup>②③</sup> 參考尹達，《中國史學發展史》（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一書。1982年，劉節（1901-1977）的遺著《中國史學史稿》由河南中州書畫社出版，不用馬克思主義的詞彙和架構，應為1950年前的舊作。

<sup>②④</sup> 龐卓恆，〈歷史學的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歷史研究》，1988年第一期，頁3-13。

<sup>②⑤</sup> 丁偉志，〈歷史是多樣性的統一〉，《歷史研究》，1983年第二期，頁17-31。

訊息論和控制論。所謂系統，是指「處在一定相互聯繫中與環境發生關係的各組成部分的整體」；所謂訊息，是系統內部建立聯繫的特殊形式；所謂控制，是指系統中的協調、調節和控制。<sup>26</sup>有人研究地理環境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認為地理環境不僅影響生產，亦影響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但對歷史起決定性作用的，仍然是生產方式，而不是地理環境。<sup>27</sup>前述種種，皆為歷史唯物論的說法。

關於歷史的認識論，前述的信息論非常注意歷史的整體，並把物質列為第一世界，精神列入第二世界，精神不直接接觸物質，而透過語言、文字等訊息接觸物質，此訊息為第三世界。歷史的訊息為第三世界，歷史知識為第三世界的思維。信息論、系統論、控制論，被稱為「三論」，<sup>28</sup>均注意歷史的網絡和相互關係。許多人站在馬克思的唯物辯證的觀點、生產的觀點、勞動的觀點、階級的觀點和群眾的觀點來認識歷史，認為應由馬克思的抽象定律中，去認識個別的史實。上述自然科學中的「三論」，均可適用於馬克思主義，而人類學中的結構論，主張「用模式的幫助去解釋社會關係」，也適用於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涉及認識的主體、認識的客體和認識的過程。大陸學者討論認識的對象，基本上都本唯物主義的觀點，認為歷史客體客觀地存在，永不改變，不管人能否真正認識；因此研究歷史的人應隨時注意個人的潛意識、個人的思想、個人的價值觀等，對歷史認識所造成的影響。他們雖然贊同引進外來的方法，俾有助於對歷史的認識，基本上所謂客觀存在的史實就是生產力、生產關係及其所衍生的其他社會關係。<sup>29</sup>

歷史的方法論，主要在解決認識的主體透過一個什麼樣的過程可以認識歷史的客體。大陸史學的本體論是唯物的，認識論的基本路線和方向亦是唯物的；方法論方面，早期也只有唯物辯證法。到1978~1979年改革開

<sup>26</sup> 李振宏，〈終極原因與相互作用〉，《歷史研究》，1986年第三期，頁3-18。

<sup>27</sup> 寧可，〈地理環境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歷史研究》，1986年第六期，頁3-20。

<sup>28</sup> 此被稱為「老三論」，又有所謂新三論，即耗散結構論、協同論和突變論。

<sup>29</sup> 劉大年，〈論歷史研究的對象〉，《歷史研究》，1985年第三期，頁3-23；王正平，〈歷史認識對象的特點〉，《歷史研究》1988年第一期，頁14-23；趙軼峰，〈歷史認識的相對性〉，《歷史研究》，1988年第一期，頁24-34。

放以後，發現史學長期以來把各種具體的研究方法視為封建的或資產階級的東西而加以鄙棄，使唯物史觀教條化，把歷史變成了簡單的形式邏輯推理，把階級分析法絕對化，對歷史作用力採取單一分析法和線性因果分析法，造成不良的後果。因而主張歷史研究方法多元化，提出了許多新的方法，如系統網絡分析法、結構功能分析法（分析社會結構，不要停在表象上）、層次分析法（多重性、多面性、多線性、多向性）、中介分析法（即各種網絡的交叉點）、模式分析法、多學科研究法、定性定量（定量即數學法或統計法）結合分析法、比較研究法（橫向的和縱向的）、<sup>⑩</sup>累進法（從早期的簡單事物進到晚期的複雜事物）、倒敘法（如認識資本主義地租，有助於認識封建地租）、心理學法等，甚至引進了一些唯心主義的語言，如柯林武德的「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並提出與馬克思主義相反的主張：歷史科學要求在一中求多，在個別中求一般，在現象中求本質。

在方法論中，闡述較多的是系統論，包括一般系統論、通訊系統論（信息論）、和控制系統論。一般系統論認為，任何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都是一個系統整體，此系統整體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賴的若干要素結合而成，具有特定的功能。具體地說，就是從整體出發，始終著眼整體與部分、整體與層次、整體與結構、整體與環境的相互聯繫、相互作用。<sup>⑪</sup>通訊系統論（信息論）是指系統內部及系統與系統之間，是以信息的形式相聯繫。控制系統論（控制論）是指一個系統內的各部分，依內部或外部情況的變化而進行調整，以克服不確定性，使系統穩定地保持或達到某種預定的狀態。大陸學者金觀濤、劉青峰以控制論解釋中國封建社會的延長，指地主經濟、官僚政治和儒家正統為三個超穩定的因素，有人指其違反馬克思主義，因為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是以經濟關係為基礎，其他因素皆隨之轉變，不與其他因素平行。金觀濤堅持用控制論研究歷史，認為不違反唯物主義，因為恩格斯曾謂，政治權力能影響經濟發展。<sup>⑫</sup>又有人指稱系統論是結構主義，違反馬克思主義。明白指出，結構是由各個成分和部分相互依存而構

<sup>⑩</sup> 吳廷嘉，〈要重視和加強史學方法論研究〉，《歷史研究》，1986年第一期，頁4-14。

<sup>⑪</sup> 常紹舜，〈談談系統方法〉，《社會科學輯刊》，1984年第二期。

<sup>⑫</sup> 金觀濤，〈系統論、控制論可以成為歷史研究者的工具〉，《讀書》，1981年第十一期。

成一個整體，每一部分只能在整體中才能得到它的意義，因此一個成分的變化會引起其他成分的變化。但結構論認為每一個結構都是獨立的，未必與馬克思的規律相同。但有的學者堅信系統論是馬克思主義的，因為在系統論學說興起前，馬克思主義即自成系統；其生產力、生產因素、社會形態、意識形態即為一大系統。

大陸學者引介的其他方法論，多屬技術層次，或特別強調不違反馬克思主義，或已脫離馬克思主義的窠臼。茲簡述於下：①量化法：量化法適用於數量概念的歷史分析，自計算機發明，使巨量的數字分析成為可能。大陸學者特別強調，量化法不違反馬克思主義。<sup>③</sup>為了引進量化法，大陸學者尚進行外國書籍翻譯工作，如198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將蘇俄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計量歷史學》翻譯出版；1992年北京商務印書館將英國史學家弗拉德(R. Floud)的《歷史計量法導論》翻譯出版。②心理歷史：雖曾介紹奧國心理學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特別強調唯物主義者與唯心主義者對社會心理的解釋不同，認為唯物主義者以經濟發展造成的社會結構來解釋社會心理，唯心主義者用社會心理解釋社會制度的起源，故主張建立馬克思主義的心理歷史學。③比較歷史：認為比較研究法有助於揭示歷史現象的異同，克服歷史研究的孤立性，但強調使用此法要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進行。④非線性化：認為對歷史發展的解釋，不管十八世紀的理性進步觀念，還是馬克思主義的封建主義必然走向資本主義的觀點，都太重視歷史的表面和縱向，而忽略了歷史的深層和橫向，故呼籲超越歷史的線性發展。<sup>④</sup>⑤模糊方法：認為兩種具體的歷史現象之間，在交叉和過渡中產生亦此亦彼的現象，或找不到因果關係。在這種情況下，論斷兩者關係，應避免絕對化，避免主觀和臆斷。譬如馬克思歷史五階段中的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之間、封建社會與資本社會之間，都有模糊地帶。

與提倡歷史方法相似，近年大陸學者還呼籲從不同方向研究歷史，或與馬克思主義結合，或超出馬克思主義之外。茲舉數例如下：①多層次模

---

<sup>③</sup> 霍俊江，〈數學方法在歷史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學習與探索》，1983年第三期；錢學森等，〈用系統科學方法使歷史科學定量化〉，《歷史研究》，1986年第四期。

<sup>④</sup> 姜進，〈歷史研究的非線性化及其方法問題〉，《歷史研究》，1986年第一

式：有的學者將史學研究分爲四個層次，低層史學確立個別的歷史事實，中層史學探索個別史實間的相互關係，高層史學建立歷史演化的一般法則和理論模式，哲學史學是對歷史、歷史學、歷史學方法作整體的思考。不同層次的史學，有不同的方法和目的，因此史學應該多元化。<sup>35</sup>有的學者指出經濟不是歷史發展的唯一因素，政治、法律、文學、藝術、宗教、道德、傳統、地理環境等既受經濟的制約，亦影響經濟，因此歷史不能先有一般標準再去探討特殊，應先從個別事物的探討，再到一般的規律。即以馬克思的歷史五階段研究歷史，各國的情況亦不盡相同。<sup>36</sup>②全方位的研究：意義與多層次研究差不多，但主張不要把馬克思主義史學過於簡單化，要全面考察有關歷史發展的諸種因素，包括地理條件和外部環境在內。<sup>37</sup>③現代化的方法與觀點：有的學者認爲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量化法等都是科學方法，應與社會科學結合，擴大研究領域，證明馬克思理論；<sup>38</sup>有的學者呼籲建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理論，以研究歷史。所謂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是指農業、工業、國防、科技的現代化。<sup>39</sup>④婦女主義史學：從美、英等國引介而來，指消除歷史上對婦女的任何形式的歧視，從批判男權開始，反對歷史事實中立說，但強調婦女主義史學要以馬克思主義爲基礎。綜上所述，四十五年來的大陸史學，基本上仍然是馬克思主義史學。近年部分史學家雖然企圖擺脫舊的窠臼，但公然批評馬克思主義者少之又少，一般都是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以偷天換日的方法引介一些外來的理論和方法。這些外來的理論與方法，用於歷史研究者不多；研究者一般仍走馬克思主義的老路。

#### 四、1950至1990年代的臺灣史學

1920至1940年代中國史學形成兩種傳統：一爲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史學，一爲歐美的實證主義和經驗主義史學。1949年以後的大陸歷史學者繼

<sup>35</sup> 李開元，〈史學理論的層次模式和史學多元化〉，《歷史研究》，1986年第一期。

<sup>36</sup> 王正平，〈略論歷史的多層次研究〉，《學術月刊》，1984年第九期。

<sup>37</sup> 霍俊江，〈歷史科學的現代化問題〉，《求索》，1983年第二期。

<sup>38</sup> 羅榮渠，〈現代化理論與歷史研究〉，《歷史研究》，1986年第三期。

承並發揚了前者，在臺灣的歷史學者則繼承並發揚了後者。臺灣史學的發展，可依年代順序，論述於下：

其一、1950年代：1949至1950年，中共自中華民國手中獲得整個中國大陸的統治權，並乘餘威對外擴張，參與韓戰、越戰，攻取或以軍事威脅臺灣前線的島嶼，臺灣處在生死存亡的邊緣。當時臺灣尚是農業經濟，龐大的國防經費，使財政困難、外匯短缺。在這種情形下，各級教育勉強推動，學術的研究談不到，史學亦不例外。1950年代，臺灣出版有關史學的書，較為重要的有三種，一為張致遠的《史學講話》，<sup>39</sup>二為李宗侗的《中國史學史》，<sup>40</sup>三為許冠三的《史學與史學方法》。<sup>41</sup>

張致遠的《史學講話》是集六篇論文而成，前三篇從班漢姆(Ernst Bernheim)的《史學導論》(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中改寫而來，一篇題名〈史學的涵義及其問題〉，一篇題名〈史學研究的範圍〉，一篇題名〈史學方法綱要〉。後三篇一屬於西方史學史的範圍，題名〈歷史與人文教育〉，略述西洋史學發展的趨勢及其教育意義；一介紹〈陶恩培論文化的起源〉，一介紹〈西洋外交史研究〉。對史學來說，較為重要的是前三篇，除介紹各種史料、幫助了解史料的工具學、以及史料的考證之外，特別介紹了各派歷史哲學：①兩元的神學歷史觀：倡自奧古斯丁(St. Augustine)，將人類分為上帝的子孫和魔鬼的子孫兩大類，主張人要協助上帝與魔鬼鬥爭。②唯物史觀：分兩派：生物史觀倡自達爾文，主張生存競爭、天然淘汰；經濟史觀倡自馬克思，主張個人與社會均受經濟條件的支配。③實證主義歷史觀：倡自法國哲學家孔德(Comte)，主張從實際的現象觀察，用正確的科學方法探求其內容和定律，並闡明因果關係。孔德不重個別史實，主張借用社會心理學和比較研究法，以探求因果及定律。④唯心主義歷史觀：倡自康德，至黑格爾發揚光大，提倡精神科學，反對用群眾心理和統計的方法。⑤表現主義歷史觀：表現主義原為哲學和繪畫中的觀念，由雷興(Theodor Lessing)和斯賓格勒(Spengler)用於歷史，前者認為歷史是大堆偶然而得的事實，沒有意義，亦不能連貫，只有靠研究

<sup>39</sup> 張致遠，《史學講話》（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2）。

<sup>40</sup> 李宗侗，《中國史學史》（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3）。

<sup>41</sup> 許冠三，《史學與史學方法》（臺北：青年書店，1959）。

歷史的人的心理需要，去感覺歷史的意義，把它當作現世的經驗；後者認為歷史是活的，我們應該像詩那樣去領會；所注意的不僅是歷史的事實，而是歷史現象的意義。⑥人文主義的歷史觀：倡自赫德 (Herder)，認為人為萬物之靈，自始具有人道主義，因此歷史的目的在向理智、人道的方向發展（頁 11-12）。

李宗侗的《中國史學史》原為在大學的授課講義，大體依朝代先後介紹傳統中國的史書和史家，並論述二十五史紀、志、表、傳的體例，以及較為特殊的典制史、學術史、地方史、宗族史、家譜、年譜等。李書出版於 1953 年，與 1941 年金毓黻所著《中國史學史》相較，未必更為深入。

許冠三的《史學與史學方法》是一部體系較為完整的史學論著。第一編論述歷史知識的性質，包括不完全性、不一定性、主觀性和客觀性。第二編論述歷史撰寫的一般方法，包括從假設到致知，以及歷史解釋中的通則和學說等問題。第三編論述歷史資料的搜集與考證，包括外考證和內考證。作者將史學分為只堆史料而不致知的的古典派、以科學方法考證小史實的科學派，和以歷史規律解釋歷史大變動的玄學派。對三派皆有批評。作者對玄學派的批評是：「在他們看來，歷史研究本身並無獨立價值，這只是為另外一些政治的、宗教的、倫理的或哲學的價值服務。在當代的玄學派史家中，以辯證唯物論者最多。他們要硬生生地將馬克思的經濟史觀套在中國歷史上，以歷史為個人所特的觀念作註解。」（上冊頁 3-9）作者對古典派的方法基本上是否定的，對科學派的方法雖認為有其限度，但認為可以克服，他說：「除非我們對於科學喪失信心，我們沒有理由懷疑史學致知的光明遠景。」（上冊頁 69）。綜覽全書，基本上是實證主義和經驗主義的，故對馬克思主義式的玄學方法加以拒絕，作者說：「史著的內容不只是敘述、描述歷史事實，而且還說明諸歷史事實間的關係，解釋歷史的變動，其說明與解釋皆基於科學的明確通則，而非玄學的籠統觀念。」（下冊頁 40）值得一提的，前述大陸學者李開元於 1986 年著文所提倡的多層次史學，將史學分為低層、中層、高層等，許冠三在 1959 年出版的該書中已有所討論（上冊頁 7）。

除出版新書外，此期亦重印 1949 年以前出版的史學論著，如張蔭麟的《論傳統歷史哲學》、姚永樸的《史學研究法》，均於 1953 年由中央文物

供應社印行，前者為二十二頁之小冊，後者為四十頁之小冊，茲不多論。

其二、1960年代：這十年間，臺灣有關史學的譯著，約有五種，兩種為翻譯，三種為撰寫。翻譯的兩種書是：①卡爾 (Edward H. Carr) 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What is History)：②該書原由六篇講演合成，屬歷史哲學，包括歷史家應如何處理史實（歷史家與史實之間不斷交互對話）、歷史人物是否為孤立的個人（皆為社會的產物和反映）、歷史研究的科學方法與相關人物的隱私權問題（科學方法用於歷史有其限度，論述歷史功過不必計及私德）、歷史上的因果關係（不以偶然視之，找出終極原因）、歷史是進步的抑退步的（應有進步的信念）、以及歷史研究的新展望（為關心社會，仍要不斷研究歷史；歷史範圍不斷擴大，歷史的解釋愈來愈寬廣）。②杜蘭夫婦 (Will and Ariel Durant) 著、鄭緯民譯《歷史的教訓》(The Lessons of History)：③該書歸納出來的歷史教訓包括人類創造了文明、生存就得競爭、不同種族應互相尊重、改革與保守皆有價值、紀律與自由同等可貴、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應該調和等。書中所論雖為歷史的本身，但涉及到歷史的性質和方向，仍然是史學的範圍。

撰寫的三種皆是處理中國史學問題，而非處理一般史學問題：①杜維運《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④該書列舉西方史學家對中國史學的若干看法，並對其看法加以辯證或釐清。該書於簡述中國史學於十九世紀末葉前之獨立發展及二十世紀初期中西史學交流狀況之後，即分別引述西方正統史家（治歐洲史者）、和非正統史家（不治歐洲史者）對中國史學的一知半解、以偏概全、認識不清之處，並分別提出辯證和釐清，對於西方漢學家較能了解中國史學，亦分別給予肯定。譬如英國史家白特費爾德 (Herbert Butterfield, 1900- ?) 曾謂中國的考據學「未能對證據作科學的評價與分析」，中國史家只做登錄事實的工作，沒有達到綜合的境界，也沒有發展歷史解釋的藝術（頁 19-20）。又譬如美國研究哲學的學者魏吉瑞 (A. G. Widgery, 1887- ?) 曾謂：「中國……的歷史著作，……大都是關於統治階級的描述，

② 王任光譯，《歷史論集》（臺北：幼獅書店，1968）。

③ 鄭緯民譯，《歷史的教訓》（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69）。

④ 原於 1966 年由中國學術獎助會獎助出版，到 1971 年重新增補由臺北三民書局出版。



……很少論及歷史的性質與意義。」(頁19)作者均提出辯證和釐清。至於對西方漢學家的一些肯定,不多引述。④李宗侗《史學概要》:⑤該書與所著《中國史學史》內容略同,惟章節重新安排,資料略有增刪。⑥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⑦該書為一演講集,共有八講,分別論述如何研究通史、政治史、社會史、經濟史、學術史、歷史人物、歷史地理、文化史,多屬作者的治學經驗,引證資料多為中國史實。

此期亦有翻印的舊書,如1963年臺灣商務印書館翻印黎東方所譯的《歷史之科學與哲學》,原出版於1929年,前已介紹,茲不多論。

其三、1970年代:1970年代臺灣地區的史學論著相當豐富,窺其內容,有些是因襲的,有些是創新的。有關史學史的書,可以舉出兩種:①黃培《歷史學》:②係高希均主編《現代美國行為及社會科學論文集》的分訂本,主要介紹美國的史學發展史,兼論定量分析和心理分析兩種史學方法。③杜維運、黃進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集》:④雜選有關中國傳統史學的論文四十五篇而成,原論文發表在1900年代者一篇,1920年代者七篇,1930年代者五篇,1940年代者四篇,1950年代者九篇,1960年代者十二篇,1970年代者七篇,多為有關傳統中國史學的論述,包括史官、史家和史書。

有關史學方法的書,可舉出三種:①姚從吾《歷史方法論》,②為陳捷先、札奇斯欽編《姚從吾先生全集》的第一本,內容分為近代歐洲歷史方法論的起源、論史料,和歷史學的輔助科學三部分。於歐洲歷史方法論起源則推崇十八、九世紀德國史學家尼博兒(B. G. Niebuhr, 1776-1831)和蘭克(L. V. Ranke, 1795-1886);論史料所舉多為中國古史資料的例證;談歷史學的輔助科學,僅舉語言學、古文字學、古文書學、印章學、錢幣學、譜系學、家世學、徽章學(紋章學,研究徽章、勳章花文演進)、年代學、地理學。姚從吾自1934年從德國留學歸國,迄於1970年在臺去世,所傳述的史學方法,多本於德國蘭克、班漢姆(Bernheim, 1854-1937)等的史學著作。

④ 李宗侗,《史學概要》(臺北:正中書局,1968)。

⑤ 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臺北:三民書局,1969)。

⑥ 黃培,《歷史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3)。

⑦ 杜維運、黃進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集》(臺北:華世出版社,1976)。

⑧ 姚從吾,《歷史方法論》(臺北:正中書局,1971)。

②王爾敏《史學方法》：⑤⑥分爲引論、原論、通論、分論、餘論五部分，論述史籍、史家、史料和歷史寫作方法，多從中國傳統史學中找例證，引證西方史學著作之處，多爲二、三、四十年代引進的著作。③黃俊傑編譯《史學方法論叢》：⑤⑥該書譯載的論文或書的章節，多爲美國史學家或社會科學家的著作，以1960年代出版者最多，亦有1940、1950、1970年代者，論題包括史學的科學方法、歷史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關係、以及觀念史的解釋問題等。

一般性的史學論文集的書，可以舉出四種：①錢穆《史學導言》：⑤⑥係集四篇通俗講演稿而成，僅〈歷史上之時間與事件〉與史學直接相關。②有志圖書公司編《如何學歷史》：⑤⑥選編沈剛伯、胡適等人所撰十篇史學論文而成，其中較爲重要的，三篇有關中國史學史，三篇有關中國史學方法。③楊懋春《史學通論》：⑤⑥偏重於社會史方面的論述。④張玉法《歷史學的新領域》：⑤⑥集二十四篇史學論文而成，分爲史學發展方向、史學方法、治史態度、歷史法庭等方面。各文的基本論點：①對一個歷史問題的探討要面面顧到；②研究的方法應不斷求新，因此對計量史學、心理史學、比較史學均加介紹；③採用行爲科學的方法，力求價值中立；④主張實證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史學；⑤政治、法律不得干涉歷史研究。

翻譯出版的書有廖中和譯《歷史的功用》（臺北，1970）、容繼業譯《歷史意義與方法》（臺北，1974）、涂永清譯《史學導論》（臺北，1976）、譚逸譯《當代史導論》（臺北，1978）、鈕先鍾譯《爲何不向歷史學習》（臺北，1977）等。其中《歷史意義與方法》(History: Meaning and Method)，原作者爲美國史家葛隆斯基(Dearn Donald Vincent Gawronski, 1936- )，論及歷史哲學、歐美史學發展及歷史寫作方法，對歷史寫作方法有較爲具體的規範。《當代史導論》，原作者爲英國史家巴拉克洛夫(Geoffrey Barraclough)，第一章介紹當代史的特性，謂當代史的觀念起於

⑤⑥ 王爾敏，《史學方法》（臺北：東華書局，1977）。

③ 黃俊傑編譯，《史學方法論叢》（臺北：學生書局，1977）。

② 錢穆，《史學導言》（臺北：中央日報社，1970）。

⑤⑥ 有志圖書公司編，《如何學歷史》（臺北有志圖書公司，1971）。

④ 楊懋春，《史學通論》（臺北：華欣文化出版事業中心，1974）。

⑤⑥ 張玉法，《歷史學的新領域》（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8）。

1918年以後，是指「今日世界各實際問題首先形成」以來的歷史，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為當代史的重要起點。此一觀念開闢新的斷代史，頗富意義。<sup>⑤⑥</sup>

此期對舊書的翻印也很重視，陳韜譯《史學方法論》（臺北，1970年翻印）、呂思勉著《歷史研究法》（臺北，1974年翻印）、楊鴻烈著《歷史研究法》（臺北，1975年翻印）等都於此期在臺北翻印出版。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此期有書局將英國史家湯恩比的史學有系統的加以介紹，出版《湯恩比與歷史》<sup>⑤⑦</sup>一書，集沈剛伯、閻沁恆等人的著作二十一種，從不同角度，對湯恩比的史學加以介紹。湯恩比的《歷史研究》巨著，將歷史上的世界文明分為二十一種，以人的生、老、病、死循環韻律，解釋文明的成長、成熟、破裂與衰亡，並以挑戰與回應解釋文明的發生，不斷的挑戰和不斷地成功反應使文明成熟，對成熟的文化不再創造或效忠，文化即破裂、衰亡。湯恩比對中國文化十分讚揚，認為二十一世紀可能是中國人的世紀。湯恩比除了脫離神學、以哲學解釋歷史外，其著作亦為歷史的比較研究和歷史的科學研究提供典範。

其四、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期：最近十五年臺灣地區的史學，與前此三十年相仿，仍是傳統中國史學與近代中國史學並行發展。比較起來，傳統中國史學，勢力較弱；近代中國史學，勢力較強。值得注意的，由於新的史學理論與方法不斷自西方引入、新的譯著不斷出版，翻印1950年代以前舊書的情形已經不見。另一方面，儘管五、六年來，臺海兩岸史學不斷交流，大陸學者的馬克思主義史學迄未在臺灣受到重視。

在傳統中國史學方面，可以舉出兩部書：①汪榮祖《史傳通說》：<sup>⑤⑧</sup>論文二十四篇，分別論述傳統中國史家、史書、和史學方法等。史家方面，有論述太史公、班固、陳壽的篇章；史書方面，有論述春秋、左傳、戰國策、後漢書的篇章；史學方法方面，有論述記言記事、彰善癉惡、傳記、盛衰、銓評、信史、素心、直筆、貫通的篇章。②杜維運《憂患與史學》：<sup>⑤⑨</sup>為論

⑤⑥ 譯本頁1-26。

⑤⑦ 牧童出版社編，《湯恩比與歷史》（臺北：牧童出版社，1976）。

⑤⑧ 汪榮祖，《史傳通說》（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

⑤⑨ 杜維運，《憂患與史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

文集，部分論文為中國歷史本身，大部論文有關中國史學史和史學方法；其中史學方法的論述，如比較史學等，亦多引證西方學者的著作。<sup>③</sup>杜維運《中國史學史》第一冊：<sup>④</sup>有系統地論述春秋戰國至東漢時期的中國史學，除論述司馬遷、班固等人的史學特徵外，論及當時的史學思想，以及當時知識分子利用歷史知識的情形。

在近代中國史學方面，可以舉出兩本書：<sup>①</sup>李弘祺等著，《史學與史學方法論集》：<sup>⑤</sup>係編集李弘祺、李恩涵等著譯之十六篇論文及兩種討論會記錄而成，內容包括中西史學史、西方史學家、歷史解釋、史學方法、歷史與社會科學的關係等方面。<sup>②</sup>思與言雜誌社編輯《史學與社會科學論集》：<sup>⑥</sup>論文分成九大類，均為座談會記錄，與史學有關者，兩類屬歷史教育，一類為近代中國史學史，一類屬社會科學與歷史學的關係；其中社會科學與歷史學的關係，分別討論了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心理學與史學的關係。此期近代中國史學，除撰寫者外，尚有翻譯出版的專書，此在1950年前的中國大陸及1950年以後的臺灣地區，一直佔重要地位。惟1950年以前所譯者，多為德文、法文著作；1950年以後所譯者，多為在美國出版的英文著作。茲舉數種如下：<sup>①</sup>弘文館出版社編輯部編譯《西洋現代史學流派》：<sup>⑦</sup>自歐美史學著作中選擇材料，介紹了十七個歐美的哲學家 and 史學家，這十七人是：

狄爾泰(Wilhem Dilthey, 1833-1911)：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柏林大學教授，著有《黑格爾的青年時代》等書。

邁乃克(Friedrich Meinecke, 1862-1954)：德國史學家，柏林大學教授，治歷史將政治史與精神史結合，著有《近代史中的國家理性概念》等書。

雅斯培(Karl Jaspers, 1883-1969)：德國存在主義（唯心主義之流派）哲學家，巴塞爾大學教授，著有《理性和存在》等書。

費勃(Lucien Febvre, 1878-1956)：法國歷史學家，法蘭西學院教授，倡

<sup>③</sup> 杜維運，《中國史學史》第一冊（臺北：作者自印，1993）。

<sup>④</sup> 李弘祺等著，《史學與史學方法論集》（臺北：食貨出版社，1980）。

<sup>⑤</sup> 思與言雜誌社編輯，《史學與社會科學論集》（臺北：明文書局，1983）。

<sup>⑥</sup> 弘文館出版社編輯部編譯，《西洋現代史學流派》（臺北：弘文館出版社，1986）。

導歷史的綜合研究，1929年與布勞克(Marc Bloch, 1886-1944)創辦《經濟社會史年鑑》。

馬魯(Henri-Irénée Marron, 1904- )：法國歷史學家，巴黎大學教授，著有《歷史知識》等書，反對實證主義歷史學，否定歷史的科學研究，認歷史是人文科學或精神科學。

阿宏(Raymond Aron, 1905-1983)：法國歷史哲學家，法蘭西學院教授，著有《歷史哲學導論》等書，認為歷史的過去由現代人的意識產生，有現實的目的，重建過去的本身不是目的。

湯恩比(Arnold Toynbee, 1889-1975)：英國歷史學家，倫敦大學教授，著有《歷史研究》等書。

巴柏(Karl Popper, 1902- )：哲學家，生於奧國，任教於英國政治經濟學院，為邏輯實證論(新實證論)代表人之一，以主觀的唯心論解釋歷史。

屈維廉(George M. Trevelyan, 1876-1962)：英國歷史學家，劍橋大學教授，著有《英國社會史》等書，認為歷史是科學也是藝術。

羅素(Bertrand Russel, 1872-1970)：英國哲學家，著有《西方哲學史》等書，認為決定歷史的因素是經濟技術、政治學說和偉大人物。

費拉特(Roderick Floud, 1942- )：英國歷史學家，倫敦大學教授，為計量學派的重要人物，著有《歷史計量法導論》等書。

比爾德(Charles A. Beard, 1874-1948)：美國歷史學家，著有《傑佛遜民主制的經濟起源》等書，是經濟史觀的重要代表。

貝克(Carl L. Becker, 1873-1945)：美國歷史學家，康奈爾大學教授，著有《革命前夕》等書，為相對主義的代表，認歷史可隨主觀的喜好而任意伸張。

尼文斯(Allan Nevins, 1890-1971)：美國史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曾為美國大資本家寫過十二部傳記，並讚揚他們的偉大性格、深遠卓見和慈善行為，強調偶然的機遇。

胡克(Sidney Hook, 1902- )：美國歷史學家，紐約大學教授，著有《論歷史英雄》等，強調機遇，認為許多偉大的君王，如無做君王的機遇，不會成為英雄。

弗蘭茲(Ommo P. Pflanze)：美國歷史學家，明尼蘇達大學教授，著有《俾斯麥和德國的發展》等書，為心理歷史學家。

克羅齊(Benedetto Croce, 1866-1952)：意大利歷史學家，著有《歷史學的理論與實踐》等書，反對實證主義，認為歷史思維最重要。

本書對西方史學家和歷史哲學家的介紹，簡單扼要，可幫助史學界對西方各派史家獲得初步的認識。②布勞代爾(Fernand Braudel)著、劉必成譯《論歷史》(On History)：④介紹年鑑學派的一些觀念，並對歷史與其他社會科學間的關係加以檢討。③沙弗爾(Robert Jones Shafer)著、趙干城、鮑世奮譯《史學方法論》(A Guide to Historical Method)：⑥論述歷史研究的過程，包括選題、搜集史料、考訂史料、史料的分析綜合、以及寫作方式和論文形式等。

1950至1990年代的臺灣史學，除前述引介或論述史學史、史學方法、史學理論者外，尚有受政治影響的一面：其一、大陸史學家以馬克思主義重新建立中國歷史體系，被政府有關方面視為破壞中國歷史和文化，因此在1950至1970年代政治控制較嚴的時期，不允學界懷疑中國歷史、批判中國文化。《古史辨》一書的被禁、誹韓案的判定，都發生在那個時代。其二、在解除戒嚴以前，大陸出版品限制進口，大陸學者的著作（包括1949年以前的，與共產主義毫不相干的著作）限制閱讀，使臺灣的歷史學知識，幾與1949年以前的傳統斷裂，靠少數大陸來臺史家傳述、靠少數非法出版商盜印，使兩岸史學傳承不絕如縷。其三、執政的國民黨出身革命政黨，革命政黨的使命感，不給予革命的客體任何尊重，使許多受革命影響的史學家，以革命史觀寫中國歷史，影響客觀史學的發展。上述的政治影響，到1980年代以後逐漸減弱。值得注意的是，另一種革命史觀，正在成長。

## 五、結 論

1949至1994年間臺海兩岸的史學分途發展。中國大陸屬於共產主義國家，不僅黨、政、軍一體，思想和文化亦與黨、政、軍一體，因此史學的發

④ 劉必成譯，《論歷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8）。

⑥ 趙干城、鮑世奮譯，《史學方法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0）。

展，一直以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為綱。馬克思主義史學，萌芽於五四時期，到 1920 至 1940 年代，逐漸成長，而於 1950 年代及其以後，得到發皇。馬克思主義史學所建立的中國歷史，內容廣闊，此處僅舉五點：①將中國歷史分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在封建社會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之間，存在著資本主義萌芽，因受帝國主義侵略，未能形成資本主義社會。②把歷代的民亂，定位為「農民革命」或「農民起義」，認為是階級矛盾引起的——有產階級壓迫無產階級、封建地主壓迫農民。③凡能依照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五階段推動歷史發展的都被肯定，但在兩個階段之間，維護舊階段、阻止新階段建立的，都被否定。譬如批評孔子維護奴隸社會、讚揚秦始皇把中國推向封建社會；又譬如讚揚孫中山開啓了反封建的資產階級革命，但到共產主義革命興起，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認為孫中山的繼承者不應再推動資產階級革命，故對 1927 年國民黨分共以後的國民革命史大加貶抑。④鴉片戰爭以後迄於 1949 年的中國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改革派和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希望建立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革命派則希望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因此不僅貶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現狀，而且貶抑建立資本主義社會的企圖。⑤由於中國共產黨為革命黨，對非共產主義和非共產黨的事物多貶抑；大陸學者寫歷史，頗為此一革命史觀所左右。

四十多年間臺灣地區的史學發展，約有以下的趨勢和特徵：①大陸史學界以唯物史觀寫歷史，臺灣史學界反對以唯物史觀寫歷史；政學界有人企圖推動以孫中山的民生史觀寫歷史沒有成就，絕大部分歷史學者，除了堅守傳統史學方法者外，都依照從歐美各國引進的史學理論和方法，從事歷史研究。②歐美的實證主義和經驗主義，最為臺灣史學界所歡迎，但由於大陸地區學者的著作限制閱讀，重新自歐美引介史學理論和方法，早期亦受到資料和人才的限制，致使臺灣地區的史學知識，有二十多年的時間，幾乎全部仰賴歷史老教授的舊講義，和翻印 1920 至 1940 年代出版的舊書。③近二十年間，由於史學界及出版界大力譯介歐美的史學及社會科學的新著，更有著作以新史學的觀念重新檢討傳統中國史學，遂使臺灣地區的史學逐漸能有所創新。在上述史學發展的影響下，四十多年來在臺灣出版的歷史著作，可以作以下的評估：①對中國歷史的分期，除引用西方史學的

觀念，分爲史前、上古、中古、近世、近代、現代以外，一般仍依朝代先後論述史事，沒有脫離 1920 至 1940 年代所建立的史學傳統。②歷史研究的範圍愈來愈廣（如育兒史、環境史），對歷史的解釋傾向多因素，對史事和人物的評價較尊重歷史發生時的價值觀。③受學術分工的影響，專題性的著作愈來愈多，通論性的著作很少受到肯定。④大部的史學家都寫描述式的歷史 (descriptive history)，並不建構大的解釋體系。⑤尊重歷代史家所建立的歷史正統，很少有翻案性的著作。⑥近代中國政治史的著作，受國民革命史觀的影響頗大，一般傾向於貶抑滿清、貶抑北京政府、貶抑共產革命。

四十多年來大陸學者堅守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立場，近年雖引介自然科學、西方社會科學以及西方史學的理論和方法，尙少用在歷史的研究上，並聲言任何引介，不得或不違反馬克思主義。臺灣地區的學者沒有固定的意識形態，基本上是從歐美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的著作中尋找史學理論和方法，一般只使用實證的和經驗的方法，使自己的著作更客觀、更可靠，並不願對特殊的理論和方法加以實行。心理史學、量化史學、比較史學，有少數學者有限度地使用，其他方面的科際整合多不成功。兩岸史學的發展或多或少，都受到政治的影響。革命史觀兩岸史學都長期使用；大陸史學不易引進西方史學理論和方法，臺灣史學，亦不易引進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和方法。臺海兩岸史學，只有擺脫政治限制、政治禁忌、政治偏見，才能進一步發展；無疑地，臺灣在這些方面已有很大的突破。

一九九四年五月十日於近代史研究所

---

本通訊歡迎世界各地學者，撰文介紹各該地區近代中國史研究情形、出版狀況、會議消息，及傑出學人之貢獻，以廣學術交流。

---





## 學人簡介

# 楊雲萍

許雪姬\*、賴惠敏\*\*

## 一、庭訓與教育

雲萍先生本名友濂，祖父爾康先生為楊氏祖先來台的第四代，能文工詩，為著名詩人、地方士紳。日據時期，曾任辨務署參事及士林區長。其父敦謨先生，畢業自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即台大醫學院前身），後被派往苗栗後龍擔任公醫。雲萍先生生於民前六年，祖父取名友濂，自小隨祖父住在士林雙溪，深得祖父寵愛。祖父常和學者士紳唱和吟詩，每逢聚會之際，祖父必讓他隨侍其側，並頗得士紳們的賞識。

雲萍先生八歲時，隨父親到後龍公學校就讀，不久轉回士林八芝蘭公學校。他在學校的表現一直很優秀，常常被派為學校代表出去比賽，如果有貴賓到學校參觀，學校都找他出來演講、致辭。公學校畢業後，雲萍先生參加入學考試，分別考取台灣醫學校和台北中學（建國中學前身）。當時台灣人要考入醫學校很難，考上台北中學也很不容易，沒想到他同時考上兩個學校，一時間成為鄉人所矚目對象。雲萍先生自小就覺得台灣人很可憐，認為真有心要醫治台灣人，不必一定當醫生，而可以由文學、史學著手，因此選擇就讀台北中學，放棄醫學校。

就讀中學可以說是雲萍先生一生難得的經驗，雖然中學裡只有他和另一個同學是台灣人，但是日籍同學和師長對兩人都很友善，加上學校設備

\* 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

\*\* 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

好、教室好，師資更好，因此在中學就讀給他的啓發甚多。雲萍先生的成績一直保持優等，故從沒有自卑感或意欲反抗、自衛等情事，畢竟自卑（即自尊）的人才會反抗。

民國十五年三月，雲萍先生自中學畢業後，即赴日本大學文學部預科深造，旋又入日本文化學院（東京）大學部文科就讀。此時正是日本最進步的時代，世界級的人才輩出，如大學部部長是日本頗負盛名的作家菊池寬，教授則有曾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川端康成、大作家河上肇和名文學批評家小林秀雄，這些大學的老師對雲萍先生都非常照顧，而他也很能理解老師們的想法、看法，課後常和老師一起討論，獲益良多。

## 二、投身文學寫作

雲萍先生自小接受祖父庭訓，接觸很多中國詩詞文學。中學時代開始閱讀由中國傳入的白話文雜誌，如《小說月報》、《東方雜誌》等，並嘗試以白話文發表文章。民國十三年左右，新文學風行台灣，他也寫了許多文章投稿。雲萍先生認為台灣文學要比中國文學或日本文學好，因為台灣文學雜揉兩種文化之精華。他自詡日本文學造詣不錯，至於中國文學則自小受祖父薰陶教養，加上家庭環境使然，接觸廣泛，故涵養亦不弱，不論古典文學或白話文學，皆頗多涉獵，因此能很深入地瞭解此二種文學的特質與內涵。至於中國作家裡，雲萍先生最欣賞魯迅先生，尤喜其罵人文章，覺得他罵得都頭頭是道，絕非亂罵。魯迅先生飽讀詩書，造詣深厚，罵起人來毫不留情，可是他卻都自謙不懂，實在是高明的藝術。中國另一位文學家郭沫若先生，乃醫生作家，填詩作詞能力亦佳，但總不如魯迅先生來得深刻。

民國十四年時，因緣際會，雲萍先生認識了江夢筆，彼此氣味相投，皆認為對台灣文學有責任，應盡心力做點事，乃共同創辦了《人人雜誌》。江夢筆家開木材行，屬富康之家，他本人既肯出錢，又能做事；兩人合作後，他多勤於辦事，雲萍先生則主寫稿、編輯。在十八、九歲這段時期雲萍先生寫了很多文章，也寫詩，曾出過詩集《山河》。〔按：為日文詩集，於民國三十三年出版〕當年雲萍先生多用「士林雲萍生」之名寫作，所以大

家都只識他名爲「雲萍」，後來乃以「楊雲萍」之名行世。

赴日求學後，因主修文學，更是投注心血於和大師們討論文學創作上。雲萍先生也曾接受邀請，和邱金波一起出席日本大東亞文學者大會。雲萍先生在日以英國文學家湯姆斯哈定（Thomas Hardy）爲研究對象，這大概是由於他的英文易了解，思想較溫和的緣故罷。

### 三、光復前後

雲萍先生在日本求學達七、八年之久，歸國後，常寫文章投稿，母親卻總認爲應找個有固定薪水的工作才行。幸虧不久之後上海的《庸報》意欲聘他爲主編，《庸報》是中日合作創辦的報紙，由日本出資本，在中國出刊的一份報紙，銷路不錯。因楊夫人不贊成，故其條件雖佳、待遇雖好，但雲萍先生仍未前往就職。因楊夫人告誡他，如果不喜歡做的事，千萬不要違背良心，勉強去做；若就此職是違背良心的事，更是絕對不可前去。後來雲萍先生很感激夫人，若非她的支持，說不定戰後即成爲漢奸，留滯大陸，必和現今的命運大不相同。

日本投降後，台灣再隸中國，大家對台灣前途報以熱切之期盼。當時適逢林茂生創辦《民報》，《民報》籌備之初，許乃昌曾專程到士林雙溪聘雲萍先生擔任主編，遂欣然接受此職。這一段時期是言論相當自由的時期，任何言論都不被禁止，加上雲萍先生敏銳的觀察，寫了不少文章，可以說是他文學批評、創作的巔峰期，如〈奪還我們的語言權〉等文，頗具時代性。

因爲雲萍先生常在《民報》寫社論、短評，台灣行政長官公署長官陳儀對他有所認識，乃獲聘爲參議。雲萍先生和陳儀會面多在長官公署，談及中國人和日本人之間的問題，雲萍先生提供了許多治台經驗。其後雲萍先生到台灣編譯館任第四組歷史文化組組長，參與考古研究、演講活動。

### 四、台大執教

「二二八事件」以後，林茂生先生遇難，《民報》也停刊了，編譯館

亦遭撤銷，許多編譯館人員多至台灣大學、師範大學任教，雲萍先生由館長許壽裳推薦，也到台灣大學任教。雲萍先生到台大教書沒有選擇文學系，反倒進入歷史系，主要在於他認為「文學」一門不易教授，史學中的史料則很重要，較易發揮，有教授之價值，故以此為職志。雲萍先生到台灣大學任教一輩子，幾乎是將一生都貢獻給台大。

因為雲萍先生對歷史的信心十足，很看重自己的史學涵養，故多潛心自己的研究。和同事的交往上，方豪教授算是比較熟悉的。方豪教授於民國三十七年來台，來時已頗具聲名。其次是沈剛伯教授，沈先生雖稱史學家，但非純粹學歷史的。傅斯年校長對雲萍先生相當器重，知道他每每由士林雙溪通車到台大來上課，風塵僕僕，便特地撥一間宿舍給他。傅先生是個有個性的學者，對於他所認識的人，好壞態度與待遇差很多，只要他對這人印象好，對這人的態度就很好；如果給他不好的印象，對待這人就很不好的。

傅校長的個性較烈，後來在省議員質詢時，因心臟病發作身亡，有人還說是郭國基氣死傅斯年。傅校長之後的台大校長是陸志鴻，陸校長對他也很有禮遇，但因不是文史界出身，雖知雲萍先生風評不錯，總是難瞭解他的價值，對他的重視程度就不如傅校長了。

## 五、教史心得

雲萍先生發現日本人很重視史料，史料是研究學問的基礎，做研究必先熟讀史料，研究才能得心應手。他的日文能力不錯，學習日本人研究學問的方法後，將此研究心得用諸教學，使學生瞭解史料的重要性。

雲萍先生在台大任教超過三十五載，自七十歲退休後，仍誨人不倦地為台大博士班學生開課。他教授的課程範圍相當廣泛，先後曾開中國文化論、日本史、中國史學之日文名著選讀、台灣史日文名著選讀、歷史哲學、明史、南明史、台灣史等等。因為重視史料的關係，雲萍先生常花很多時間做史料的介紹及解讀史料，也因而曾鬧過一個笑話，此乃雲萍先生上明史時，因先介紹明史史料，到了學期最後一堂課，才講完朱元璋的軍隊打到大都，講得氣喘咻咻，這門課就結束了！此一趣譚至今仍膾炙人口。

對於南明史這門課，在台灣史界，雲萍先生是首開南明史課程的史學家。因他深感鄭成功在台治績卓著，為聯結中國史和台灣史的重要環結，因而有重視之必要，在於這門課裡有個重要的觀點，雲萍先生常一再強調的是：鄭成功是開創台灣，而非收復台灣。

台灣史是雲萍先生研究的重點，講授台灣史時一樣是先注重台灣史料，最後才是台灣史。關於台灣史，雲萍先生的重要觀點是：中國和台灣的關係應自隋煬帝開始，而非遠自三國吳大帝。

在日本史或中國史之日文名著選讀、台灣史日文名著選讀這些課程中，雲萍先生介紹內藤湖南、伊能嘉矩的著作來解釋史觀，對學生有相當大的啟發。

## 六、收藏與感懷

雲萍先生不但是詩人、作家、文學家，也是史學家，同時是個收藏甚豐的收藏家。關於他的收藏自何時開始，連自己也想不起來了，可能從小和祖父浸淫骨董收藏有關。雲萍先生幾乎是天天上牯嶺街，看到好的東西就買下來，用心蒐集的文獻資料、骨董、錢幣、印章、地契，藏量蔚為可觀，所以也可列入收藏家之林。令雲萍先生最感欣慰的是：楊夫人的大力支持，有時還摘下手上的金戒指典當應急。她默默支持的美德，是雲萍先生收藏有成的動力。

（本稿係參照吳美慧小姐所紀錄的楊雲萍先生第一次訪問稿，特此致謝。並感謝劉淑芬教授撥冗潤筆。）

### 附錄：楊雲萍教授著作目錄

楊友濂，筆名雲萍，生於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七日，台北市

學歷 台北第一中學 一九二六

日本大學文學部 一九二八

文化學院（東京）大學部 一九三一

經歷 台大歷史系教授 一九四七 — 一九七七

台大歷史所教授 一九七七 — 一九九一

台大歷史系名譽教授 一九八六 —

國史館委員 一九七〇 —

著作

一九二四年

二 月 〈一陳人之手記〉《台灣民報》 收入《智慧的薪傳》（文訊雜誌社）

一九二六年

一 月 〈光臨〉 《台灣民報》（一月一日）

一九三七年

二 月 〈楊英に關る資料〉 《文藝台灣》 二卷二期

一九三八年

四 月 〈陳迂谷の詩と詩集〉 《愛書》 十期

〈 — あの追憶 — 連雅堂先生〉 《愛書》 十期 頁一六九 — 一七二

〈芝山巖考〉 《台灣日日新報》 四輯

一九三九年

一 月 〈黃景寅の詩について〉 《愛書》 二期

〈稻江治春詞について〉 《台灣風土記》 一期

一九四〇年

二 月 〈鄭成功雜考〉 《文藝春秋》 十八卷二期

三 月 〈劉家謀の「海音」に就いて〉 《文藝台灣》 二期 頁八〇 — 八七

五 月 〈楊浚は楊承藩にすりず考〉 《文藝台灣》 三期 頁一五四 — 一五九

一九四一年

五 月 〈「窮理圖解」と「天地變異」に就いて〉 《台灣時報》 二三卷五期 頁七〇 — 七四

七 月 〈讀書餘錄〉 《台灣地方行政》 第七卷第七期 頁八 — 十二

〈「大料炭撫墾署報告」に就いて〉 《台灣地方行政》 七卷七期

八月 〈台風瑣話〉 《大阪朝日新聞》（八月四日）

九月 〈寄人二首〉 《文藝台灣》 第二卷第六號 頁四三

十月 〈排算八字と析字注〉 《民俗台灣》 一卷四期

十二月 〈士林先哲傳記資料初輯〉 《民俗台灣》 一卷六期 頁二六

〈研究と對象〉 《民俗台灣》 一卷六期

一九四二年

四月 〈「劍花室文集」に就いて〉 《台灣時報》 二五卷四期  
頁八四 — 九二

五月 〈台南古蹟志について〉 《民俗台灣》 二卷五期

〈宣傳と「學術もの」〉（隨筆） 《文藝台灣》 第四卷第二號

〈市場〉（詩） 《文藝台灣》 第四卷第二號

七月 〈台灣舊慣調査會に就いて〉 《台灣時報》 二五卷七期  
頁四五 — 五五

十月 〈陳三五娘など〉 《民俗台灣》 二卷十期

一九四三年

四月 〈頼和氏追憶〉 《民俗台灣》 三卷四期

〈台灣關係文獻解題（一九四三年四月 — 一九四四年四月）〉  
《民俗台灣》

八月 〈台灣農民の民俗學的な考察〉 《台灣時報》 二六卷八期

九月 〈糊と鉄と面の皮〉 《文藝台灣》 第六卷第五期 頁四四  
— 四七

十一月 〈詩集山河〉 台北市 清水

一九四四年

〈「李氏焚書」に就いて〉 《台灣時報》 二七卷九期 頁  
一〇八 — 一一三

五月 〈台灣語文獻小記〉 《民俗台灣》 四卷五期

## 一九四五年

二 月 〈台灣的文藝與學術〉 《民報》（二月一日、二月二日）

十二月 〈開戰前夜の東京〉（譯） 台北市 東寧

## 一九四六年

五 月 〈中山詩文集及其他〉 《民報》（五月十九日）

八 月 〈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回顧〉 《台灣文化》

## 一九四八年

五 月 〈台灣的研究〉 《台灣風土》 一期（五月十日）

〈深夜錄 — 記林幼春先生及其他〉 《台灣風土》 二期（五月十八日）

六 月 〈「通志」的纂修〉 《台灣風土》 四期（六月一日）

〈「通志」的纂修〉 《台灣風土》 五期（六月八日）

〈「台灣通史」的作者及其手蹟（附圖）〉 《台灣風土》

六期（六月十五日）

〈「台灣通志」稿本〉 《台灣風土》 七期（六月二十二日）

〈關於W. Campbell 的「台灣書誌」〉 《台灣風土》 七、九期（六月二十二日、七月六日）

〈史家連雅堂〉 《台灣風土》 八期（六月二十九日）

七 月 〈關於W. Campbell 的「台灣書誌」〉 《台灣風土》 十期（七月十三日）

八 月 關於W. Campbell 的「台灣書誌」 《台灣風土》 十四期（八月十日）

〈駭紅簾外〉 《台灣風土》 十五期（八月十七日）

〈古物古蹟的保護〉 《台灣風土》 十六期（八月二十四日）

九 月 〈「台灣文化志」的著者〉 《台灣風土》 十九期（九月十四日）

〈中秋風雨〉 《台灣風土》 二十期（九月二十一日）

十一月 〈台灣簡史 — 為台灣省首屆博覽會「文獻館」作〉 《台灣



風土》 二五期（十一月二日）

〈博覽會文獻館舉要〉 《台灣風土》 二五、二六期（十一月二日、九日）

十二月 〈傍神作福〉 《台灣風土》 三十期（十二月二十一日）

一九四九年

一月 〈C.E.S. 的「被等閒之台灣」〉（附圖） 《台灣風土》 三四期（一月二十五日）

二月 〈蟹與柿〉 《台灣風土》 三六期（二月八日）

三月 〈陳迂谷的詩和詩集〉 《台灣風土》 四一、四二期（三月十五日、二十二日）

四月 〈關於黃景寅的詩〉 《台灣風土》 四四、四五期（四月三日、十二日）

〈福州歌謠與台灣〉 《台灣風土》 四七期（四月二十六日）

五月 〈日人的台灣「尊重政策」〉 《台灣風土》 四八期（五月五日）

〈台灣研究必讀書十部(一)〉 《台灣風土》 四八期（五月五日）

〈福州歌謠與台灣〉 《台灣風土》 四九期（五月十七日）

〈台灣研究必讀書十部(二) — 台灣通史〉 《台灣風土》 五一期（五月二十四日）

六月 〈台灣研究必讀書十部(三) — 台灣文化志〉 《台灣風土》 五三期（六月七日）

〈台灣研究必讀書十部(四) — 續修台灣府志〉 《台灣風土》 五四期（六月十四日）

〈台灣研究必讀書十部(五) — 諸羅縣志〉 《台灣風土》 五六期（六月二十八日）

七月 〈台灣研究必讀書十部(六) — 淡水廳志〉 《台灣風土》 五七期（七月五日）

〈鄭成功之歿〉 《臺灣文化》 五卷一期 頁十五 — 二十

七

〈台灣研究必讀書十部(七) — 台海使槎錄〉 《台灣風土》  
五九期(七月十九日)

十月 月 〈台灣研究必讀書十部(八) — 台灣外記〉 《台灣風土》 六  
九期(十月四日)

〈台灣研究必讀書十部(九) — 荷蘭治下之台灣 — Formosa un-  
der The Dutch.〉 《台灣風土》 七十期(十月十八日)

〈「台灣叢書」第一輯擬目〉 《台灣風土》 七一期(十月  
二十五日)

十一月 月 〈YM 訪書記〉 《台灣風土》 七三、七四期、七六期(十  
一月八日、十五日、二十九日)

十二月 月 〈台灣研究必讀書十部(十) — 台灣島之過去與現在 — The Is-  
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台灣風土》 七十九期  
(十二月二十日)

〈台灣研究必讀書十部(十一) — 台灣島史 Geschichte der Insel For-  
mosa〉 《台灣風土》 八十期(十二月二十七日)

一九五〇年

一月 月 〈師友風義錄〉 《台灣風土》 八一、八二、八三期(一月  
十日、十七日、二十四日)

〈關於劉銘傳的一些資料及其他〉 《台灣風土》 八四期(一  
月三十一日)

二月 月 〈關於劉銘傳的一些資料及其他〉 《台灣風土》 八五、八  
七期(二月六日、十三日、二十七日)

三月 月 “Poor Little Rich Land” 《台灣風土》 八九期(三月十三  
日)

〈櫟社沿革志略及其他〉 《台灣風土》 九十、九一期(三  
月二十日、二十七日)

四月 月 〈櫟社沿革志略及其他〉 《台灣風土》 九二、九三期(四  
月三日、十日)

〈關於台灣的「詩社」的一些資料〉 《台灣風土》 九四期

- (四月十七日)
- 五月 〈架藏有關「芝山巖」的資料〉 《台灣風土》 九六、九七期(五月八日、十五日)  
 〈架藏有關「芝山巖」的資料〉 《台灣風土》 九九期(五月二十九日)
- 六月 〈鄭成功的墨蹟〉 《台灣風土》 一〇〇期(六月六日)
- 七月 〈延平郡王祠的楹聯〉 《台灣風土》 一〇三期(七月三日)
- 〈一日人的「遺稿集」〉 《台灣風土》 一〇五期(七月十七日)
- 〈「澎湖游草」及其他〉 《台灣風土》 一〇六期(七月二十四日、三十一日)
- 八月 〈蔣雪谷先生紀念〉 《台灣風土》 一〇九、一一一期(八月十四日、二十八日)
- 九月 〈蔣雪谷先生紀念〉 《台灣風土》 一一二、一一三期(九月四日、十一日)
- 〈「無悶草堂詩存」未收作品舉略〉 《台灣風土》 一一五期(九月二十五日)
- 十月 〈「無悶草堂詩存」未收作品舉略〉 《台灣風土》 一一六、一一七、一一九期(十月九日、十六日、三十日)
- 十一月 〈「台灣考」及其他〉 《台灣風土》 一二〇、一二二、一二三期(十一月六日、二十日、二十七日)
- 〈讀「販書偶記」〉 《台灣風土》 一二一期(十一月十三日)
- 十二月 〈「台灣考」及其他〉 《台灣風土》 一二四期(十二月二十五日)
- 一九五一年
- 一月 〈關於「峰峙灘音」〉 《台灣風土》 一二六期(一月十二日)
- 〈滄海遺民王友竹〉 《台灣風土》 一二七期(一月二十六日)

- 日)
- 三 月 〈讀「台灣之建築」〉 《台灣風土》 一三二期 (三月二十三日)
- 四 月 〈吳鳳事蹟與一英人〉 《台灣風土》 一三三期 (四月二十日)
- 五 月 〈吳鳳碑記及其他〉 《台灣風土》 一三四期 (五月四日)
- 六 月 〈陳季同的詩詞〉 《台灣風土》 一三六期 (六月一日)  
 〈「普天忠憤全集」及其他〉 《台灣風土》 一三七、一三八期 (六月十五日、二十九日)
- 七 月 〈「普天忠憤全集」及其他〉 《台灣風土》 一三九期 (七月十三日)  
 〈唐景崧雜記〉 《台灣風土》 一四〇期、一四一期 (七月二十七日、八月十日)
- 八 月 〈唐景崧雜記〉 《台灣風土》 一四二期 (八月二十四日)
- 九 月 〈藍鹿洲的台灣統治論〉 《旁觀雜誌》 十六期 頁三〇—三一
- 十一月 〈關於沈題延平郡王祠楹聯〉 《台灣風土》 一四五期 (十一月二日)
- 十二月 〈t'Verwaaerloosde Formosa《台灣風物》封面插圖說明〉 《台灣風物》 一卷一期  
 〈備忘小錄〉 《台灣風物》 一卷一期 頁二—三
- 一九五二年
- 〈台灣史上的人物〉 《中華日報》副刊 一二〇篇
- 一 月 〈備忘小錄〉 《台灣風物》 二卷一期 頁二四—二五  
 〈六十七兩采風圖合卷〉 (《台灣風物》封面插圖說明) 《台灣風物》 二卷一期  
 〈林覺：蘆鴨圖〉 (《「台灣風物」封面插圖說明) 《台灣風物》 二卷一期
- 二 月 〈備忘小錄〉 《台灣風物》 二卷二期 頁一八—一九  
 〈關於民俗改善〉 《台灣風物》 二卷二期

- 五月 〈詩人連雅堂〉 《中國一周》 一〇九期 頁三 — 四  
 〈備忘小錄〉 《台灣風物》 二卷三期 頁一六 — 一七  
 〈鄭成功墨蹟〉 (《台灣風物》封面插圖說明) 《台灣風物》 二卷三期
- 七月 〈台灣圖〉 (《台灣風物》封面插圖說明) 《台灣風物》 二卷四期  
 〈朝鮮顯宗實錄中有關南明史料(1-6)〉 《台灣風物》 二卷四 — 九期
- 八月 〈台灣土人風俗之圖〉 (《台灣風物》封面插圖說明) 《台灣風物》 二卷五期
- 九月 〈七爺八爺圖〉 (《台灣風物》封面插圖說明) 《台灣風物》 二卷六期  
 〈藍鹿洲的台灣民俗改善論〉 《台灣風物》 二卷六期 頁四 — 六
- 十月 〈新奇雜歌〉 (《台灣風物》封面插圖說明) 《台灣風物》 二卷七期  
 〈台灣歌謠的整理〉 《台灣風物》 二卷七期
- 十二月 〈女性與風俗〉 《台灣風物》 二卷八、九期  
 〈婦女圖〉 (《台灣風物》封面插圖說明) 《台灣風物》 二卷八、九期
- 一九五三年
- 八月 〈劉壯肅公奏議補遺 —— 「彙保基滬立功將士官紳併案請獎摺」〉 文獻專利 四卷一、二期、頁一二一 — 一二四
- 十月 〈可歌可泣的霧社事件〉 《中國一周》 一八三期 頁一〇 — 一一
- 一九五四年
- 二月 〈陸隴其與台灣〉 《台灣風土》 一五八期 (二月一日)  
 〈詩人莊雲從〉 《台灣風土》 一六〇、一六一期 (二月十五日、二十二日)  
 〈關於台海使槎錄與裨海紀遊〉 《台灣風土》 一六四期 (

- 三月十五日)
- 三 月 〈連雅堂與圓山貝塚〉 《台灣風土》 一六五期(三月二十二日)
- 〈爲「台海使槎錄」申辯〉 《台灣風土》 一六六期(三月二十九日)
- 四 月 〈圓山大砥石與砥石歌〉 《台灣風土》 一六八期(四月十二日)
- 〈「成趣園詩鈔」及其他〉 《台灣風土》 一七〇期(四月二十六日)
- 五 月 〈楊懋甫遺詩及其他〉 《台灣風土》 一七一期(五月三日)
- 〈關於曹懋民先生〉 《台灣風物》 四卷五期 頁四四—四五
- 〈楊爾康先生遺著〉 《台灣風物》 四卷五期 頁四六—四九
- 〈記最後一期的「民俗台灣」〉 《台灣風土》 一七五期(五月三十一日)
- 六 月 〈胡南溟的詩及其詩稿〉 《文獻專刊》 五卷一、二期 頁一—六
- 〈「士林溫古誌」及「士林街要覽」〉 《台灣風土》 一七八期(六月二十一日)
- 七 月 〈「士林溫古誌」與「士林街要覽」〉 《台灣風土》 一七九、一八〇期(六月二十八日、七月五日)
- 〈沈傲樵的遊台詩篇〉 《台灣風土》 一八一期(七月十九日)
- 八 月 〈「人人」雜誌創刊前後〉 《台北人物》 三卷二期 頁五〇—五六
- 〈士林地方的開發及其他〉 《台灣風土》 一八三、一八四期(八月十六日、三十日)
- 九 月 〈士林地方的開發及其他〉 《台灣風土》 一八五期(九月

十三日)

- 十月 〈連雅堂傳〉 《台灣文化論集(二)》 頁三〇九 — 三一六  
 〈台灣的寓賢〉 《台灣文化論集(二)》 頁三一七 — 三二五  
 〈大直徐氏番祖媽〉 《台灣風土》 一八七期(十月十一日)
- 十一月 〈梁任公的林公畫像贊〉 《台灣風土》 一八八期(十一月八日)  
 〈妻妾之多〉 《台灣風土》 一八九期(十一月二十二日)
- 十二月 〈「南嘉雲地區歷史文物展覽會」及其他〉 《台灣風土》  
 一九〇 — 一九一期(十二月六日、二十日)

一九五五年

- 一月 〈「臺灣外記」考〉 《台灣風物》 五卷一期 頁一九 — 二二
- 二月 〈關於「鄭延平王三世文牘」〉 《台灣風土》 一九三期(二月七日)
- 三月 〈關於「鄭延平王三世文牘」〉 《台灣風土》 一九四期(三月七日)
- 五月 〈明清史料戊編〉 《台灣風土》 一九五期(五月三日)
- 九月 〈國民革命運動對於臺灣的影響〉 《收入國民革命運動與台灣》 頁五五 — 六二

一九五六年

- 二月 〈牡丹詩社與連雅堂詩鈔及其著者〉 《台北文物》 四卷四期 頁一五 — 二〇
- 四月 〈有關臺北市的二三古文書〉 《台北文物》 五卷一期 頁一六 — 二七  
 〈關於北部臺灣開發的一些資料〉 《台北縣文獻叢輯二輯》 頁四三七 — 四四〇  
 〈陳登元的事蹟及其遺作〉 《台北縣文獻叢輯二輯》 頁四四一 — 四四四  
 〈越南錢幣與中國〉 收入《中越文化論集(二)》 頁二八七 —

## — 二九六

六月 〈鄭成功焚儒服考〉 《台灣研究(一)》 頁三一 — 三七

九月 〈鄭克塽螟蛉子說考〉 收入《台灣風土文物民間知識百年紀念專輯》 頁三四 — 三九

## 一九五八年

〈明國子監考〉 《中國歷代大學史》 頁八五 — 一〇四

六月 〈「寬記執照」考釋〉 《台北文物》 七卷一期 頁五八 — 一六四

## 一九六一年

三月 〈「楊英從征實錄」校勘記引言〉 《台灣文獻》 一二卷一期 頁一五 — 一六

四月 〈鄭成功登陸台灣的日期〉 《新時代》 一卷四期 頁二十二 — 二十三

十二月 〈鄭經進征大陸的始末〉 《台灣省立博物館科學年刊》 四期 頁一 — 六

## 一九六二年

三月 〈歷史、歷史學、歷史哲學〉 《台灣文獻》 一三卷一期 頁六 — 八

## 一九六五年

六月 〈石暘睢先生的追憶〉 《南瀛文獻》 十期 頁六 — 八

八月 〈鄭經入台灣兩位始末考〉 《台灣風物》 一五卷三期 頁五 — 九

## 一九六九年

六月 〈鄭伯瑞先生墓誌〉 《台灣風物》 一九卷一、二期 頁三 — 二

八月 〈南明時代與琉球之關係的研究〉 《史學彙刊》 二期 頁一七三 — 一八七

## 一九七一年

七月 〈南明時代與琉球之關係的研究〉 《中華雜誌》 九六期 頁二七 — 三一



- 十月 〈鄭氏三世與台灣〉 收入《中原文化與台灣》 頁四一九—  
一四二三
- 一九七三年  
十二月 〈胡適之先生的追憶〉 《中國時報》第十二版（十二月十七日）
- 一九七四年  
五月 〈南明時代與日本的關係〉 《史學集刊》 六期 頁一九七—  
二一四
- 一九七五年  
五月 〈南明弘光時代的幾個問題〉 《史學集刊》 七期 頁一五  
七—一七八
- 一九七六年  
五月 〈南明監國魯王事蹟的研究〉 《史學集刊》 八期 頁三三  
—六二
- 十月 〈鄭克壘螟蛉子說考補訂稿〉 收入《沈剛伯先生八秩榮慶論  
文集》（台北市 聯經） 頁一九五—二〇二
- 十一月 〈蔣渭水先生之追憶〉 《幼獅月刊》 四四卷五期 頁五八  
—五九
- 十二月 〈鄭成功焚儒服考（改訂稿）〉 收入《沈剛伯先生八秩榮慶  
論文集》（台北市 聯經）頁一九三—二〇二
- 一九七七年  
四月 〈鄭氏三世與台灣（改訂稿）〉 收入《中華學術院史學論集  
》 頁四〇六—四一一  
〈南明永曆時代的研究〉 《史學集刊》 九期 頁五九—  
八八
- 九月 〈明熹宗朱由校試論〉 《台大歷史學報》 四期 頁二三五  
—二四四
- 一九七八年  
一月 〈記新得南明錢幣〉 《錢幣天地》 二卷一期
- 四月 〈鄭成功登陸台灣的日期〉 《中國時報》（四月二十九日）

- 六月 〈鄭成功的歷史地位〉 收入《台灣史研討會紀錄》
- 一九七九年
- 二月 〈一個文人的願望〉 《中國時報》副刊（二月三日）
- 十二月 〈南明時代的錢幣〉 《歷史博物館館刊》 十期 頁五七
- 一九八〇年
- 四月 〈藝術家、革命家、政治家〉 《中國時報》（四月四日）  
〈鄭成功的歷史地位（改訂稿）附鄭氏永曆通寶拓片〉 收入  
《台灣史論叢第一輯》 頁九九 — 一〇四
- 五月 〈崇禎監五錢小記〉 《集幣會刊》 二期
- 十二月 〈楊氏習靜樓藏台灣古印選存（一~五十）〉 《台灣風物》  
三〇卷四期~三七卷一期
- 一九八一年
- 三月 〈方杰人先生安息〉 《台灣風物》 三一卷一期 頁三 —  
四
- 五月 〈臺灣史上的人物〉 台北市 成文  
〈永昌當五錢試考〉 《集幣會刊》 第三期（台北市集幣協  
會成立三週年紀念特刊）
- 六月 〈池田敏雄先生逝世紀念專輯〉 《台灣風物》 三一卷二期  
頁一 — 五四
- 十月 〈許季蕓先生的追憶〉 《書和人》 四二六期 頁二 — 四  
〈許壽裳先生的追憶〉 《中外雜誌》 三〇卷四期
- 十二月 〈B25 與薔薇花〉 《中國時報》（十二月二十五日）  
〈諸君自己批判，有沒有及此〉 《聯合報》（十二月二十五  
日）  
〈台灣風物創刊前後〉 《台灣風物》 三一卷四期
- 一九八二年
- 一月 〈士林之春〉 聯合報（一月二十六日）
- 一九八四年
- 二月 〈未消瘦的詩魂〉 《文訊月刊》 第七、八期
- 五月 〈生肖八卦錢譜初稿〉 《集幣會刊》 第六期

- 九 月 〈古語錢小譜〉 《台灣風物》 三四卷三期  
一九八五年  
三 月 〈論方志的體例：從為台灣省通志定體例說起〉 《台灣風物》  
三五卷一期 頁一一一 — 一二二  
〈王詩琅先生追憶〉 《台灣風物》 三五卷一期  
五 月 〈生肖八卦錢譜續稿〉 《集幣會刊》 第七期  
一九八六年  
五 月 〈記新獲「西王賞功」幣〉 《集幣會刊》 第八期  
六 月 〈悼林柏壽先生〉 《台灣風物》 三六卷 二期  
一九八七年  
三 月 〈楊氏習靜樓藏台灣舊檔案古書契隨錄〉 《台灣風物》 三  
七卷一期  
〈楊氏習靜樓藏台灣古書契偶存（二～二十）〉 《台灣風物》  
三七卷二期～四一卷四期  
一九九〇年  
一 月 〈台灣的文化與文獻〉 《台灣風物雜誌社》  
三 月 〈鄭成功登陸台灣的日期〉 《台灣風物》 四十卷一期  
八 月 〈關於連雅堂先生記事訂誤〉 《中央日報》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史料叢刊

(23) 四川保路運動史料彙纂(上)(中)(下)

戴執禮 編

定價 平裝台幣 2200 元，精裝 2400 元

本叢刊係編者四十年辛勤搜集，潛心編研的碩果。全書共收文件約一千九百一十餘件，約二百零五萬言。錄自原稿、傳單、布告、稿本、孤本者約四百零數件，錄自稀有資料者約三百四十餘件，共約七百五十餘件。

## 島田虔次

森紀子著<sup>\*</sup>

陳慈玉譯<sup>\*\*</sup>

島田虔次先生是位研究中國思想史的大師。他被吳智英氏譽為「是能深入儒學的理論內核——這對現代日本人而言，是一種完全異質的思考方式，並取得令人信賴的學術成就學者之一」；其人格所滲透入的每一篇論文，不但有高度的學術性，而且還能使專家以外的讀者如痴如醉。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他研究成果已被翻譯成中文、英文和德文，在日本國內和國外都獲得極高的評價。

1917年8月12日，島田先生在廣島縣出生。在廣島的中學時代，他曾經深為盧梭的〈愛彌兒 (Emile)〉所深深傾倒，亦曾學習世界語 (esperanto)，非常多感。但是，鑒於軍國主義時期日本的中學的閉塞性，島田先生在1933年到了中華民國山東省青島市，就讀於該地的日本中學。儘管當時世界語主義者為當局所監視，但先生卻積極地與中國的世界語主義者相交流。最近，藉《讀書》雜誌之助，先生與老世界語主義者呂吟聲 (福田) 氏恢復了聯繫。六十年不通音問，一朝鴻雁復修，不由人不感慨萬分。呂氏形容當時還是中學生的島田先生：「我覺得他已能放眼世界，英姿煥發，不僅精通世語，華語和英語也屬上乘，而且關心社會科學，憧憬美好的未來世界，將來一定會成爲一名在某方面不可多得的人材」。(LA MONDO〈世界〉，1992年3月)

1935年，先生入京都第三高等學校文科就讀；1938年繼續負笈於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大學三年級時，先生偶然接觸到王陽明的《傳習錄》，

---

\* 鈴鹿醫療科學技術大學講師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感動良深，於是對致良知學說持極大興趣。對盧梭與王陽明的傾倒，可以說是先生學問形成的起點。1941年3月，先生以〈陽明學之人間概念、自我意識之展開及其意義〉為論文，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史學科東洋史學組。此論文後來擴充成《中國近代思惟之挫折》一書，為學界提供了種種深思的課題。職是之故，先生學問的出發點，乃緣於作者與研究對象之間之共鳴與通感。這便造成了先生日後的著作，具有某種氣勢與很大的感化力。

同年4月，先生大學畢業後即任職於長野縣野澤高等女學校，旋於1943年4月入京都大學東方文化研究所，在吉川幸次郎先生所主持的經學文學研究室中，擔任助教，並負責《毛詩正義》的校勘工作。在吉川先生的指導下，先生每週參加《毛詩正義》的研究會，並為編纂元曲辭典，參加了《元曲選》研究會，從而在治學上受到了清代經學的洗禮。在此其間，雖曾發生過從軍、住院等意外事件，但先生卻認為這是他一生中對學問最有領會之充實時期。經過這一階段做人和做學問的訓練，養成了島田先生在翻譯和註解上一字一句都毫不疏忽的學風。但儘管他熱衷於清朝經學的研求，他對明代心學的關心，亦絲毫不減。

1946年6月，東海大學在清水市開創，先生即出任預科教授。但是，適值日本戰敗後大混亂時代，來自京都的學者們和自稱(或被稱)為馬克思主義者的職員們之間，發生齟齬，結果先生於1949年4月離開該校。回到京都後，先生先擔任立命館大學講師，同年12月成為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副教授，1969年9月昇任教授，過著頗順利的研究生活。與此同時，先生主持明代史研究會、辛亥革命研究會、朱子語類研究會、五四運動研究會等等。從1975年10月就任京都大學文學部教授，至1983年3月退休之間，他傾注全力指導學生，亦曾到中國大陸和臺灣講學。現在先生為京都大學名譽教授、東洋史研究會副會長。退休後的島田先生悠悠自適，埋首於讀書和著作，即使現今雖已年過七十七歲，依然繼續不斷地從事永不厭煩的研究工作。

作為儒學思想史專家，島田先生之研究範疇，大致可分為三大類：(1)宋明時期的性理學；(2)清代民國時期的思想狀況；(3)日本的儒學。並且，無論那一課題，都展示出先生精深語義學能力與豐富的西洋思想之修養，以及對淵博的中國文化的敬畏之情。

## 一、宋明時期的性理學

如前所述，先生研究的出發點是陽明學。一提及先生之名，任何人都會聯想到的他的處女作——《中國近代思惟之挫折》一書（1949年出版）。相較於以往日本對中國思想的學術著作，該書是第一本有體系地捕捉所謂王學左派（泰州學派、李卓吾）而加以肯定性介紹的著作。更兼本書認為心學的根本問題是人性的問題，從直覺方面把握陽明的良知與盧梭主張的「心情（coeov）」的類似性，把良知→現成良知→童心的這種王學左派義理的開展，視為「良知的自我確立」，亦即從世界史的觀點來捕捉「自我的自覺史」，這種嶄新的手法可以說是劃時代的。此書所投下的影響波紋極大，主要產生的爭論在對王學左派的評價與對近代（近世）的時期評價方面。但是，我們必須明白島田先生構思此書的時候，是經過戰爭與日本戰敗，個人的人性完全被忽視的時代；而且，當時京都的學風對清朝考據學賦與極高評價，相形之下，明代心學就太被冷落了。「對西洋的近代文化不會在中國文明開花結果的抱憾」，亦是渴望允許能發揮個性的健全之市民社會的這種批判精神的表露。如果能理解此點，則能夠充分地體會此書所擁有的獨特情熱吧！

但是，島田先生對於陽明學的理解當然不僅止於此。他對另一與「致良知說」並稱為陽明學之重要支柱的「萬物一體之仁」、「生生」的考察，呈現在《中國近世の主觀唯心論について萬物一體の仁の思想》（1958），和《明代思想の一基調スケッチ》（1964）中。此二文明確地指出：在陽明以後的明代思想界，「良知」一詞常常與萬物一體有關連的情況下被使用，宋學之根本命題的「生生之仁」，則確曾以「生」、「生生」、「生機」等字眼，無限制地被隨便使用。這種非常重要的論考，實為了解中國儒學之真貌所不可欠缺的課題。但以往日本人在儒學史的研究中，這一課題可以說被完全被忽視去。島田先生大概是注意到這一課題的第一人！在今日中國哲學界進行再評價如熊十力、梁漱溟等新儒家的思想時，已明顯地承認了生機主義，我們不禁對島田先生的洞察力銘佩萬分。

對先生而言，陽明學研究已大致完結。他認為陽明心學的意義，在於它把握了儒家本質的最有效者，從而展現出儒家思想的極則。再者，先生倡言思想是社會的實體，並以體用合一的觀點來看待思想與社會的問題，自此立場而言，要理解陽明學與陽明學左派時，必須把握其激昂性。換言之，在說明天地之「生生」時，必須闡明此一「生生」，心之「生生」為同一境界，從而發見明代思想的基調時。在將其活潑的傳道講學活動視為社會現象化時，島田先生基本上贊同侯外廬氏的看法，把自陽明時代至明末清初評價為「可以比美戰國諸子百家爭鳴的；瀰漫著活絡的創造性研究氣氛的時代」。

為了考察陽明學，當然亦須慮及作為其前提的宋學及朱子學，而《朱子語類》實為必讀之書，此乃是吉川幸次郎先生的教誨。島田先生認為宋學是「在經史子集各領域創造性能源的噴放，是中國史上空前的壯觀」，評價極高。

關於宋學的形成問題，學界常提及佛教和道教的影響，對佛教的影響尤其強調，例如宋學之「理」、道統論、靜坐等都被認為是偷自佛教的。島田先生反對此說法，認為持此論者無乃太過輕視中國人的思維能力。那麼宋學對佛教最有實質性的影響又是什麼呢？島田先生探討宋學重要範疇的體用合一論之源流，指出「體用」論，才是淵源於佛教（見《体用の歴史に寄せて》，1961），其證據則顯見於五～六世紀之際的中國佛教典籍中。然而，中國思想本來就有體用思想的潛流，故宋儒的體用論雖淵源於佛教，但絕對不應視為異種異質論理的移植。並且島田先生還主張：純粹因為服膺於汎神論，朱子學雖呈現高度的理論成果，但終究仍不免有僅止於循環論，持續論理的傾向。再者，他也指出宋學之得自道教者，故其汎神論的感情和宇宙的原理的衝動，與儒教的「生生」有關連。（見《朱子學と陽明學》，1967）。

## 二、清代民國時期的思想狀況

與宋學的「規模氣魄之博大與波瀾曲折之多彩」相比較時，島田先生感嘆道：「清朝文運的多麼單調啊！」如果被世間稱為偉大的「實學」的

清代考據學，其實証主義只不過是文獻主義時，則符合此名詞真義的實學（軍事學、農學、本草學等）於明代反而更興盛。在這樣產生種種新機運的明末，陽明心學之中，由於把「學」的原理凝聚於「良知」一點，故也能理論性地包容異端（例如李卓吾的顯彰墨子），甚至把異端與聖人之學（儒學）合二而一的態度亦逐漸成長；儘管如此，島田先生認為其開花結果則必待清末而後可。然而，這並非意味著明清之學的斷絕。

島田先生假設明清思想史的連續性。正因如此，作為明清思想史上承先啓後的關鍵人物—章學誠受到先生的重視。章學誠雖以史學理論而名家，但島田先生卻注意到章氏史學思想之根基，一貫地存在著性情之說與個性主義。也就是說，章學誠學問的根本態度是開（批判、包攝、揚棄）風氣（考証學風氣）之先，是主張基於個人性情之自得的獨斷史學；島田先生認為這才是陽明派的心情之歷史性伏流（〈章學誠の位置〉，1970）。

島田先生也把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說，評為既是「能夠超越考據學的哲學，同時也是考據學之哲學」。六經是史，亦是器。春秋以後，官守與師教、傳與經、事與道（義）、道與器，皆開始分離。並且在此時出現了作為「私家著述」之史學。但真正的史學非謀求恢復其合一性不可。史學的目的在「經世」，應該是具有「今」之觀點與「變通」能力的「獨斷」之「一家之學」。島田先生認為章學誠那種唯有「性情之自得」時才能夠立「學」的主張，不只是對考據學的反動，並且還是淵源的「漢書藝文志」的考據學風氣之必然產物；而考據學的發展必然會再認識諸子學，把孔子視為諸子之一人，導致儒教之自我相對化，此為清末思想狀況之端緒。（〈歷史的理性批判：六經皆史の說〉，1969）。在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說中，義的一面為龔自珍所繼承，章炳麟則承繼事的一面。因此，以章學誠為媒介，明末之思想界可與清末思想界相連續，而具發展性。

再者，由於清朝的考據學有尋古溯源的內在性運動傾向，故產生了可謂為「孽子」（不像父母的孩子）的「微言大義」之公羊學。清朝考據學的發展在清末所造成的諸子學與公羊學之復活，結果使僅為諸子之一的孔子形象，或者是，從反對有關「孔教」的立場，來主張做為國粹的史學者之孔子形象，與具神祕的宗教色彩的孔子形象並存。島田先生最有興趣的是連孔子的形象也瞬息萬變的清末思想界之動勢（dynamism），即西力衝



擊之下，欲將傳統之學總動員來對抗西學的中國文明之動勢。特別是關於章炳麟，島田先生很早就具有頗大的共鳴而論述，這是因為章氏的革命思想與其學問有密切的表裡關係，並且那是徹底的清朝考証學的正統繼承，而重新樹立了「國學」（見〈章炳麟について〉，1958）。同時，島田先生亦傾注情熱於翻譯介紹辛亥革命期的思想狀況——這是迅速完成歐化的日本人所理解的。

島田先生還注意到清末思想家（無論改革派或革命派），都深具佛學造詣的這一現象，儒教哲學中所最欠缺的就是對意識深層的研究。島田先生解剖近代熊十力思想，認為他嘗試「毫無顧忌地鼓吹佛教唯識哲學的深層意識論，把陽明學和王船山業已達到的儒學哲學的階段，再向前推進一步」（〈新儒家哲學について——熊十力の哲學〉，1987），島田先生對於熊氏雖鼓吹唯識，但亦遵從儒家哲學的傳統而徹底堅持「有」的立場，十分感佩。這也是先生在抗議——提及「東洋哲學」的深度時，即毫不躊躇地規定為「無」之哲學的日本人智力的片面性。島田先生強烈主張儒學的「有」之立場亦可與之相匹敵。

### 三、日本儒學

島田先生的儒學研究，採用了從中國儒學義理脈絡深入理解的進路，一方面糾正了日本式的偏見，在另一方面，他也以此為基礎，擴大做為遠東儒學史的嘗試，他亦關心日本的儒學。例如：他言及三浦梅園的氣之哲學的「体系」性，認為是不見於中國儒學的一日本儒學的獨創性——（〈三浦梅園の哲學〉，1979）；並且，他認為井小楠的共和主義中，可以看到儒學的理想主義（〈堯舜民主政？〉，1976），包括儒學在現今所具有的意義等這些課題都是島田先生目前所從事的。順便一提的是，最近他詳細校註並出版曾援助孫中山先生革命運動的宮崎滔天所著的《三十三年落花夢》，由於宮崎滔天是一位少數純支援辛亥革命的日本人，故先生對其心情有很多共鳴之處吧！

以上，僅介紹範疇廣泛而精深的島田先生的研究業績之一小部分，如果我的理解的不周全不致引起誤解，則甚幸甚幸：島田先生是一位人文科

學者，亦為歷史家，自此自覺的態度和普通主義的立場，以內在面來捕捉思想的自律性，以很大的規模來描述中國儒教的動勢。我們應該從整體的脈絡中論說島田先生的學問，亦因為如此，對於最近先生著作集即將出版一事，深感無比的喜悅。

（承蒙小野和子教授引薦本文，特此申謝）

### 附錄：島田虔次教授著作目錄

#### 單行本

中國に於ける近代思惟の挫折（三三四頁） 筑摩書房 一九四九年 三月  
（改訂版）一九七〇年 十二月

中國革命の先驅者たち（筑摩叢書、二九八頁） 筑摩書房 一九六五年  
十月

大學・中庸（新訂中國古典選第四卷、三九九頁）朝日新聞社 一九六七年  
一月（文庫版）一九七八年 七月

朱子學と陽明學（岩波新書、二〇八頁） 岩波書店 一九六七年 五月

荻生徂徠全集 第一卷 學問論集（六六二頁） みすず書房 一九七三年  
七月

王陽明集（中國文明選第六卷、三五〇頁） 朝日新聞社 一九七五年  
九月

#### 共譯・共編

中江兆民著『三醉人經綸問答』（桑原武夫との共譯・共編 岩波文庫、  
二六六頁） 岩波書店 一九六五年 三月

辛亥革命の思想（小野信爾との共譯・共編 筑摩叢書 二八五頁） 筑  
摩書房 一九六八年 二月

清末民國初政治評論集（西順藏との共編 中國古典文學大系58、五四八  
頁） 平凡社 一九七一年 八月

辛亥革命の研究（小野川秀美との共編、四八三頁） 筑摩書房 一九七  
八年 一月

## 論文

- 陽明學における人間概念・自我意識の展開とその意義(一) 東洋史研究第八卷第三號 一九四三年 八月
- 陽明學における人間概念・自我意識の展開とその意義(二) 東洋史研究第八卷第五・六合併號 一九四四年 三月
- シナにおける近代思惟の挫折 (『中國に於ける近代思惟の挫折』所收) 東光第四號 一九四八年 四月 王學左派論批判の批判 史學雜誌第六一卷第九號 一九五二年 九月
- 王龍溪先生談話録並解説 東洋史研究第一二卷第二號 一九五二年 十二月
- 中國近世の主觀唯心論について — 萬物一體のにの思想 — 東方學報(京都)第二八冊 一九五八年 三月
- 章炳麟について — 中國傳統學術と革命 — (上) (『中國革命の先驅者たち』所收) 思想第四〇七號 一九五八年 五月
- 章炳麟について — 中國傳統學術と革命 — (下) (『中國革命の先驅者たち』所收) 思想第四〇八號 一九五八年 六月
- 中國・思想史 日本における歴史學の發達と現状 I 一九五九年 八月
- 明清の思想界 圖說世界文化史大系 18 一九六〇年 一月
- 中國のルソ — (『中國革命の先驅者たち』所收) 思想第四三五號 一九六〇年 九月
- 體用の歴史に寄せて 塚本博士頌壽記念佛教史學論集 一九六一年 二月
- 明代文化の庶民性 世界の歴史(中央公論社)第九卷 一九六一年 八月
- 文運榮える乾嘉 世界の歴史(中央公論社)第九卷 一九六一年 八月
- 桓玄・慧遠の禮敬問題 慧遠研究・研究篇 一九六二年 三月
- 明代思想研究の現段階 歴史教育第一〇卷第一〇號 一九六二年 十月
- 儒教の叛逆者李贄 思想第四六二號 一九六二年 十二月
- 明代思想の一基調 — スケッチ — 東方學報(京都)第三六冊 一九

六四年 十月

新しい哲學の出發 思想の歴史（平凡社）第六卷 一九六五年 九月

朱子學と陽明學の完成 思想の歴史（平凡社）第六卷 一九六五年 九月

中國の傳統思想 世界の歴史（人文書院）第四卷 一九六五年 十月

楊慈湖 東洋史研究第二四卷第四號 一九六六年 三月

龔自珍「尊隱」 前近代アジアの法と社會 一九六七年 十月

清朝末期における學問の情況 講座中國（筑摩書房）第二卷 一九六七年 十二月

異人・鄧豁渠傳 吉川博士退休記念中國文學論集 一九六八年 三月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講座現代倫理（筑摩書房）第六卷 一九六八年 六月

歴史的理性批判 — 「六經皆史」の説 — 講座哲學（岩波書店）第四卷 一九六九年 九月

宋學の展開 講座世界歴史（岩波書店）第九卷 一九七〇年 二月

章學誠の位置 東方學報（京都）第四一冊 一九七〇年 三月

陽明學と考證學 大學ゼミナ — ル東洋史 一九七〇年 五月

清末小説についての感想 野草第二號 一九七一年 一月

梅園研究所感 梅園研究第二號 一九七一年 十二月

ある陽明學理解について 東方學報（京都）第四四冊 一九七三年 二月

堯舜民主政？ 中國哲學史の展望と摸索 一九七六年 十一月

兆民の愛用語について 中江兆民の世界 — 「三醉人經綸問答」を読む — 一九七七年 十二月

辛亥革命期の孔子問題 辛亥革命の研究 一九七八年 一月

三浦梅園の哲學 — 極東儒學史の見地から — 東洋史研究第三八卷第三號 一九七九年 十二月

#### 譯・註・解説

梁啓超文三篇（『中國革命の先驅者たち』所収） 東洋史研究第一七卷第三號 一九五八年 十二月

ラサの宗論 (P. Demiéville 著) 東洋史研究第一七卷第四號 一九五九年  
三月

ある革命家の遺書 (陳天華著) (『中國革命の先驅者たち』所収) み  
すず第四五號 一九六三年 一月

唐宋時代の農民戦争の歴史的特徴 (侯外廬著) 東洋史研究第二三卷第  
一號 一九六四年 六月

陳天華「獅子吼」まくら みすず第六三號 一九六四年 八月

警世鐘 (陳天華著)・革命軍 (鄒容著) (警世鐘は『辛亥革命の思想』  
所収) 桑原武年編『ブルジョワ革命の比較研究』 一九六四年 十二  
月

「民約譯解」原文、よみくだし文、ならびに注釋 (中江兆民著) 桑  
原武夫編『中江兆民の研究』 一九六六年 二月

『三民主義』民族主義 (孫文著) 小野川秀美編『孫文・毛澤東』 一  
九六九年 七月

五無論 (章炳麟著) 山田慶兒編『中國革命』 一九七〇年 二月

三十三年の夢 (校訂・解題) 小野川秀美、宮崎龍介編『宮崎滔天全集  
』第一卷 一九七一年 七月

隱者の尊重 (龔自珍著) 西順藏、島田虔次編『清末民國初政治評論集  
』 一九七一年 八月

仁學 (卷上) (譚嗣同著) 西順藏、島田虔次編『清末民國初政治評論  
集』 一九七一年 八月

新中國未來記 (第三回まで) (梁啓超著) 西順藏、島田虔次編『清末  
民國初政治評論集』 一九七一年 八月

公羊派・洋務派・變法派 (解説) 西順藏、島田虔次編『清末民國初政  
治評論集』 一九七一年 八月

學則・文淵・詩源 (荻生徂徠著) (讀み下し) 『荻生徂徠全集』第一  
卷 (みすず書房) 一九七三年 七月

『荻生徂徠全集』第一卷 解題、凡例 『荻生徂徠全集』第一卷 一九  
七三年 七月

『中國近世思想研究』 (安田二郎著) 解説 安田二郎著『中國近世思想

研究』 一九七六年 一月

『三十三年の夢』註釋 小野川秀美、宮崎龍介編『宮崎滔天全集』第五卷 一九七六年 八月

### 批評

李贄——十六世紀中國反封建思想的先驅者——（朱謙之著） 東洋史研究第一五卷第二號 一九五六年 十月

神々の體系（上山春平著） 人文第六號 一九七三年 一月

明代思想研究——明代における儒教と佛教の交流——（荒木見悟著）

禪文化第六八號 一九七三年 八月

### 索引

大乘大義章索引 慧遠研究・遺文篇 一九六〇年 十一月

明佛論索引 中世思想史研究班編 一九六三年 三月

### 雜錄

『近代化』についての疑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報第二八號 一九五二年 三月

中國見聞記 東洋史研究第一九卷第四號 一九六一年 三月

中國見聞記補記 東洋史研究第二〇卷第一號 一九六一年 六月

章太炎思想研究雜感 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會會報第二三號 一九六二年 三月

農民戰爭に関する論争メモ 中國學術代表團招請運動ニュース第一號 一九六二年 六月

侯外廬氏の思想研究 中國學術代表團招請運動ニュース第六號 一九六三年 七月

中國學術代表團に望む（アンケート回答） 中國學術代表團招請運動ニュース第七號 一九六三年 八月

お墓まいりの侯先生 中國學術代表團京都訪問記録 一九六四年 四月

『三酔人』譯注こぼれ話 圖書第一九〇號 一九六五年 六月

高橋和巳氏「中國民眾史の斷面」を讀んで高橋氏に問う 讀書新聞五月十六日 一九六六年

注釋ということ 新訂中國古典選第四卷月報一四 一九六七年 一月

- 宮崎滔天 二題 圖書第二一〇號 一九六七年 二月  
 無題 桑原隲藏全集第二卷月報二 一九六八年 三月  
 似つかぬ弟子 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一卷月報 一九六八年 十一月  
 ションベンの記 講座『禪』第八卷月報八 一九六八年 十二月  
 中國近代の歴史と思想 — 小野川秀美著『清末政治思想研究』をめぐって(山口一郎、丸山松幸、小野信爾との座談會) みすず第一二四號 一九六九年 十一月  
 私の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全集第一二卷月報六 一九七〇年 六月  
 座談會 中國文明 中國文明選月報一〜一四 一九七一年二月〜一九七五年九月  
 としよりの冷水 人文第三號 一九七一年 八月  
 中國を旅して 朝日新聞五月十七日 一九七三年  
 代表團の質問と北京大學の回答 人文第八號 一九七三年 九月  
 中國で會った學者たち 以文第一六號 一九七三年 十月  
 テキサス談 人文第一〇號 一九七四年 九月  
 ある決算報告 人文第一三號 一九七五年 九月  
 讀者のために 何長工著、河田悌一・森時彦譯『フランス勤工儉學の回想』 一九七六年 二月  
 智慧を學びとるために 岩波書店『原典中國近代思想史』宣傳パンフレット 一九七六年 十月  
 武内博士の學恩 武内義雄全集第八卷月報五 一九七八年 十一月  
 朱子と三浦梅園 人類の知的遺産第一九卷月報 一九七九年 八月  
 黎澍先生印象斷片 京都日中學術交流懇談會會報第五號 一九七九年 十月  
 小野川秀美博士訃 史林 第六三卷第五號 一九八〇年 九月
- 講演要旨**
- 良知説の展開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報第三三號 一九五三年 二月  
 「大學」の解釋 人文第一四號 一九七六年 三月  
 堯舜民主政? 東洋史研究第三五卷第三號 一九七六年 十二月

**辭典項目**

世界歷史事典 平凡社 一九五一年四月～一九五四年三月

周敦頤、朱熹、隋唐時代 五思想、張載、程顥、程頤

アジア歴史事典 平凡社 一九五九年九月～一九六二年四月

王闖運、王原、王守仁、學案類稿、龔自珍、許謙、許衡、公羊學、元儒考略、黃榦、光復會、國粹學報、吳敬恆、吳澄、菜根譚、自強學齋治平十議、時務學堂、時務報、朱熹、朱子語類、朱松、章學誠、章炳麟、仁學、性理大全、錢德洪、譚嗣同、中國教育會、傳習錄、天討、皮錫瑞、文史通義、民報、明夷待訪錄、楊文會、姚文田、陸九淵、陸九齡、李贄、柳貫、劉師培、梁汝元

社會科學大辭典 鹿島研究所出版會 一九六八年四月～一九七一年八月  
士大夫、支那學、朱子、朱子學、周敦頤、章炳麟、程頤、李卓吾

ブリタニカ國際大百科事典 TBSブリタニカ 一九七二年五月～一九七五年八月

朱子學、陽明學

**著作目錄補遺**

1. 王良 青木正兒博士還曆紀念『中華六十名家言行錄』 1948 弘文堂
2. 鄭子瑜・實藤惠秀編校『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を讀む 1969.2月『大安』
3. SHIMADA Kenji Die neo-Konfuzianische Philosophie: Die Schulrichtungen Chu Hsi U. Wang Yang-mings, übersetzt von Monika Übelhör (Gesellschaft für Natur-und Völkerk. Ostasiens e.v. Hamburg (Tokyo), Hamburg 1979/1987 Dietrich Reimer, Berlin

**退休以後**

1. 停年退官の弁 1981.10月 『以文』24
2. 中江兆民『民約譯解』の中國版 1981.10月 『同朋』
3. 戰後日本宋明理學研究的概況 1982.3 『中國哲學』第7輯 三聯
4. 『三浦梅園』 日本思想大系41 1982.5月 岩波
5. 黃宗羲と朱舜水 山井湧『黃宗羲』(人類の知的遺産33月報) 1983.7月 講談社



6. 日本島田虔次教授關於宋明理學的通信 李甦平譯，張立文校『中國哲學史研究』83年4期
7. Diversity in the Thought of Shidafu (Keynote Speech) Proceedings of the 31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uman Sciences in Asia and North Africa 1983 第2冊 1984出版
8. 『アジア歴史研究入門』第1巻 序論
9. 『アジア歴史研究入門』第3巻 思想史Ⅲ宋～清 1883.11月 同朋舎
10. 中國での兆民受容 1983.12月『中江兆民全集』第1巻 月報 岩波
11. 福本雅一著『明末清初』への序文 1984.8月 同朋舎
12. 中江兆民の漢學（入矢義高・溝口雄三との座談會）84.11～85.3月『中江兆民全集』3.6巻月報
13. 陳慶華教授の思い出 1985.2月『東亞』212霞山會
14. Marianne Bastid 清末ヨーロッパへの留學生たち — 陳慶華教授追悼・福州船政局の近代技術導入をめぐる 長部悦弘と共譯 1985.3月『東亞』213 霞山會
15. 中國 その他 『平凡社大百科事典』 1985.3月など
16. 川勝義雄著『中國人の歴史意識』へのあとがき 1986.2月 平凡社
17. 蔣國保訳『朱子學與陽明學』への自序 1986.7月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8. 章太炎的事業及其與魯迅的關係（張賢譯） 1986.8月 章念馳『章太炎生平與思想研究文選』に收む「章炳麟について」第二章の中譯
19. 孫文研究をめぐるの私見 『孫中山研究日中國際學術討論會報告集』 1986.11月 法律文化社
20. 王陽明與王龍溪（葛榮晉、李甦平譯）『日本學者論中國哲學史』に收む 1986.11月 中華書局
21. 『新儒學家哲學について — 熊十力の哲學』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共同研究報告「五四運動の研究」第4函のうち（通算第12冊） 1987.10月 同朋舎
22. 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儒教の展開（懷德堂講座講演要旨） 1987.12月 『懷德』56

- 23.金泰俊『虚學より實學へ』への書評 1988.7月29日 朝日ジャーナル
- 24.思想のことば「現代にをける儒教哲學」 1988.8月 『思想』770 岩波書店
- 25.福本雅一『書の週邊』1～5への紹介文 1988.12月11日 出版ダイジェスト 1277
- 26.儒教における生けるもの 東アジア知識人會議 『東アジア地域の經濟發展とその文化的背景』に收む 1989.6月 日本經濟調查協議會
- 27.孫文の儒教宣揚の動機論文をめぐって 『山根幸夫教授退休記念明代史論叢』 1990.3月 汲古書院
- 28.SHIMADA Kenji Pioneer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Zhang Binglin and Confucianism 1990. Stanford UP (Translated by J.A. Fogel) 『中國革命の先驅者たち』 『辛亥革命の研究』 より各1篇
- 29.宮崎滔天『三十三年の夢』校注(近藤秀樹共同執筆) 1993.6月
- 30.余英時著林紀子訳『中國近世の宗教倫理と商人精神』序文 1991

近史所專刊之(71)

## 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

(民國十七年至十八年)

呂芳上著

504頁 平裝台幣350元,精裝400元

本書利用大量的原始文件和檔案,點出二〇年代學運發展和變質的過程,是一本教育史、政治史,也是社會史的學術著作。



## 研究概況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諮詢 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本（八十三）年七月一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諮詢委員會於該所召開第二次會議。會議由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教授劉廣京主持，出席人員包括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新亞研究所教授全漢昇、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教授孔復禮（Philip A. Kuhn）、國立台灣大學教授王曾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授李國祁、國立政治大學教授王壽南，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陳三井。列席人員包括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及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魏秀梅、黃福慶、許雪姬、陳慈玉、呂芳上、張瑞德。經過半天的討論，會議達成了以下幾項綜合結論：

### 一、研究工作之推展：

- 1.大陸及俄國所藏檔案資料之整理出版，十分重要。過去二年近史所在此方面之努力，已有部分成果。然目前機會難得，仍待繼續爭取。所需經費，或可進一步向蔣經國基金會及國內其他基金會申請。
- 2.國內所藏檔案，如故宮之宮中檔，應促其繼續出版。石叟叢書及大溪檔案，在院長的支持協助下，亦正待有關方面更肯定之回覆。
- 3.人才之吸收，應以目前近史所所需之專長為優先。亦可積極向外挖掘人才，如俄國史方面的研究人才。其取用方式，宜朝公開徵求及組遴選委員會的方向努力。
- 4.學術交流合作，除與國外學術機構外，近史所未來與院內他所，及國內大學相關所系的交流合作，亦值得加強，以建立本所在學術界近代史研究方面的領導地位。

## 二、本院人文社會科學各所間的所際整合：

- 1.可考慮以所際互相合聘方式，加強人文組內各所的整合。
- 2.可藉共同研究計劃之推動，共同研討會之組成，增進與他所之溝通、聯繫，俾有益於進一步之所際整合。

## 三、下任所長之推薦：

- 1.本所陳三井所長任期，即將於八月十五日屆滿，基於勞役均分及世代交替之考慮，陳所長擬及時交棒。請諮詢委員會依院組織法之規定，推荐下任所長候選人。
  - 2.經過討論，全體委員認為陳三井先生在第一任所長任內，近史所表現非凡，研究成果輝煌，故一致同意，仍推薦陳三井先生擔任下一屆近史所所長。並請及早設立副所長，以為襄助。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進行之 專案研究計畫

(民國83年8月～)

江淑玲\*輯

## 一、中國近代民間世俗文化生活（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

計畫主持人：王爾敏

計畫執行期：民國83. 8. 1～84. 7. 31

計畫內容：中國平民佔全人口中大多數，其生活情趣、信仰內涵、交際禮俗、休閒娛樂，多不同於官紳行徑，實具有廣泛活動力。惟前代人向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審

不留心記載，往往散見於片斷筆記，零散疏略，不具系統。本計畫計從傳統庶民八個較常有的行徑入手，就明清以來庶民生活的活動內涵，研考其心性所鍾，起居動止，交際往來，休閒娛樂。進而探索其範疇經過，信持程度。其理既無強制，何以感染面廣；其情粗俗鄙俚，何以癖愛深切。正以見出中國世俗文化特質。計畫具體綱目為：(一)世俗信仰；(二)歲時節令；(三)飲食醫藥；(四)禮儀規矩；(五)簿書契約；(六)命理術數；(七)游樂才藝；(八)風月調教。彙總觀察，以掌握近代庶民文化生活的真實景況。

## 二、北伐時期國民革命軍的政治組織與政治工作，1924~1928（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

計畫主持人：呂芳上

計畫執行期：民國 83. 8. 1~ 84. 7. 31

計畫內容：一九二〇年代，國民黨改組，建黨與建軍同時進行。初期作為「黨軍」的國民革命軍，政治化成為有效的革命武裝力量，這是過去中國歷史上所沒有的，而其影響則已近一個世紀。國民革命軍的官兵受黨的意識形態支配，軍隊的行動受黨意支配。一九二四年黃埔軍校建立，象徵政治化軍隊的創始，運作的具體組織是政治訓練部及黨代表制度，這是後來國軍「政工制度」的濫觴。北伐軍事行動之快速成功，與這一新軍制有密切關係。「黨」、「軍」、「國民黨」、「共產黨」這幾個因素圍繞著國民革命軍的政治組織與政治工作；要釐清制度的形成和這些因素的關連性，是中國現代史上極為重要的問題。本計畫完成後，將對國民革命史、北伐史、民國軍事史和國共關係史上若干關鍵性問題的瞭解有所助益。

## 三、清代皇族的家庭結構與經濟生活(II)（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

計畫主持人：賴惠敏

計畫執行期：民國 83. 8. 1~ 84. 7. 31

計畫內容：此計畫為第二期計畫，第一期主要工作是建立皇族家譜的電腦資料庫，至今有將近八萬人的詳細個人檔案。這些極為完整和準確的人口資料，將裨益於中國史及世界史的研究。目前這些資料已提供數位學者從事清代皇族人口史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將陸續發表於國際學術刊物*The*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Population Studies*，並由北京大學和牛津大學分別出版論文集。第二期的計畫，擬利用已輸入電腦的婚姻資料，分析每對夫妻的結婚年齡、結婚與第一個小孩出生的間隔，及婦女年齡別的生育率。在閱讀宗人府檔案時發現，滿洲人很重視嫡子，爵位之傳承以嫡子為優先。因此嫡子的死亡率、結婚次數、生育率等，是否異於其他諸子？嫡子的家庭結構與其他庶出的有何差異？本計畫將繼續分析這些問題，以瞭解皇族的家庭結構。

#### 四、民國四、五年間冊封外蒙活佛與中俄蒙交涉之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

計畫主持人：張啓雄

計畫執行期：民國 83. 8. 1~ 84. 7. 31

計畫內容：民國 4 年 6 月恰克圖會議上簽定中俄蒙協約，約中規定外蒙活佛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汗的名號，受中華民國大總統的冊封。其後俄國阻撓中國之冊封，外蒙也拒絕之，經庫倫駐在都護使陳籙的折衝交涉，始得完成冊封外蒙活佛一事。其中有幾個問題值得探討：(1) 民國政府既已推翻滿清王朝，採行國際法與各國交涉締約，為何又重拾封建體制，以冊封外蒙活佛表達中華民國領有外蒙主權的主張？(2) 中俄蒙協約是中俄蒙三方同意簽字者，為何俄國阻撓、外蒙也拒絕冊封？(3) 辛亥革命以後，在新舊體制交替的過渡期間，中華民國駐庫倫都護使兼冊封專使陳籙如何應付難局？他對外蒙政教合一的「宗教性冊封體制」又有何特殊見解與作法？本計畫擬針對上述各點，蒐證史料，以解析民國初年中華民國冊封外蒙活佛的諸多矛盾現象。

#### 五、天理、情欲之辨：清代思想史主要論題研究之一（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

計畫主持人：張壽安

計畫執行期：民國 83. 8. 1~ 84. 7. 31

計畫內容：呼籲正視人之情欲並滿足人之情欲，是明末以來大眾文化的主流。此一針對宋明理學「存天理、滅人欲」主張而來的社會反動，是

否影響到菁英文化層次的思想家的思想？並對儒學思想在清代的發展產生何種作用？向來學者對清代思想史的研究，多只討論到戴震即止，雖也略微提到焦循、阮元等人，但皆認為無多大建樹。事實上，戴震是第一位把此一社會反動重欲主張提昇到思想層次，並進行理論性討論的學者。戴震哲學被稱為以「欲」為首出的哲學，明白揭示理出於欲，不合情欲之理，非理。戴學不但有傳人，且皆傳其重情欲的主張。其後傳無論主張理學或反理學轉而主張禮學、禮教，都緊緊扣住「人情好惡乃理（禮）之基礎」此一大前題。本研究擬將焦點置於討論清儒對情欲的看法，情與理的界分、情與禮的界分等，以期探析此一興起於十七世紀的「人性」問題，如何從社會現象走入思想殿堂。

#### 六、明清的士大夫與宗教 (I)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

計畫主持人：李孝悌

計畫執行期：民國 83. 8. 1~ 84. 7. 31

計畫內容：先秦儒家的理性、人本精神，經由理學的復興而再度彰顯。到明清時期，因科舉而成為牢固的官方意識形態，並對知識階層產生相當大的規範作用。但這並不意謂明清的士大夫就完全拒斥超自然的信仰。實際上，先秦的儒家並未否定鬼神信仰，而只採取不正面面對的態度。此後陸續發展出的一些理論，如陰陽、五行、太極等，其實也都可以輕易地和神祕的宗教信仰掛鉤。在實際生活中，除了一部分積極稟持理性精神，不相信鬼神之說者外，多數士大夫都程度不等的捲入各種宗教信仰之中。當戰爭、災禍時，可以看到官紳拔擢某些神明，或參與祭祀。在平時，士紳往往在神明的策封與寺廟的興建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此外，對官紳禁淫祠的分析，則更進一步能了解中國傳統知識階層對宗教信仰的特殊之處。本計畫大量利用官方記載、士大夫的文集筆記、地方志等資料，就上列士大夫與宗教信仰的各種不同面相作全面而細緻的分析

#### 七、日本南進政策下台灣與東南亞的貿易和資源分配 (中央研究院主題計畫)

計畫主持人：陳慈玉

計畫執行期：民國 83. 8. 1～86. 6. 30

計畫內容：此計畫為「台灣與東南亞的歷史、社會、經濟、文化的綜合研究計畫」之子計畫，為期三年。台灣與東南亞的關係可以回溯到 17 世紀，當荷蘭人於一六二四年以東印度公司成為第一個有系統統治台灣的政權之時，台灣成為荷蘭東印度公司在遠東貿易中之一環節，與荷屬印尼巴達維亞、西班牙殖民地菲律賓均有接觸。此後，台灣雖然出現明鄭和清政權，但與東南亞的緊密關係一直不斷，商人往來其間，物品相互交流乃至發生市場競爭情況。日本亦早於一八八〇年代即提出「南進論」，一八九五年佔領台灣後，更以台灣為其南進基地，企圖掌握東南亞。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日本的海運企業獲得巨利，得以擴大其他事業，對於鋼材和燃料煤的需求因此劇增。另一方面，東南亞本為歐洲列強之殖民地，戰爭使法、英兩國無暇東顧，日本趁機以台灣為基地，擴大對此地區的貿易（如茶、煤），並欲控制此地區的資源，財閥乃成為「南進」的尖兵。除了財閥之外，殖民地政府亦鼓勵台灣人前往東南亞發展。一九一九年成立華南銀行，貸款台人，俾便投資東南亞或從事貿易。其後並有相關組織成立，使台灣更契合「南進基地」的角色。本計畫即試圖從歷史角度，以日據時期為重心，探討台灣與東南亞的經貿關係，包括日本南進政策形成的背景、性質的轉變、實際運作中財閥的角色、南進政策下台灣與東南亞的貿易狀況、金融、資源分配等。

#### 八、日治時期台商的東南亞經貿活動（中央研究院主題計畫）

計畫主持人：林滿紅

計畫執行期：民國 83. 8. 1～86. 6. 30

計畫內容：此計畫為「台灣與東南亞的歷史、社會、經濟、文化的綜合研究計畫」之子計畫，為期三年。日治時期台商的兩岸經貿活動頗多與東南亞的經貿活動互相連結。例如：板橋林家之出面投資華南銀行，主要目的即在推進南支（華南）與南洋（東南亞）的經貿活動。艋舺商人周仁美，是將日本棉紡織品輸出台灣、華南、南洋的最大商家。大稻埕錦茂洋行是台灣包種茶輸出南洋的最大輸出商，該行並在南洋發展糖業。這些台商的跨國性經濟活動，已在台灣對外貿易史上，締造了先驅性的紀錄。這



些跨國經貿經驗的內容為何？在推展東南亞的經貿活動過程中，與當地政府、商人，與日本政府、商人，乃至與中國政府、商人之間，又有何相激相盪的關係？在層層激盪之後，台商的商業管理行為有何轉化？而這些經驗對戰後台灣工商階層的崛興又有何影響？此皆為本計畫所欲探討的內容。

---

## 中國大陸民國史研究述評

張 憲 文\*

### 一、曲折的研究道路

中華民國史，是中國歷史發展的重要階段，也是史學研究的重要內容。長期以來，中國大陸史學界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對這段歷史沒有很好的研究，也不能正確地、客觀地反映歷史的真實面貌，給史學研究造成很大混亂。回顧大陸民國史研究，自1956年提出以後，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曲折的發展道路。它大體上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

第一：1956年—1971年，可以說是民國史研究的提出階段。大陸自1949—1955年，除普遍學習中國革命史外，談不上有什麼中國現代史的研究，更沒有中華民國史這個學科。1956年，教育部組織大學教師編寫《中國現代史》。由於學者們對分期問題上認識不一致，因而由李新主持編寫的這部書定名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這部書仍然沿用中國革命史的體系，絕大部分內容與中國革命史沒有區別。同一年，中國大陸制定十二年科學發展規劃，中華民國史研究被列為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可

---

\* 南京大學歷史學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長

是，次年在全國即掀起了大規模的反右派鬥爭。緊接著，1958年又發動了「教育大躍進」、「史學革命」。歷史教學和學術研究，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古代史要打破王朝體系，寫勞動人民的歷史，現代史要突出革命鬥爭。對史學領域中的各種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學術思想、學術觀點，開展了大批判。在這種形勢下，學者們都不願意去研究中華民國史。雖然1961年董必武在紀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的會議上，提出重寫清史、編寫中華民國史，但是無人響應。1962年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史學領域中極「左」思想和教條主義日益嚴重。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史學研究逐步淪為四人幫進行政治鬥爭的工具，影射史學將史學研究引向歧途。中國共產黨內的兩條路線鬥爭史代替了整個中國現代史的研究。中華民國史成為史學研究的禁區，沒有哪一個人敢於問津。這一時期，民國史方面的出版物極少，具有代表性的如：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處（即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前身）編輯了一套《中國現代政治史資料匯編》共二四四冊，全部內容為1919—1949年間中央政府的檔案史料，很有學術價值；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輯出版了一套《中國近代經濟史參考資料叢刊》，它後來成為中國大陸研究近代經濟史的基本史料。從1959年開始，全國各省市政協組織編寫出版《文史資料選輯》，為民國史研究提供大量有價值的口述史料。

第二：1972年—1978年，可以說是中華民國史研究的草創階段。在文化大革命的嚴重破壞下，中國經濟瀕於崩潰，教育事業停頓，文化學術也陷於危機。學生不讀書、不上課。書店內除馬列、毛著和政治讀物外，沒有學術著作面市。鑒於這種情況，1972年舉行了全國出版工作會議，試圖挽救文化出版事業的危機。這次會議，除受到四人幫評法批儒的錯誤導向外，將編寫中華民國史提到議事日程。會後，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後改隸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了中華民國史研究組（後改為研究室），以李新、孫思白教授為首，開始組織力量編寫《中華民國史》。

大陸編寫《中華民國史》的消息，在報紙上一經披露，立即引起海內外尤其是台灣方面的強烈反響。台灣《傳記文學》雜誌社為此召開「民國史研究座談會」，指出大陸編寫民國史「引起國內外史學界的震撼與關切」，說「這件事有如颱風過境一樣」，如果等到大陸的「皇皇巨著數十冊

數百冊出現在國外圖書館的書架上，到那時我們只有被迫接受缺席裁判了！」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主任委員秦孝儀，則在《聯合報》上發表文章，對大陸編寫《中華民國史》的宗旨和活動，提出了不同看法。也準備編寫《中華民國史》，並宣布一千萬字的規模，兩年內編好。但是不久又引起一些學者的反對，認為中國的編史傳統，是「後朝修前朝之史」，「豈有國未亡而修斷代史之理」。台灣朝野為此熱鬧一陣後，決定編著《中華民國建國史》。

大陸雖然決定編寫中華民國史，但是由於處在「文革」時代，學者們還背有沉重的精神枷鎖，民國史的研究活動還局限在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南京大學等少數高等學校、研究機構。1978年12月，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衝破了長期「左」傾錯誤的嚴重束縛，提出了改革、開放的方針，為民國史研究創造了良好的政治環境。

這一時期，基本上沒有民國史方面的著作出版。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為編寫中華民國史，由中華書局出版了一套《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其中包括大事記、人物傳記和各種專題資料、譯稿等。

第三：1979年—1984年，可以說是中華民國史研究的發展階段。1979年春，在四川成都召開了中國歷史學規劃會議，制定第六個五年計劃期間的史學發展規劃。這是1949年以後大陸舉行的一次最大規模的史學工作會議，它對民國史研究起了重要的組織和推動作用。不僅規劃了一些民國史研究項目，還發動廣大史學工作者開墾民國史這塊肥沃的荒地。西南軍閥史研究會，就是經與會學者的倡導組織起來的。會後，民國史研究活動在全國各地廣泛展開。

但是，由於長期以來極「左」思想的影響，一些人對民國史研究還抱著懷疑、觀望態度，有的怕擔政治風險。個別人甚至提出取消民國史研究。因此，這一階段民國史研究雖然有較大的進展，但步伐不快。《人民日報》辦了一個「學點民國史」專欄，刊登了幾十篇文章，向廣大讀者傳播了民國史知識。

1984年5月，首次中華民國史學術討論會在南京召開。這是一次十分有成效的學術會議，有兩百餘名歷史學者出席。它的召開，消除了一些人對民國史研究的疑慮，動員了更多的人投入民國史研究，密切了研究學者

之間的學術聯繫，在大陸形成了民國史「研究熱」。

當首次中華民國史學術討論會尚在籌備時，台灣黃季陸於1984年春節在《聯合報》上撰文指出，國史館在離開大陸時，許多檔案沒有帶走，現在要通過各種渠道和方法，補充這部分檔案。《人民日報》刊載了這條消息。我們聞訊立即表示歡迎黃季陸及台灣學者來南京參加學術會議。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負責人也發表談話，歡迎台灣學者來該館查閱檔案。報紙、電台都報導了這一消息。當然，這種願望在當時來說是很難實現的，但它反映了海峽兩岸學者開展學術交流的迫切心情。

這一時期，民國史資料開始大量出版。如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又編輯出版了《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若干冊，《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叢刊》若干專題。各地檔案館都保存了民國時期具有不同地區特色的檔案史料，都整理出版了一些很有影響的資料匯編。隨著人物研究活動的日益深入，著名民國人物的文集、全集、年譜、日記、書信等，不斷出版問世。民國時期的一些有影響的報紙、期刊、圖書等也大量影印再版。隨著國內外學術交流的廣泛開展，外國和港台地區的書刊，也大量進口，擴展了學者們的研究視野。

第四：1984年至目前，可以說是民國史研究走上繁榮的階段，這是大陸史學界的共識。在這一時期(一)民國史的資料和著作，繼續大量出版，引起社會各方面的廣泛關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創辦了《民國檔案》雜誌，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民國春秋》雜誌。各省檔案館出版的館刊中，都刊佈不少檔案史料和研究論文。(二)一批民國史研究機構和學術團體建立起來，培養了一批研究人材，形成了一支較強的研究隊伍。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之後，在一些高校和省社會科學院建立了民國史研究室或相關的研究機構。南京地區建立了中華民國史研究會。許多地區建立了有關孫中山、辛亥革命、中日關係、中美關係、民國經濟和地方史等方面的學術團體。在各地學者的支持下，南京大學建立了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並將於1994年出版《民國學刊》。近十年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大學、復旦大學、蘇州大學、上海師範大學、杭州大學和華中師範大學等單位，招收和培養了一大批民國史的博士研究生或碩士研究生。(三)民國史研究活動開展得比較活躍的地區有北京、南京、上海、廣州、武漢、天

津、杭州、昆明、重慶、瀋陽、長春等城市。在這些城市都形成了一些具有重要影響的研究特色，引起海內外的注目。四海內外的學術交流日益頻繁，大批外國學者和台灣同行來大陸訪問研究或搜集資料。1987年10月，在南京舉行的民國檔案與民國史學術研討會，成爲民國史研究的新的里程碑。

## 二、學術上的重要發展

二十多年來，學者們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礎上，共同努力，深入探索，在學術上取得了重大成就，學術觀點也有新的發展。現僅就主要方面作一簡要評述。

### (一)在民國史體系和架構方面，逐步擺脫中共黨史的影響

中共黨史是專門史，它和中國革命史、中國國民黨史一樣，都屬於政治史一類。中共黨史應該研究中國共產黨本身的發展以及它的方針、政策和路線。中共黨史學科基本上依照1951年出版的胡喬木著《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一書的脈絡形成自己的體系。而中國現代史、中國革命史等，又都依葫蘆畫瓢照搬中共黨史體系，使這些學科沒有形成自己的特色。

中華民國史，是整個中國通史的一部分，它是繼清王朝以後的又一部斷代史。它研究的內容，包含自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以後整個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歷史，它要對這一時期的社會發展作全面的研究。它與習慣上所說的中國現代史（也即是1912年—1949年中國近代史的後半段），在研究的範圍上應該是一致的。

李新主編的《中華民國史》（多卷本，已出版1920年以前的部分）和另一部著作《中華民國史綱》，一方面對民國史上一些重大的問題，作了新的探索，提出了一些有別於其他論著的新看法，在當時來說是有了一定學術意義的；另一方面，也試圖構築新的民國史理論體系，這是一項前人未做過的、難度很大的學術工作。因而，長期以來民國史採取了一種過渡性體系，即把重點放在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權方面。在目前史學研究飛速發展

的形勢下，擺脫中共黨史或政治史的架構，以一種新的思路、新的體系、新的觀點，重新編寫民國史，是非常必要的。這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我們相信在學者們的共同努力下，是可以實現的。

## (二) 辛亥革命史的研究，達到了較高的學術水平

辛亥革命是一次全國性的革命活動。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四次掀起研究熱潮。第一次是1956年紀念孫中山誕辰九十週年；第二次是1961年紀念辛亥革命五十週年；第三次是1981年紀念辛亥革命七十週年；第四次是1991年紀念辛亥革命八十週年。幾次紀念活動，都相應地開展了學術討論，史料、回憶錄、著作、論文，大量出版、發表。經過學者們幾十年的辛勤耕耘，研究的深度、廣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其中，章開沅、林增平主編的《辛亥革命史》，金沖及、胡繩武編著的《辛亥革命史稿》和李新主編的《中華民國史》第一編〈中華民國建立〉，反映了大陸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水平。

「文革」以前，學者們重點研究了清末社會的主要矛盾，革命發生的內外原因，同盟會和其他革命團體、革命黨人領導的武裝起義，清末立憲運動和文化思想等問題。「文革」期間，由於極「左」思想的影響，使人們不能正確估量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因而研究有所停滯。進入八十年代以後，學者們比較全面地、客觀地考察了革命黨人和立憲派的歷史地位和作用，正確評述了下層勞動群眾的反抗鬥爭與局限性，研究視野更加擴展。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資產階級的形成、南京臨時政府的地位和作用、辛亥革命後的文化思想和社會發展，都提出了一些新見解。

大陸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也存在著一些不足。

其一，受政治的干擾和影響甚大。由於大陸十分重視紀念辛亥革命，因而學術討論往往從屬於紀念活動的主旨。政治形勢的變化，會在學術討論的內容上反映出來。如六十年代初對民初國會的批判，就是受到當時「反修」鬥爭的影響。

其二，未能全面估量辛亥革命的成敗與歷史意義。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結束帝制，建立民國，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這在中國歷史上是

劃時代的大事變，其意義和影響十分深遠。辛亥革命作為一次民主革命，它的任務是把皇帝拉下馬，並給帝國主義、封建主義一次沉重的打擊。從這個意義上說，辛亥革命完成了任務，因而是一次勝利的、成功的革命。我們不能設想一次革命可以徹底完成消滅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任務，過份地強調辛亥革命失敗的一面顯然是欠妥當的。

### (三)北洋軍閥史的研究，開始向縱深發展

1949年以來，北洋軍閥史的研究一直被冷落。雖然沒有大的研究禁區，但是學者們對北洋政府的統治多數採取貶抑的態度，這也有失公允。八十年代，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北洋軍閥形成的原因、派系矛盾、混戰紛爭、歷史作用及與帝國主義列強的關係等，發表了一批論文和著作。如來新夏主編的《北洋軍閥史稿》以及《段祺瑞與皖系軍閥》、《馮國璋與直系軍閥》、《張作霖與奉系軍閥》等。但是，從總體上說對北洋軍閥政權及其統治下的中國社會，研究是不夠的。近年來，學者們對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歷史開始了新的思考。譬如，應該怎樣評價袁世凱？他在取得中華民國大總統職務後，廢除《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踢開國會搞獨裁，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條，進而搞洪憲帝制，這顯然是違背歷史潮流的倒退行爲。毫無疑義，應該受到歷史的譴責。但是，袁世凱在政治制度、軍事改革、經濟政策的某些方面，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對中國的社會發展是有益的。同樣，對北洋政府來說，它是1912年至1928年中國政治舞台的主角，不能籠統地講它賣國、獨裁、黑暗。從中國近代化全過程考慮，北洋政府統治的十七年，是不可忽視的年代。現在北京、南京等地的學者，開始深入的研究北洋政府的工商政策、財政金融政策，肯定了促使經濟發展的積極方面。我相信，北洋軍閥史的研究，在不久的將來會出現新的面貌。

### (四)西南軍閥史的研究，成果顯著

西南軍閥是相對於北洋軍閥的另一軍閥系統。他們控制西南半壁江山，長時間與北洋軍閥爭雄，企圖問鼎中原。多年來，大陸史學界對西南軍閥

的研究是一片空白。1979年在成都舉行的中國歷史學規劃會議上，建議西南地區的學者利用集體力量開展這方面的研究。會後，雲南、貴州、四川三省，後來又加上廣西、廣東、湖南三省，一大批學者投入這項研究活動。他們不斷舉辦學術研討會，大約用了五、六年時間，即提出了許多研究成果。《護國運動史》、《四川軍閥史》及一些人物傳記，均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和好評。學者們集中討論了西南軍閥的概念、範圍，形成的標幟及存在的時限，混戰的形成及其根源等。對西南軍閥的人物，也進行了實事求是的評述。應該說，基本上理清了西南軍閥的面貌。

#### （五）民國人物的研究，發展最快、成果也最多

其中，最為活躍的是關於孫中山的研究。雖然這方面的研究，幾十年來也歷經曲折，在十年浩劫中也一度處於停滯狀態，但是，後來再次活躍起來。廣州成爲孫中山研究的中心。到1986年紀念孫中山誕辰一百二十週年時，學術研究已經十分深厚、廣泛，成果不斷問世，如出版了《孫中山全集》、《孫中山年譜》及《孫中山傳》等。在一些基本問題上，海峽兩岸學者都能形成共識，沒有大的分歧。

對辛亥革命前後的一些重要歷史人物，如黃興、宋教仁、章太炎、朱執信、廖仲愷、宋慶齡、鄒容、陳天華、秋瑾等，都作了比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很有學術水平的科研成果。如姜義華的《章太炎思想研究》及湖南地區對黃興的廣泛研究等。

民國史研究的最大禁區是關於國民黨軍政人物的研究。長期以來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不管這些人物是否做過有利於國家民族的事情，均一概斥之爲反動。有的形象被扭曲，有的被醜化。這方面的內容，完全失掉了學術上的價值，如陳伯達的《人民公敵蔣介石》、榮孟源的《國賊蔣介石》等。這些書，在很長一段時間影響很大。1954年對胡適的大量批判文章，將胡適這個民國時期的重要文化人物打入冷宮。

七十年代末，民國人物的研究出現了新的兆頭。尊重歷史事實，對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給予全面客觀的分析，成爲學者們的共識。在這之後，學者們逐步地、也是比較緩慢謹慎地進入這一領域，對國民黨軍政人物開始



了新的探索。這一過程大約經歷了十年時間，學者們對蔣介石、胡漢民、汪精衛、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胡適等一大批人的生平活動、思想演變，開展了多方面的研究，先後寫出了不少有學術價值的著作。學者們能夠把這些人物放在歷史過程中作全面的、辯證的、實事求是的考察，而不就一時一事定其一生是非。

譬如關於蔣介石的研究，過去是最敏感的課題。經過深入的探討，我們認為他在早年是一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者，有強烈的反帝、反封建要求，是孫中山革命事業的追隨者，曾為推翻袁世凱和北洋軍閥的統治做過有益的貢獻。1927年後，蔣介石為了穩定統治，採取了一系列財政經濟政策和政治措施，建立了比較完善的政治體系，發展了社會經濟，但是，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和蔣介石的個人獨裁，束縛了中國政治民主化的進程。他的反共意識進一步增長，對共產黨發動了五次軍事圍剿。整個抗日戰爭時期，蔣介石雖然對日本不斷採取有條件的妥協政策，但是他始終堅持抗戰，表現了比較明顯的民族主義思想傾向。抗戰勝利後，蔣介石堅持獨裁、反共、內戰、依靠美國的政策，最後導致大陸統治的失敗。

再如對汪精衛這個人物，亦能針對其一生變化作出實事求是的分析。汪精衛，在其後期毫無疑義是一個背叛民族利益的大漢奸。但在其早年亦是為中國民主革命作出貢獻的革命家，是孫中山的重要助手之一。他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是一個軟弱的國民黨左派，而不是假左派真右派。1927年南京政府建立後，他與蔣介石的分合，均是權力之爭。

對胡漢民、馮玉祥、胡適這些一生相當曲折、複雜的人物，都給予了恰當評價，恢復了他們的本來面目。不少省、市還對有影響的地方人物，開展了研究，也發表許多成果，豐富了民國史研究內容。

當然，民國人物的研究，也存在一些缺點，譬如對人物的性格、心理活動、思想演變，探索甚少，傳記文筆亦欠活潑，這些方面均有待於改進。

#### （六）民國經濟史的研究，進入了新的階段

過去，中國現代史的研究，主要強調帝國主義的經濟掠奪和四大家族官僚資本主義的經濟壟斷，對國民政府的經濟政策，不能給予客觀的、公

正的評價。八十年代以後，這種情況有了極大的改變，出版了幾部民國經濟史的著作。民國時期經濟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十年代經濟和抗戰後方經濟兩個方面。對抗戰勝利後的經濟狀況，研究甚少。民國初年經濟和城鎮經濟的研究，剛剛起步。

學者們指出，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採取了一系列有效的財政經濟政策，如整頓稅制、改革財政制度、限制白銀外流、實行幣制改革、開展關稅自主運動等，增加了財政收入，使國民黨獲取了內戰經費，也促進了經濟的發展。應該指出，由於內戰、天災和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影響，三十年代的中國經濟是在曲折起伏中緩慢發展的，至1936年發展到一個較為繁榮的時期，為反對日本的侵略增強了物質力量。學者們也認為，宋子文、孔祥熙家族，是中國的兩大財團，有較雄厚的經濟實力，而蔣介石和陳立夫、陳果夫並沒有自己的經濟資本，因此蔣、宋、孔、陳四大家族不是經濟概念。民國經濟研究，應將國家資本和官僚私人資本區別開來，這在研究工作中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

抗戰後方經濟的研究，1986年以來在西南地區是史學研究的新熱點。學者們指出，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沿海各省先後淪陷，大批工廠企業遷往西南、西北內地。為了保證抗日戰爭的勝利進行，國民政府調整了經濟方針和經濟政策，實行戰時統制經濟政策，控制外匯管理，加強金融和外貿管制，在農村實行田賦徵實政策，統制糧食收購。因而推動了西南、西北地區經濟的發展，使資產階級獲取了經濟利益，也保證了抗日戰爭的發展和大後方局勢的穩定。學術界改變了過去單純講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經濟掠奪和發戰爭財，因而破壞了後方經濟的片面看法。

### (七)中外關係史的研究，發展不平衡

中外關係史，是民國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長期以來，受反帝、反修思路的影響，因而對中國和各大國之間的關係，不能給予恰當的評述。中國實行開放政策以後，與各國的交往日益頻繁，中外關係史的研究，也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其中，中美關係史的研究，是最熱門的學科。不僅成立了一些專門研究中美關係的機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有美國研究所，

復旦大學、四川大學成立了美國研究中心，南京大學與美國霍普金斯大學聯合創辦中美文化交流中心；而且研究成果亦大量湧現。據陶文釗教授統計：「文革」前共出版專著、資料集約四十種，論文三百多篇。「文革」後十年即發表論文四百多篇，其中關於民國期間中美關係的論文即占五分之四以上。「文革」以後，出版了一些學術質量高的專著，如資中筠的《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和發展》、丁名楠和張振鵬等的《帝國主義侵華史》（第二卷）等。中美關係史叢書編委會編輯出版的論文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文革」後中美關係史的研究水平。中美關係史的研究，較多的集中在美國對華政策方面，如關於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對華政策、巴黎和會、華盛頓會議、大革命期間美國對華政策、1931—1945年間美國對華政策、美國與中共的關係、馬歇爾調停、中美商約等。而關於中國政府對美政策的研究，就顯得比較薄弱。研究的課題都是政府政策、外交活動方面，對於民間的往來，文化關係的研究，仍然是很大的空白點。

中日關係史，一向是史學界研究得比較好的領域，八十年代以來又獲得長足的進展。全國各地主要在東北、北京、上海、天津成立了一些研究日本問題和中日關係的機構和團體。學術研討會不斷舉行，著作、論文，不斷出版。民國時期中日關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侵華史和中國抗日戰爭史方面。對中日關係中一些重大的事件，如五三慘案、九一八事變、南京大屠殺等，都作過許多深入細緻的研究；對於一些有爭議的問題如田中奏摺等，均開展過討論。

中蘇關係史的研究，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過程。五十年代，主要強調中蘇友誼，因而那時的論著沒有什麼學術價值。六十年代初，中蘇關係破裂，雙方學術上的交往斷絕。兩國仍發表過一些文章。但這些文章帶有很強的政治意識，有很大的片面性。蘇聯出版了一批早年駐華代表的回憶錄。這些回憶錄強調蘇聯對中國的援助，而對中國所造成的危害卻甚少談及。八十年代後期，中蘇關係逐步改善，雙方學術上的交往亦開始增加，中蘇關係史的研究逐步展開。學者們亦較能實事求是地評述中蘇關係史上的一些重大問題。但是，由於種種條件的限制，如史料缺乏等，研究工作恢復緩慢，成果還不多。

中國大陸對英國史的研究，有深厚的基礎，但對民國時期中英關係的研究，尚嫌薄弱，成果不夠多。學者們常常把英美兩國放在一起加以評述，

淡化了中英關係的特色。

中德關係在中國近代史上居於重要地位。三十年代，德國與中國政府關係十分密切。至八十年代中期，中國史學界才開始重視民國時期中德關係史的研究，與德國學者合作編輯檔案史料，展開合作研究。但是，至目前為止，研究人員不多，成果亦少。

其他方面，如中韓關係研究，才剛剛起步。中法、中意關係史研究，都還是空白。

#### (八)由一度十分熱門的民主黨派史研究，擴大研究中國國民黨史和民國政黨史

八十年代在許多大學的歷史系或政治系，都開設了中國民主黨派史這門課程。不少學者亦研究民主黨派史，出版了幾部有研究深度的著作。大約有六、七年時間，在中國現代史領域中成爲很熱門的課程。近幾年，可能由於史料少等原因，研究活動大大低落，而中國國民黨史研究卻迅速發展起來，發表和出版了不少論文和著作。但研究的廣度、深度，還嫌不夠，在評述上也缺乏新意。

中華民國成立以後，中國大地冒出許許多多政黨、政團，他們在政治上發揮著或大或小的作用。這方面的問題亦應是民國史研究的重要內容。1991年出版了邱錢牧主編的大型著作《中國政黨史》，對民國時期曾經存在過的大小政黨、政團進行了研究，評述了它們在政治鬥爭中的地位和作用。這部著作的出版，標幟著史學工作者開始關注這一課題，在學術研究上邁出了新的一步。

#### (九)抗日戰爭史的研究，是近十年來發展較好的領域

過去，大陸和台灣受政治的影響，雙方各執一詞，相互否定國共兩黨在抗戰中的地位和作用。1985年以後，大陸學者發表了大量文章評述抗日戰爭的正面戰場，對二十多次大規模戰役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一方面充分肯定這些戰役在抵禦日軍侵略中發揚的浴血奮戰精神，另一方面也分析了由於戰略指導失誤所造成的損失。學者們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指出抗日戰爭

存在兩個戰場——即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這兩個戰場是相互支持、相互依存，又獨立作戰的關係。敵後戰場的出現，是軍事上抗敵禦侮的需要，也是共產黨發展壯大的需要。沒有正面戰場吸引著日本的大量兵力，敵後戰場的開闢和抗日根據地粉碎日軍掃蕩、進攻，都將是困難的。同樣，沒有敵後戰場八路軍、新四軍堅持不懈地、廣泛地牽制和打擊日軍，正面戰場所承受的軍事壓力將更大。我們認為，抗日戰爭是一次反對外敵入侵的民族戰爭，是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由各民族、各階級、各政黨、各團體以及海外僑胞、愛國人士廣泛參加的一次民族戰爭。任何人在民族大敵面前，只要堅持抗日或做過一些有益於民族的事業，都應給予肯定的評價。為保衛國家民族流血犧牲的，都值得全中國人民紀念。

多年來，大陸學者對抗日戰爭的研究不夠全面、廣泛。1985年以後，從不同的角度，深入探討抗日戰爭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外交和國共兩黨關係等，發表了較多的文章，評述是比較客觀、公正的。十多年來，復旦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和東北地區的學者，注重偽政權史的研究，四川省的學者着力研究抗日戰爭大後方的政治、戰時經濟和救亡運動，都寫出了一些有較高學術價值的論著。然而，大陸學者對抗日戰爭的某些方面，如軍事戰略、日本佔領區、文化教育等，研究還很薄弱。1995年是抗日戰爭勝利五十週年，大陸史學界將開展一系列學術活動，相信抗日戰爭的學術研究將會提到一個新的水平。

以上評述了大陸史學界對民國史研究的主要方面。除這些內容外，大陸學者亦開始注意國民政府史的研究，特別是對1927—1937年這段歷史提出了一些深刻的見解。民國時期的教育、文化思想、社會變革、國民黨基層政權、農村社會結構、海外華僑、婦女運動、學生運動以及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等，都是十分重大的課題，在這些方面，都發表過一些文章或著作，然而研究也還不夠廣泛、深刻，成果也不多。

### 三、結束語

回顧大陸民國史研究的歷程，可以說是道路曲折，成績可觀。瞻望未來，民國史學科有著廣闊的、美好的前景。為把民國史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階段，我認為必須注意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第一：開拓思路，克服僵化的意識觀念，加強宏觀課題的研究。對長期指導和影響民國史研究的重要理論問題進行再認識，對的堅持，錯誤的加以修正，使我們的認識更加符合歷史實際。

第二：研究方法的創新和多元化。在保持好的治學傳統，繼承和發揚前輩學者嚴謹的治學作風基礎上，改進呆板的、單一的研究方法，吸取海外學者有益的研究方法，使我們的思路更加濶，研究更加活躍。

第三：開拓新的研究領域，拓寬研究視野。民國史研究雖然已較繁榮，成果亦不少，但它畢竟是近二十年來發展起來的新的歷史學科，研究的深度、廣度，都有待加強。特別需要進一步加強與台灣、西方學者的學術往來與交流。我相信民國史的研究，將會更加興旺發達。

近史所專刊之(72)

## 以禮代理

### —凌廷堪與清中葉儒學思想之轉變

張壽安 著

195 頁

精裝 300 元

平裝 250 元

本書主要討論清代中葉禮學思想的興起。這可以說明梁啟超以降學界普遍認為清代只有學術而無思想此一觀念之偏誤。同時也指出儒學在擺脫以心性理氣之個人內在修為為主的理學型態之後，走上以禮學實踐為主之途。清代學者關心行為結果之善、行為終判之義。他們期望通過各種禮儀在鄉黨間宗族間的實踐，以重整倫常並重建社會秩序。凌廷堪即為此「以禮代理」思想之首倡者。本書先介紹以禮代理此一思潮產生之社會與經濟背景，其次闡釋凌廷堪的以禮代理思想，再說明嘉道間崇禮思想蔚起，並分析此一崇禮思想與當時理學界產生之爭辯，最後討論禮學思想之社會實踐，以證明清學在思想與經世間的聯繫性。



## 上海《民國日報》中的基督教會史料

邢 福 增\*

### 一、引 論

故史學大師傅斯年曾說：「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這句話當真道出不少史學研究者的心聲。在中國基督教歷史研究方面，我們亦面對著資料散處各地，卷帙浩繁的困擾。除了眾多由西方教士與中國基督徒撰寫書籍，以及不同來華差會的檔案外，我們向來皆仰賴由傳教士或信徒所出版的期刊、雜誌作為基本的史料。例如十九世紀的 *Chinese Repository* (1832-1851)、《教會新報》(1868-1873) 及《萬國公報》(1874-1883; 1889-1907)；二十世紀的《中華基督教會年鑑》(1912-1936)、《生命月刊》(1919-1926)、《真理週刊》(1924-1926)、《真理與生命》(1926-1935)、《文社月刊》(1925-1928)、*China Mission (Christian) year Book* (1910-1939) 以及橫跨兩個世紀的 *Chinese Recorder* (1867-1941) 等<sup>①</sup>。

然而，中國自十九世紀末開始發展其新聞報業，在不少報章中，其實亦有很多有關基督教情況的報導，向為從事教會史學者所忽視。筆者曾較有系統地翻閱了兩份民國時期的報章——《申報》(1912-1949)、《民國日報》(上海版)(1916-1932; 1945-1947)，即發現當中藏有頗為豐富的基督教

\* 香港建道神學院講師

① 有關這方面史料的介紹，可參查時傑：〈民國以來的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以工具書為例〉，《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論文集》下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92），頁1547至1561。

史料<sup>②</sup>。不僅如此，筆者在整理有關史料時，更發現從這些報章對基督教的報導內容的演變，可進一步反映出基督教在中國發展際遇的一個縮影。

本文將以《民國日報（上海版）》（以下簡稱《民國日報》）為例，先從縱向的角度，扼要將當中有關的基督教的報導與其發展際遇的關係交代，然後即集中非基督教運動期間（1922-1927）及往後數年（1928-1931），就《民國日報》中有關中國基督教大學的史料，作一介紹。

## 二、《民國日報》與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

《民國日報》創刊於一九一六年，一九三二年因著抗日戰爭的關係而停刊，復員後於一九四五年重刊，一直到一九四七年止。創刊初間，該報為中華革命黨的機關報，主要由陳其美、葉楚傖、邵力子、朱執信等人主編。其時積極反對袁世凱的帝制、張勳復辟及段祺瑞政府，並支持孫中山的護法運動。新文化運動及五四運動時期，該報更增〈覺悟〉副刊，由邵力子主編，大力傳播新思潮。一九二四年，國民黨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後即成為黨的機關報，有中共黨員瞿秋白等人加入。在國共合作的形勢下，一直進行反帝國主義及反封建主義的宣傳。及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後，《民國日報》為西山會議派主控，言論轉為反共產主義，但國家主義的色彩仍然十分強烈<sup>③</sup>。

### 第一階段：基督教的黃金時期（1916-1922）

基本上，《民國日報》在一九二二年非基督教運動爆發前，雖然有其政黨的背景，但是對基督教的報導，卻仍相當開放。在「本埠新聞」的版面中，不時有基督教的史料刊登：

#### 1. 有關基督教青年會的活動宣傳：

---

② 筆者在香港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中心資助下，現正將《上海民國日報》中的基督教史料予以編目整理，一俟完成，即可供研究者參考。

③ 中國近現代史大典編委會編；《中近現代史大典》下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頁631，633。



在此段時期，青年會一般舉行的活動，例如講演④、徵求會員⑤等，都可在《民國日報》找到一些相關的報導。並且，若干講詞更以「專件」或「來件」的方式全篇刊登。當中有不少更以青年會在國家社會方面的作用為主，例如〈青年會為鑄造國民之大工廠〉，便強調「青年會之用意以宗教真理淪人性靈，敦人品行，無欲使青年復其固有之善，而去其舊染之污，以明道德」⑥。此外，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爆發後，青年會協會亦發表宣言，表示其對時局的關注，並呼籲全國各青年會協會，向當地政府及人民「聲訊不公道之危害」，以表明「今日吾基督教團體，對於政府與人民應盡之責」⑦。青年會向國人宣傳其人格救國的主張與行動，確實可在《民國日報》中反映出來⑧。

## 2. 有關一些基督教團體的活動：

例如基督教普益社⑨、基督教救亡十人團⑩、基督教救國會⑪、基督教全國大會⑫及引發非基督教運動的導火線世界基督教學生大會⑬，《民國日報》都有相當篇幅的報導及專件介紹。當中的基督教救亡十人團，乃由安慶青年會的會員所組成，若非在此找到其宣言，我們根本不曉得有此組織

- 
- ④ 例如〈吳鐵城在青年會之演說——平民主義與世界之將來〉，《民國日報》，民8年12月26日，28日，第三張（十一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影印版），24分冊，總頁659，683；〈陳獨秀在青年會演說〉，《民國日報》，民9年3月21日，第三張（十版），26分冊，總頁288。
- ⑤ 如〈青年會二十二週年紀念徵求大會開幕宣言〉，《民國日報》，民11年2月8日，第三張（十一版），37分冊，總頁435。
- ⑥ 徐翰臣，〈青年會為鑄造國民之大工廠〉，《民國日報》，民8年1月26日，第三張（十一版）19分冊，總頁299。
- ⑦ 〈青年會協會對外宣言〉，《民國日報》，民8年7月13日，第三張（十版），22分冊，總頁154。
- ⑧ 如包世傑：〈目前青年會可以救國之一事〉，《民國日報》，民9年2月13日，第三張（十一版），25分冊，總頁533。
- ⑨ 〈普益社舉辦因利會〉，《民國日報》，民9年9月9日，第三張（十至十一版），29分冊，總頁122至123。
- ⑩ 〈基督教救亡十人團之宣言書〉，《民國日報》，民8年7月24日，第二張（八版），22分冊，總頁284。
- ⑪ 如徐謙：〈基督教救國會成立宣言〉，《民國日報》，民9年4月3至5日。
- ⑫ 詳參民11年3月至5月的《民國日報》，在此不贅。
- ⑬ 詳參民11年3月至5月的《民國日報》，在此不贅。

的成立。至於基督教救國會的資料，在《民國日報》中更有相當珍貴的史料<sup>⑭</sup>

### 3.有關教會的消息：

如耶穌教自立會的全國聯合大會<sup>⑮</sup>、基督徒的和平祈禱會<sup>⑯</sup>聖公會對國貨平價的主張<sup>⑰</sup>，甚至是上海老北門浸會的新堂落成禮<sup>⑱</sup>亦見於《民國日報》。

總的來說，從第一階段《民國日報》中有關基督教的不同報導來看，可見主編者不僅沒有因著其政治背景而對宗教活動有任何的偏見，反倒視之為眾多社會新聞之一而作出較客觀的報導。而中國教會方面，亦努力透過新聞媒介來宣傳她的活動<sup>⑲</sup>，在當中更反映出一個不爭的事實；部份中國基督徒或團體正努力在國家存亡受到內外強權威脅的情況下，就救國的問題向國人告白他們的信仰立場，並且將之以行動實踐出來。這說明基督教在二十世紀初非基督教運動前，正處於黃金發展的時期。對當時國人來說，基督教因著其屬於西方文化的一部份，而受到國人的歡迎<sup>⑳</sup>，而基督教救國主義的萌生，無論是從耶穌的人格入手<sup>㉑</sup>，抑或強調國家本身的救贖意義<sup>㉒</sup>，皆顯示出中國教會對時代處境所作的回應。

⑭ 參拙著：〈儒者，基督徒，革命家——徐謙與基督教救國主義〉，《建道學刊》，第二期（1994年7月）。

⑮ 〈耶穌教自立會全國聯合大會〉之一、二及三，《民國日報》，民9年6月29日至7月1日。

⑯ 〈基督徒祈禱和平大會〉，《民國日報》，民8年5月11日，第三張（十一版），21分冊，總頁131；〈基督教祈禱和平盛會〉，《民國日報》，民8年5月12日，第三張（十一版），21分冊，總頁143。

⑰ 〈聖公會主張國貨平價〉，《民國日報》，民8年7月8日，第三張（十二版），22分冊，總頁96。

⑱ 〈浸會堂新屋落成禮〉，《民國日報》，民9年12月21日，第三張（十版），30分冊，總頁712。

⑲ 筆者在同時期的上海《申報》中，亦看到不少相同的報導，可見當時若干基督教團體及教會十分重視透過傳媒來宣傳他們的活動。

⑳ 參梁家麟：〈五四前後新文化運動思潮與基督教〉，華福編：《第二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彙報》（香港：華福，1988），頁497至505。

㉑ 參拙著：〈二十世紀初年的「基督教救國論」（1900-1922）——中國教會回應時代處境一例〉《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第十一期（1991）。

㉒ 參拙著：〈儒者，基督徒，革命家——徐謙與基督教救國主義〉。

## 第二階段：非基督教時期(1922-1932)

一般史家皆以一九二二年為非基督教運動的起始，而一九二八年北伐完成為該運動的終結。無疑，在整段非基運動時期，中國教會受到不同的攻擊，以及來自政黨的壓力。但是，運動的結束卻不完全等於基督教即可恢復昔日的地位，在國民政府定都南京，開始訓政時期後，國家主義仍然高漲，基督教在此仍然受到若干程度的衝擊。從《民國日報》的報導中，亦可反映出這十年間基督教在中國的際遇。

先是一九二四年起，隨著《民國日報》政治立場的激化，該報的副刊〈覺悟〉即從八月起到一九二五年三月間，出版了二十五期的「非基督教特刊」，特刊中登載了從不同角度批判基督教的文章<sup>23</sup>。此後，無論繼續在〈覺悟〉、或在「黨務」及「教育」的專版中，皆有很多針對基督教及教會教育而作的抨擊。較特別者，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的聖誕日，《民國日報》以一整版的編輯，出版了「非基特刊」，重刊了朱執信的名著——〈耶穌是甚麼東西〉<sup>24</sup>，顯示部份國民黨人士仍欲以非基督教為目標，進行鬥爭。在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更隨報印發厚達一百多頁的《不平等條約研究集》，當中在文化侵略部份，即詳細地以大量文字，配合多個圖表，說明基督教如何在中國進行文化侵略<sup>25</sup>。這種針對基督教的情況，一直持續至一九三二年《民國日報》停刊為止。

另方面，在《民國日報》亦有在「本埠新聞」中零散地報導一些中國教會及信徒對上述情勢的回應及反省。例如一九二五年基督教協進會舉行一連七日年會，討論了教會如何面對時局的問題<sup>26</sup>；並且提出取消一切不

<sup>23</sup> 有關「非基督教特刊」內容的介紹，可參〈非基督教特刊——上海民國日報覺悟副刊的特刊〉，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三集上冊（北京：三聯書店，1979），頁61至76。很可惜，在中國大陸影印版的《民國日報》中，只有第二十至二十四期的特刊，其他皆缺。

<sup>24</sup> 「非基特刊」，《民國日報》，民17年12月25日，77分冊，總頁960。

<sup>25</sup> 同上，頁43至125（78分冊，總頁35至48）

<sup>26</sup> 〈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年會〉第一至第三日；〈基督教協進會年會閉幕〉，《民國日報》，民15年5月14至16日；5月21日，第四張（十四版）

平等條約（包括傳教條約）的主張<sup>27</sup>。至於〈覺悟〉中反對基督教的言論，一些中國基督徒亦有撰文回應，例如張仕章就針對張振振等人敵視基督教的言論而作出疏解，試圖說明三民主義與基督教間，是可以並行不悖的<sup>28</sup>。

總結第二階段《民國日報》中有關基督教的報導，可說全是清一色的反對基督教言論。並且，我們可以清楚看見，與一般的理解恰好相反的是<sup>29</sup>，反基督教的言論及行動並沒有隨著一九二八年的非基運動而結束，反倒在一些國民黨黨員的指導下，開展了另一種形式的反教。借用葉仁昌的分析，防禦式的國家主義反教已轉化為一種內統式的國家主義反教；基督教在北伐後被要求也要臣服、效忠，並整合於新的政治秩序及三民主義之下<sup>30</sup>。

### 三、非基督教時期《民國日報》中的基督教大學史料

從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二年間，《民國日報》中確實有不少關於中國基督教教會學校的史料，當中差不多全是從文化侵略的角度，披露學生在當中如何受到西方帝國主義的茶毒，並為在各級大中小學校內強化三民主義黨化教育而宣傳。此外，亦有大量有關反對文化侵略運動大會<sup>31</sup>及上海市

<sup>27</sup> 〈基督教協進會討論傳教條約〉，《民國日報》，民15年12月5日，第四張（十三版）。

<sup>28</sup> 張振振等與張仕章的爭論，可參《民國日報》，民17年2月12日至3月9日期間〈覺悟〉副刊，在此不贅。

<sup>29</sup> 不少學者皆以一九二七、八年為非基督教運動的結束，並認為在國民政府統治下，中國再無大規模的反教風波，政教關係良好。有關說法可參梁家麟：《福臨中華——中國近代教會史十講》（香港：天道書樓，1988），頁152。查時傑：〈民國基督教會史（三）——非基督教與本色化運動時期（1922-1927）〉，《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第十、十一期（1984），頁434至435。

<sup>30</sup> 葉仁昌對此有相當深入的解析，參氏著：《五四以後的反對基督教運動——中國政教關係的解析》（臺北：久大文化，1992），頁152至156。

<sup>31</sup> 例如〈蘇省黨部決議舉行反對文化侵略運動大會〉，《民國日報》，民19年5月7日，86分冊總853；〈激昂壯烈之蘇省會反帝文化侵略運動大會〉，民19年5月7日，86分冊，總頁82；〈蘇省整委發表反帝文化侵略宣言〉，《民國日報》，民19年7月9日，86分冊，總頁110。

收回租界教權運動的報導<sup>②</sup>。

有關非基督教時期《民國日報》的基督教大學史料的情況，可先參〈附錄〉：

**附錄：《民國日報》中直接與基督教大學有關的史料<sup>③</sup>**

陳友松：〈怎樣在基督教學校內實施三民主義的教育〉，民 17 年 3 月 18 日，73 分冊，總頁 257。
德佑：〈約翰大學復活了〉，民 17 年 9 月 15 日，76 分冊，總頁 244。
薛光前：〈男女同學的又一障礙——蘇州大學禁令六條〉，民 17 年 11 月 3 日，77 分冊，總頁 48。
魯易：〈滬江大學女學生的制服〉，民 17 年 12 月 6 日，77 分冊，總頁 585。
鄧恨天：〈咄！東吳之基督教教育〉，民 17 年 12 月 19 日。
德儉：〈打倒帝國主義的先鋒隊——聖誕節復大女生午夜祈禱〉，民 17 年 12 月 23 日，77 分冊，總頁 863。
〈教育部頒佈宗教團體興辦教育事業辦法〉，民 18 年 4 月 24 日，79 分冊，總頁 949。
〈齊魯大學設辦鄉村師範——變更文化侵略方法〉，民 19 年 2 月 16 日，84 分冊，總頁 592。
〈教育部嚴飭金陵滬江兩校停止宗教科系〉，民 19 年 3 月 24 日，85 分冊，總頁 334。
〈京市黨部嚴密檢查金大辱國影片〉，民 19 年 4 月 4 日，85 分冊，總頁 493。
〈金大學生向教育部教局請願——為取締侮辱國人之影片事〉，民 19 年 4 月 4 日，85 分冊，總頁 493。

<sup>②</sup> 這方面的報導在一九三〇年五月四日起至十一月的《民國日報》中有大量的報導，在此不贅。

<sup>③</sup> 這裡所列舉的，主要是直接與基督教（新教）大學有關的報導，其他如天主教的大學（例如震旦大學），以及不少教會中小學校的情況，則不包括在內。

〈金大洋教授復攝侮辱華人影片〉，民19年5月16日，86分冊，總頁202。
〈教部嚴禁陳列宗教書報〉，民19年7月2日，87分冊，總頁20。
〈滬江大學音樂社在蘇州〉，民20年4月10日，分冊91，總頁491。
〈聖約翰立案〉，民20年6月22日，92分冊，總頁616。

上述史料主要圍繞一九二八年三月至一九三一年六月間，當中反映出在訓政初期基督教大學所面對的衝擊。事實上，當時在江蘇省的國民黨中央黨部正積極推行反對文化侵略運動大會，而上海市黨部亦全面部署收回租界內的教權。在一片反對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狂潮下，基督教大學正面對來自政府施加的重大挑戰。不過，從《民國日報》中，可以見到在重重禁令與壓力下，基督教大學仍有一定的發展空間：

### 黨化與基督化的消長

在國家主義的衝擊下，基督教大學要向政府註冊立案，並且取消大學的宗教系，有關的宗教科目亦必須改爲選修，學校不得宣傳宗教<sup>③4</sup>；除與大學開設選修科有關的宗教書籍及雜誌得酌量陳列外，其他一律禁止<sup>③5</sup>……。但是，從《民國日報》的報導得知。在有關法令施行後，金陵及滬江大學顯然沒有落實執行。據報導，金大及滬大在一九二八至二九年度仍設有宗教系及神學科<sup>③6</sup>，而聖約翰大學至一九三一年時，仍以聖經作爲必修科呢。

<sup>③7</sup>

### 國人對基督教大學的拒迎

<sup>③4</sup> 〈教育部頒佈教團體興辦教育事業辦法〉，民18年4月24日，79分冊，總頁949。

<sup>③5</sup> 〈教部嚴禁陳列宗教書報〉，民19年7月2日，87分冊，總頁20。

<sup>③6</sup> 〈教育部嚴飭金陵滬江兩校停止宗教科系〉，民19年3月24日，85分冊，總頁334。

<sup>③7</sup> 〈聖約翰立案〉，民20年6月22日，分冊92，總頁616。

對部份國人來說，基督教大學是徹頭徹尾的文化侵略，只是「洋奴養成所」<sup>⑳</sup>，學生都是「惟外人是聽之順民」，任由洋人宰割魚肉而不知反抗的<sup>㉑</sup>。事實上，基督教大學的若干表現，的確令國人感到難受，例如一九三一年四月，滬江大學音樂協社在蘇州青年會舉行音樂大會，那位華人主席竟以英語報告。其時一位聽眾忍受不住，便站起來說：「在中國的領土之內，在中國未亡之前，在國民政府領導之下的中國境內，主席報告還是請說國語的好」；豈料那位主席卻以國語回答：「我們中文也要說的，不過先說英語吧了」<sup>㉒</sup>。在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時，如此表現，又豈不教國人反感？難怪有人投稿往《民國日報》謂：「一個有民族自覺心的青年就不應再踏入這一個充滿著蔑視和恥辱的園地」<sup>㉓</sup>。但是，對另一部份中國人來說，基督教大學仍然是他們夢寐以求的目標，如聖約翰大學雖然在五卅慘案後流失了一批學生，復因政治形勢的關係而停辦，但在一九二八年九月重新開學前開設的補習班，卻又吸引了不少學生報讀<sup>㉔</sup>。據統計，在一九二九年時，聖約翰大學的學生已有二百七十人之多<sup>㉕</sup>。

#### 四、小 結

總的來說，無論是研究二十世紀的中國基督教歷史，或是她在華的教育事業方面，《民國日報（上海版）》實在是另一種不可或缺的資料。就前者而言，透過不同的報導，我們可以重建若干基督教團體或人物的活動，作為相關研究的重要史料。對後者來說，我們更可具體及深入地掌握非基督教運動至訓政初期上海及鄰近地區國人對基督教及教會教育的不同反應。

⑳ 德佑：〈約翰大學復活了〉，民 17 年 9 月 15 日，76 分冊，總頁 244。

㉑ 〈齊魯大學設辦鄉村師範——變更文化略方法〉，民 19 年 2 月 16 日，84 分冊，總頁 592。

㉒ 〈滬江大學音樂社在蘇州〉，民 20 年 4 月 10 日，分冊 91，總頁 491。

㉓ 〈聖約翰立案〉，民 20 年 6 月 22 日，分冊 92，總頁 616。

㉔ 德佑：〈約翰大學復活了〉，民 17 年 9 月 15 日，76 分冊，總頁 244。

㉕ 《聖約翰大學五十年史略（1879-1929）》（臺灣：聖約翰大學同學會，1972 重印），頁 35。

更進一步地利用報刊資料來研究中國基督教歷史，作為教會性資料的補充，看來是日後我們不能忽視的方向。

---

## 關於《許壽裳日記》\*

(自 1940 年 8 月 1 日至 1948 年 2 月 18 日)

北岡正子 黃英哲 合著\*\*

### 一

許壽裳（1883-1948），字季黻（或季蕪），浙江紹興人，畢業於杭州求是書院。1902年9月，以浙江省派遣的公費留學生身份赴日本留學，先進弘文學院速成普通科就學，在那裏，結識同鄉周樹人（後來的魯迅）。之後，兩人深摯的友情直到魯迅去世（1936年）。1904年3月，從弘文學院畢業，進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研習「教育、地理、西洋史」，於1908年3月畢業。這段期間，他以行動反滿的立場。他擔任的同鄉會雜誌《浙江潮》（1903年創刊）的編務，以鼓吹革命思想為己任，並加入光復會以及爾後成立的中國同盟會（1905年）。許壽裳和魯迅在弘文學院就讀時，就認為改造民族性唯賴革命，留學時代的後半期，和魯迅一起生活，並著手準備文藝運動。但是，沒有成功。在同一時期，和魯迅等數人，同去旁聽章太炎的《說文解字注》講學。章太炎和在求是書院邂逅的蔡元培，都是許壽裳生涯最尊敬的師長。許壽裳原有留學德國之意，曾和魯迅結伴前往

\*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東洋學文獻叢刊第64輯，平成五年三月刊行。

\*\* 北岡正子 關西大學文學部教授  
黃英哲 立命館大學博士班研究生



由獨逸學協會學校辦的獨逸語專修學校上了短時間的課，然而，願望沒能實現。他於1909年回國，任職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教務長。之後，魯迅也返國，在同校擔任生理學、化學老師，兩人共事了一段時間。

辛亥革命過後，蔡元培就任教育總長，立刻聘請許壽裳到南京的教育部工作，在這裏，再度和魯迅同事。隨著遷都，許壽裳也跟著教育部的轉移遷住北京，擔任教育部普通教育司第一科長。此後，直到中日戰爭爆發為止，先後歷任江西省教育廳長、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校長、中山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幹事兼文書處主任、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院長等要職。他在教育部，或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及廣州中山大學任職時，一遇到教育或政治的重大事件，必和魯迅携手面對困難，同甘共苦。1929年，因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排斥校長運動，而引發教育界新舊兩派對立的所謂女師大事件時，許壽裳由於支持了支援學生而被免職的魯迅，反對當時的教育總長章士釗，而遭到被開革的命運。1926年3月18日，北洋政府軍對著因反對包括列強的武力干涉和政府的外交姿態而舉行示威抗議的民眾開槍，死傷頗多，因3.18事件發出的逮捕令中，大學教授就有五十名，許壽裳和魯迅也在名單內，他倆歷經逃難生活後終於各自逃離北京。另外，1927年4月12日，因蔣介石的清堂使中山大學也有數十名學生遭逮捕，許壽裳和魯迅因校方未出手援救，而以辭職表示抗議。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10月，國民政府教育部將北平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天津北洋工學院三校合併，在西安成立西安臨時大學。許壽裳受聘為史學系主任兼教務委員。1938年，西安臨時大學因戰亂轉移到漢中，改名西北聯合大學。許壽裳雖兼任這所大學的法商學院院長，不久，因受到教育總長陳立夫的干涉，憤而辭去院長之職，專任史學系教授。1939年，西北聯合大學改組為西北大學時，許壽裳辭職，同年冬天，前往雲南，再度成為中山大學師範學院教授（因戰禍，中山大學從廣州遷到雲南的澂江）。1940年春天，應私立華西大學（成都）的邀請，以庚款（英國義和團賠償金所設）講座教授身份前去執教。1941年夏天辭去華西協合大學，赴重慶擔任國民政府考試院考選委員會簡任秘書，後成為專門委員，重溫公務員生活。

中日戰爭結束，許壽裳回到南京，雖得與九年未見的上海家族團圓，但

不久旋於 1946 年，接受老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長官陳儀邀請赴台。赴台後的許壽裳，歷任台灣省編譯館館長、台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教授兼主任等職，1948 年 2 月，因離奇死於台灣大學宿舍，而結束一生。

許壽裳歷經戰前、戰中、戰後，足跡遍及日本、中國、台灣。他的一生可謂是波瀾壯闊。許壽裳的日記，是從他就職成都華西協合大學 1940 年 8 月 1 日開始，止於 1948 年 2 月 18 日卒於台灣大學教授任上為止，從 57 歲到 65 歲的記錄。等於映照了許壽裳在戰時的大後方（國統區）經驗和戰後的台灣經驗。

## 二

1937 年 10 月，許壽裳隻身前往大後方。從西安到漢中、城固、澂江、成都、重慶輾轉遷徙，度過遠離家人近十年的辛酸歲月。1940 年 9 月 16 日，在舊曆中秋的日記裏，記載了如下的感慨：

近年來，南北東西，不遑寧處。民二五此夕在北平，二六在嘉興，時正為安頓眷屬，收拾行裝，終日彙彙，對月黯然，數日後即冒險赴西安。二七在城固，二八在岷江，舟中同行八人，泊傳家場，不久飛滇。今年在此，極感蕭條，妻子流離，相隔萬里，在蓉者惟孺兒一人而已。

從目前公開的日記裏，可以了解是記載了在大後方成都、重慶後半期約五年的生活。日記中，鉅細靡遺地記錄了有關書信往返、金錢收支、人物往來、起居、讀書、著述、工作等事情。此外，也會因觸景而寫下如上述般的感慨。

首先，戰爭的陰影濃厚地籠罩著這段時期的生活。日記裏精密的記載空襲的次數和時間，與留在上海妻子、女兒的通信日期（從上海到重慶通信時間需一個月以上）和內容，以及親友們的信件等等，具體的浮現了日本軍重覆轟炸成都、重慶，生活在占領區中國人生活的困頓和逃避戰亂的人們的身影。例如 1944 年 10 月 15 日的日記如此記載：

得兆恆（長女之夫，住在桂林——引用者注）信，謂暫不前進，此次湘桂及黔桂撤退情形之慘，有不忍言。其妹夫楊君一家五口遷兆

恒一日離桂（九月十日），至十月八日發信時尚未抵金。又有友人一家七口，困坐車頂上至十七天之久，還算萬幸，其餘擠不上車及中途遺棄者不知凡幾，毫無組織，毫無秩序。又旬日前，車站附近，汽油炸彈庫爆炸，公私損失之大，可謂空前。……

另外，當在上海的女兒經由桂林、貴陽一路找到父親所在的重慶約十個月的日記裏，充份表現了擔心女兒安危及行路困難的父親的心情，令讀者無不動容。

日記不僅記錄了日常戰時的生活，同時也反映出一名抗日知識份子的戰鬥意識。1941年9月5日的日記，敘述了有關抗日戰爭的意義：

……日本已將琉球民族消滅，朝鮮民族奴役，現在又攫擄了越南民族，逼伺著泰族。中華民族的抗戰是日本奴役東亞諸民族的最有力的阻礙與打擊，同時也是東亞諸民族解放希望之所繫。

此外，1942年4月3日的日記，讀了內山完造的〈魯迅先生〉，將魯迅抗議內山太過褒獎中國的段落抄下：「中國的將來，如同阿拉伯的沙漠，所以我要鬥爭」。又於5日，抄下郁達夫〈憶魯迅〉文中的一段：「因魯迅的一死，使人們自覺出了民族的尙可以有為，也因魯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國還是奴隸性很濃厚的半絕望的國家」。許壽裳並沒有加上自己的感想。1945年4月8日的日記也是去掉感想的寫著：聽說了「青年從軍」的學徒士兵們的不滿——軍隊教官道義低劣的模樣、不給充份的武器只給一隻步兵槍的軍事訓練、津貼連理一次頭髮都不夠、反倒被兵士們安慰的高官的視察慰問等。從上述的日記內容與其抄錄的短文一起解讀，可以窺知許壽裳憂慮著抗日戰爭的未來和戰鬥主體——中國人國民性的改革有密切關聯。

日記中處處可見日本步向戰敗的戰況。美軍空襲東京、名古屋，蘇聯參戰，向廣島投原子彈，聯合國接受日本投降……。1945年8月15日的日記裏，因日本投降及獲知留學美國的次子平安抵美後，寫下兩首欣喜的詩：

昨成詩兩首。八月十日夜聞日寇乞降，翌日得琛兒平安抵華府喜成二首。

居然喜訊聯翩至 黷武倭夷竟乞降

難得八年摧勁虜 從今一德建新邦  
 陷區妻子狂歌舞 盟國經綸足駿龐  
 歸路反愁何所見 創痕滿地下長江

兒書萬里慰親情 喜報安然抵美京  
 科學發明原子彈 和平領導國聯盟  
 厚生能泯貧和富 進德端由愛與誠  
 羨爾觀光時會好 相期無負此長征

如同詩裏所說，戰後建立「新邦」所需的「愛與誠」，正是許壽裳以前在弘文學院的青春時代和魯迅共同認定是自己民族所欠缺，解脫奴隸性所必要的品德。

其次，可指出的是，許壽裳站在和國民黨內部的 C.C 派（以陳立夫、陳果夫為首的國民黨內部派系）對立的立場。1941 年 3 月，許壽裳堅決回絕三十一集團軍總司令湯恩伯創設的中正學院院長之職，21 日的日記紀錄了給朋友謝似顏、朱少卿的信裏，敘述了拒絕的理由：

似顏、少卿學長兄大鑒：自奉灰電，即於十六快覆一緘，昨夜奉八日航快書，今晨即覆一電，諒均察及。湯公盛意至感，惟院長之職實不能就，前函已懇請其另擇他人，此中不得已苦衷，敢為二兄明言之：弟本參同盟會，且加入國民黨，特以三十餘年來，壹心教育，對於黨務未嘗致力，且不滿於黨內有黨，此為二兄所知，似顏兄共事多年，知之尤稔。自民二七秋，弟兼長法商學院時，教部長別有用意，密電常委，謂院長宜擇超然者，弟聞之，憤而立刻辭職，從此不欲與陳見面，以弟本性孤介，實難與此公周旋。院長無論如何不能與教部無關係，弟既有此痕跡，恐反累 湯公知人之明，再四思惟決意辭命，務請二兄代為婉達，至感至謝。……

根據 4 月 25 日的日記可了解，中正學院是為教育在戰區不能赴學校的子弟，培養其成為戰時有用人材的學校。湯恩伯是許壽裳老友陳儀所栽培的人物，但也是日後翻弄了陳儀命運的人。如同許壽裳在信裏言及的，如做院長必定和教育部有所瓜葛，實為不想和陳立夫面對，是源於 1938 年在西北聯合大學的經驗。

1938年7月，任史學系教授的許壽裳兼任了同校法商學院院長，長男世瑛氏的〈先君許壽裳年譜〉（《魯迅研究資料》22收錄）裏，針對上述信件的內容有詳細的說明：11月，當時的教育部長陳立夫有密電給西北聯合大學常務委員會指示，法商學院院長須超越而接近中央者擔任，應暫定由張北海整頓法商學院。其背景源於法商學院的前身是北平大學法商學院，更先是北京俄文法商專科學校，因設有俄語課程而對此敏感；加上許壽裳因反對「黨內黨」的存在被視為不服中央者所致。現在，如果讀《國立西北聯合大學法商學院主要教職員履歷表》（民國二十七〈1938〉年十月十四日），可知其中數人有留學蘇聯的經驗，並可看到俄語教師曹聯亞（靖華）的名字。許壽裳得悉密電之事後非常氣憤，立刻辭去院長一職。據聞，當時的西北聯合大學係在陳立夫、陳果夫兄弟所謂C.C.派的掌握之下。

有關形成上述事件背景的戰時國民政府的教育統制，下述論文可資參考（劉惠璇〈抗戰時期知識份子的困境〉《警專學報》第三期1990.6）。當時的國民政府對於西遷後方的高等教育機關，寄予相當高的關注。在「支援抗戰」、「準備建國」的兩項目標之下，積極地干涉大學的教育行政的管理和監督。首先，先全面劃定大學教育。由中央決定大學的數目和地域分配，強化監督指導的制度，成立學術審議會，擴張教育行政權。其次，整頓大學內部的行政組織，確立大學行政的重點，強化內部行政和人員編制的規定。這些措施無非為了嚴厲箝制教育藉以集中權限。為強化擴大其文教政策的這種國民政府的教育統制，具現於將黨團（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導進校園這個事實。各大學成立了國民黨中央黨支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召集教師和學生組織黨義研究會，促使教育界人事逐漸接觸黨務，自歐美返國的教授們相繼入黨。針對此，也有批判學校行政和研究自由恐受影響的學者。教育部長陳立夫譴責新文化運動帶來重視西洋的風氣深刻地影響了大學教育，稱大學為「文化租界」，揚言要收回租界，而著手整理課程、科目、教材。於是，重視「中國文化」、「中國教材」的大學教育，產生了「復古守舊」的傾向。

許壽裳再三發出堅辭院長的信函，4月25日的日記寫著：「……此種訓練機關，教授實難其選，既須富於本科學識，又須深於黨義研究，同時

更須濟事實地經驗，三者缺一，則不能達訓練目的，此非普通大學教授所能勝任愉快者。弟個人既無此能力，又不能訪求此項良教授以爲輔導，則其餘一切更不必談」。讀了其數日以內所寫的這些書信，從所謂：「對於黨務未嘗致力」，以及適任中正學院教授資格者「須深於黨義研究」爲其條件之一，到可是「個人既無此能力」的主旨之中，都可讀出許壽裳絕不苟同 C.C. 派法西斯主義的教育統制之意志。

許壽裳反對 C.C. 派的立場延至戰後不曾改變。卻也可能造成日後；據聞被阻止擔任台灣大學校長；陳儀下台後台灣省編譯館立刻被廢止，以至於最後的不測之死等的主因。

### 三

1946 年 1 月，許壽裳以考試院考選委員會第一次復員人員身份，回到南京，和分離九年的家人團聚，但不久，應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長官陳儀的邀請，前往台灣。

陳儀（原名毅，字公俠或公治，1883-1950）和許壽裳、魯迅同爲紹興出身，1902 年 10 月，留學日本，就讀成城學校、陸軍測量學校，1908 年 11 月，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砲兵科。和許壽裳、魯迅在留學時代結爲好友，一同成爲光復會會員。辛亥革命後，成爲浙江都督府軍政司司長，1917 年再度赴日，進陸軍大學就讀，返國後在上海企業界任職。經歷了軍人、政治家要職。許壽裳在重慶任職時期，陳儀正好在此就任行政院秘書長、國家總動員會議主任，兩人的交往情形可在日記裏讀到。戰後，其政治手腕和留日經歷受到評價，被提拔爲戰後初期台灣統治機關的最高負責人。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長官是掌握全台灣政治的特任官。陳儀於 1945 年 10 月渡台，參加了台灣總督安藤利吉的受降典禮，負責戰後的接收任務。此後，陳儀設立了台灣省編譯館，企圖重建戰後台灣的文化，聘許壽裳爲館長。（有關陳儀的經歷，參考了《陳儀生平及被害內幕》1987，中國文史出版社）。

1946 年 5 月 2 日，許壽裳接到陳儀打來的電報，第二天 3 日的日記裏如此記載：「知〈顧密〉電已譯出，略謂爲促進臺胞心理建設，擬專設

編譯機構，編印大量書報，盼兄來此主持，希電覆。」陳儀寄信給許壽裳詳敘了對編譯館更進一步的構想（5月13日，沒公開書簡）。作為了解設立台灣省編譯館的趣旨和業務內容是貴重的資料，因此引用如下：

兄願來台工作，很高興。台灣經過日本五十一年之統治，文化情況與各省兩樣。多數人民說的是日本話，看的是日本文，國語固然不懂，國文一樣不通，對於世界與中國情形也多茫然。所以治台的重要工作是心理改造，而目前最感困難的，是改造心理的工具——言語文字——須先改造。各省所出書籍報紙，因為國文程度的關係多不適用。台灣的書報在二三年內必須另外編印專適用於台灣人的。第一要編的是中小學文史教本（略）。第二要編的是中小教師的參考讀物（略）。第三為宣達三民主義與政令須編適於公務員及民眾閱讀的小冊。第四一般的參考書及辭典等。這是就台灣的應急工作而言。此外弟常常感覺到中國現在好書太少了，一個大學生或者中學教師要勤求知識，非讀外國書不可，不但費錢而且不便，我常有「譯名著五百部」的志願，（略）為了右面的五種工作，我想設一編譯館。（略）

戰後初期的台灣雖復歸中國，但基本上仍未脫離日語文化圈。（據推定，終戰前夜的台灣日語普及率，幾乎達70%）換句話說，當時的台灣社會仍是日本社會的一部份。也因此，除非通曉日語和日本文化，否則無法在台灣從事文化工作。在台灣實施所謂的「心理建設」、「心理改造」，無非是將經日語和日本文化育成的台灣人的認同，重新改為以中國話和中國文化來達成。許壽裳被期待的重任即在此。

據日記所載，許壽裳是在對於編譯館的工作內容和陳儀等人幾次書信往返，以及和親友們商量後，作了去台灣履職的決定。但是，許壽裳下決心的另一個動機，據女兒世瑋女士的說法，1946年初夏，許壽裳覺得南京的政治氣氛不合他意，而告訴家人他要應陳儀之邀赴台就任編譯館館長。當時台灣的狀況比較起來算安定，所以認為可實現長年以來想寫魯迅傳和蔡元培傳的心願，是他決定赴台的主要理由。（許世瑋〈憶先父許壽裳〉《魯迅研究資料》14,1884收錄）。的確，這個願望是魯迅歿後，許壽裳長年所想，從1940年10月19日的日記即可得知：

魯迅逝世已四周年，追念故人，彌深愴慟，其學問文章，氣節德行，吾無間然，其知我之深，愛我之切，並世亦無第二人，曩年匆促間成其年譜，過於簡略，不慊於懷，思為作傳，則又苦於無暇，其全集又不在行篋，未能著手，只好俟諸異日耳。

此外，1943年也曾被催促寫魯迅傳（2月23日記）。

到了台灣的許壽裳，投注心力進行有關魯迅的著述活動，對於在台灣傳播魯迅思想居功厥偉。並將此和作為編譯館要務的台灣新文化建設——「心理建設」，做了有機性的結合。

身為台灣省編譯館館長，許壽裳為使業務上軌道而辛苦備嘗，這在日記裏隨處可見。詳細情形另文敘述（黃英哲〈許壽裳在台灣的足跡——戰後台灣文化政策的挫折——上、下〉《東亞》291、292，1991.9.10，霞山會），在此不予重覆。日記顯示，許壽裳赴任不到十天即打電報給李霽野，另外不到一個月，又考慮到為了作台灣的研究，必須在日本學者返國前著手共同作業。台灣編譯館設有四組：（一）學校教材組、（二）社會讀物組、（三）名著編譯組、（四）台灣研究組，各組所屬人員分別是：袁珂（聖時）（第一組）、李霽野（第三組）、台灣籍的學者楊雲萍（第四組），李霽野和楊雲萍成為主任。李霽野是魯迅發起的未名社的主要會員，袁珂則是華西協合大學時代許壽裳的學生。許壽裳時常和陳儀或其秘書見面，關於館的營運、設備、經費、人事、出版等事項，交換意見，獲得支援推展工作。10月初，李霽野抵台，12月李何林也赴台。同年10月，許壽裳設宴款待台灣研究組的日本成員淺井惠倫、國分直一、立石鐵臣、池田敏雄等人。眼見主要人員都已到齊正待施展業務，卻實際千頭萬緒。1946年10月25日，許壽裳在給陳儀的信裏這麼寫著：

夜作上公洽私函，力陳種種困難：（一）本館館舍、（二）職員宿舍、（三）宿舍傢具、（四）交通車及小汽車、（五）宴會請柬。請其婉告主管人員，對於本館工作之特殊性質加以認識，本館事務現狀之特別困難加以瞭解，切弗漠視。

另外，日記也紀錄了許壽裳在事務方面，和新教科書的編輯委員會及教育關係者舉行座談會，說明台灣省編譯館的方針等情形。

然而，苦心經營且已上軌道的台灣省編譯館的工作，卻在1947年，群



眾因不滿戰後施政而爆發 2.28 事件後，受挫以致停頓。

事件發生後，許壽裳到台灣省編譯館辦公的情形，最初記在日記裏是 3 月 12 日，但是翌日下午發燒到 38 度，連續幾天身體不適。28 日，兩名館員被警備總司令部逮捕，許壽裳爲了其中一個釋放較慢的館員，去見陳儀，要求妥善處理，4 月 7 日，這名館員終獲釋放。四月，社會讀物組編輯的《光復文庫》出版了幾本，可知其絕對不是在事件之後才編輯的。還有，4 月 8 日，行政長官公署轉達給許壽裳編輯一千種國民文庫的計劃，也因後來公署、編譯館的廢止而不得不使工作停頓。

4 月 22 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遭廢止，改組省政府，陳儀下台，由魏道明接任台灣省主席。24 日，許壽裳向陳儀提出辭呈，陳儀雖未接受，但結果如同去職。5 月 11 日，陳儀離台，許壽裳赴松山機場送行。5 月 15 日，魏道明抵台，17 日，許壽裳從報紙得知前一日 16 日在省政府會議中已決定廢止台灣省編譯館，這是無視館長存在的一項決定。5 月 17 日的日記許壽裳如此寫著：

新生報及省政府公報，載編譯館經昨日第一次政務會議議決撤銷，事前毫無聞知，可怪。在我個人從此得卸仔肩，是可感謝的；在全館是一個文化事業機關，驟然撤廢，於臺灣文化不能不說是損失。

更進一步，在台灣省編譯館歸劃給教育廳的翌日，即來台一年後的 6 月 25 日的日記裏，如此記著被政情的變化播弄功虧一簣一年來的辛勞：

來台整整一年矣，籌備館事，初以房屋狹窄，內地交通阻滯，邇者遲遲始到，工作難以展開。迨今年一月始得各項開始，而即有二二八之難，停頓一月，而五月十六即受省務會議議決裁撤，如此匆遽，莫解其由，使我表見未遑，曷勝悲憤！館中工作專案移交者近三十件，現款專案移交者百五十餘萬。知我罪我，一切聽之。

事態演變至此也許已經早就預料到吧！陳儀剛離台之後，曾試探許壽裳的台灣大學寄來教授兼中國文學系主任的聘書。據臺大同學會的《會員名簿》（民國三十六〈1947〉年八月一日）記載，任職國立台灣大學的校長、教務長、訓導長、及農學院、工學院院長、熱帶醫學研究所所長等，都出身浙江省。寄出聘書，可說出自牽掛許壽裳安危，校長陸志鴻和中國文學系教授臺靜農等人的關心。許壽裳自從在西北聯合大學和陳立夫發生

衝突，短時間在中山大學任教以來，就不曾在教育部管轄下的公立大學執教，而且據聞戰後，陳儀曾力薦他做台灣大學校長，也因遭教育部反對而未實現（1945年12月27日的日記，可見和此有關的記事）。此次，C.C.派可能未向陸志鴻轉達意向。

據日記記載，許壽裳7月開始在台灣大學工作，很快的就參與入學考試的計分和判定等業務，許壽裳在自己被台灣大學聘請後，立刻為曾在台灣省編譯館攜手共事的同事們奔走覓事，從6月到8月先後聘請國分直一（史學系副教授）、立石鐵臣（同系講師）、李齊野（共同科教授）、李何林（中國文學系副教授）、楊雲萍（史學系教授）等人，到台灣大學任教。

1948年2月18日深夜（或19日凌晨），許壽裳在大學宿舍遭人殺害，結束65歲的生涯。根據《台灣新生報》（1948年2月23日）所登載警務處的公開發表，是因為原台灣省編譯館工友高萬俤，潛入許壽裳宅偷竊，遭發現而行兇。《台灣新生報》的標題如此寫道：「許壽裳教授被殺案，兇手就擒真相大白，殺人犯是前工友高萬俤，警務人員全體出動三日半破案」。許壽裳被殺的2月，大學和宿舍遭竊。而在「三日半」之間，有關他的親友受到難以理解的調查一事，許世瑋女士在其文章中曾提及（許世瑋〈讀李陳關於我父親許壽裳在台被殺是政治性暗殺二文後〉原載《觀察》半月刊第6卷第12期，1950年4月16日《魯迅研究資料》14收錄，1984）。閱讀這篇文章和《觀察》（《同上》14收錄）中李何林、陳醒民的文章（李何林〈提供許壽裳先生兩年前在台被殺是政治性暗殺的種種事實〉、陳醒民〈許壽裳案的審判人對於李何林文的補充〉）之後得悉，許壽裳的死令人匪夷所思之處甚多。而許壽裳的死被認為是國民黨（C.C.派）的政治暗殺也不是沒有理由的。總之，他的死留下很多謎點。

那晚，許壽裳寫完日記後就寢的吧？2月18日簡短的記事成為最後，突然地，許壽裳日記中止。

#### 四

現在，我們研究魯迅時，許壽裳所寫有關魯迅的文章，無疑提供了我

們第一手資料。根據日記獲知，許壽裳大半的著述，實際上都是在台灣，任職台灣省編譯館時所寫。在此值得一書。因為戰後台灣的生活，對許壽裳而言，和在此之前的戰時流亡生活相比，儘管可以說有穩定的一面，但也不可否認，許壽裳視為己任的台灣新文化之建設，委實是根植於魯迅的精神之上。

結集了許壽裳所寫有關魯迅文章的單行本有三種：《魯迅的思想與生活》（楊雲萍編，1947年6月，台北，台灣文化協進會）、《我所認識的魯迅》（王士菁編，1952年6月，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亡友魯迅印象記》（1947年10月，上海，峨嵋出版社）。前兩本因各自收錄了許壽裳散見各處的文章集輯成冊，所以同一標題的文章重覆收錄了不少，但字句的表現可看出有不一樣的部份。我們認為，許壽裳歿後出版的《我所認識的魯迅》裏的若干篇文章，不知何種理由被作者以外的人修改過。《亡友魯迅印象記》是應許廣平之託，來台時，每章分數回寫共二十五篇，在上海經許廣平奔走斡旋後出版了單行本。其他，還有幾篇沒收錄在單行本的文章。

以下是根據日記、關係資料，製成的有關許壽裳寫魯迅的著述活動一覽表。

## 許壽裳 魯迅關係著作一覽表（稿）

### 凡例

《魯迅的思想與生活》 略號→A

《我所認識的魯迅》（52, 53, 78， 略號→B — 52, 53, 78)

《亡友魯迅印象記》 略號→C

沒看到原載刊物（書）的文章 →未見

原載刊物完全不明，以及參考資料雖明記了原載刊物，但需調查是否確屬該刊物者→不明。

資料所記原載刊物的發行年月日，在無法依據該刊物核對時，發行年月日不予記入。

西曆則以後兩位數字記入。

年 月 日	文 章 題 名	原載誌(書)	收錄書
36.10.19	(魯迅逝世)		
10.27	〈我所認識的魯迅〉	《新苗》(北平)第11期 36.11	B-52, 53, 78, 《魯迅先生紀念集》(上海) 37.10 文化生活出版社
11.8	〈懷亡友魯迅〉	《新苗》第11期 36.11	A, B-52, 53, 78, 《魯迅先生紀念集》《月報》37.1 (開明書店) -未見
12.7	〈魯迅的生活〉	《新苗》第13,14期 37.12	《工作與學習叢刊之一》〈二三事〉37.3 生活書店 《魯迅研究》37.6 生活書店 A, 蕭紅《回憶魯迅先生》41 (重慶) B-78
12.19	〈懷舊〉	《新苗》第13期 37.1 -未見	B-52, 53, 78, 《魯迅先生紀念集》
37.3.18	〈魯迅古詩文的一斑〉	《新苗》第16期 37.4 -未見	《許壽裳文錄》86.9 湖南人民出版社
5.24	〈魯迅先生年譜〉	《大魯迅全集》第七卷 36.6 改造社 (日本·東京) 《魯迅先生紀念集》	《宇宙風乙刊》27期 40.8 王冶秋《民元前的魯迅先生》47
42.3.12	〈魯迅在杭州任教時的生活〉	不明	不明
4.14	〈王冶秋『民元前的魯迅先生』序〉	王冶秋《民元前的魯迅先生》峨嵋出版社(上海) 43.4	A, B-52, 53, 78
7.8	〈周樹人略傳〉	教育部《中國教育全書》-未見	無

年 月 日	文 章 題 名	原載誌（書）	收錄書
10.17	〈關於兄弟〉	《文壇》2卷1期 （重慶）43.4 -未見	A, B-52, 53, 78
44.5.4	柳非杞編 〈魯迅舊體詩集 〉序·跋	《新華日報》 （重慶）44.5.14 （題名〈《魯迅詩集 〉序〉）-未見 《雲南晚報》 （昆明）44.7.30 （題名〈跋尹默手寫 『魯迅先詩鈔』〉） -未見	A, B-52, 53, 78
10.18	〈回憶魯迅〉	《新華日報》 （重慶）44.10.25 -未見	B-52, 53, 78
45.10.25	〈魯迅的幾封信 〉	《新華日報》 （重慶）45.10.19 -未見	B-53, 78
10.18	〈魯迅與民族性 研究〉	《民主週刊》第一卷 第二期（昆明） 46.1.15 -未見	B-52, 58, 78
46.5.18	〈亡友魯迅印象 記〉（三則起稿 ）	一、二章《民主週刊》 第35期46.6.15、 三章《民主週刊》 第36期	C
46.5.24	〈亡友魯迅印象 記〉（十葉請許 廣平送付）	四、五章《民主週刊》 第37期	C
6.8	〈亡友魯迅印象 記〉（十一葉請 許廣平送付）	六、七章《民主週刊》 第38期46.7.6	C

年 月 日	文 章 題 名	原載誌(書)	收錄書
6.25	(許壽裳抵台北)		
9.23	〈亡友魯迅印象記〉(八、九章寄許廣平)	八、九章《民主週刊》第51, 52期合併號46.10.10及《人世間》第四期(上海)47.6.12	C
9.26	〈亡友魯迅印象記〉(十章寄許廣平)	《人世間》第四期47.6.12	C
9.30	〈魯迅的精神〉	《台灣文化》(台北)第1卷第2期46.11	A, B-52, 53, 78
10.?	〈魯迅的德行〉	《僑聲報》(上海)46.10.14	A, B-78
10.6	〈亡友魯迅印象記〉(十一、十二章寄許廣平)	十一章《人世間》第四期 十二章《人世間》第五期47.7.20	C
10.14	〈魯迅和青年〉	《和平日報》(台中)46.10.19	A, B-53, 78
10.15	〈亡友魯迅印象記〉(十三、十四章寄許廣平)	十三、十四章《人世間》第五期	C
10.29	〈魯迅的人格和思想〉	《台灣文化》第2卷第1期47.1	A, B-52, 53, 78
12.25	〈亡友魯迅印象記〉		C
12.26	〈亡友魯迅印象記〉		C
47.3.26	〈臺靜農藏『魯迅講演稿手跡——娜拉走後怎樣』跋〉	無	無
5.4	〈『魯迅的思想與生活』自序〉	無	A, B-78

年 月 日	文 章 題 名	原載誌（書）	收錄書
5.26	〈亡友魯迅印象記〉（脫稿十五～二十五章寄許廣平）	十五、十六、十七章 《人世間》第六期 47.8.20 十八、十九、二〇章 《人世間》第二卷 第二期 47.10.1 二十三章《台灣文化》 第2卷第5期 47.8	C
6.?	《魯迅的思想與生活》出版		
7.28	〈魯迅的避難生活〉	《時與文》第二卷 第六期（上海） 47.10.17 及《文藝 復興》第四卷第二期 47.11.1 - 未見	B-52, 53, 78
9.30	〈魯迅的遊戲文章〉	《台灣文化》第二卷 第八期 47.11	B-52, 53, 78
10.19	《亡友魯迅印象記》出版		
48.2.18	《遇害於台灣大學宿舍》		
52.6	《我所認識的魯迅》第一版出版		
53.4	《我所認識的魯迅》第二版出版		
78.6	《我所認識的魯迅》第三版出版		

〔參考文獻：《許壽裳日記》、許世瑛〈先君許壽裳年譜〉（《魯迅研究資料》22, 89 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編）、許壽裳《魯迅的思想與生活》（47 台灣文化協進會）、同《亡友魯迅印象記》（47 峨嵋出版社）、同《我所認識的魯迅》（52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王冶秋《辛亥革命前的魯迅先生》（56 新文藝出版社）、沈鵬年輯《魯迅研究資料編目》（58 上海文藝出版社）、林辰編《許壽裳文錄》（86 湖南人民出版社）、魯迅紀念委員會編《魯迅紀念集》（36 文化生活出版社）、袁良駿《魯迅研究史上卷》（86 陝西人民出版社）、許壽裳《我所認識的魯迅》（53 人民文學出版社）、許壽裳《我所認識的魯迅》（78 人民文學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魯迅研究室編《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匯編1-5》（86 中國文籍出版公司）。

從上表可以瞭解移住台灣的許壽裳，在不滿兩年的時間寫的文章超過以前的十年。《魯迅的思想與生活》一書的約一半，《我所認識的魯迅》的約三分之一，《亡友魯迅印象記》的三分之二以上，都是在台灣時寫的。他所留下的這些著述，或許可說是他一直想寫的魯迅傳之前的結晶。

許壽裳到台灣赴任那年，正是魯迅去世十週年。許壽裳履職的約一個月以前的5月20日，《中華日報》（台南）的文藝欄〈文藝〉的〈名作巡禮〉欄，刊登了R（龍瑛宗的筆名）的〈阿Q正傳〉（日文）。在此之前，談及魯迅作品的報導很少。魯迅忌日的10月19日，《中華日報》登載了龍瑛宗的〈中國近代文學的始祖——在魯迅逝世十週年紀念日——〉（日文），以及楊遠的近代詩〈紀念魯迅〉（日文）。《和平日報》（台中）的文藝欄〈新世紀〉第68期也刊載了幾篇紀念魯迅的文章，許壽裳的〈魯迅和青年〉登在首頁，這是台灣初次公開刊登他寫魯迅的文章。11月1日，台灣文化協進會的機關誌《台灣文化》第1卷第2期推出〈魯迅逝世十週年特輯〉，這是在戰後的台灣初次綜合性的介紹魯迅，也是當時的新聞雜誌中唯一以魯迅為題製作的特輯。許壽裳應台灣協進會之邀，寫了〈魯迅精神〉一文。11月4日，《台灣新生報》（台北）的文藝欄〈新地〉第49、50期，刊載了紀念魯迅雷石榆的詩和朱嘯秋、周青等人的文章。在《台灣文化》的〈後記〉中，如此寫著：「本省在日本人統治下時，我們無法公然追悼魯迅，去年忙於慶賀台灣光復，很少人想到魯迅的忌日，而今年我們公開紀念魯迅。可說是光復後第一次！」許壽裳在台灣介紹魯迅的精神，正趕上「第一次」。

許壽裳在這兩篇文章中敘述了魯迅的思想和精神。他談到，魯迅生前稱讚台灣的青年們支援中國的革命，並且渴望台灣發起革命，特別是，許壽裳強調，魯迅認定革命是改造民族性的必要條件；此外，「抗戰」可說貫穿了魯迅一生的精神，魯迅作品表現的即是此「戰鬥精神」。他再強調，這是為了民眾的戰鬥，是有計劃性的韌性十足的戰鬥。許壽裳和魯迅在弘文學院就讀時，就常談到改造民族性的問題，兩人對此深富同感，關於此點，許壽裳在回憶魯迅時再三提及。兩人都共同認識到：中國民族性最欠缺的是「誠與愛」，這病根在「兩次奴於異族，唯一的救濟方法是革命」。（詳見北岡正子〈另一個國民性議論——給魯迅，許壽裳的國民性議論的影響〉《關西大學，中國文學紀要》第十號，1989.3）這種論點作為許壽裳的思想持續到戰時戰後的事實，可在1945年8月15日的日記裏寫的兩首詩尋獲。而在台灣發表的那些文章的精神亦根基於此。對初履方解脫日本長期統治的台灣的許壽裳而言，其文化重建的緊急課題，是改造被日本文



化同化的台灣，以及改造抗戰勝利後中國人的民族性，兩者關係密切。許壽裳透過談魯迅的思想，而陳述改造民族性問題的重要性，這同時也是許壽裳自身的思想宣言。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雜誌《台灣文化》是台灣協進會標榜其為〈綜合文化雜誌〉所發行的會刊。台灣文化協進會以「宣揚三民主義，傳播民主思想，改造台灣文化，普及國語國文」為宗旨，並「聯合了台灣對文化教育有熱忱的同志、團體」而成立（〈台灣文化協進會章程〉《台灣文化》一卷一期，1946年9月），站在協助政府的立場，等於是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外圍團體。許壽裳任館長的台灣省編譯館的份內工作，原是編輯提昇台灣學生國語能力的教科書。但是，台灣文化的重建，亦即將中國文化移植到台灣，只靠透過學校教育和教科書推行國語並不足以達成，而藉社會文化團體作社會教育，及其中心的精神支柱是有必要的。1946年6、7月相繼成立的台灣文化協進會和台灣省編譯館，雙雙承擔了由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構想的推進台灣文化重建政策。《台灣文化》的〈魯迅逝世十週年特輯〉的〈後記〉表示，許壽裳是最了解魯迅的人，他的文章充份表現了「偉大的導師」魯迅的精神；此外，並以「我們相信這一本〈紀念魯迅特輯〉對於台灣文化的貢獻的一定不少」終結。至此，接受魯迅精神為戰後台灣的新文化支柱，及視許壽裳為理解魯迅第一人的事實，不語自明。許壽裳傾其所能積極協助，以後也時常投稿給《台灣文化》。他以將魯迅也曾扮演要角的中國新文化運動帶到台灣為目標而持續實踐有關魯迅的著述活動。終於，包括移居台灣後許壽裳所寫的有關魯迅的文章，由曾任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參議、台灣省編譯館台灣研究組主任、台灣文化協進會理事，後來和許壽裳一同成為台灣大學教授的楊雲萍整理成冊，1947年6月以《魯迅的思想與生活》為題，交給台灣文化協進會出版，此時正是台灣編譯館決定廢止，整理殘餘業務之際。1947年6月19日的日記寫著：《魯迅的思想與生活》一冊知已出版。

《亡友魯迅印象記》誕生的經緯，亦可從日記得知。許壽裳於1946年4月18日收到許廣平寄來要他為魯迅逝世十年寫回顧文的信。許壽裳手邊的魯迅著作似乎並不齊全，借來《吶喊》、《墳》、《集外集》寫完前三章，是邀稿後一個月。此後又以一面借來《魯迅全集》，一面催促兒子寄

來魯迅的信函而完成第七章。第八章以後，是在台灣寫的。我們認為，許壽裳抵台時，台灣還沒有《魯迅全集》。許壽裳托人從中國買進《魯迅全集》時是八月下旬，寫完八、九章已是九月下旬。這就是他到台灣後最初完成的有關魯迅的文章。到這一年十二月為止，他繼續執筆包括《亡友魯迅印象記》在內的文章。此時，適值必須使台灣省編譯館的工作步向正軌的繁忙期。

翌年1947年，有關《亡友魯迅印象記》的執筆，只在5月26日的日記寫著，將十五到二十五章全部稿件交給許廣平，這些原稿可能是從1946年年底寫的。根據日記，準備開始寫終章〈病死〉，可能是1947年4月初之時，4月2日記有「信王冶秋託鈔許季上輓魯迅詩」，王冶秋的回信於4月10日寄到。許壽裳喜歡許丹的輓詩「哭周豫才兄」。讀了《魯迅先生紀念集》，許壽裳將那首詩的附註連同詩，抄寫在1942年4月3日的日記裏。抄下的附註是：「自魯迅逝世後，各方紀念文字看得不少，個人覺得許季上先生的一首輓詩，最足以顯示魯迅的真精神，附錄於此，以申同契」。想將這首詩寫進終章，但可能是手邊沒有《魯迅先生紀念集》，所以委託王冶秋抄寫。另外，在引用這個附註之前，有「今紀念集內季上誤作季市，急應更正者」的字樣，看得出許壽裳因被錯認為己而顯得慌張的模樣。發生2.28事件，台灣省編譯館工作的受挫、陳儀下台、台灣省編譯館被廢止的多事之秋時期，也正是許壽裳著手執筆《亡友魯迅印象記》後半部之際。

根據李何林的回想（前述書），針對許壽裳所寫有關魯迅的文章，以「警備司令部參謀長」和「三民主義青年團台灣支團部主任委員」為發行人出版的雜誌等，曾予以譴責攻擊。確實，其中，由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任發行人的雜誌《正氣》（第一卷第二冊，46.11.1發行），所揭載的遊客〈中華民族之魂！〉則已然不僅是批評，而是對準許壽裳和魯迅作出髒話侮辱和攻擊的文章了。相對於此，許壽裳回以：「反而使《亡友魯迅印象記》提早完成！」由於他所描寫魯迅在上海十年奮戰情形的文章，揭發了國民黨反動派過去的罪惡，所以引起他們的不悅。這一章收錄是在後半的二十一、二十二章。《亡友魯迅印象記》在許廣平的奔走下，終於在1947年10月19日出版了單行本，比魯迅逝世十週年晚了一年，這

一年發生在台灣的事件，幾乎都是改變許壽裳命運的重大事情。《亡友魯迅印象記》出版後，除了9月底寫的〈魯迅的遊戲文章〉以外，他就沒再寫有關魯迅的東西了。

和台灣的新文化建設不可分的魯迅精神之接納，擴及至從大陸購入《魯迅全集》和出版了魯迅作品的注解書。1947年1月13日的《國聲報》（高雄）載：「再版《魯迅全集》最近運到一批」的新聞裏，報導了為紀念魯迅逝世十週年再版的《魯迅全集》全二十卷，最近寄達台灣省，同文並表示，《魯迅全集》或將成為台灣重要的學術指針。事實顯示，中文版的《魯迅全集》最遲至1947年初即已進到台灣，更進一步，於1947、8年，以不懂中國話的台灣人為對象，先後出版了如下幾種附注解、日語對譯的魯迅作品：

楊遠譯『阿Q正傳』（47.1 東華書局）

王禹農譯『狂人日記』（47.1 標準國語通信學會）

藍明谷譯『故鄉』（47.8 現代文學研究會）

王禹農譯註『孔乙己·頭髮的故事』（48.1 東方出版社）

王禹農譯註『藥』（48.1 東方出版社）

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原只限少數知識份子的魯迅讀者，就這樣逐漸擴散至各階層。魯迅之被接納，許壽裳著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許壽裳想把被國民黨敵視的魯迅之戰鬥精神在台灣發揚光大，本身就是一種伴隨著危險的工作，而他得以在戰後初期的台灣如此帶動了魯迅思想的傳播，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長官陳儀的庇護不容忽視。陳儀回大陸，許壽裳離開台灣省編譯館，之後，許壽裳只寫了兩篇有關魯迅的文章，這是否透露著什麼？

有關許壽裳的死，前面曾述及許世瑋女士和李何林認為是出自國民黨的政治暗殺，這也說明了實因許壽裳在台灣大大宣揚魯迅精神，卻暗地裏批判國民黨法西斯統治的關係。如此看來，《亡友魯迅印象記》可說是許壽裳的遺書吧？長年牽繫的魯迅傳終究沒能完成，但藉著談魯迅，賭命表現自己思想的這本書，竟巧合的成為兩人友情的證明。

不久，曾在許壽裳身邊一起工作的李何林、李霽野相繼返回中國大陸，直到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為止，最後留下來的臺靜農也對魯迅三緘其口

埋首學究生活。此後，在台灣展開嚴厲的魯迅批判，魯迅的作品成爲地下文學。台灣再度展開魯迅研究，是最近的事情。

## 五

在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學文獻センター刊行《許壽裳日記》（自1940年8月1日至1948年2月18日），除了極少部份（1946年6月25日、7月13日、12月1日、1947年1月11日、3月1日、3月29日、5月17日、5月20日、6月25日、11月24日、1948年2月4日、2月5日、2月9日、2月10日、2月13日、2月14日、2月18日）曾摘錄於《台灣文化——悼念許壽裳先生特輯》（第三卷四期，48.5）以外，其餘都是第一次公開。

說起來，這是當初並無公開意圖的每日生活記錄的累積，然而，整體看來，卻意外地凸顯出一個知識份子在其後半生，戰前與戰後，在文化性歷史迥異的中國與台灣，遭遇非常時期，並且，面對無法迴避的困境挺身持續應戰的誠實姿態。

日記翔實記錄了：在戰時大後方的抗日，與國民黨勢力的抗爭，波及生活的戰爭實態，以及在戰後台灣實施文化重建政策及挫折的經緯。

青年時代讓許壽裳吸收了各種知識，其中包括侵略他祖國的日本文化。他祈願日本敗北並慶賀戰勝。但是，留學時代習得的日語和日本文化，是日後促使他到台灣的因素。讀日記，令人想像，他的日本經驗，也許是複雜地使他受到傷害，而且導引他走向人生最後方向的肇因。

時至今日，透過其所著魯迅的回憶錄，許壽裳以魯迅代言人之姿，仍讓我們覺得親切；但是，讀了日記，明白執筆時的狀況後，可看出其實也是表白作者自身的另一個故事。並能從中知曉，在弘文學院和魯迅一同憂心中國民族欠缺的品德——誠與愛，也同時是許壽裳生涯所盼，希望自身體現的美德。

許壽裳在台灣從事新文化建設，及傳播魯迅思想是表裏一致的事業。這事業一方面是許壽裳有意識地進行的工作，藉涵養此種品德，得以恢復因日本侵略而失去的民族性，但是，另一方面也幫助了中國當局在台灣推

展「中國文化本位主義」政策。許壽裳在戰後台灣寫的日記，也可以看做此一文化本位主義政策實行及挫折過程的記錄。

日記也可說是，在中國和台灣和日本的異文化摩擦的三角形之中，一面守著「誠與愛」的一個知日派知識份子所走過的痕跡。

以上敘述的，並沒有完全觸及日記的全貌。從今天的研究來看，把它當作歷史資料、社會文化資料、經濟資料、文學資料、傳記資料或氣象資料等等，也都具有令人矚目的豐富內容。而這端視讀者抱持的關心和問題而定。

---

## 菲律賓華僑義山碑文的史料價值

吳 文 煥\*

菲律賓華人雖然源自中國這個文明古國，也動輒以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化為榮，但在實際上卻遠非一個重視文化的族群。其表現之一，就是對自己的史料不予重視。而這一點不但表現在不懂得也不注意保存和整理史料上，而且反映在大量有關菲律賓華人的史料的失散之上——其中有不少史料竟是被當作廢物扔掉毀掉的。這種情形，不能不為菲華歷史的研究工作，特別是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造成極大的困難。研究菲律賓華人史的學者莫不為史料之難找而興嘆。經驗告訴人們，在現在還健在的華人之間，包括許多華人社團，是很難找到什麼現成的史料的。在這樣的情況下，要找華人的史料，也就只好去找「死人」，去找他們的墓碑了。

墓碑，更確切地說是碑上的文字，即碑文，一向是十分珍貴的史料，特別是那些年代較久遠的。從1992年下半年至今，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和菲律賓國史館及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合作，在蔣經國基金

---

\* 菲律賓世界日報主筆，菲華史家

會贊助下，組成菲律賓華人史料基礎與調查與蒐集計畫，菲律賓全國展開的搜集華人史料的工作中，其中主要組成部份之一，就是拍攝各地華僑義山的華人墓碑。

我們前後用大約半年的時間，從馬尼拉的華僑義山開始，拍攝了全非各地包括宿務、怡朗、納卯、依里岸、加牙鄺黎奧洛、三寶顏、古達描島、蘇洛、獨魯萬、甲萬那端、描東岸、朗嗎倪地、亞巴里、甲美地、株藝牙佬、仙答洛、羅申那、黎牙實備、那牙（部份）、紅奚禮示（部份）、描戈律、武端等二十個華僑義山的華人墓碑。全部計用了九百二十七卷膠卷。按每個膠卷至少三十六張（有的不止，特別是那些一張同時拍有數個墓碑者）計，我們這次在全非各地華僑義山所拍攝的華人墓碑，至少當有三萬三千三百七十二個。其工程不可謂不浩繁。

必須指出的是，儘管我們所拍攝的華人墓碑的數目已那麼多，這項的工作距完成還有一段距離。這是由於：

- (1)並不是所有有華人居住的社鎮或城市（鄉村就更不用說了）都建有華僑義山。在沒有華僑義山地方，華人一般就安葬在教會或政府的墓地，和當地人混葬在同一個墓地；
- (2)即使在有華僑義山的社鎮或城市，特別是大岷區，也不是所有的華人都安葬在華僑義山。在大岷，現在已有越來越多的華人安葬在西式的紀念墓園；
- (3)由於年代久遠，風雨侵蝕失修，有一些華人墓碑或損毀遺失，或已字跡模糊，全不可讀；
- (4)華僑義山建立前在菲逝世安葬的華人的墓碑，絕大部份已不復存在。仙查安那教堂、王城八連門還有聖大所展示的十八、十九世紀的菲律賓華人華文墓碑，當是至今所僅存的一些殘片。

儘管有如此的局限性和不足之處，這次搜集華人墓碑的工作在菲律賓可以說是空前的，可能也是絕後的。這些資料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和可靠性，極其寶貴。

如果說搜集這種墓碑史料的工程已是浩繁的話，那麼整理這些史料的工作應當說也是同樣浩繁的。

至本文截稿時為止，已輸入電腦的墓碑計一萬一千八百五十個。按照

我們所輸入的程序，電腦可自行為我們整理出（包括打印出）按籍貫、姓氏、生卒年份分類的各種材類。這項輸進電腦的工作不但將會也有需要繼續進行下去。在這裡，我們權且僅就已輸進電腦的這一萬一千多個墓碑的資料，按籍貫和按姓氏分類來為大家作一個報告和分析。

在這一萬一千八百五十個墓碑中，有註明籍貫或所註明籍貫尚可讀的只有九千一百三十六個。在這九千一百三十六個墓碑中，屬福建省的計八千二百八十四個，佔總數的 90.67%，而廣東省的計八百零九個，佔 8.86%。此外，尚有一些中國其他省份的，其情況如下：

山東	4
台灣	2
（金門）	21
安徽	4
江西	1
江蘇	2
廣西（桂林）	1
浙江	4
湖北	1
湖南	1
遼東	1

有趣的是，其中有一個竟是非律濱籍的。

以上情況表明，菲律賓的華人中，除福建人和廣東人之外，至少還有來自中國其他十個省份的華人。

籍貫屬福建的八千二百八十四個墓碑，範圍包括至少四十四個縣城或村莊，其中人數較多的縣和市計有。

晉江	5,689	68.67%
南安	1,230	14.85%
惠安	259	3.13%
廈門	162	1.95%
龍溪	161	1.95%
思明	110	1.32%
泉州	94	1.13%
同安	91	1.10%
安溪	60	0.72%
石獅	56	0.67%
永春	44	0.53%

必須說明的是，籍貫註明是福建的墓碑，有八十三個沒有更進一步寫明，只籠統的稱為福建。

籍貫屬廣東人的，在八百零九個墓碑中，只有二十二個寫明所屬之縣，七百八十七個只寫說是廣東人。而這二十二個墓碑，僅提到四個縣，即：

台山	15
開平	4
中山	2
汕頭	1

從以上介紹的情況，現在我們也許可以較有根據和把握地說，在菲律賓的華人中，福建人佔百分之九十，廣東人不到百分之十，約百分之九。

而在眾多的福建人之中，來自晉江縣的最多，佔 68.67%，約七成；其次是南安人，佔 14.85%，或約一成五。

下面再介紹按姓氏分類的情況：

在已輸進電腦的一萬一千八百五十個墓碑中，因為有近千個只有英文姓名，且有一部份因已被損而不可讀，所輸入華文姓名實只九千三百五十三個。各姓氏人數及其所佔總數的百分比如下：



陳	921	9.85%	蔡	828	8.85%
施	734	7.85%	吳	581	6.21%
黃	563	6.02%	林	556	5.94%
王	522	5.58%	李	507	5.42%
許	481	5.14%	楊	375	4.01%
洪	352	3.76%	莊	307	3.28%

這十二個姓氏，可以說是菲華社會的大姓，每一百人中，有三人以上是姓這些姓的，其中前九個姓氏，更多達五至十人左右。

隨後的十七個姓氏，每百人中約有一至兩個。

張	177	1.89%	劉	148	1.58%
曾	133	1.42%	蘇	126	1.35%
鄭	125	1.34%	郭	122	1.30%
柯	110	1.18%	梁	94	1.01%
葉	85	0.91%	高	82	0.88%
伍	82	0.88%	顏	78	0.84%
邱	77	0.82%	翁	14	0.15%
紀	13	0.14%	沈	13	0.14%
留	13	0.14%	甄	12	0.13%
馬	12	0.13%	關	12	0.13%
賴	11	0.12%	譚	10	0.11%
徐	10	0.11%	江	9	0.10%
汪	8	0.09%	阮	8	0.09%
魏	8	0.09%	馮	7	0.07%
倪	7	0.07%	鍾	6	0.06%
歐陽	6	0.06%	范	4	0.04%
金	4	0.04%	丘	3	0.03%
湯	3	0.03%	田	2	0.02%
萬	1	0.01%			

必須指出，以上關於姓氏分類統計，隨著輸進電腦的墓碑資料的增加及全部輸入工作的完成，是可能出現一些變化的，特別是在那些比例較小，較不常見或罕見的姓氏中。但總的趨勢和情況看來基本上不會有太大的變化。在那些大姓和常見姓中，會發生變化的可能是比例比較接近的姓氏，可能在所佔比例或比例大小的順序方面出現一點變化。

以上的介紹和分析表明，華人墓碑對了解和研究菲律賓華人的情況是極有價值且可靠的史料。即使它具有我們在前面分析過的局限制，佔有這樣的材料和進行這樣的分析和研究，在菲律賓華人史的研究上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這些「死人」材料，甚至是我們研究菲律賓華人的籍貫和姓氏唯一可依靠的材料。這樣的材料和數據，我們在活人之間是難以找到的。

還必須指出和解釋的是，我們前面所作的分析和研究，所根據的只是已輸入電腦的一萬一千多個或我們所拍攝的三萬三千多個墓碑的三分之一。因此，隨著輸進電腦工作的完成，亦即根據這三萬三千多個墓碑的資料再重新分類整理一下，無論在籍貫或姓氏方面，肯定會有一些變化。但是，根據統計學或然率的原理，我們在前面根據三分之一或一萬一千多個墓碑的資料分析和研究得出一些結論，還是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根據的。它所反映出之大致趨勢相信不致會有太大的偏差的，因而是相當可信及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的。

儘管如此，我們認為，雖然這項搜集菲華史料的工程時下已暫告一個段落，也可得出一些結論和成果來，把這三萬三千多個華人墓碑的資料全數輸進電腦的工作無論如何應繼續下去，加以完成。這不但是使我們的分析和研究更充實、更有根據、更可靠、更全面的需要，而且是我們把全部墓碑的碑文資料加以整理打印，作出完整的書面報告的需要。

應順便指出的是，無論是從膠卷正片抄寫這些墓碑的碑文資料或把這些資料輸進電腦，及由電腦整理分類加以打印的工作，都是十分費勁、費時，需要耐心及細緻的苦差。不但人吃不消，連電腦都不大吃得消。

還應當補充的是，這些菲律賓華僑義山的華文碑文資料，無疑還有其他各種人文社會學的研究價值。例如華人人口在各個時期性別的比例之變化，壽命長短的變化。還有，如果全部碑文資料輸入電腦的工作告完成後，

全菲各地華人聚居地的籍貫及姓氏比例，無疑也可根據電腦程序的分類整理出來。到時，諸如宿務的所謂吳天吳地，納卯的洪天戴地這樣的說法，不但可得到統計數據的支持和佐證，而且可得到在量的方面較準確的概念。須知道，華人在菲律賓各地聚居，是帶有很大的血緣和地緣淵源的。血緣表現在同姓方面，地緣則表現在同鄉方面。這種例子，俯拾皆是，在這裡可隨便舉出一些。

除宿務和納卯外，從北而下：

依沙迷拉省郊亞鄢社：姓黃、姓潘者多

碧瑤市和荷浪牙波市：廣東人多

羅申那市：姓陳者多

描東岸市：姓黃者多

黎牙實備市：姓李者多

依里岸市：金門人多

蘇洛：姓陳者多

行文至此，我們也許可以說，搜集菲律賓華人史料的工作固難，整理和分析這些資料的工作甚至更難，也更重要。在經過兩年的努力起步及在搜集史料方面打下基礎，已擁有大量素材的基礎上整理，分析及充份使用這些史料的工作無論如何應該繼續下去。否則，真有令人感到功虧一簣，殊堪可惜。

最後，我們謹在這裡對不辭勞苦，踏遍全菲各地華僑義山，負責拍攝全菲這三萬三千多個華人墓碑的蘇尚曉先生及菲國史館的攝影師 Zaldy Repuya 先生，還有負責把這些碑文資料輸進電腦的王幼慧小姐表示衷心的謝意。

##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二期

341 頁 平裝 300 元

本期於民國八十三年六月出版，內容包含論著、演講、學術討論、研究動態、書評等中英文文章，計十六篇。

函購八折，郵撥帳號 103417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新書評介

《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啓超調適思想之研究》，黃克武著，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70），1994年2月，正文196頁，附參考書目及索引。

在二十年前，江勇振曾對當時已然問世的關於梁啓超的生平與思想的著作，提出檢討與分析，並指出，對梁啓超這樣一位在近現代國史上聲名洋溢而且影響鉅大的人物，應該多方面的拓展研究方向。例如，他認為，探尋學術思想方面的梁啓超，是到了一個該開展的時候了<sup>①</sup>。或許，關於學術思想方面的梁啓超的形象，中國大陸學者易新鼎的《梁啓超和中國學術思想史》一書的描摹，還不能滿足我們的期望<sup>②</sup>。然則，對已在臺灣史學界沉寂一段時間的「梁啓超研究」領域來說，黃克武先生（以下簡稱作者）的近作：《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啓超調適思想之研究》一書（以下簡稱本書），開展了新的思考與研究的方向，當是無庸置疑的。<sup>③</sup>

① 江勇振，〈期待另一個研究梁啓超的新方向〉，原刊：《〔師大〕歷史學報》，第2期（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974年2月），收入：史華慈等著，周陽山、楊肅獻編，《近代中國思想人物篇——自由主義》（臺北，時報出版公司，民國69年），頁239-263。按，江氏此文係針對以下諸書提出評論：

① Joseph R. Levenson, *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2nd 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 Press, 1959)；

② 張朋園，《梁啓超與清季革命》（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53年初版，民國58年再版）；

③ Chang Hao,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 Press, 1971)；

④ Huang, Philip C., *Liang Ch'i-ch'ao and Modern Chinese Liberalism*, (Seattle: Univ. of Washington Press, 1972.)

② 易新鼎，《梁啓超和中國學術思想史》（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關於此書，筆者已另撰書評評論之，待刊。

③ 據筆者所見，在江勇振前引書評論文發表後，臺灣學界陸續出現的關於梁啓超研究的專著約有下列數種：張朋園，《梁啓超與民國政治》（臺北，食貨出版社，民國67年）；宋文明，《梁啓超的思想》（臺北，水牛出版社，民國67年）；劉

首先，本書在研究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的領域上來說，是一部很少見的，以專著篇幅針對特定史料，進行分析與詮釋的作品。作者自述其撰寫動機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以《新民說》為基本史料，分析梁啟超在清末思想變遷與意義（自序）。儘管也曾徵引梁啟超其他的論著以做為論證、說明的資料來源，但基本上《新民說》是本書處理的惟一對象。<sup>④</sup>而之所以選擇《新民說》為處理對象，作者表示，是因為梁超啟的這部作品問世後，可以說是中國新知識分子必讀的，而它的內涵反映了當時某些知識分子的價值觀念（自序），而《新民說》的影響力更是無遠弗屆（頁52-60），因此有必要對這部作品提出的課題進行深入的研討。這種微觀式的研究取向呈現的成果，與過去宏觀式的，以個人生平行止（如「梁啟超與清季革命」）或思潮趨向（如「晚清中體西用思想」）進行研討的著作，兩相比較，可謂別開生面：重視的是特定史料的內部解讀與意義的詮釋，不再是剪刀與漿糊式的，以主題分類纂輯資料而號稱思想史研究。<sup>⑤</sup>而其所意欲闡述的論旨，經此詳細的分疏與論證，則更形突出。

同時，作者以《新民說》為基本史料進行微觀式的分析與詮釋，他的研究方法論取向，亦有別於一般思想史研究而另有所宗。

---

紀曜，《梁啟超與儒家傳統》（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74年7月，未出版）；雷慧兒，《梁啟超的治國之道：人才主義的理想與實踐》（臺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國78年）；孟祥才，《思潮巨子——梁啟超傳〔救國篇〕·〔學術篇〕》（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臺北，風雲時代出版社，民國79年）。張著承繼其《梁啟超與清季革命》而述論梁啟超在民國以後的生平言行與思想，基本上仍是傳統人物傳記式的研究成果；宋著則採主題式的方式引介梁啟超的各個思想主題；劉的博士論文係從梁啟超生平各階段對儒家傳統的態度觀點與評價入手，分析其思想發展與特質；雷著則以「人才主義」的理想與實踐為主題，述論梁啟超生平行事中彰顯出來的，以奉行「人才主義」的職志所在；孟著是中國大陸的研究成果，對梁啟超的生平雖尚有詳細的敘述，但對若干史事人物的評斷，仍不脫中國大陸品評臧否的公式（如以梁啟超為資產階級改良派的代表來概括其一生），不免降低其學術價值。

④ 例如，作者提出這樣的一個論點：梁啟超重視菁英份子的觀念，也反映在他對「鼓民氣」之論或群眾示威行動的疑懼上。在此，作者的論證資料，主要是《新民說》「論民氣」一節，另外也引用梁啟超〈答飛生〉（《新民叢報》第40、41號合刊本，1903年9月）一文為補充說明（頁155-156）；其他類似例證不詳舉。

⑤ 例如，以梁啟超各時期涉及民主的著述，分項討論「梁啟超的民主觀」；宋文明的《梁啟超的思想》一書即是典型的例子。

在本書的根本分析架構上，作者依據的則是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氏提出的「轉化」（transformative approach）與「調適」（accommodative approach）的分析架構。對於清末民初複雜萬端的思想光譜，特別是改革派與革命派間的對立與論爭，作者嘗試提出的總結，即包納在「調適」、「轉化」這樣的分析架構下：革命派傾向「轉化類型」，主張以高遠的理想徹底改造現實世界；而改革派傾向「調適類型」，以為不可忽略現實，故主張小規模的局部調整或階段性的漸進改革（頁 1-6），梁啟超則正是「調適思想類型」的最重要代表（頁 21），本書即在處理《新民說》一書中所呈顯出來的梁啟超的「調適思想」。此外，作者也表示，歷史學者為了解思想家著述的思想，應該用一些新的分析範疇以掌握其思想內涵，並且應該以比較清楚的方式呈現給讀者，因此，他以一些普遍性的範疇，例如思想家對目標、知識、現實世界、與達成目標的方法與策略等看法做為描述工作的根本單位。在此，他依據的仍是墨子刻的著作中所採用的方法論（頁 39）。所以，本書可以說是一部墨子刻式的方法論（Metzgerian methodology）應用於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研究的成果。<sup>⑥</sup>本書這樣的特性，一方面固然為梁啟超思想描摹了新的影像，一方面也不免遮掩了一些觀察的視角。

正是強調了梁啟超是那個時代的「調適思想類型」的代表，所以，對過往蕭公權、張朋園、張灝等前輩學人研究梁啟超的成果，作者做出綜合性的整理（頁 22-33），顯示出既有研究成果之不足，或是可再進一步申論

---

⑥ 當然，除了墨子刻式的方法論外，作者也表示，本書「在方法論方面……有一些新的觀察角度」：其一是避免受政治態度影響，不預設革命的轉化思想為主流；其二是採用比較方法，注重各種思想間的相互關係與比較，乃至與西方思想比較（頁 37）。但筆者認為，觀乎作者同意潘英批評本土史學界囿於「革命典範」之研究取向的意見（頁 8-9），以及，為呈顯出梁啟超「調適思想」的特色，作者舉「轉化思想類型」的代表性人物：譚嗣同做比較（第七章；另有與其他人物或思想的比較例證，不詳舉），皆可顯示這兩點都只是作者意欲突破既有研究成果的寫作策略，實在不能算是方法論；而在處理梁啟超思想與中國傳統的關係這個課題上，作者則以人類學上的 emic 與 etic 的角度為之（頁 35-39），但是，參照 emic 與 etic 的角度，是被安排在梁啟超「調適思想」第三個特點：梁啟超「調適思想」與傳統有密切關係這個脈絡中的（頁 183-185）。所以就本書的整體架構言之，墨子刻的方法論仍然是最根本的。

之處。而以《新民說》為基本史料，對梁啟超思想的內容、特色與淵源，作者提出了一些別有新意的界說；而關於美洲之行對於梁啟超思想轉變之影響，以及他同革命黨人合分始末的思想因素，也有新的詮解。不管讀者是否同意作者將梁啟超思想定位為「調適思想」，但是作者的詮譯，確實刺激了我們對其思想的進一步思考。

而在另一方面，作者呈現梁啟超的「調適思想」之餘，更具企圖心地對若干省思中國民主思想的論述課題，提出了以梁啟超「調適思想」為參考基點的討論。作者檢討以西方學人為主的，對於中國民主思想的論述，區分成三種解釋類型：一是以 B.Schwartz 為代表的「民主工具論」（頁 14-16）；二是最近興起的，對中國社會中是否存在著「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或是「民間社會」（civil society）的討論（頁 17-19）；三是關於民主體制的思想資源與其政、經條件可行性問題的討論，特別是墨子刻將社會視為思想、政治與經濟的「三個市場」論（頁 17-21）。因而，在筆者看來，本書對梁啟超「調適思想」的呈現，也可以說是一個「批判性研究〔中國知識分子〕自身對民主的認識」（頁 21）的成果。以下即針對本書的這兩點貢獻進行討論。

整體說來，作者呈現梁啟超「調適思想」的策略是這樣的：以說明撰寫《新民說》的背景及影響為出發點（第二章），在以下各章中，即依據《新民說》，分別處理梁啟超所設定的目標（第三章）、他對知識的看法（第四章）、他對歷史及現實世界的觀察（第五章），以及對達成目標的方法與策略（第六章）等課題。最後舉出「轉化思想類型」的代表性人物：譚嗣同（第七章），以及思想定位居於「調適思想類型」與「轉化思想類型」間的孫中山（第八章），分做比較，以進一步呈顯出梁啟超「調適思想」的特色。

一般討論《新民說》的重點，都以梁啟超提出「新民論」的目標是「利群」——有利於中國這個群體未來的發展——為中心而提出分析。本書同樣指出「造福中國」、「使病態的中國恢復健康」——對於中國這個群體的關懷——的意念是梁啟超設定的理想境界（頁 61-65，頁 143）。而群體是由個人組成的，因此，討論的起始點都是群己關係。然而，對這個問題的討論，與其他研究者不同的是，如張灝、黃崇智、劉紀曜等人都以為

梁啓超重群體而輕個人，並論斷他是「集體主義者」或「權威主義者」的意見，作者卻不表示同意（頁 83-90）。作者認為，梁啓超所強調的是「非彌爾主義式的個人自由」（non-Millsian emphasis on individual liberty）。這種個人自由的意涵，以保障個人為基礎，但同時以為個人與群體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有時也強調保障群體價值做為保障個人自由的方法，但他根本重視的還是個人自由（頁 33，頁 187-188）。

作者是這樣論證這個論點的：在梁啓超的思想中，群體的表現是由組成該群體的個人水準（包括道德品質與知識能力等方面的素質）集合而成（頁 72-73），群體文明的高下是由組成群體的個人道德水準所決定：所以個人應有良好的私德，亦應具備「相善其群」的公德（頁 66-72）。而在由私德公德兼具的個人組成的群體中，乃至各群體組成的世界中，人我之間與己群之間，我群與彼群之間，存在著一個「界」，以規範彼此的權利、義務關係；但是「界」不能侵犯個人的權利，反而，個人在己群的「界」中要申張許多權利，如保障自我的政治、宗教、經濟、民族與思想自由。追求與保障這些自由居於核心地位（頁 73-76，頁 87）。但因為人都有情欲的需索（頁 111），人性中也有若干不良傾向，如過於看重私利（頁 67-68，頁 110，頁 113-114），為保障一己的自由與權利，規範義務，制止不良傾向的危害，每個群體中都要有法律（頁 76-78）。然則，因為人性中不良傾向的作用，與認識上的限制（頁 95-96），可能出現制定惡法的現象（頁 76-77，頁 81-82）；亦且，如同人性不良傾向的惡劣作用一樣，我群與彼群亦不免因利益而衝突（如帝國主義即因此產生），在此威脅下，我群恐將不復存在。所以為保障一己的自由也要保障我群的自由（頁 80-81，頁 114）。面對惡法，面對帝國主義威脅，個人與他所隸屬之群體該如何因應？作者認為，梁啓超即藉著強調「非彌爾主義式的個人自由」而解決此等困境。因為這種個人自由以保障個人為基礎，同時以為個人與群體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所以也強調保障群體價值做為保障個人自由的方法。因此在《新民說》的若干段落中會出現了一些被認定為「集團主義者」或「權威主義者」的文字，如主張限制個人自由，主張個體在群體中猶如機器的一部份或軍隊中的一員等等。但就作者之論證追求與保障一己各方面的自由居於梁啓超思想的核心地位，以及梁認為個人與群體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等論點來看，



實在不能論斷他是「集體主義者」或「權威主義者」。因此，根本重視個人自由是梁啓超「調適思想」第一個特點。

而作者以爲，正是梁啓超這種對於人都有情欲的需索，人性中必然有若干不良傾向注意與認識，顯示他的思想中頗有「幽暗意識」的特徵，這是其「調適思想」第二個特點。梁啓超認識人性中必然有無法剷除的惡劣的與不良的傾向，若任其發展，必然產生負面的作用。人類都有利己之私心（頁 67-68），所以可能制定惡法以圖利自身（頁 76-77，頁 113）；於利害衝突時會罔顧道德（頁 110，頁 113-114）；每個團體中一定有假公濟私之人（頁 113）；社會政治團體，如政黨，固然可爲促進公益之因素，然原因卻是黨員「爲私名私利計」而「媚於庶人」所致（頁 79）。當然，梁啓超並不會因此而否定了人類往比較理想方向發展的一些具體例證與再求進步的可能性（頁 119-121）。所以，在梁啓超看來，歷史就是一個善惡兼具的過程，其本質是漸步進化而可以認識的（頁 97-99）。

因此，美洲之行後梁啓超言論轉變之軌跡，由「激進」而趨「保守」，由高呼「破壞」（頁 145-149），轉而批評「破壞」，倡言「淬勵其本有」（頁 138-139，頁 144-145，頁 151-154），並批評盲目鼓勵民氣之舉（頁 155-156）；由將新民對象責之以全民，希望「吾民之各自新」（頁 143-144），轉而寄望「中等社會」承之（頁 154-155），如此的轉變，可以從其思想中的「幽暗意識」伏流來解釋（頁 181）。同時，梁啓超思想中的「幽暗意識」，也讓他懷疑「大同之世」的可能性，轉而注意「脫離理想界而入於現實界」的實際狀況（頁 61-62），以爲人不可能超越現實，完全按照理想來改變現實，而讓他終至轉向提出提倡緩進改革的主張（頁 157）。

而作者更進一步的認爲，梁啓超思想中的「幽暗意識」與對個人自由的強調，與他對傳統的愛好是有密切關係的（頁 185）。這即是梁啓超「調適思想」第三個特點：與傳統有密切的關係。

作者指出，梁啓超對知識的分類與評估，與中國傳統相當一致，所以他的思想與純粹的達爾文主義者大異其趣（頁 103-105）；而他對公理是人類的認識能力必然可以掌握的信心（作者稱之爲「樂觀主義的認識論」，頁 95），與朱子、王陽明等人「不以孔子是非爲是非」的觀念頗爲一致（頁 96-97）。後來，梁啓超轉向倡言「淬勵其本有」，尤其提倡陽明學派的

修身工夫（頁 151-154），凡此皆可顯示出他的思想與傳統的密切關係。

爲了更進一步呈顯出梁啓超「調適思想」的特色，作者提出了「轉化思想類型」的代表性人物：譚嗣同做比較，由此呈顯出二者的同異。以譚嗣同《仁學》爲基本素材，採取與析論梁啓超「調適思想」一樣的方法進路，分別敘述了譚嗣同的宇宙論、知識論、人性論、對歷史的看法，和他構思的終極目標：大同世界等課題（頁 161-172）。作者指出，梁啓超與譚嗣同（乃至孫中山、毛澤東等人）之間固然在對知識與歷史等方面的觀念有其相同之處，但各與不同的思想取向結合，以致形成彼此的鉅大差異。如在目標設定上，譚嗣同以世界主義爲理想，追求超越國家的「地球之治」，梁啓超則看重現實，不以「大同之世」爲理想，要在現實中追求中國的福祉（頁 172-175）。作者也舉出思想定位脈絡居於「調適思想類型」與「轉化思想類型」之間的孫中山與梁啓超比較，發現二者之間，雖有若干相似點，如對傳統的態度頗爲類似，但在其他根本課題上卻有很多不同的意見。像是由於孫中山對人性的樂觀看法等因素，爲中國追求福祉的行動而訴取激烈的革命手段，他的「幽暗意識」並不如梁啓超那樣強烈，又希望以先知先覺者組成政黨動員民眾，致使他不像梁那樣地根本尊重個人自由等等。所以，梁啓超同革命黨人不能合作，確實有其思想因素（頁 192-193）。

總結以上，作者嘗試將梁啓超思想定位爲「調適思想」，這種「調適思想類型」的人物，正視現實環境的限制，主張局部調整或是漸進改革，重視個人自由，肯定傳統；而與之對立的革命派則傾向「轉化思想」，以高遠的理想希望徹底改造現實世界，而傾向「轉化類型」的人物，並把集體視爲最高價值，貶低個人價值與個人自由，否定傳統，以激進手段希望徹底改造世界。但是，「調適類型」的思想卻不受歡迎，與「轉化類型」相較，甚至可以說是「一個被放棄的選擇」。作者最後即簡要地分析其原因，並以爲在時過境遷之後我們應該「平心靜氣地研究並欣賞梁啓超的調適思想」（頁 195-196）。這種對於梁啓超思想定位所做的研究與詮釋，確實頗富新意；而對於梁啓超思想由「激進」而趨「溫和」的轉變，以及他的政治選擇，未同革命黨人合作的因由，在思想因素上，也有深層的新詮釋。不管讀者是否同意，作者確實刺激了我們的進一步思考。

不過，以梁啟超的「新民論」本身做爲一個思想論域（discourse）來看，它真的是「一個被放棄的選擇」嗎？如果將焦點放在清末以降，與梁啟超之「新民論」論旨頗爲一致的，各種或可統稱爲「改造國民論」的思考、討論與行動，實均甚囂塵上，在歷史脈動中，依然存在著相當的連續性。它並未被放棄，只是以不同的側重點呈顯出來。梁啟超之前的嚴復，主張「開民智、鼓民力、新民德」；<sup>⑦</sup>在梁之後的，從各層面倡論、進行各種「改造中國國民」的論述與行動，時至今日，仍不絕如縷。像是王照等人改革漢字的倡言與構思；<sup>⑧</sup>魯迅關於批判「國民性」的言論；<sup>⑨</sup>潘光旦提倡的「優生學」；<sup>⑩</sup>近如柏楊之《醜陋的中國人》對國民道德的批判；<sup>⑪</sup>與方勵之等於一九八〇年代時期合稱中國大陸思想界四大領袖的學者溫元凱

- 
- ⑦ 關於嚴復「開民智、鼓民力、新民德」的主張，一般研究嚴復思想的文獻都會討論他在這方面的觀點與影響，例如 B.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 Press, 1964) 的探討，就是學者公認的經典著作。但筆者以爲，似乎也可以針對其言論在近現代「新民論」或「改造國民」這一個論述脈絡之地位進行探討，而不僅視爲與其「追求富強」之論有關。
- ⑧ 王照之主張，見諸〈庚子創造官話合聲字母原序〉等文，氏著，《小航文存》第一卷，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27 輯（總號 265）（臺北，文海出版社）。而關於改革漢字，提倡國語以爲啓蒙、改造國民之資的討論，參見：王爾敏，〈中國近代知識之普及化及國語運動〉，《中央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1 期（民國 71 年 7 月，頁 13-45）；此文承師大王文裕學友告知，謹此致謝。
- ⑨ 魯迅的這段話：「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爲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狡猾」（〈論睜了眼看〉，收入：《墳》，《魯迅全集》〔16 卷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第 1 卷，頁 240），是最常被徵引爲他批判「中國國民性」思想的佐證，相關討論，參見：鮑晶編，《魯迅「國民性思想」討論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年）。
- ⑩ 潘光旦，《優生概論》（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 36 年）。此書承劉廣京先生告知，謹此致謝。
- ⑪ 柏楊，《醜陋的中國人》（臺北，林白出版社，民國 74 年）；並見：李怡訪問，林思整理，〈柏楊談中國與中國人：中華民族是不是受到了阻咒？〉，（香港）《九十年代》，總 207 期（1987 年 4 月，頁 70-78）。相關的討論，參見：周裕耕（J.Ritter）著，墨勤譯，《醬缸——柏楊文化批評》（臺北，林白出版社，民國 79 年）；孫國棟，《評柏楊》（香港，明報出版社，1989 年）。

之力倡改革開放，亦聲言要以推行「中國國民性改造」為起點。<sup>⑫</sup>各式各樣的，論旨與「新民」一致，但策略有別，重點不一，態度激進、緩和亦大相逕庭的言論及行動，在國史上的淵遠流長與影響，應有進一步挖掘探究的空間。

作者曾表示，此後將對梁啓超思想與在他之前的思想論域進行比較，以及，為對梁啓超在當時的思想光譜有更全面的認識，亦將以《新民說》之後的一些思想課題進行更具體的探討（頁39-40）。以作者在本書所展現的處理問題的治學功力，當是令人可以期待的。而本文以比較長的篇幅對本書論證所做的整理，以及嘗試提出的可進一步討論的課題，只是對關心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的學界同好閱讀本書與據之進一步反思的野人獻曝。

□臺大歷史所博士班研究生·潘光哲□

《明實錄類纂》李國祥、楊昶主編，武漢出版社，1990年。

《明實錄》做為明代史研究的基本史料，歷來為學者所珍視，然由於卷帙多達三〇四五卷，使用起來亦實有其不便。自民國初年孟森先生編纂《明元清系通紀》（北京大學，1934年），及抗戰前日人編纂《明代滿蒙史料·明實錄抄》（京都大學文學部，1943-1959年）以來，以專題方式編纂《明實錄》資料，成為一種常見的型態。其後如香港方面羅香林及其門人趙令揚等所編《明實錄中之東南亞史料》（香港，學津書店，1968年）、《明清實錄中之西藏史料》（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81年），何丙郁等輯錄的《明實錄中之天文資料》（香港大學中文系，1992年）；臺灣地區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所編《明實錄閩海關係史料》（臺北：臺灣銀行，1971年）、鄭樸生先生編次的《明代倭寇史料》一、二輯（臺北：

⑫ 溫元凱、倪端，《中國國民性改造》（香港，曙光圖書公司，1988年）；參見：曾慧燕，〈我沒有被吹倒：改革家溫元凱〉，（香港）《九十年代》，總208期（1987年5月，頁23-25）。關於溫元凱等人在1980年代中國大陸思想界之地位的報導，參見：傅偉勳，〈「走向未來」的金觀濤與劉青峰：大陸學術界的前衛象徵〉，收入：氏著，《文化中國與中國文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國77年），頁229。

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日本方面有《明代西域史料·明實錄抄》（東京：京都大學文學部內陸アジア研究所，1974年）、《中國、朝鮮の史籍における日本史料集成·明實錄之部》（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年）、《明代西南民族史料·明實錄抄》（東京：東洋大學アジア・アフリカ文化研究所，1983年）等。而就編纂的數量來說，則以大陸方面最多。就個人所知，如《明實錄蒙古史料抄》（北京：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蒙古研究室，1957年）、《明實錄有關雲南歷史資料摘抄》（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明實錄貴州資料輯錄》（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明實錄藏族史料》（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明實錄廣東少數民族資料摘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8年）、《明實錄經濟資料選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明實錄廣西史料摘錄》（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明實錄東北史資料輯》（瀋陽：遼瀋書社，1990年）、《明實錄鄰國朝鮮篇資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出版時間不詳），均為相同類型的資料集。而在以上的十餘種資料輯錄中，主要以摘編明代邊疆地帶的資料為多。

除此之外，也有學者以在位皇帝所在的實錄為斷限，編製索引。徐泓先生所編的《明太祖、太宗、仁宗、宣宗實錄分類索引》（哈佛燕京學社補助研究報告，1983年），與《明孝宗、武宗實錄分類索引》（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報告，1988年），即為此一方面重要的資料索引。

晚近，由李國祥、楊昶主編的《明實錄類纂》，無疑是有關《明實錄》資料輯錄的一大盛事，截至目前為止，先後已有《人物傳記卷》（1990年）、《廣西史料卷》（1990年）、《湖北史料卷》（1991年）、《涉外史料卷》（1991年）、《北京史料卷》（1992年）、《宮廷史料卷》（1992年）、《文教科卷》（1992年）、《四川史料卷》（1993年）、《自然災異卷》（1993年）、《經濟史料卷》（1993年）、《廣東海南卷》（1993年）、《福建臺灣卷》（1993年）、《軍事史料卷》（1993年）等十餘種出版。其中除《廣西史料卷》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外，其餘均由武漢出版社梓行。對於明代史事的研究而言，這一套書的出版，在某程度來說，提供了學者相當的助益。但《明實錄類纂》隨著各卷的逐

一出版，其編纂所呈現的問題也逐一浮現。在使用上，其不便之處也極為明顯。下面就以一個使用者的角度，指出這一套書的重大問題。

一、體例不清。《明實錄類纂》已出版各卷的分類，兼有以地域為主及以資料性質為別的兩種分類，前者如廣西、湖北、北京、四川、廣東海南、福建臺灣各卷；後者則已有人物傳記、涉外、宮廷、文教科科技、自然災異、經濟、軍事諸卷。此二大類兼而並存，就使用者多元需求的立場來說，有其必要。不過，在此一套書中，並未就資料重疊的處理態度做說明，以讓使用者明瞭如何就其個人需要加以翻查。如已有《自然災異卷》，在地域類各卷中也有〈天地災異〉；已有〈涉外史料卷〉，在地域各卷中又有〈涉外關係〉；其他在地域各卷中的〈人物〉、〈文教〉（〈文化〉）、〈經濟〉，與《人物傳記卷》、《文教科科技卷》、《經濟史料卷》，都有所交疊，但這兩大類重覆的情況未見各卷中的凡例有所說明，交代資料的處理方式。實際上，這一套書的總凡例並未給予使用者一個充分的訊息，以明瞭整套書的編纂分類、綱目意涵及資料的處理態度；且各卷也沒有個別的凡例說明其資料的歸類方式，或個別特殊綱目的定立意義、該綱目項下所收資料的內容、種類為何，整個編纂的體例並不清楚，似乎意謂使用者已然應該知道其中的類別歸類所在，不需要再加說明。

二、收錄未全。《明實錄類纂》做為史料的類編，還存在著一個嚴重的問題，即史料遺漏極多，而編者並未提示使用者。基本上，《明實錄類纂》僅是摘抄，並非全錄。且所摘標準為何，也不清楚，有極重要而未摘，無關大體者反而錄進。茲撮舉數例為證：

1.明代北京的經濟活動，特別是工商業，在萬曆年間有重大變化，而《北京史料卷》〈農牧工商〉項下，萬曆朝全然未錄。

2.有關明代北京修築外城一事，在明憲宗時已有定西侯蔣琬提出（《明憲宗實錄》卷一五六「成化十二年八月庚辰」條），《北京史料卷》〈工程交通〉未收。至明世宗嘉靖年間修築外城時，亦有一番討論，其事自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兵部尚書丁汝夔提出，至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工程完成，經歷興工、停工、復工、完工以及大臣言論表達、勘察等的過程，但在〈工程交通〉中所錄多不完整，其中重要的數條，如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甲子定議修築外城事宜、嘉靖三十二年三月丙午兵科給事中朱伯辰、通政使

趙文華、大學士嚴嵩申請復工、嘉靖三十二年閏三月丙辰兵部等衙門會勘地形、嘉靖三十二年四月丙戌明世宗與嚴嵩討論修築工程等，未見摘錄；所收僅較不重要的數條，且有自加截去文字情況，如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甲申條省去督工名單、嘉靖三十年二月庚辰條省去城中居民宋良輔等願出資助築及陸炳以為不妥的文字、嘉靖三十二年閏三月乙丑條省去告太廟祭文。

3.有關京城治安的資料蒐集也多不全，如永樂二年二月壬午設北京兵馬指揮司、永樂七年八月乙巳增設北京五城兵馬司、以及往後加設巡捕營（弘治十五年）、擴增巡捕營步騎兵員額（武宗、世宗朝）等，《北京史料卷》〈監察司法〉，抄錄多有遺漏。又明末北京城中把桿結幫，相互械鬥的資料，如萬曆四十六年閏四月丁卯，泰昌元年八月丙午、泰昌元年八月己未、泰昌元年八月庚申等也未收錄。

4.明世宗嘉靖初年的大禮議，是政治上的重要事件，前後爭論、相互執議的資料不少，而《宮廷史料卷》〈皇帝皇族〉項下，僅收錄嘉靖三年九月始定大禮的兩條資料，前此整個風波的過程之資料未見摘入。

5.明代風俗變遷與官方禁約奢侈僭越的資料，在《明實錄》中至少有百餘條，《文教科卷》〈風尚道德〉所收僅有數條。

6.自宮求職做為明代宦官史的特殊現象，在實錄中存在不少禁止自宮、驅趕淨身人的資料，以個人所知即有九十餘條，但《宮廷史料卷》〈太監宮女〉所收不及其四分之一。

7.另外，疫病資料亦然，其中如天順元年五月丙子條載順天等府，薊州、遵化等州縣，自景泰七年冬至是年春夏，瘟疫大作；嘉靖二十一年五月北京疫癘流行、嘉靖二十四年正月民多疾疫、萬曆十年春夏順天府疫癘盛行，人死甚眾等等，在《自然災異卷》〈飢饉疫癘〉、《北京史料卷》〈天地災異〉均未摘錄。

8.明代天文資料，依何丙郁先生所輯，達上下冊數百頁，而《文教科卷》〈自然觀測與科技〉所錄，顯然相差甚多。

以上，僅就個人所熟悉的部份撮舉，其他類纂可能也有相同遺漏情況，使用者未可認為全錄。總之，此一套類纂，僅能稱得上是摘抄或選編，而其所以致此，可能是摘錄人員在抄錄過程中不夠專注用心，編輯者又未細

心地校閱，乃使得原來意圖編纂完整性分類資料匯編的用心功虧一簣。

三、個別類纂分卷過大，如《文教科卷》應可再細分為文教、科技二卷，《經濟史料卷》應可再區別為工商、農牧漁礦、田土賦役等卷，如此一來，或許更利於使用。此外，在綱目的處理訂定上，有些卷的綱目也嫌過大，甚至僅有綱而無子目，如《文教科卷》只粗分〈思想學術〉、〈教育科學〉、〈文學藝術〉、〈自然觀測與科技〉、〈典籍著述〉、〈禮儀制度〉、〈宗教迷信〉、〈風尚道德〉及〈其他〉九大項，此外未再分細目。對於使用者而言，如此粗疏的歸類，實在有其不便利。因為在各項下的資料彼此相雜，使用時必須再花費時間自行甄別、挑揀，倘若在編輯時能因勢利導，就便加些功夫，將項下資料進一步細分，則缺憾非僅不存在，對使用的人來說更不啻是一貢獻，而乃未盡其功，落得只是有待研究者自行篩揀的「半成品」。這一情形，除《人物傳記卷》、《涉外史料卷》、《經濟史料卷》、《自然災異卷》外，或多或少都存於其他各卷中。

在這套書中，除了《人物傳記卷》因資料特性，按個別人物辭世時間的先後，以繫年方式收錄外，排除了以往大部份實錄資料選編不加分類、不立綱目的處理方式，各卷均有綱目，是一個進步。但個別卷中的綱目似乎有太過一致的缺點，尤其是地域性質的各卷，除《福建臺灣卷》外，俱分〈自然〉、〈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文教）〉、〈人物〉六大類，細目也大同小異；《福建臺灣卷》依其特殊地域情況，立有〈海禁海防〉一類，分有倭寇、海寇、海禁、海防四個子目，顯然較有同樣情況的《廣東海南卷》將此類資料置於〈軍事〉「軍事行動」、「鎮壓和剿討」二項下要好。另外，做為明帝國首都的北京，在《北京史料卷》的綱目下，全然看不出其與地方有何差異，倘若能在此卷中有「宮城建設」、「京城防衛」、「京官生活」、「舖戶供應」、「京畿莊田」……等能反映北京特殊性的綱目，則將予人不同的感受。質言之，如能依據各地域的個別情況，在可能的範圍內標立反映該區域的綱目，對於研究者而言，幫助必然更大；若定要以一致的標題統攝各卷，似乎不見得好。

四、資料歸類有誤，或同類史料分屬不同類別的情況，為數頗多。在綱目已然不夠細密的現實下，這一問題對使用者而言，更是一大困擾。就同類資料分屬不同類別而言，如《宮廷史料卷》、在〈衣食器用〉項下收有



成化十八年至二十二年間明憲宗賜百官扇子，以及萬曆十六年至四十八年間明神宗賜輔臣、講官吊屏、神箋、鮮筍、鱗魚、果品、珍饈、金銀等的史料；卻在〈其他〉項下，又見有萬曆二年至天啓七年間皇帝賜臣下字畫、果品等的同類資料，而在《經濟史料卷》〈物質生活概況〉項下，也收有萬曆年間神宗賜張居正酒膳等物的史料，其錯雜與疏忽，明顯存在，令人不解。又如有關於壇廟、山川祭祀的資料，分置於《宮廷史料卷》〈祭祀雜占〉，與《文教科技卷》〈禮儀制度〉中，也予人不便。

就歸類錯誤而言，如《宮廷史料卷》的〈衣食器用〉項下收錄了為數不少有關宗廟祭器、祭服、祭禮、喪儀等應入〈祭祀雜占〉；及賜太監鹽引、賜親王火者（小宦官）等應入〈太監宮女〉的資料。另外，又如《文教科技卷》〈風尚道德〉項下，也收有應置於〈太監宮女〉之下的自宮求職的史料。《北京史料卷》〈工程交通〉中，也收了不少創建佛寺的資料；在〈文教·科學學校〉下，如洪武二十五年七月壬午，申明靴禁... 其北平地寒，人民許穿牛皮直縫靴；成化十九年八月辛未、二十年二月辛未遣順天府官祭宋丞相文天祥等，放置亦有失當。〈文教·禮儀風俗〉所收，更多為官方祭祀活動如祭先農之神、宋丞相文天祥、祈雨、祈雪等，似與標題亦有差距。〈文教·其他〉所收則絕大部份為與佛道等有關的資料，似應標以「宗教信仰」之目。而《文教科技卷》〈自然觀測與科技〉一開始所錄資料，竟多是元明之際爭戰的材料。凡此種種，似可以看出資料的編輯過程，缺乏仔細的推敲，與審慎的態度。而似此歸類不當的情況，在許多卷裡或多或少均存在，編纂校閱不夠周延，於此亦可見了。

五、個別類卷的資料未應用校勘記補正。在諸多類纂中，如《經濟史料卷》、《廣東海南卷》等，可以看出其已用校勘記補正實錄抄錄的錯誤，但仍有不少未充分校勘的例子，如弘治四年八月戊午條「兩廣鎮守總兵安遠侯既為都御史秦紘劾」以下，依校勘記有「取回京，奏乞免就獄，待會勘訖聞奏」十四字，而《廣西史料卷》〈司法監察〉收錄時未依此補入。又如嘉靖二年五月庚辰條，致仕南京工部尚書黃珂卒，依校勘記有傳文述其生平，而《人物傳記卷》可能因未參閱校勘記以致未收錄此一傳記。這樣的例子可能也存在於其他類纂中。

六、標點錯誤、錯字頗多，但相較於以上的缺點，這一個問題已屬細

事，也就不多舉了。

編纂史料彙編是造福事業，也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對於《明實錄類纂》的編輯者，個人亦實有誠摯敬意。而對於此一套類纂的出版，亦實盼其能臻於至善。然而編輯史料類編，其用意正在於有益於使用者檢閱，編得好壞與否亦在於使用起來方不方便。就此而言，《明實錄類纂》的編輯出版，顯然在諸多方面存在許多缺失，使用時亦令人不敢放心，實不得不指出，俾利用者有所瞭解，於使用上不致輕忽，逕為引用，發生錯誤；亦且有所助於後續各類卷的出版免生錯誤。當然，編纂者與使用者難免有心態上的差別，本文也許是使用者的苛求，也許是使用者的期盼，但不論如何，使用此一套書，是需要有心理準備，不要把它當做是完整性的資料彙編，利用時也最好再對照原書及校勘記。

□淡江大學歷史系講師·邱仲麟□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中琉關係檔案選編》，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4月，及俞玉儲〈清代中國和琉球貿易初論〉，載《第一屆琉球·中國交涉史研討會論文集》，沖繩縣立圖書館，1993年3月。**

大半年前琉球大學的赤嶺守君就告訴我，他們和北京有關方面合作編刊中琉關係檔案。大約1993年11月前後，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研究室的謝必震教授郵贈《清代中琉關係檔案選編》（以下簡稱選編）一冊。封面上印著北京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書局出版，版權頁上印的是1993年4月第一版。內頁正面有「本書的整理、編纂和出版，承蒙日本沖繩文化基金會的資助，謹致感謝。」內頁反面載徐藝圃主編，徐恭生、秦國經副主編，謝必震等五人為編輯。足見合作是琉方出資，中方出文獻並負責編纂印刷等事。編例、目錄均用繁體字，典雅大方，引人喜愛。本年春間又收到台北的中琉文經協會轉來琉球沖繩縣圖書館惠贈該書一冊。

編例說，該書是據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的宮中硃批奏摺四百件，和軍機處錄副奏摺四百六十三件而成，起自乾隆12年（1747），迄於光緒24年（1898）。檔案文件編號以年號為單元，乾隆朝自1至204，嘉慶朝203件，

道光朝 258 件，咸豐朝 64 件，同治朝 61 件，光緒朝 73 件。目錄格式，除檔號外是文件名稱，即某官某人奏某事摺，及日期、頁碼。日期先著清皇年號月日，次列公元時間，用起來很方便。文獻並非重新排印或打字印刷，而是影印。凡硃批摺件均字跡工整易看，錄副則均行草字體，閱讀較費力。

檔案內容，以有關琉球進貢、接貢船往來，及中琉雙方護送救恤彼此遭風難民、難商兩種文件最多。少數是關於清朝冊封琉球，琉球向中國派遣留學生，及中國緝捕劫掠琉球船隻的海盜船等事務者。可以說都是有關例行事務性的文獻，《籌辦夷務始末》及《清季外交史料》中有關國交大事文件，本書均未重複收錄。與《琉球歷代寶案》相較，《寶案》多國書，《選編》則幾全屬中國地方官，尤其是閩浙地方官員的奏報。因之，從此更能看清中琉關係在中國，尤其是在地方上的運作情形。海難船資料，如按年、時加以排列，可以有助於瞭解東亞海上氣象，及中國沿海貿易情況。就貿易而言，本選編提供了更詳盡的中琉貿易資料。內有琉球進貢、接貢船進出口免稅銀額，及約 40 分交易貨物清單。根據這些資料，可以進行瞭解 18、19 世紀琉球進貢時的交易額及貨物結構。

上述檔案《選編》出版前，日本沖繩縣立圖書館刊出《第一屆琉球、中國交涉史研討會論文集》。會議是 1982 年八月在琉球舉辦的。文集中有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歷史檔案副主編俞玉儲先生撰〈清代中國和琉球貿易初論〉一文。俞氏近水樓台先得月，利用《選編》文獻寫出了這篇值得參考的論文。

俞文只討論了中琉封貢貿易中的朝貢貿易，對中國冊封使去琉球時進行的冠船貿易，以次數、史料均少，未予著筆。文章交代了琉球向中國朝貢的貢期之演變；貿易地點——福州柔遠驛；舉出了琉球進貢船、接貢船輸往中國貨物與免稅清單各三分，以及自中國購回的貨物及免稅單三份；琉船進出福州港及貿易免稅等過程。俞文最值得提的是對輸出入貿易額的估測。

琉球向中國朝貢，自清初兩年一次，每次限兩船，1667（康熙 6）年始於貢期之次年加派接貢船一隻，<sup>①</sup>即每貢有三船進出福州港。來時均帶土產

<sup>①</sup> 豐見和行著、孫薇譯〈與中國有關的琉球公文〉（載《第一屆琉球·中國交涉史研討會論文集》，頁 173-182），頁 176。

及銀子用購中國貨物。買賣免稅。②乾隆十二年前進出口只檢查有無違禁貨物。是年因發現琉人挾帶銀兩以多報少，故自此規定來去均詳列貨物種類及數量，海關計算應稅而免繳銀額，製成公文，知會琉王，並奏報清廷。

雖然有每種貨物的數量及其免稅額及免稅總額數字，但因稅收是從量而非從價，所以無法求得琉球每次入貢時的進出口交易總值。作者利用所得乾隆 36 年及 40 年的進出口貨總值得出兩個平均總值稅率，又查得自乾隆至光緒元年的稅率變化極微，乃以其間進出口平均總稅額除以乾隆 36 及 40 年的平均總稅率，得出琉球每次進貢時輸入中國的貨值平均為 38,633 兩，從中國買回的平均貨值為 138,586 兩。③這似乎是第一次對中琉進貢貿易考出了一組具體的數值。

然而作者並未根據這每次朝貢貿易的進出口貨值數據綜計乾隆二十年代至光緒元年間的貿易總價值。原因不明。可能是覺得對進出口次數的統計不完整。的確如此。俞文表列琉球貢船進口免稅 29 次，接貢船免稅 19 次，貢船出口免稅 23 次，接貢船免稅 27 次，而筆者據《選編》統計出的數字是 52，47，42，38。這是因為俞文撰寫時《選編》猶未編定，所據資料不完備之故。

此外，從琉船進口免稅額得出的進口貨值，並非其進口總值，因為琉球除進貨外，還攜帶現銀，而海關對這些銀兩並未抽稅。乾隆 12 年進貢琉人向閩海關報告他們所挾來現銀一萬兩，實則兩艘貢船共帶不下十萬兩。36 年帶現銀 41,000 兩，而所帶進口貨在福州售銀 18,214 兩，④現銀是貨值之 2.25 倍。這還是琉貨在福州的售價，如以產地價格及琉球價格計，則現銀比例更高。中國對琉球進口貨除違禁品外，並無種類、數量的限制，對現金數額也無多少限量，而琉球使團貿易人竟以多報少，作者未予解釋。免稅額的變化與貨物結構有關，作者也未加分析。

《選編》的刊行對研究 1740 年代至 1870 年代中琉進貢貿易有極大的幫助，而俞玉儲氏的文章對此研究向前推進了一步。筆者上文提出的幾點問

---

② 順治間收稅，康熙 7 年停收兩貢船稅，接貢船仍收，25 年起併停。見俞文，頁 198。

③ 俞文，頁 197-209。

④ 俞文，頁 200-202。

題，僅表示猶待努力之處。事實上，乾隆 12 年以前的琉球進貢貿易沒有留下有系統的數據。即是是年之後，有一段時間閩海關也未按實估報，只據以前數字抄報，而有明一代的貿易，更需仔細考究。至於琉球在此貿易中所得利潤，猶須瞭解其土產，日本、東南亞貨價，及中國貨在琉球、日本市場上的價格。如能求得此利潤在琉球國家經費支出中的比例，自更完美。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張存武□

---

**Barend ter Haar, *The White Lotus Teachings in Chinese Religious History*. Leiden: E.J. Brill, 1992. 343 pp.**

Barend ter Haar's path-breaking study of Chinese sectarian religion (usually referred to in Chinese as *min-chien tsung-chiao* 民間宗教 or *min-chien chiao-p'ai* 民間教派) represent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path-breaking works on this topic in many a year. His thoughtful treatment of the complex historiographical issues involved in the study of the so-called "White Lotus Religion" (*pai-lien chiao* 白蓮教), as well as his penetrating social historical analysis of Chinese sectarian religion as a whole, will undoubtedly provide an important paradigm for scholars working on such topics in the future. In addition, this work clearly def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sectarian and lay Buddhist organizations, and explores how sectarians and Christians alike became implicated in the panics of the late Ch'ing. The book's main shortcomings involve ter Haar's rather hazy distinction between religious movements and religious traditions, his forced attempt to deny the rebellious tendencies of certain sectarian groups, his dichotomous division of Chinese society into elite vs. non-elite groups, and his misconceptions of Ming-dynasty lay Buddhism.

The author clearly lays out the goals he intends to achieve in the opening section of the Introduction. These involve: 1)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 history of Chinese sectarian religion; 2) The study of how the names "White

Lotus Society” (*pai-lien she* 白蓮社) and “White Lotus Teachings” (which he also translates as *pai-lien chiao*) are treated in Chinese primary sources; and, 3) The analysis of how modern scholars have researched these two topics. Ter Haar succeeds in attaining all three of these goals, in large part because of the clear conceptual framework undergirding his research. As he points out, traditional scholarship on Chinese sectarian religion in China, Japan and the West has argued that the devotionalist White Lotus Society of the Sung-Yüan era developed (some scholars claim “degenerated”) into the White Lotus Teachings, which became highly rebellious due to its absorption of Maitreyan and Manichaeic beliefs (p. 4). A number of assumptions underly such an interpretation, the most important being that there was one continuous White Lotus sect, that sources from different dynasties and different regions may be lumped together in researching it, that all millenarian and Buddhist uprisings are representative of such a sect, etc. (pp. 5-8).

As we shall see below, ter Haar’s analysis in subsequent chapters of this book successfully overturns the arguments and assumptions just presented. In doing so, his adoption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names groups give themselves (autonyms) and the names others give them (exonyms, stereotypes, labels) proves particularly helpful to his cause (pp. 13-15). Ter Haar clearly demonstrates that the term White Lotus Society gradually disappeared as an autonym after this group was proscribed by the Hung-wu Emperor (r. 1368-1398) during the early Ming, while the term White Lotus Teachings became a label used by scholar-officials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elite to describe those religious groups they considered “heterodox” (*hsieh* 邪) or prone to rebellion (pp. 140-146, 150-155, 168 & 222). He even shows that by the time of the so-called White Lotus uprising in 1622, the term “White Lotus Teachings” had become a pseudo-autonym in that certain officials erroneously believed such groups used it as an autonym (pp. 197 & 228).

Ter Haar also attempts to formulate a new terminology for studying the White Lotus. Rejecting the term “sect” because of what he views as its overt

implications of dissent and heterodoxy, ter Haar argues that the White Lotus and other sectarian organizations were in fact “religious groups”, collections of men and women who voluntarily entered a distinctive social relationship. The beliefs and other prescriptions set forth by a group’s leaders are referred to as “teachings”. Sets of religious groups which “share a number of distinctive religious convictions and practices” are best described as “movements”, while those groups sharing a common ideal “but whose concrete religious and social expression of this ideal was more diverse” should be considered “traditions” (pp. 12-13). His distinction between movements and traditions, while of considerable value to the social historian, proves all too vague and results in a number of problems which I shall discuss below.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background of the White Lotus Society, ter Haar presents a detailed discussion of lay Buddhism during the Sung and Yüan dynasties in Chapter II. Here he makes an important distinction between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lay organizations: 1) Assemblies established by Buddhist monasteries; 2) Pure Land ritual assemblies held by monasteries; and, 3) Various lay groups operating outside of and beyond the control of monasteries (pp. 30-31). Ter Haar explains that this latter type of group differed from other lay Buddhist ones in organizing around small cloisters (*an* 庵), adopting autonyms such as Good Friends (*shan-yu* 善友) or People of the Way (*tao-min* 道民), and using religious affiliation characters like *p’u* 普, *chüeh* 覺, and *miao* 妙 in the names members assumed upon joining, etc. (pp. 39-40). He also shows that while such lay organizations became increasingly popular in south China during the Sung-Yüan period, they eventually became the target of attacks by both Buddhist specialists who resented the competition they posed to their control over lay believers, and members of the elite, who feared they might link up with more rebellious groups (pp. 37-38, 44-55). Nevertheless, most Sung-Yüan scholar-officials exhibited considerable tolerance towards such groups, which rarely suffered persecution until the Ming dynasty (pp. 55-63).

The history of the White Lotus Society during the Sung and Yüan dynasties is the subject of Chapter III. The author explores the links between the White Lotus Society and the third type of lay Buddhist group discussed in Chapter II, pointing out that members of both organizations used affiliation characters in their names and actively engaged in devotional and charitable activities (pp. 65-71). He presents detailed case studies of many White Lotus groups in south China, particularly in Fukien and Kiangsi. Perhaps of greatest interest is his discovery that certain cloisters in Fukien were run by members of the same lineage (pp. 82-83, 85), although this should come as no surprise to scholars familiar with the work of Maurice Freedman and Ken Dean on the links between lineage organizations and religious activities in Fukien.<sup>①</sup> Ter Haar also presents important data from three model letters concerning marriage between sect members, as well as the construction of White Lotus halls (pp. 78-80). This chapter concludes with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attempt by the Yüan monk Pu-tu 普度 (1255-1320) to defend the White Lotus Society from charges of heterodoxy, while at the same time criticizing those practices which incurred the ire of other monks and scholar-officials (pp. 72-76, 96-111).

Chapter IV is probably the most important chapter of the entire book because it is here that ter Haar presents his own unique interpretation of what happened to the White Lotus Society after the Yüan dynasty. He opens this chapter by recapitulating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the history of the White Lotus sect formulated by previous scholars: that during the chaotic transitional period between the Yüan and Ming dynasties a devotionalist sect with the autonym White Lotus Society (what the author calls the “old style White Lotus movement”) changed into a rebellious millenarian sect with the autonym White

---

① See Maurice Freedman,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Monographs on Social Anthropology #33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66); and, Ken Dean, *Taoist Ritual and Popular Cults of Southeast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33-37, 115-117, 126-127 & 158-162.



Lotus Teachings (the “new style White Lotus movement”). Such scholars view the late Yüan uprising of Han Shan-t’ung 韓山童 as the most crucial example of this transition, and also one which reflects the impact of Manichaeism (p. 114). Ter Haar convincingly demonstrates that it is highly unlikely that a “new style White Lotus movement” (or “new style White Lotus Teachings”) ever existed in Ming-Ch’ing China, and that the term “White Lotus Teachings” was simply a label used by scholar-officials (especially those stationed in the sensitive northern border regions) to attack religious groups or individuals they mistrusted (pp. 150-168; the use of labels is also discussed in subsequent chapters on pp. 212-227, 233, 249, 272 & 285-287). He also argues that Han Shan-t’ung’s rebellion probably had little to do with either the White Lotus Society or Manichaeism, but was heavily influenced by Maitreyan beliefs popular in north China since the Six Dynasties era (pp. 115-123). Finally, he shows that the Hung-wu emperor’s prohibition of religious groups such as the White Lotus Society under the law of the “heterodox way” (*tso-tao* 左道), which eventually superseded an older law on “heterodox teachings” (*yao-yen* 妖言), strongly influenced the views of scholar-officials and the ways in which they dealt with such groups (pp. 123-130, 145, 150, 171-172, 220).

Chapter V as well as parts 2 and 3 of Chapter VII deal with important events intimately related to the increasing use of the term “White Lotus Teachings” as a pejorative label – the mass panics during the years 1557 and 1876. These panics, which centered on fears of being attacked by sinister flying objects or having one’s soul stolen by queue-clipping, appear to have been largely the result of increased social tensions and deep-rooted suspicions towards outsiders such as beggars, masons, peddlers, and itinerant religious specialists. Ter Haar does a fine job of demonstrating that while most people feared being attacked by evil “magicians”, members of the elite blamed such panics on members of the White Lotus Teachings (pp. 173, 174, 180-181 & 192). He also elaborates on Joseph Esherick’s work on the Boxers,<sup>②</sup> showing

② Joseph Esherick,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that by the time of the Boxer Rebellion this elit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ause of panics had spread to the popular level, with the Boxers killing people suspected of being members of the “White Lotus Teachings” (pp. 282-286). He also makes the highly interesting point that the same stereotypes used to attack the White Lotus Teachings were also used against Christian groups, and that converts to this religion were occasionally mistaken as White Lotus members (pp. 220, 234-238, 270 & 283-284).

While one might question ter Haar’s use of the term “magician” to describe the various religious specialists accused of queue-clipping and/or soulstealing, his penetrating analysis of how rumors about such individuals arose and spread is highly deserving of attention by scholars working on similar topics. One only regrets that at the time he wrote this book he was largely unaware of Philip Kuhn’s work on panics, particularly his prize-winning book on the 1768 panic published in 1990,<sup>③</sup> apparently because of the two-year gap between the time ter Haar submitted his final draft to E.J. Brill and its eventual publication in 1992. Ter Haar only cites Kuhn’s 1987 article on soulstealing (in a note to page 248),<sup>④</sup> while Kuhn appears to have been totally unaware of ter Haar’s work on panics, probably because none of it had been published before the appearance of this book.

Chapter VI and the first part of Chapter VII explore the problem of how the label “White Lotus Teachings” came to be used by the Ming-Ch’ing elite. Ter Haar does a brilliant job of showing how the use of labels and pseudo-autonyms to describe sectarian groups became common among networks of elites, particularly those who were lay Buddhists themselves, had personally experienced mass panics, or had served in the Ministry of Rites (pp. 221, 238-242). He goes on to argue that the declining tolerance of sectarian religions

---

California Press, 1987).

③ See Philip A. Kuhn,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④ See “Political Crime and Bureaucratic Monarchy: A Chinese Case of 1768,” *Late Imperial China*, 8.1 (1987), 80-104.

by members of the elite reflected the successful inculcation of Neo-Confucian orthodoxy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system, as well as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lineage ideal (pp. 200 & 243), concluding that by the Ming-Ch'ing era a "social and ideological divide" had arisen between members of the elite and non-elite classes (including elite and non-elite lay Buddhists!) which prevented any meaningful religious or social interaction (pp. 200, 212, 243, 292 & 300). I will explore the highly problematic nature of this argument below.

The Conclusion is particularly well-crafted, providing not only a neat summary of the arguments presented in previous chapters but also making a number of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field. For example, ter Haar makes an important breakthrough in showing that Susan Naquin's division of sectarian groups into "sutra-recitational" (possessing numerous texts such as precious scrolls (*pao-chüan* 寶卷), high group cohesion, regular meeting places and times, a devotionalist ideology, etc.) and "meditational" (characterized by only a few texts, diffuse teacher-pupil relationships, infrequent meetings, a latent millenarian ideology, etc.)<sup>⑤</sup> can also be extended to other non-sectarian Buddhist, Taoist and local religious groups (pp. 295-297). He also convincingly argues that precious scrolls should not be viewed as "vulgarizations" or "popularizations" of Chinese religion but as "important and original religious achievements" (p. 299). However, his claim that such works were limited in their spread and accessibility seems untenable in light of the research done by scholars such as Glen Dudbridge, Daniel Overmyer, etc. <sup>⑥</sup> Finally, ter Haar shows the fallacy of arguing that sects were only present in north China

---

⑤ See Susan Naquin, "The Transmission of White Lotus Sectar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David Johnson, Andrew J. Nathan, and Evelyn S. Rawski, eds.,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 255-291.

⑥ See Glen Dudbridge, *The Legend of Miao-shan* (Oxford: Ithaca Press, 1978), pp. 44-50, 69-70 & 85-89; and Daniel Overmyer, "Values in Chinese Sectarian Literatur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y *Pao-Chüan*," in Johnson, et. al., *Popular Culture* pp. 219-254.

and secret societies only present in the south by proving that this apparent concentration is but another result of the labelling process described above (p. 302).

In addition to the numerous contributions described above, this work's greatest strength derives from ter Haar's rigorous application of the historiographical methodology once reserved for the study of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history to his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religion. For example, he shows that previous scholars have sloppily combined sources from different regions and dynasties in attempting to study the White Lotus, and have relied too heavily on sources composed by its enemies, as opposed to the writings of its members (pp. 6 & 9). He also reveals that the rewriting of late Yüan history by early Ming historians has distorted our view of millenarian organizations like the one led by Han Shan-t'ung (pp. 115 & 118), and that the label "White Lotus Teachings" rarely appeared in contemporary sources on various incidents involving sectarian groups but was frequently used in later sources (pp. 156, 213, 233 & 261). Perhaps his most breath-taking analysis shows that elite perceptions of sectarian organizations not only shaped the views of their peers but also those of modern historians. In one important example, he shows that pejorative phrases used to attack lay Buddhist groups, such as "eating vegetables and serving the devils" (*ch'ih-ts'ai shih-mo* 喫菜事魔), have exerted a great influence on modern historiography, even though they were usually applied only on a retrospective basis by those with little knowledge of such groups (p. 61). In addition, his research on the panic of 1557 indicates that elite interpretations of these events influenced the views of late Ming and Ch'ing scholar-officials, as well as Japanese historians (pp. 184 & 195).

The author's sophisticated appreciation of the nature of the sources he had to work with also extends to the confessions of sect members. Ter Haar rightly points out that such sources tend to be highly problematic, even though they occasionally supply valuable data on sect beliefs and practices. His sensitive

treatment of these sources reveals that apart from the obvious problems involved in relying on statements made under duress, it can be extremely difficult to separate the speculations of the authorities doing the questioning from the original confessions and events themselves, that interrogators often put words and ideas in the mouths of suspects, that clerks as interpreters of local dialect exercised a great deal of influence over the proceedings, etc. (pp. 197, 253- 254). In a particularly stimulating analysis of the confessions made by a group of people implicated in the 1876 panic, ter Haar proves that while these individuals originally had nothing in common, elements added to their stories by the questions of their interrogators forged an artificial link between them (pp. 272-280). His careful and reasoned judgements on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different source materials should prove an inspiration for this and future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researching Chinese religion.

All in all, ter Haar's book represents a highly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 However, it is not without its problems. First of all, ter Haar probably should have retained the use of the term "sect" in describing these religious groups, as the terms "movement" and "tradition" he prefers prove all too vague. In the Introduction, ter Haar faults Daniel Overmyer for using the term "sect" in his writings, arguing that scholars of Chinese religion should drop this term because of its links to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the West and its implied notions of protest, deviance, and heterodoxy (pp. 9 & 12). Unfortunately, he fails to appreciate how Overmyer has demonstrated that the term sect, when stripped of its connotations from Christian history, can be effectively applied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ectarian groups if one defines them as voluntary associations oriented towards individual salvation formed in reaction to and in competition with organized religions like Buddhism and Taoism.<sup>⑦</sup> In addition, while citing more recent works

---

⑦ See Daniel Overmyer, *Folk Buddhist Religion. Dissenting Sects in Late Traditional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62-72.

by Bryan Wilson which emphasize the protest aspects of sects,<sup>⑧</sup> ter Haar has apparently overlooked many of Wilson's earlier writings emphasizing the voluntary, egalitarian, and soteriological aspects of sects over that of protest. Of particular interest to sinologists may be Wilson's distinction between four sect sub-types: 1) Conversionist (practicing evangelistic activities; membership based on conversion experiences); 2) Adventist (emphasis on the overthrow of the established order; membership based on knowledge of doctrine; hostility toward the surrounding society); 3) Pietist (withdrawal from world; emphasis on an elect community); and, 4) Gnostic (esoteric teachings designed to help members achieve material success in everyday life).<sup>⑨</sup> Most Chinese sutra-recitational and meditational sects appear to have combined elements of sub-types 1, 3, and 4, but could develop aspects of sub-type 2 in times of crisis.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one should uncritically apply Western concepts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 but one should also avoid arbitrarily rejecting concepts which, when modified to suit the data, can be of great value in doing research.

In addition, in formulating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religious movements and traditions as a means to replace the term sect, ter Haar not only overlooks a vast body of scholarship surrounding these terms,<sup>⑩</sup> but also fails to provide a clear set of criteria for distinguishing the two. How many convictions and practices must religious groups have in common to be considered movements, and what degree of diversity justifies treating them as traditions? The author himself seems undecided on this issue at times. For example, in his discussion of the White Cloud Tradition (his translation of *pai-yün tsung* 白雲宗), ter Haar calls it *both* a tradition and a movement (p. 33). In addition, in some

---

⑧ See Bryan Wilson, *Magic and the Millenium* (London: Heinemann, 1973).

⑨ Wilson, "An Analysis of Sect Develop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4 (1959), 3-15.

⑩ See for example Paul Valliere's thoughtful essay on the term "tradition" in the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volume 15, pp. 1-16.

parts of the book ter Haar argues that the “old style” White Lotus Society of the Sung-Yüan era and a few later “survivals” qualify as movements (Chapter III & pp. 130-150, 204-209), while elite White Lotus groups formed during this era and the more diffuse “new style” White Lotus Teachings of Ming-Ch’ing north China represent different traditions (pp. 16, 90-92, 114-115, 130-139 & esp. 188). At one point, he even argues that the White Lotus Teachings in Ming-Ch’ing north China were so diversified that they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either a tradition or a movement (pp. 141-142, 150, 189). All in all, the lack of a systematic discussion concerning traditions, movements,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appears to have done ter Haar’s analysis more harm than good.

It is also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why ter Haar tries so hard to convince the reader that the White Lotus had no protest and rebellious aspects. While he may be correct in arguing that such religious groups were not organized in open opposition to monastic Buddhism (p. 298), there is little doubt that they competed with it and even forced members of sangha who joined to play what ter Haar himself describes as “subordinate” roles (pp. 83 & 94). Ter Haar also shows that many monks felt threatened by the existence of lay religious groups beyond their control, whose members assumed roles the sangha normally performed (pp. 38, 68, 81, 88, 132-135 & 294). I would argue that joining this type of lay Buddhist sect was an implicit form of protest in that members refused to submit to the control of monastic Buddhism and attempted to achieve religious goals on their own terms.

Ter Haar’s assertion that the rebellious nature of White Lotus sects was largely a stereotype is also highly puzzling (pp. 258, 302-304). While it is true that many individuals and groups were wrongly labelled “White Lotus Teachings” by suspicious scholar-officials, it is also undeniable that a number of groups using the autonym White Lotus or whose members adopted identical affiliation characters did rebel (pp. 125-126, 146-149). His attempts to apologize for such rebellions also appear highly forced. For example, in

commenting on a 1351 rebellion led by Tsou P'u-sheng 鄒普勝, ter Haar states that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is rebellion had been entirely determined by the chaotic conditions of that time and did not represent a change in White Lotus movement beliefs towards violent action inspired by millenarianism" (p. 126) I would argue that ter Haar should have adopted Susan Naquin's analysis, which reveals that meditational sects could have latent millenarian tendencies (often expressed in those texts possessed by their leaders), which tended to surface during highly chaotic times.<sup>①</sup> Similarly, his claim that a 1577 incident involving a group with the autonym White Lotus Teachings Society (*pai-lien chiao-she* 白蓮教社) "was planned to facilitate the advent of the savior and his helpers, rather than as a conspiracy aimed at overthrowing the state" (p. 149) seems an overly one-sid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facts. Finally, ter Haar's insistence that the term White Lotus Gathering (*pai-lien hui* 白蓮會), used to describe the group Han Shan-t'ung's grandfather had belonged to, had never been used to refer to the "old style White Lotus movement" appears incorrect in light of data concerning the White Lotus Society during the Sung-Yüan period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autonym White Lotus Gathering was occasionally used by sect members (pp. 30-31, 70, 99-100).

Ter Haar also appears inconsistent in his use of affiliation characters, particularly *p'u* and *chüeh*, as a means of identifying groups which were related to the White Lotus Society. For example, in his geographic survey of the White Lotus Society during the Sung-Yüan period, ter Haar includes groups which did not use the autonym White Lotus Society but which featured these affiliation characters. However, in attempting to locate examples of White Lotus organizations during the Ming-Ch'ing era, he tends to select only cases in which the names White Lotus Society or White Lotus Teachings are used. While he does view the Non-action Teachings (*wu-wei chiao* 無房教) as being related to the White Lotus Society in part because many of Lo Ch'ing's

① See Susan Naquin, *Millenarian Rebellion in China: The Eight Trigrams Uprising of 181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羅清 (1443-1527) followers used identical affiliation characters, he appears to deny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group led by Tsou P'u-sheng may have been linked to the White Lotus Society, even though many of his followers also used the religious affiliation character *p'u*, choosing instead to label it as a "Maitreyist uprising" (p. 126). Similarly, in analyzing the case of Fang P'u-chih 方普志 and his followers implicated in the 1876 panic, he apparently refuses to consider that they might have had some links to a later form of the White Lotus Society, despite the fact that almost all of them used the character *p'u* in their names (pp. 277-279).

From a social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erhaps the most disappointing aspect of this book involves the author's discussion of the apparent transformation of elite attitudes towards lay Buddhist and sectarian groups during the Ming-Ch'ing era. Ter Haar argues that the socioeconomic changes of the late Ming also affected elite attitudes towards such religious groups, and led to an unbridgeable "divide" between elite and non-elite Chinese in the realm of religion (pp. 198-200, 211-212, 243-246). There are a number of problems with such this argument. First of all, ter Haar never clearly defines what he means by "elite". Did this group include only those men who had attained an examination degree and/or an official position (i.e. the gentry (*shen-shih* 紳士)) or did it encompass all those who could exert influence on local affairs (the local elite (*ti-fang ching-ying* 地方精英))?<sup>⑫</sup> If the former, his conclusions may hold true, but only in specific cases; if the latter, his entire argument needs to be revised in light of the fact that many people with little status but considerable influence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the same lay Buddhist and even sectarian organizations ter Haar claims the "elite" rejected (see below). Ter Haar also uses the term "literati" at times, but is equally vague as to its

<sup>⑫</sup> See Philip A. Kuhn,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3-5; and, 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Backus Rankin, "Introduction," in Esherick & Rankin,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 1-24.

meaning. This is a problem he should have paid greater attention to, inasmuch as many literati were classically educated men who had not passed any exams.

Secondly, the dichotomy between elite and non-elite views of religion is all too simplistic, and appears to reflect traditional bifurcations of culture into great tradition vs. little tradition or elite vs. folk that have persisted far too long in the minds of some scholars. In an important review article concerning a number of recent works on Chinese religion, Catherine Bell points out that scholars of both European and Chinese popular religion have gradually overcome the influence of these historically derived and socially nuanced formulas to show that culture involves the internal generation of both distinctions and unities.<sup>⑬</sup> Furthermore, David Johnson has demonstrated that even a simple model analyzing members of Chinese society in terms of thei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position in the structure of dominance postulates the presence of nine distinct social classes, many of which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late imperial social history.<sup>⑭</sup> One does not have to totally accept Bell's or Johnson's ideas to realize that a complex and diverse society such as China's, one which during the late imperial era featured unprecedented social and geographic mobility, cannot possibly have been split in two along the lines ter Haar proposes.

Thirdly, ter Haar greatly overemphasizes the negative attitudes towards lay Buddhist and sectarian groups expressed by members of the elite. While writings by men such as T'ien Yi-heng 田藝蘅 (1524-ca.1590) do indicate that some members of the elite disapproved of such organizations, the issue of how representative these views were is never adequately addressed (pp. 208, 211-212, 243). In addition, even though a minority of lay Buddhist groups catered almost exclusively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elite (pp. 209-212), this did not prevent some elite members from joining other more popular lay

<sup>⑬</sup> See Catherine Bell, "Religion and Chinese Culture: Toward an Assessment of 'Popular Religion'," *History of Religions*, 29.1 (August, 1989), 35-57.

<sup>⑭</sup> See David Johnson, "Communication, Class, and Consciousnes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Johnson, et. al., eds. *Popular Culture*, pp. 34-72.

organizations. Ter Haar's analysis of this problem would have benefitted from a reading of Timothy Brook's 1984 dissertation on gentry patronage of lay Buddhism, recently published in book form, which reveals that the gentry supported both types of lay organizations for a complex range of motives, especially publicizing gentry identity (ter Haar indicates in a note on p. 211 that he has read Brook's 1989 article on lineages and funerary ritual, but unfortunately fails to include it in the Bibliography).<sup>15</sup> A growing body of research also indicates that the gentry were avid supporters of cults to popular deities.<sup>16</sup> All in all, ter Haar's claim that the growth of the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 lineage ideal led to a divide between elite and non-elite beliefs and practices proves highly unconvincing, particularly since members of the elite continued to join (and sometimes even lead!) all manner of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during the late imperial era.<sup>17</sup>

Finally, ter Haar inexplicably claims that Yün-ch'i Chu-hung 雲棲祿宏 (1535-1615), Han-shan Tê-ch'ing 憨山德清 (1546-1623), and other late Ming Buddhist monks "continued the old style White Lotus tradition" (p. 209),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the lay organizations they founded were run by

<sup>15</sup> See Timothy Brook, *Praying for Power: Buddh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Gentry Society in Late-Ming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03-107, 185-223 & 289-290; and "Funerary Ritual and the Building of Lineag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9.2 (December, 1989), 465-499.

<sup>16</sup> See for example Valerie Hansen, *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1127-1276*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95-127, 164; Terry F. Kleeman, "The Expansion of the Wen-ch'ang Cult," in Peter N. Gregory & Patricia Buckley Ebrey, eds.,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ang and Su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pp. 45-73; and Paul R. Katz, *Demon Hordes and Burning Boats: The Cult of Marshal Wen in Late Imperial Chekiang* (Albany: SUNY Press, forthcoming).

<sup>17</sup> See for example Judith Berling, *The Syncretic Religion of Lin Chao-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and Anna Seidel, "Chang San-feng: A Taoist Immortal of the Ming Dynasty," in Wm. Theodore deBary, ed., *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483-531.

monasteries under their control and clearly represented the first type of lay Buddhist organization ter Haar describes in Chapter II.<sup>18</sup> In addition, even though some of Chu-hung's disciples adopted affiliation characters in their names, these generally did not include the characters *p'u* and *chüeh*.<sup>19</sup>

The biggest problem with this work though, is that ter Haar proves unable to answer the all-important question he poses at the beginning of Chapter IV concerning the history of the White Lotus Society: "Did the [Sung-Yüan] movement only disappear from our sources...or did it indeed slowly desintegrate (*sic!*) as a socio-religious phenomenon?" (p. 114). In fact, th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appears to be none of the above, as most of the evidence in Chapters V-VI concerns the use of the label "White Lotus Teachings", not those groups which might have been related to the White Lotus Society. Ter Haar does present a few scattered cases involving groups similar to the "old style White Lotus movement", especially the Non-Action Teachings founded by Lo Ch'ing, but it is not clear whether such groups constituted a movement in ter Haar's sense of the word. In addition, ter Haar downplays the significance of evidence indicating that many groups linked to the Sung-Yüan White Lotus Society went underground, continuing to exist while using different autonyms (pp. 133 & 168). Therefore, the White Lotus Society can only be said to have disappeared from the sources in the sense that this autonym ceased to be used. As for the White Lotus Society's disintegration as a socio-religious phenomenon, ter Haar's decision to focus only on those groups labelled White Lotus Teachings causes him to overlook abundant evidence from both north and south China revealing that sectarian organizations highly similar to the White Lotus Society (including those Sung-Yüan groups which went underground and changed their names during the early Ming) continued to be important socio-religious phenomena after the

---

<sup>18</sup> See Brook, *Praying for Power*, pp. 103-106.

<sup>19</sup> See Yü Chün-fang, *The Renewal of Buddhism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92.

Yüan-Ming transition, with some surviving to the present day.<sup>20</sup>

Ter Haar's inability to explain the history of the White Lotus Society following the Ming is also due to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imbalances of the sources he relies on, as well as his failure to apply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sutra-recitational" and "meditational" sects formulated by Susan Naquin. For example, he assumes that northern Fukien was the center of the White Lotus Society during the Sung-Yüan era,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possibility that this may be due to biases in the sources (pp. 80-86). In addition, while he claims that the White Lotus Society subsequently spread to north China, he is never able to convincingly prove when and how such a process occurred (pp. 87, 141 & 294). Perhaps most troubling is his exclusion of south China from subsequent discussions of the White Lotus religion (except for the sections on panics), ignoring the presence of numerous groups which may have been linked to this religion, many of which are described in the works in note 20. In all fairness to ter Haar, any attempt to researc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ng-Yüan White Lotus Society and numerous other late imperial sects would be beyond the ability of even the finest scholar; such a goal can only be achieved through the cooperative efforts of scholars doing detailed case studies. Nevertheless, ter Haar's emphasis on the study of elite use of the label "White Lotus Teachings" distracts from his efforts at clarifying the actual

---

<sup>20</sup> The best survey of Chinese sectarian movements is the *magnum opus* by Ma Hsi-sha 馬西沙 & Han Ping-fang 韓秉方 entitled *Chung-kuo min-chien tsung-chiao shih* 中國民間宗教史 (Shanghai: Shang-hai jen-min ch'u-pan-she, 1991). For a description of sectarian groups on Taiwan, see David Jordan & Daniel Overmyer, *The Flying Phoenix. Aspects of Chinese Sectarianism in Taiw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An important collection of papers by Chinese, Taiwanese, and Japanese scholars which should shed further light on this problem were presented at the First Conference on Vegetarian Sects (*chai-chiao* 齋教), held in Tainan, Taiwan on May 28, 1994. These have been published in Chiang Ts'an-t'eng 江燦勝 & Wang Chien-ch'uan 王見川, eds., *T'ai-wan chai-chiao té li-shih kuan-ch'a yü chan-wang* 台灣齋教的歷史觀察與展望 (Taipei: Hsin wen-feng ch'u-pan kung-ssu, 1994).

history of late imperial Chinese sects.

Ter Haar also never fully explains why those sectarian groups in North China which became labelled “White Lotus Teachings” were so intrinsically different from the White Lotus Society of the Sung-Yüan era. I believe that this is because such groups belonged to the category of “meditational” sects described by Naquin. While ter Haar correctly argues that Naquin should not have used the term “White Lotus sectarianism” to describe all sutra-recitational or meditational sects, and that this distinction may also be applied to non-sectarian groups as well, he fails to appreciate that the groups in north China he has researched tended to be meditational sects strikingly similar to the Eight Trigrams (*pa-kua* 八卦) sect Naquin has written about (see Note 11), particularly in their teacher-pupil networks set up by charismatic and mobile specialists, their latent millenarian doctrines, and their promises to believers of positions of power following the apocalypse (pp. 142-143, 147-149 & 189). Therefore, I would argue that in fact no change in the White Lotus Society occurred, but that ter Haar’s over-emphasis on data from north China causes him to focus exclusively on meditational sects with roots in the Six Dynasties which came to be labelled as “White Lotus Teachings”.<sup>21</sup> Had the author chosen to consider data on other sectarian groups in both north and south China, he might have reached a very different conclusion.

This book also suffers from numerous errors in spelling and punctuation, the most glaring being misspelling the names of Cynthia Brokaw (“Brockaw”; pp. 25 & 322) and Timothy Brook (“Brooks”; p. 211). The name Ch’i-sha 積砂 is wrongly transliterated as Chi-sha (“Jisha”; p. 33), and while the second character of the Taoist Ch’en Chih-hsü’s 陳致虛 (fl. 1329-1336) name is erroneously written as *chih* 志 (p. 109).

In conclusion, I wish to emphasize that despite its few shortcomings, this

---

<sup>21</sup> For more on these early meditational sects, see Erik Zürcher, “Prince Moonlight’, Messianism and Eschatology in Early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 *T’oung Pao*, LXVIII (1982), 1-59.

book represents a major breakthrough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 and is sure to be required reading among students, teachers, and researchers alike for many years to come.

□中研院史語所訪問學人、清華大學兼任副教授·康豹□

Paul R. Katz

---

**James W. Tong: *Under Heaven-Collective Violence in the Ming Dynas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325pp.**

過去有關集體行動的相關研究，可說是琳瑯滿目，西方學者無論是社會心理學、政治學、社會學與歷史學等領域都有相關的研究，而中國史方面的研究過去大陸史家與日本史家也曾費力研究過群眾運動，尤其是所謂的「農民運動」。但作者湯維強以明代一朝作整體研究，且以量化的方法來分析倒是頭一回。作者在導論中說明了此課題研究的意義，因為過去有關的研究取向和理論，無論是社會心理學、集體行動或是社會結構論者，他們的理論幾乎都是溯自 Durkheim、Marx、Mill 或 Weber 等大師而來的，理論的基礎也是根據現代變遷的社會而非傳統社會為背景，所以並不見得適用於前現代（pre-modern）的社會，所以研究傳統中國仍然很重要。作者也希望藉由實證的研究以建構前現代集體行動形成的理論。而所以選擇明代為研究的對象，一則因為明代有較為完整的方志資料，而且又不像清代曾受西力影響。本書除了以量化分析明代一朝反亂的時空分佈及其特徵外，還要探討兩大問題，一是探討前現代人民為何走向反亂？他們的動機是什麼？其次是要探討他們如何能夠反亂？作者在此提出了「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與「政府能力」（regime capacity）這兩種解釋來取代過去的階級衝突與社會變遷的解釋。

作者從 237 種方志中，範圍包括了 119 個州與 1097 個縣內，找出 630 個記載是「起」或「亂」的個案作量化分析，時間範圍以 1371 年至 1644 年間為限，西南四省因為資料缺乏而省略，另外，少數民族的反叛也略去。作者在資料上還會仔細地利用各種不同的方法來檢證其所蒐集的事件數量，

如以省志、府志比照縣志的記載，視其三者之間有關反亂事件的記載是否有詳略或多寡的差異，結果顯示在詳略雖有不同，但事件數量並無太大的差別。作者甚至將方志內反亂事件數量的記載與《實錄》、《明史》、筆記小說以及方志內〈列女〉、〈忠義傳〉內的記錄相對照，結果顯示差異亦不大。時間分佈顯示其中五分之四是集中發生在明代後期，有三個高峰期：武宗朝（1506-25）、世宗朝（1545-65）及熹宗思宗朝（1626-44）。空間上的分佈則是四分之三在華南，而且華南地域的差異亦大，如閩、廣加起來的例子就占一半，南北直隸則很少，湖廣、江西也不多。華北地域性差異較小，普遍來說華北各地發生的頻率都很小，其中以河南、山西最少。

這些反亂若依其性質來分的話，三分之二是掠奪性質的土匪，三分之一是饑民。至於明代的反亂算不算是「農民運動」呢？作者發現反亂的領導人有的是小販、商人、生員與僧侶，只有少數的反亂領導是農民，而更多的例子是鹽梟、鹽徒、礦工與士兵等等。再就地域的差異來看，華南類型比華北多，大概因為華南經濟較發達，有較高程度的社會分化，加上地形崎嶇，使華南的反亂較多樣化。華北的特徵則多是有組織的反亂，如教民叛亂、兵變與礦徒的暴動，這類的反亂比重要比華南高，規模也比華南大。

至於反亂的動機為何呢？作者研究後認為人民反亂的基本原因是生活困難，但其動機取決兩方面的「理性」考慮，一是荒年生存之可能性（視災荒的程度大小與政府救荒的效率而定），其次是違法反亂維生而又能避免法律治裁的可能性（視地方之軍隊與團練鎮壓能力與效率與否等原因而定），反亂發生的時機多是人民在荒年生存的可能性愈小，但違法反亂而生存的可能性愈大的時候。如果維生的經濟情況愈艱難，政府救荒制度又緩不濟急，再加上法律愈鬆弛，政府的軍隊無力鎮壓，人民就會考慮以掠奪方式維生，所以反亂的土匪就愈多。作者的統計顯示明朝政府的財政支出與赤字，恰與人民反叛呈正相關。由此可知，明朝政府的行政效率也影響到反亂出現的可能性，晚明政府的腐敗現象包括了貪污、軍事體系的崩潰、財政體系的崩潰、救荒制度的衰退等等原因都增加了人民走向反亂的機會。尤其是救荒制度的影響最大，若統計明末政府的救荒頻率表面上



看來雖未有太大的變化，但實際上明末的災荒頻率已增高了許多。政府的行政效率在地區上也有差異，愈接近中央的核心區愈少反亂的發生，愈偏遠的邊陲區則反亂愈多。

接著作者也根據統計的結果來檢討過去解釋反亂的兩種說法：社會變遷論與階級衝突說。社會變遷與反亂是否相關，作者以江南作為反證。江南地區是社會變遷最大的地方，但是反亂事件卻很少，反而社會變遷並非最劇烈的閩粵地區是反亂最多的地區。而城市化與反亂之間也看不出相關性，因為明代城市化的起步期是由嘉靖中期（1545）到萬曆時（1567-1620）是最興盛時期，但與反亂事件發生的三個高峰期並不相合，反到是反亂發生較少的時代。但作者也承認仍有一些集體暴動事件是與社會變遷有關，如商人的罷市、工匠罷工、反抗礦稅、糧食暴動與械鬥等等，這些都是發生在社會變遷特別劇烈的城市內。所以社會變遷的說法有助於解釋城市暴動的發生，但此說法與整個明代反亂並無關聯性。為何社會變遷下並無太多的反亂事件，可能因為政府利用儒家思想透過科舉與鄉約等工具傳播教化成功，加強了菁英與大眾之間文化整合。同時政府也利用控制與組織工匠和商人的方式來控制社會變遷的腳步。再加上傳統的血緣組織的力量以及商業化的影響有助改善農村失業情形，緩和社會變遷的壓力。

至於階級衝突的理論可以解釋明代的反亂嗎？作者以三類導因階級問題——反宗室、奴變、佃變抗租——的反亂為例來研究。首先作者發現反宗室主要發生在明清易代之際，在明亡以前的例子很少，而且宗室莊田分佈的空間與反亂發生的空間分佈不相合，在時間上宗室的人口數量與莊田數量膨脹的時間都和反亂發生的時間不相合。可見得與宗室的衝突不是人民反亂的主要原因。而奴變只出現在六個地區，而且也多是在明清易代之際。佃變抗租的例子只集中在蘇州府與泉州府，例子也很少。所以這三類階級衝突事件在整個明代反亂中只算是少數。為何這種階級衝突的例子那麼少，可能是資料上的遺漏，也許正因為這些事件不構成地方社會的威脅，所以方志中才不記載。另外，政府的干涉主義下也在法律上明定主僕關係與約束莊田的收租，而且明代佃農的租額也有降低的趨勢。

最終，作者認為明代的反亂是民眾在「理性選擇」與「政府能力」制約下的結果，而明代社會變遷下的衝突與階級衝突所以不構成大問題，也

是因為政府法令與行政制約的結果。而且明代也還未達到歐洲一般的深層社會分化與強烈的階級意識形成之階段。

作者以其深厚的社會科學背景下從事這樣科際整合的史學研究，我們在這本書中可以看到許多優點。以往中國史學界在研究群眾的集體行為大多仍是走社會變遷論與階級衝突說，很少史家曾注意到西方學界有關集體行動這樣多樣化的理論與解釋，使得所有的研究都局限於前兩種解釋，作者在這方面可以說是一大突破。在方法上作者對於量化方法的運用可說是駕輕就熟，在龐大的方志史料中找到這些事件並將其多種變數量化分析，這樣的努力著實讓人激賞。更值得稱讚的是作者企圖透過中國史的研究來建構前現代的集體行動理論，把中國史帶入西方學術領域內，並且與西方理論對話，這樣的企圖無論成功與否都是值得敬佩的。

其次，本書的優點之一就是作者還不忘與其它朝代及歐洲的情形作比較。作者以其研究和楊慶堃有關晚清變亂的量化研究作比較後發現，兩個朝代的反亂有許多相似點，如都是以土匪和叛亂為主，兵變、抗租、抗稅例子都只占少數。但不同的是南北差異的變化，廣東由明代高頻率地區至清代轉變成低頻率區，而南直隸則由低頻率區變成高頻率區。又清代的「互助團體」（communal groups）的活動較明代多。作者又比較 Charles Tilly 研究歐洲的例子後發現，中國在明代多為反抗礦稅與糧食暴動這類為主的反動型集體行動（reactionary collective action），而較少像歐洲以行會、社團的對抗以及宗教戰爭等暴動為主流的原始型（primitive），至於像現代歐洲的請願示威與罷工等這類具強烈要求的激進型（proactive）暴動，在明代亦很少見。可能是因為當時中國社會的分化未如歐洲。

不過本書也有一些小缺失，首先是作者在書中第 56 頁中利用《大明一統志》的人口數字來評估反亂與人口的關係。《一統志》一書成書年代在英宗天順年間（1461），但是明朝自十五世紀中葉以後人口數字就因為里甲制度的崩潰、鄉紳庇護隱漏戶與官員胥吏的舞弊等原因，致使人口數字下降而與真實人口數差距愈來愈大。所以一般史家都認為明代人口的數字還是明初太祖製作黃冊時的數字較接近真實，以後許多地方的統計數字是大同小異地編造出來的。本書作者在書中竟然未參考到何炳棣與梁方仲等學者的研究，以致會發生這樣的錯誤。

其次，本書在第七章內有關宗室與反亂的關係雖然經過他的檢證，認為宗室莊田分佈的空間與反亂發生的空間分佈不相合。不過，反亂發生的因素中也許是多重的原因造成人民生活的困難，即使大多數的反亂發生是與宗室無關，但更應該去分析那些發生在宗室所在地的反亂，看看這些反亂的群眾到底是不是宗室莊田下的農民。而文中他認為授給宗室的莊田多為官田，這樣一來造成政府財政收入的減少，於是只好加重百姓的負擔，間接導致明朝財政的危機。但是莊田對財政稅收的影響恐怕有限，其實欽賜之莊田多為官田與永不起課的荒田，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一書中即以福王為例指出，關於福王莊田的若干情節，中外學者多有誤解。當時萬曆指令以四萬頃為福王的莊田，而萬曆所真正為福王索要的，則不在田土而在佃金。因為河南民間的新開墾田地，稱為「白地」，其所有權常常發生問題。地方官對這種田地所徵收的賦稅，既不歸入一般的田賦，也很難視為官田的地租。山東由於黃河河道的變遷，被淹後的田地重新開發，情形亦復類似。湖廣則因河流湖泊眾多，昔日之湖沼成為圩田，河岸瘠土僅徵「蘆課」者至此也有成為良田的趨勢。此外，各省還有被抄沒的莊田等等，所以情況極為複雜。這些土地的賦稅收入，縱未盡入地方官之私囊，但也從未作公開而詳盡的交代。萬曆的意圖，即要三省地方官從這筆收入中每年繳納銀46000兩，以作福王府的開支。而遲至1617年，湖廣官員只表示願承擔銀3659兩。另外，宗室藩王向人民奪買之民田也要呈報有司，編差納稅。而且明代史料中諸王府逼奪民田豪奪民業事例是極其有限。由此看來，莊田的地租並不影響財政收入太大。

另外，作者的「理性抉擇」與「政府能力」理論雖然可以說明晚明陝西流寇形成原因是災荒多、地處偏遠、政府救荒與鎮壓無力等等，但是有趣的是作者的統計中發現福建與廣東是發生反亂最多的地區，那麼為何最後使明滅亡的是來自陝西的流寇，為何同樣是地處偏遠的閩粵之反亂不會像流寇形成大規模運動，這樣他的理論仍然無法解釋到底中國在何種情況下的哪些地區是最易形成威脅政權的大規模反亂？在此也體現出這本書的兩層問題，首先是作者忽略了反叛的規模在地域上的差異。作者雖然在第三章時也以反亂所影響的縣數作標準來估計反亂的規模，但是他是每一省所有反亂事件所影響的縣數作估計，最後的結果仍然是福建與廣東兩省

排名第一，這其實是不良的量化方法下所給人的一個錯誤印象。如果將各省平均每一個反亂事件所影響到的縣數作一估計的話，就會發現另一種結果。以下表列出重新估計的數字：

省份	1368-1644年間的 反亂事件數量	反亂影響到 到縣份數	每一事件所影響 的縣數	排名
北直隸	25	103	4.12	1
山東	23	70	3.04	2
河南	23	34	1.48	6
山西	25	30	1.02	10
陝西	42	95	2.26	3
湖廣	38	51	1.34	8
江西	53	76	1.43	7
南直隸	29	34	1.17	11
浙江	26	34	1.31	9
福建	107	159	1.49	5
廣東	239	409	1.71	4

由上表中就可以看到其實北直隸、山東與陝西三省平均每個反亂事件的規模都要比福建與廣東大，影響所及的縣份至少都在兩個以上。因此我們才可以知道廣東與福建反亂雖多，但是因為規模較小，所以對明朝的威脅反而不及陝西之嚴重。其次的問題是為何不在別的省份，而是在陝西形成大規模的反亂？作者雖然在第四章中分析了荒年的成因，在第五章中分析了明政府的制度，但是都未觀察到地域性的差異，使其理論在解釋上不夠周延。其實就以財政制度而言，明末的「三餉」在各地有不同程度的加派，但是各地也因為經濟條件的不同，對加派的忍受程度也有差異，這也是為何明末的流寇起於經濟落後的陝西，而不是經濟較發達的福建與廣東之原因。

在此也想提出有關本書的幾點建議。可能因為作者是社會學家，所以在參考二手資料時大多是英文著作，對日本學者的研究只參考了已經翻譯成英文或中文的作品，因此一些較新的著作都無法參考到，使本書失色不

少。其次，作者雖然說明過因為史料上的局限，所以不能探討現代集體行動理論的相關問題，如參與人數、傷亡人數與延續的時間等等，但是筆者以為雖然大多數方志資料中的記載並不詳細，但若參照其它的史料（尤其筆記小說）將會發現一些個案是有較完整記載的資料，可以探討他們的心態、動員的方式以及動員的組織等等較深入的問題，最近日本有幾位年輕的明清社會史家正在嘗試這種研究取向，而且也有初步的成績發表，值得參考。

無論如何，這本書的成績是不容磨滅的，它不只是一本量化史學的好範本，也是社會學與史學結合的佳作，更重要的是它把中國史的研究理論化。這些優點都是值得激賞的。

□臺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巫仁恕□

##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稿約

- (一)本通訊蒐集近代中國史研究之各項資料，俾供研究參考，園地公開，歡迎各界惠賜未出版之稿件，中、英文不拘。
- (二)本通訊暫定為半年刊，每年三、九月各出刊一期，一、七月底截稿。
- (三)來稿除特約者外，以不超過五千字為宜，請依本刊格式用有格稿紙謄寫，亦可附寄相關照片。
- (四)來稿請署真實姓名、詳細地址和聯絡電話。
- (五)本通訊編輯委員會對於來稿如有重大刪改，將商請作者同意。
- (六)採用之稿件，致贈作者當期通訊五份。
- (七)來稿請寄臺北市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收。



##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

(1993年10月～1994年9月)

江 淑 玲\* 輯

(1993) 10.5 由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和香港大學歷史系聯合主辦的「京港清史學術討論會」，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會期三天（至7日），京港地區數十名專家學者出席會議，發表論文三十餘篇，就清代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民族關係等各方面問題展開討論。

11.26 「蒙古史料諸問題」國際討論會，由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東亞的社會變容與國際環境」研究計畫主辦，會期二天（至27日），會議由該研究計畫主任中見立夫先生主持，來自中國、蒙古、日本的二十多名學者出席會議，宣讀論文十一篇，內容涉及以蒙、漢、滿、藏、日等文字撰寫的有關十八至二十世紀的蒙古史料。

(1994) 1.13 「明清以降東北亞區域經濟文化研究會」之成立會及第一屆學術研討會，在哈爾濱市召開，會期二天（至14日），該會旨在研究東北亞地區各國明清以來的歷史演變和現實狀況，包括各國的經濟發展、文化形態、政治狀況、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在學術討論會方面，與會代表提交論文近二十篇，內容涉及歷史和現實的諸多問題。

3.24 美國亞洲學會年會於波士頓舉行，會期四天（至27日）。會中議程之一為「梁啓超研究之新趨勢」，提出論文四篇，邀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張朋園先生擔任總評論。

4.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學術討論會，由副研究員賴惠敏小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審

姐報告：〈清代皇族的家庭結構與財產分配〉。

4.15 美國史丹福大學墨子刻 ( Thomas A. Metzger ) 教授應邀至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所演講二場，分別為 15 日：〈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發展與公民社會的問題〉、18 日：〈二十世紀中國的烏托邦主義與李澤厚的歷史觀〉。

4.16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及平埔研究工作會聯合舉辦「平埔族群研究學術研討會」，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舉行，會期二天（至 17 日），發表論文十七篇。

4.2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學術討論會，由研究員魏秀梅小姐報告：〈琦善在兩江的政績，1825~1827〉。

4.29 「加州與太平洋圈：過去、現在、未來 ( California and the Pacific Rim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 」國際學術研討會，由美國太平洋大學 ( University of the Pacific ) 主辦，會期三天（至 5 月 1 日），此會議係探討太平洋圈之歷史，包括美國、加拿大、日本、中國大陸、台灣、香港、紐西蘭、澳洲等地區，有助於亞太地區之了解。

5.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學術討論會，由研究助理游鑑明小姐報告：〈日據時期的台籍護士〉。

5.14 「中國法制史研討會」在國立政治大學舉行，由該校法律系主辦、中國法制史學會協辦，討論議題為：〈民國初年之法律改革〉、〈日治時期台灣之刑事司法〉、〈淡新檔案之整理〉、〈未來台灣法制史之研究方向〉、〈淺談清代法制及其運作——以霧峰林家京控案為例〉。

5.18 由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主辦、自立晚報協辦，邀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徐正光先生演講，講題：〈台灣的族群關係——以客家人為主體的探討〉。

5.1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郭廷以先生史學講座講演會，邀請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周質平教授演講，講題為：〈白話文與簡體字〉。

5.20 美國史丹福大學歷史系為范力沛教授 (Prof. Lyman Van Slyke) 榮退而舉辦「中國現代史新觀點會議」，會中主講人及講題如下： Emily Honig, "Native Place and the Creation of Chinese Ethnicity"; Bryna Goodman, "Native Place Ties in Urban Spaces: Variations and Modern Meanings";

Carol Benedict,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Disease in China; Problems and Prospects"; Sun Lung-kee, "The Presence of the *Fin de Siècle* in the May Fourth Era"; Ch'en Yun-fa, "Reconsidering the Yan'an Way: From Rectification to Cadre-screening and Spy-hunting"; Dorothy Ko, "Footbinding Is History"; Gail Hershatter, "Sexing Modern China".

5.27 由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主辦、自立晚報協辦，邀請東吳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教授張家銘先生演講，講題：〈台灣近代社會階層史研究芻議〉。

6.2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舉行學術研討會，由研究員梁其姿小姐演講：〈清中後期施棺及綜合性善堂的發展〉。

6.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執行計畫「菲律賓華人史料基礎調查與搜集」（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補助），其結案會議假該所舉行，會中由洪玉華、吳文煥、朱法源（及潘露莉）主講，講題分別為：〈菲律賓檔案館和珍本書中的華人資料〉、〈菲律賓華僑義山碑文的史料價值〉、〈菲華口述史工作報告〉。

6.10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舉辦學術座談會，主題為：「台灣近代經濟史研究面面觀」。

6.10 由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主辦、自立晚報協辦，邀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林滿紅小姐演講，講題：〈1895——兩岸關係史上的重要年份〉。

6.11 由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贊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持之「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計畫，舉辦第四次學術座談會，由張朋園先生主講：〈梁啟超的兩性觀：論傳統對知識分子的約束〉、王樹槐先生主講：〈康有為對女性及婚姻的態度〉、賴惠敏小姐主講：〈清代皇族婦女的家庭地位〉、李貞德小姐主講：〈最近宗教史研究中的女性問題〉、胡曉貞小姐主講：〈最近西方漢學界婦女文學史研究之評介〉、呂芳上先生主講：〈抗戰時期的女權論辯〉。

6.1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郭廷以先生史學講座講演會，邀請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東亞研究所郭恆鈺教授演講，講題為：〈孫中山的聯俄政策〉。



6.20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舉辦學術討論會，由方孝謙先生主講：〈弱勢霸權控制的完成：日據下台灣人民的文化經驗（1895～1945）〉。

6.25 「甲午戰爭一百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所主辦，會期三天（至27日），發表論文三十二篇。此次與會出席學者多為國內外中國近代史及台灣史專家。各篇論文分就甲午戰爭的四個議題「戰前的國際外交局勢」、「海戰與陸戰」、「馬關議和與割台」、「結果與影響」進行討論，從各種歷史角度觀察此一歷史事件。

6.2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郭廷以先生史學講座講演會，邀請美國哈佛大學孔復禮教授演講，講題為“Participation and Authority i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Wei Yuan”。

6.3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郭廷以先生史學講座講演會，邀請美國戴維斯加州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劉廣京先生演講，講題為：〈晚清歷史與中國歷史〉。

7.1 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舉辦學術討論會，由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教授林金枝先生主講：〈華僑與中國革命和建設〉。

7.5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舉辦學術研討會，由康豹（Paul Katz）先生主講：〈牡丹社事件中的疾疫問題〉。

7.8 中央研究院舉辦「吳大猷院長榮退學術研討會」，會期二天（至9日），會中與近代史有關者有張玉法院士主講：〈台海兩岸史學發展之異同（1949～1994）〉、黃富三先生主講：〈台灣的商業傳統——自荷治時代至清代〉。

7.1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郭廷以先生史學講座講演會，邀請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張灝先生演講，講題為：〈轉型時代（1895-1920）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與文化史上的重要性〉。

7.13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辦學術座談會，由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政治社會研究室主任李強先生主講：〈大陸有關台灣研究的概況〉。

7.13 「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由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及國立台灣大學、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所共同主辦，會期三天（至15日），發表論文二十一篇，與近代史有關者有十篇。即〈論清代邊疆民族的離心運動

〉（李治亭）、〈如何評價清朝的統一和南明的抗清鬥爭〉（王天有）、〈滿清入主及其文化承緒之國家統一政策〉（王爾敏）、〈清代前期少數民族在實現與維護國家統一中的作用〉（關捷）、〈地方勢力擴張與晚清政局〉（茅家琦）、〈聯邦主義與民國的分與合〉（胡春惠）、〈民國以來政權統合的方式與主張（1912~1949）〉（蔣永敬）、〈試論袁世凱的集權政治與省區的地方主義〉（張憲文）、〈1895——兩岸關係上的重要年份〉（林滿紅）、〈歷史意識與廿一世紀海峽兩岸關係展望〉（黃俊傑）。（參閱本期會議報導）

7.24 林本源基金會舉辦台灣研究研討會，邀請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蔡慧玉小姐主講：〈日治時代台灣保甲戶籍行政〉。

8.11 南京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張憲文先生，應邀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講題：〈大陸民國史研究述評〉。

8.19 「近代中國檔案研討會」在柏克萊加州大學召開，會期三天（至21日），共提出報告二十五篇，會議分(一)檔案的開放與利用，(二)追尋資料，(三)擴大編目檢索檔案技術，(四)清代檔案，(五)典藏與維護，(六)近代史等議程進行討論。（參閱本期會議報導）

8.29 由遼寧大學歷史系主辦的「第七屆全國暨國際清史學術討論會」，在遼寧省瀋陽市召開，會期五天（至9月3日），會議旨在結合清軍入關，研討其對中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及中外關係諸方面的影響。

8.30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舉辦學術研討會，由國立台灣大學日本綜合研究中心主任許介麟先生演講：〈戰後台灣史的一些政治問題〉。

9.1 由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理學會主辦的「1994年海峽兩岸檔案管理暨微縮技術交流研討會」，假台北力霸大飯店舉行，會期三天（至3日），共發表二十九篇論文，有大陸學者十四人來台參加。

9.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學術討論會，由研究員熊秉真小姐報告：〈驚風——中國近世兒童疾病研究之一〉。

9.6 「甲午戰爭一百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在山東省威海市舉行，由山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山東社會科學院等主辦，會期五天（至10日），討論會主題為「甲午戰爭與近代中國和世界」。

9.12 「第十一屆世界經濟史大會」在義大利米蘭舉行，會期五天（至16日），此會係以歐洲為主體的經濟史大會，亦是經濟史方面最大的國際聯合會。台灣出席者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林滿紅小姐及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陳國棟先生，分別宣讀論文：“Decline or Prosperity? Mainland China's Merchant Trading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1820~1895.”、“Shipping and Trade of Chinese Junks in the Southeast Asia, 1730~1830: A Survey.”

9.1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學術討論會，由研究員陳三井先生報告：〈吳稚暉與里昂中法大學之創設〉。

9.23 「第四十三屆美國中西部地區亞洲研究學會年會」，由 Western Illinois University 主辦，並由華裔學者謝文孫教授擔任學會主席，會期三天（至25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陳三井先生應邀作貴賓報告——「談中央研究院的東南亞研究」、副研究員陳秋坤先生應邀宣讀論文：“From Uncivilized Aborigines to Landed Proprietors: Taiwan Aboriginal Land Rights, 1690-1850”、國立中興大學副教授蔡慧玉小姐亦應邀宣讀論文：“Taiwanese Identity as Recollected, Reinvoked, and Reinvented: Findings of a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on Taiwanese Elders, 1992-94.”。

9.2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學術討論會，由研究助理李達嘉先生報告：〈晚清的重商思想與重商政策〉。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論文集

### 「認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論文集

568 頁      精裝 1200 元 平裝 1100 元

本書係民國八十三年元月十二日至十四日，近史所與柏克萊加州大學共同主辦研討會之會議論文集，計中、英文論文共二十篇。



## 新書出版消息

張珍琳\*輯

### 一九九二年出版

- 上海通社編 上海研究資料 上海 上海書店 六九六頁  
 上海通社編 上海研究資料續集 上海 上海書店 七五六頁  
 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 延安整風運動 西安 陝西人民出版社 八月 三八一頁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編 社會變革比較研究：近代中國社會變革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十一月 三一九頁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 第五、六冊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九月 一二二一頁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蔣介石年譜初稿 北京 檔案出版社 十二月 八八四頁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藝術局主編 中國美術五十年（1942~1992） 杭州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五月 四〇五頁  
 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一屆討論會秘書處編 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 臺北 國史館 十二月 九一〇頁  
 王波 彭德懷入朝作戰紀實 石家莊 花山文藝出版社 八月 二四八頁  
 王聿均、萬紹章 朱家驊先生之事功與思想論集 臺北 中華民國聯合國同志會 五月 一四六頁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約用助理

- 天津市歷史博物館等編 近代天津圖志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二七三頁
- 石之瑜 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原理：變遷中的市場社會主義文化 臺北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八月 二七七頁
- 李健編著 中南海咏嘆錄 二冊 北京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十一月 七八七頁
- 肖黎等主編 影響中國歷史的一百個洋人 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十二月 四七五頁
- 沈嘉榮 太平天國史略 南京 南京出版社 十二月 三五二頁
- 何思謎編 抗戰時期專賣史料 臺北 國史館 六月 五六〇頁
- 朱志騫 南京臨時政府財政問題之研究（民國元年一月～四月）：中山先生辭讓臨時大總統的金錢因素 臺北 知音出版社 七月 二六三頁
- 朱瑞月編 國民革命建軍史·第一部：建校建軍與東征北伐 臺北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一月 六五六頁
- 西南師範大學歷史系等編 重慶大轟炸（1938～1943） 重慶 重慶出版社 二一三頁
- 金冶主編 回憶譚震林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三月 五五四頁
- 馬文奇等 張聞天經濟思想研究 西寧 青海人民出版社 十二月 二二一頁
- 姚仲明等主編 將軍、外交家、藝術家：黃鎮紀念文集 北京 解放軍出版社 六月 七九〇頁
- 重慶市檔案館編 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經濟法規 二冊 北京 檔案出版社 七月 一四一八頁
- 晉察冀革命根據地工人運動史編寫組編 晉察冀革命根據地工人運動史：1937.7～1949.9 北京 中國工人出版社 十一月 三四三頁
- 高振農 佛教文化與近代中國 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十一月 四〇九頁
- 高曉星、時平編著 民國空軍的航迹 北京 海潮出版社 十二月
- 高繼仁編著 中國工業經濟史 開封 河南大學出版社 十二月 二六二頁

- 徐之河、徐建中 中國公有制企業管理發展史（1927～1965） 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八月 四二一頁
- 張全盛、魏卞梅編著 日本侵晉紀實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十二月
- 張癸 中國民主黨派史綱（1927～1989）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一四一頁
- 張家昫 模範軍閥：馮玉祥 臺北 久大文化出版公司 七月 二二二頁
- 張敏鈺口述、唐小山撰述 平凡中創新機：張敏鈺回憶錄 臺北 卓越出版社 十月 二二七頁
- 張瑛 蔣介石「清黨」內幕 北京 國防大學出版社 三〇四頁
- 野添憲治著、張友棟等翻譯 花岡事件記聞 保定 河北大學出版社 十二月
- 崔丕 近代東北亞國際關係史研究 長春 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 五月 四一二頁
- 章清 胡適評傳 南昌 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八月 三二九頁
- 郭潤宇 陝西民國戰爭史 上冊 西安 三秦出版社 十一月 三一一頁
- 陳清輝 李卓吾生平及其思想研究 臺北 文津出版社 十月 六一三頁
- 黃枝連 亞洲的華夏秩序：中國與亞洲國家關係形態論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四一三頁
- 黃新憲 中國近現代女子教育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六月 二〇二頁
- 黃福慶主編 澳門專檔(一) 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十二月 五六四頁
- 彭雨新編 清代土地開墾史資料匯編 武漢 武漢大學出版社 十二月 七五六頁
- 湖北省檔案館編 漢冶萍公司檔案史料選編 二冊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解學詩 歷史的毒瘤：偽滿政權興亡 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四一七頁
- 楊克林、曹紅編著 中國抗日戰爭圖志 三冊 香港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一一〇〇頁
- 聞黎明 聞一多傳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十月 四四七頁

- 福建省社會科學聯合會編 林則徐研究論文集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一月 四六〇頁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 臺灣總督府檔案中譯本第一輯 南投 臺灣省文獻  
委員會 七月 五四八頁
- 葉仁昌 五四以後的反對基督教運動：中國政教關係的解析 臺北 久大  
文化出版公司 六月 二七三頁
- 潘君祥、沈祖煒主編 近代中國國情透視：關於近代中國經濟、社會的研  
究 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十二月 四一五頁
- 潘念之主編 中國近代法律思想史（上） 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四月 四五八頁
- 鄭功、季谷譯 新中國：中國大陸、台灣、香港經濟發展之比較 臺北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五月 三一二頁
- 鄭春苗等編著 中國近代史新編：1840~1949 大連 大連理工大學出版  
社 十二月 六一二頁
- 劉維開編 國民政府處理九一八事變之重要文獻 臺北 中國國民黨中央  
委員會黨史委員會 七二四頁
- 顏清滄 海外華人史研究 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 七月 三四三頁
- 薄一波 薄一波文選（1937~1992）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十二月 六三  
五頁
- 顧昕 中國啓蒙的歷史圖景 香港 牛津大學出版社 二二七頁
- 山本有造 日本殖民地經濟史研究 名古屋大學出版會 二月 三一三頁
- 山根幸夫等編 近代日中關係史研究入門 東京 研文出版 四六七頁
- 小澤重男等 モンゴルという國 東京 讀賣新聞社 十二月 二六七頁
- 矢沢利彦 西洋人の見た中國皇帝 東京 東方書店 五月 二三〇頁
- 江田憲治 五四運動の上海勞働運動 京都 同朋舍 一月 一二七頁
- 伊原吉之助 台灣の政治改革年表・覺書（1943~1987） 帝塚山大學  
七月 三六五頁
- 李大維著、磯崎新太郎譯 モンゴルの夜明け：モンゴル族自治獨立の悲  
願 東京 めいけい出版 七月 一七〇頁
- 神田信夫先生古稀紀念論集編纂委員會編 神田信夫先生古稀紀念論集：

- 清朝と東アジア 東京 山川出版社 三月 六二一頁
- 島田正郎 清朝蒙古例の實效性の研究 東京 創文社 十一月 三八八頁
- 清水稔 湖南五四運動小史 京都 同朋舎 一月 一四五頁
- 龜井茲明 日清戰爭從軍寫真帖：伯爵龜井茲明の日記 東京 柏書房 七月 三二五頁
- 臺灣總督府編、河原功監修 台灣日誌 東京 綠蔭書房 三月 三八一頁
- 臺灣經世新報社編、緒方武歲解説 台灣大年表 東京 綠蔭書房 三月 二七九頁
- 齋藤道彦 五・四運動の虚像と實像：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 東京 中央大學出版部 二九四頁
- Anderson, Kym ed. *New Silk Roads: East Asia and World Textile Markets*.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45pp.
- Brown, Claudia and Chou, Ju-Hsi. *Transcending Turmoil: Painting at the Close of China's Empire, 1796-1911*. Phoenix: Phoenix Art Museum, 368pp.
- Connelly, Marisela and Bustamente, Romer Cornejo. *China-América Latina: Génesis y Desarrollo de sus Relaciones*. Mexico City: El Colegio de Mexico, 196pp.
- Copper, John F. *China Diplomacy: The Washington-Taipei-Beijing Triangl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0pp.
- Dong, Fureng. *Industrialization and China's Rural Modernization*. New York, N.Y.: St. Martin's Press, 113pp.
- Gill, R. Bates. *Chinese Arms Transfer: Purpose, Patterns and Prospects in the New World Order*. Westport, Conn. and London: Praeger Publishers, 248pp.
- Guo, Jiann-Jong. *Price Reform in China, 1979-86*.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5pp.
- Haar, B.J. ter. *The White Lotus Teachings in Chinese Religious History*. Leiden; New York: E.J. Brill, 343pp.
- Hood, Stephen J. *Dragons Entangled: Indochina and the China-Vietnam War*.



- Armonk, N.Y.: M.E. Sharpe, 188pp.
- Li, Yu-ning ed. *Chinese Women Through Chinese Eyes*. Armonk: M.E. Sharpe, 280pp.
- Moody, Peter R. *Political Change on Taiwan: A Study of Ruling Party Adaptability*. New York: Praeger, 209pp.
- Nish, Ian Hill. *Japan's Struggle with Internationalism: Japan, China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1931-3*. London; New York: K. Paul International, 286pp.
- Ody, Anthony J. *Rural Enterprise Development in China, 1986-90*.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45pp.
- Ogden, Suzanne eds. *China's Search for Democracy: The Student and the Movement of 1989*. Armonk: M.E. Sharpe, 451pp.
- Pan, Lynn. *Tracing it Home: Journeys Around a Chinese Family*.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236pp.
- Peyrefitte, Alain. *The Immobile Empir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630pp.
- Rawski, Thomas G. and Li, Lillian eds. *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62pp.
- Richter, Ursula. *Zweifeln am Altertum: Gu Jiegang und die Diskussion über Chinas Alte Geschichte als Konsequenz der "Neuen Kulturbewegung" ca. 1915-1923*. Stuttgart: Münchener Ostasiatische Studien Band 60, Franz Steiner Verlag, 322pp.
- Salisbury, Harrison E. *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544pp.
- Wang, Gungwu.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 Wright, Tim ed. *The Chinese Econom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Basingstoke: Macmillan, 220pp.
- Yu, Renqin. *To Save China, To Save Ourselves: The Chinese Hand Laundry Alliance of New York*.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53pp.

### 一九九三年出版

- 丁日初主編 近代中國 第三輯 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五月  
三三二頁
- 中央檔案館等合編 偽滿憲警統治 北京 中華書局 九三三頁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毛澤東年譜（1893～1949） 三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十二月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朱德傳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八月 八一二頁
-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譯處編 國外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論著目錄大全：1919～1989 北京 中共黨史出版社 三月 六三一頁
-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青運史研究所編 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史辭典 瀋陽 遼寧人民出版社 六六六頁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 第九、十冊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十一月 一二八二頁
-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著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黨派 北京 檔案出版社 十二月
- 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二屆討論會秘書處編 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二屆討論會 臺北 國史館 十二月 八九二頁
- 王守稼等 毛澤東晚年過眼詩文錄 二冊 臺北 風雲時代出版公司 十一月
- 王俯民 蔣介石詳傳 二冊 北京 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五月 一六三六頁
- 王鳳賢、丁國順 浙東學派研究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三月 四三六頁
- 毛毛 我的父親鄧小平 臺北 地球出版社 五九三頁
- 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編 清代黃河流域洪澇檔案史料 北京 中華書局 十月 九五〇頁
- 北京同仁堂史編委會編 北京同仁堂史 北京 人民日報出版社 四月 一九〇頁
- 矢吹晉著、魏珠恩譯 毛澤東與周恩來 臺北 倉頡出版社 三月 二二二頁

- 田本相主編 中國現代比較戲劇史 北京 文化藝術出版社 六九二頁  
艾達·普樂特著、廖中和等譯 漢家女 臺北 臺灣學生書局 八月 一  
九八頁
- 牟鍾鑒、張踐 中國民國宗教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十二月  
朱瑞月編 國民革命建軍史·第二部：安內與攘外 二冊 臺北 國防部  
史政編譯局 一月 一六七四頁
- 朱瑞月編 國民革命建軍史·第三部：八年抗戰與戡亂 二冊 臺北 國  
防部史政編譯局 一月 一七三五頁
- 宋光宇編 臺灣經驗(一)——歷史經濟篇 臺北 東大圖書公司 十月 二  
六四頁
- 宋家珩、董林夫 中國與加拿大：中加關係的歷史回顧 濟南 齊魯書社  
三月 三六六頁
- 余子道 長城風雲錄：從榆關事變到七七抗戰 上海 上海書店 五月  
五九三頁
- 何布峰 中國民國軍事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十二月  
何艾生 中國民國科技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十二月
- 何培夫主編 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澎湖縣篇 臺北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六月 二五六頁
- 杜春和編著 光緒朝黑龍江將軍奏稿 二冊 北京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  
複製中心 十二月 八五三頁
- 沈君山、黃俊傑編 耕耘歲月——沈宗瀚先生自傳及其他 臺北 正中書  
局 十二月 五四七頁
- 李松林 蔣介石的臺灣時代 臺北 風雲時代出版公司 十一月 四九〇  
頁
- 李松林 蔣經國的臺灣時代 臺北 風雲時代出版公司 十一月 三九八  
頁
- 李尙英 中國清代宗教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十二月  
李國鼎著、趙建中譯 臺灣經濟發展背後的政策演變 南京 東南大學出  
版社 四月 一五一頁
- 李銳 三十歲以前的毛澤東 臺北 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十二月 六四四

- 頁
- 李銳 廬山會議實錄 臺北 新銳出版公司 十二月 三八九頁
- 呂偉俊、王德剛 馮國璋和直系軍閥 鄭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七月 三〇三頁
- 吳方 末世蒼茫——細說晚清思潮 臺北 風雲時代出版公司 八月 二三一頁
- 吳思 中國頭號農民：陳永貴浮沈錄 臺北 新銳出版公司 十二月 三〇〇頁
- 吳倫霓霞編 邁進中的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三十年（1963~1993） 香港中文大學 二九五頁
- 季鴻生編著 中美關係五十年 上海 百家出版社 三月 二三二頁
- 周雨 大公報史：1902~1949 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 七月 四四八頁
- 周育民、邵雍 中國幫會史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三月 八五四頁
- 林衡哲、張恆豪編著 復活的羣像——台灣三〇年代列傳 臺北 前衛出版社 三二一頁
- 雨辰 西安事變 北京 中國青年出版社 十二月
- 尙明軒、尙列 廖仲愷 北京 中國青年出版社 十二月
- 施松寒 張聞天思想研究：東北工作時期 北京 中共黨史出版社 四月 二七一頁
- 英子編 中國外交秘聞 北京 團結出版社 四月 三四四頁
- 胡國台訪問、郭瑋瑋紀錄 劉真先生訪問紀錄 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十二月 三四四頁
- 姜長英 中共空軍史 臺北 中翼出版公司 十二月
- 姚守中等編著 瞿秋白年譜長編 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 二月 四八五頁
- 馬之驢 雷震與蔣介石 臺北 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十一月
- 馬子富 中國清代文學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十二月
- 馬東玉 梁漱溟傳 北京 東方出版社 十二月
- 馬洪、孫尙清主編 現代中國經濟大事典 四冊 北京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 馬興國主編 中日關係研究的新思考：中國東北與日本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瀋陽 遼寧大學出版社 二月 四七三頁
- 洪清田 彭定康治港得失 香港 天地圖書公司 三〇八頁
- 師博主編 西藏風雨紀實 北京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四五二頁
- 高奇達之助著、沙福恆等譯 「滿洲國」的終結 北京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二月 一九四頁
- 高新、何頻 朱鎔基傳：從反黨右派到鄧小平繼承人 臺北 新新聞文化事業出版公司 三一五頁
- 徐星平 弘一大師 臺北 商鼎文化出版社 三月 五三一頁
- 徐爲民編 中國近現代人物別名辭典 瀋陽 瀋陽出版社 十月 五一二頁
- 徐凱等 中國清代政治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十二月
- 孫勝柱等編 當代中國工運理論研究文選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十月
- 唐明邦主編 中國近代啓蒙思潮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二月 二四四頁
- 張弓等主編 國民政府重慶陪都史 重慶 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三月
- 張永和 李光耀傳 廣州 花城出版社 五七二頁
- 張希賢等編著 中國向何處去：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動態分析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四月 三〇六頁
- 張朋園等訪問、潘光哲紀錄 任以都先生訪問紀錄 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十二月 二〇九頁
- 張炎憲等採訪紀錄 基隆雨港二二八 臺北 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二月 三一二頁
- 張炎憲等採訪紀錄 嘉義北回二二八 臺北 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二月 二九六頁
- 張炎憲等編 臺灣史與臺灣史料：臺灣史料評析講座紀錄(一) 臺北 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十二月 三〇八頁
- 張洪祥 近代中國通商口岸與租界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三三七頁
- 張晉藩主編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大辭典 哈爾濱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十二月

- 張越 中國清代思想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十二月
- 張緒心、高理寧 孫中山未完成的革命 臺北 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十月  
三二六頁
- 陳敦德 毛澤東與蔣介石 北京 八一出版社 十月 三二七頁
- 陳潔如 陳潔如回憶錄：蔣介石的第三任妻子 北京 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三月 一九八頁
- 莊吉發主編 先正曾國藩文獻彙編 八冊 臺北 故宮博物院 十一月
- 莊永明 韓石泉傳 南投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十二月 三九四頁
- 許放 中國民國政治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十二月
- 郭兆甄、蘇方學 娃娃博士：中國原子彈氫彈元勳鄧稼先 鄭州 河南人  
民出版社 六月 三一九頁
- 郭延禮 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 第三卷 濟南 山東教育出版社 四月  
二四一四頁
- 郭飛平 中國民國經濟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十二月
- 郭齊勇 熊十力思想研究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六月 三九五頁
- 郭滌等主編 延安時期與毛澤東思想 西安 陝西人民出版社 五月 三  
七九頁
- 梁曉聲 一個紅衛兵的自白 西安 陝西人民出版社 八月 三四八頁
- 梁靜源 美國華工田野生涯 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 十二月 二二〇頁
- 華僑華人歷史研究編輯部編 中國華僑歷史學會成立十周年紀念論文集  
北京 東方出版社 十一月
- 馮元魁 光緒帝 長春 吉林文史 五月 三七四頁
- 馮開文 中國民國教育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十二月
- 惠德安 張學良將軍戎幕見聞 瀋陽 遼寧人民出版社 一月 二二九頁
- 湯志鈞 戊戌時期的學會和報刊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十二月 九〇  
二頁
- 溫儒敏 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十月 三〇四頁
- 湖北省總工會編 湖北工運大事記：1863~1949 武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八月 三四一頁
- 黃艾仁 胡適與中國名人 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五月 四二一頁

- 黃光域編著 外國在華工商企業辭典（1840~1949） 瀋陽 遼瀋書社
- 黃順力 從林則徐到毛澤東：中國人的百年救國路 鄭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三二五頁
- 黃福慶主編 澳門專檔(二) 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十二月 七一頁
- 經君健 清代社會的賤民等級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八月 二七二頁
- 賈亦斌主編 論台獨 北京 團結出版社 五月 二三八頁
-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婦女聯合會編 新疆婦女運動四十年 烏魯木齊 新疆人民出版社 一月 三七七頁
- 楊東梁 中國清代軍事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十二月
- 楊德慧 楊杰將軍傳 昆明 雲南人民出版社 十一月 四八五頁
- 楊鵬程、左雙文主編 二十世紀中國史：從近代走向現代 石家莊 河北人民出版社 八月 九八〇頁
- 葉龍彥 郝更生傳 南投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十二月 一九八頁
- 葛留青 中國民國文學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十二月
- 鄒沛、劉真編著 中國工人運動史話 五冊 北京 中國工人出版社 九月
- 愛新覺羅·毓岳 我跟隨溥儀二十年：末代皇子回憶錄 北京 紅旗出版社 四月 一二三頁
- 趙頌堯、吳齊 西學東漸 蘭州 甘肅教育出版社 三月 一七八頁
- 齊慶昌、孫志升 直奉大戰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一月 一六六頁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 臺灣總督府檔案中譯本第二輯 南投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四月 五五〇頁
- 蔣毓英 臺灣府志 南投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六月 一四〇頁
- 鄧玉祥 劉真先生與臺灣教育 臺北 臺灣書店 十二月 一三八頁
- 蔡少卿主編 民國時期的土匪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三五五頁
- 蔡德金 汪偽二號人物陳公博 鄭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七月 三一三頁
- 蔡德金 歷史的怪胎：汪精衛國民政府 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三三六頁

- 黎濤編著 最後的自白：江青接受外國記者採訪實錄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七月 三七一頁
- 劉兆佳編著 過渡期香港政治 香港 廣角鏡出版社 十一月 四一九頁
- 劉秀生、楊雨春 中國清代教育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十二月
- 劉俐娜 中國民國思想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十二月
- 劉會軍 國民黨特務暗殺紀實 鄭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三〇六頁
- 劉廣安 清代民族立法研究 北京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一八五頁
- 盧權、禰倩紅 葉挺傳 鄭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七月 五八五頁
- 燕帆 大串連：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旅遊 北京 警官教育出版社 五月 三九一頁
- 薛銜天 中東鐵路護路軍與東北邊疆政局 北京 社會文獻出版社 四月 三三五頁
- 韓昱 變法與維新：戊戌變法及其歷史命運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六月 一六六頁
- 蘇冀魯 國民黨：1937——慘烈悲壯的抗日戰爭正面戰場 北京 國防大學出版社 十一月 二二二頁
- 蘇雙碧 北伐風雲 北京 光明日報出版社 三月 一七八頁
- 顧昕 中國反傳統主義的貧困 臺北 風雲時代出版公司 十一月 二八六頁
- 權延赤 走下聖壇的周恩來 臺北 新銳出版公司 十二月 四五四頁
- 龔書鐸 近代中國與文化抉擇 北京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十月 二六九頁
- 山本有造編 滿洲國の研究 京都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三月 五八六頁
- 小島晉治、並木賴壽編 近代中國研究案內 東京 岩波書店 六月 三六四頁
- 仁木ふみ子 震災下の中國人虐殺：中國人労働者と王希天はなぜ殺されたか 東京 青木書店 七月 二六六頁
- 日本孫文研究會編 孫文とアジア：1990年8月國際學術討論會報告集 東京 汲古書院 六月 三二八頁



白取道博編 滿蒙開拓青少年義勇軍關係資料 七冊 東京 不二出版社  
四月

古澤賢治 中國經濟の歴史的展開：原蓄路線から改革、開放路線へ 京  
都 ミネルヴァ書房 十一月 二三五頁

台灣人元日本兵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會編集 台灣・補償・痛恨：台灣人  
元日本兵戦死傷補償問題資料集合冊 東京 六月 一〇三六頁

光田明正 中華の發想と日本人 東京 講談社 八月 二五二頁

佐佐木衛 中國民眾の社會と秩序 東京 東方書店 十一月 二六三頁

明清時代の法と社會編集委員會編 和田博徳教授古稀紀念：明清時代の  
法と社會 東京 汲古書院 七二三頁

梅原郁編 中國近世の法制と社會 京都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三  
月 五八四頁

姫田光義等 中國20世紀史 東京 東京大學出版會 七月 三一七頁

細谷千博等編 太平洋戦争 東京 東京大學出版會 七月 六六九頁

莫邦富 新華僑：世界經濟を席捲するチャイナ・ドラゴン 東京 河出  
書房新社 十一月 三三六頁

増田弘 侮らず・干渉せず・平伏さず：石橋湛山の對中國外交論 東京  
草思社 二四六頁

Adelman, Jonathan R. and Shih, Chih-yu. *Symbolic War: The Chinese Use  
of Force, 1840-1980*. Taipe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261pp.

Barnett, A.Doak. *China's Far West: Four Decades of Chang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Bergholz, Fred W. *The Partition of the Steppe: The Struggle of the Russians,  
Manchus and the Zunghar Mongols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 1619-1758*.  
New York: Peter Lang, 522pp.

Brown, Deborah Ann. *Turmoil in Hong Kong on the Eve of Communist Rule:  
The Fate of the Territory and Its Anglican Church*. San Francisco: Mellen  
Research University Press, 447pp.

Butcher, John and Dick, Howard eds. *The Rise and Fall of Revenue Farming:*

- Business Elites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State in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N.Y.: St. Martin's Press, 309pp.
- Cariño, Theresa C. and Baviera, Aileen S.P. eds. *Black Cat White Cat: An Inside View of Reform & Revolution in China*. Quezon City, Philippines: Philippine-China Development Resource Center, 140pp.
- Chang, Sung-sheng Yvonne. *Modernism and Nativist Resistance: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from Taiwa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Chang, Tsan-Kuo. *The Press and China Policy: The Illusion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0-1984*. Norwood, NJ: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72pp.
- Ch'en, Chieh-ju ed. *Ching Kai-shek's Secret Past*.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73pp.
- Chu, Godwin and Ju, Yanan. *The Great Wall in Ruins: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366pp.
- Copper, John F.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aiwan*. Metuchen, N.J.: Scarecrow Press, Inc., 179pp.
- Davis, Deborah and Harrell, Stevan eds. *Chinese Families in the Post-Mao Er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70pp.
- Deane, Hugh ed. *Evan F. Carlson on China at War, 1937-1941*. New York: China and US Publications.
- Deng, Gang. *Development Versus Stagnation: Technological Continuity and Agricultural Progress in Pre-Modern China*. New York, Westport, Conn., and London: Greenwood Press, 263pp.
- Dittmer, Lowell and Kim, Samuel eds.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Evans, Richard. *Deng Xiaoping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London: Hamish Hamilton, 339pp.
- Garver, John W.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346pp.
- Heppner, Ernest G. *Shanghai Refuge: A Memoir of the World War II Jewish*

- Ghetto*. Lincoln &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1pp.
- Hickey, Dennis Van Vranken. *United States-Taiwan Security Ties: From Cold War to Beyond Containment*. Westport, Conn.: Praeger, 196pp.
- Howell, Jude. *China Opens Its Doors: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 Wheatsheaf, 274pp.
- Hua, Qingzhao. *From Yalta to Panmunjom: Truman's Diplomacy and the Four Powers, 1945-1953*. Ithaca, NY: 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267pp.
- Hua, Sheng, Zhang, Xuejun and Luo, Xiaope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o Refor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Press, 244pp.
- Kau, Michael and Marsh, Susan eds. *China in the Era of Deng Xiaoping: A Decade of Reform*. Armonk, N.Y.: M.E. Sharpe, 506pp.
- Klintworth, Gary. *Australia's Taiwan Policy 1942-1992*.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Publications Programme,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50pp.
- Kueh, Y.Y. and Ash, Robert eds. *Economic Trends in Chinese Agriculture: The Impact of the Post-Mao Refor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405pp.
- Lam, Lai-Sing *The Role of Ch'i in Mao Tse-Tung's Leadership Style*. San Francisco: Mellen Research University Press, 322pp.
- Lee, Mabel and A.D. Syrokomla-Stefanowska eds. *Modernization of the Chinese Past*. Sydney: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179pp.
- Leung, John K. eds. *The Writings of Mao Zedong, 1949-1976. Vol.II* Armonk, N.Y. and London: M.E. Sharpe, 863pp.
- Lin. Bih-jaw ed. *Contemporary China and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aipe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387pp.
- McCord, Edward Allen. *The Power of the Gun: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ese Warlordism*.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436pp.
- Moser, Michael J. and Moser, Yeone Wei-chih. *Foreigners within the Gates: The Legations at Pek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58pp.

- Olivier, Bernard Vincent.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Nationality Policy in the Northeastern Provinces*. San Francisco: Mellen Research University Press, 326pp.
- Oxford, Ellen. *Blood, Sweat, and Mahjong: Family and Enterprise in a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91pp.
- Pasternak, Burton and Salaff Janet W. *Cowboys and Cultivators: The Chinese of Inner Mongoli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80pp.
- Pohl, Karl-Heinz、Wacker, Gudrun and Liu Huiru eds. *Chinesische Intellektuelle im 20 Jahrhundert: Zwischen Tradition und Moderne*. Hamburg: 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Asienkunde, 432pp.
- Pomeranz, Kenneth. *The Making of the Hinterland: State, Society, 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 1853-1937*.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36pp.
- Ross Robert S. ed.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Tripolarity and Policy Making in the Cold War*. Armonk, N.Y.: M.E. Sharpe, 204pp.
- Schmutz, Georges-Marie. *La sociologie de la Chine: Matériaux pour une histoire 1748-1989*. Berne: Peter Lang, 357pp.
- Su, Shaozhi. *Marxism and Reform in China*. Nottingham: Spokesman, 173pp.
- Sun, Youli. *Chin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 1931-1941*.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44pp.
- Thomson, J. *Thomson's China: Travels and Adeventures of a Nineteenth-Century Photograph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26pp.
- Tsai, Jung-fang. *Hong Kong in Chinese History, Community and Social Unrest in the British Colony, 1842-1913*.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375pp.
- Tsai, Wen-hui. *In Making China Modernized: Comparative Modernization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Baltimore: School of Law, University of Maryland, 281pp.
- Tsang, Steve ed. *In the Shadow of China: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since 1949*.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21pp.
- Unger, Jonathan ed. *Using the Past to Serve the Present: Historiography and*

-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rmonk, N.Y.: M.E. Sharpe. 292pp.
- Wegars, Priscilla ed. *Hidden Heritage: Historical Archaeology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Amityville, N.Y.: Baywood Publishing Company. Inc., 430pp.
- White, Gordon. *Riding the Tiger: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86pp.
- Zabrovskaya, L.V. *Istoriograficheskie problemy yaponno-kitayskoy voyny 1894-1895*. Vladivostok: Institute of the History, Archaeology and Ethnography of the Far East, and the Far East Section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 114pp.
- Zhai, Zhenhua. *Red Flower of China*. New York: Soho Press, 245pp.
- Zhan, Jun. *Ending the Chinese Civil War: Power, Commerce and Conciliation between Beijing and Taipei*.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46pp.

#### 一九九四年出版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編輯委員會 口述歷史(5) 日據時期台灣人赴大陸經驗 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六月 四一四頁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鄧穎超文集 北京 人民出版社 一月
- 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編 抗日戰爭與中國歷史：「九·一八」事變六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 瀋陽 遼寧人民出版社
- 王幻 鄭板橋評傳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四月 一二六頁
- 王家儉 清史研究論叢 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 七月 五〇一頁
- 王紹光 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 香港 牛津大學出版社 三一六頁
- 王爾敏編 康有為手書真跡 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五月 九二三頁
- 王鴻泰 「三言二拍」的精神史研究 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六月 二四一頁
- 尹家民 蔣介石與他的特務們 臺北 新新聞文化公司 三月 三一九頁
- 史革新 晚清理學研究 臺北 文津出版社 三月 二一六頁
- 史景遷著、張連康譯 知識分子與中國革命 臺北 絲路出版社 四月

- 四九六頁
- 古野直也著、許極燉編譯 臺灣近代化秘史 高雄 第一出版社 三月  
四〇六頁
- 古鴻廷 東南亞華僑的認同問題（馬來亞篇） 臺北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四月 二三八頁
- 矢吹晉 外國人眼中的毛澤東與周恩來 臺北 國際村出版社 三月 二  
二四頁
- 朱昭陽口述，吳君瑩紀錄，林忠勝撰述 朱昭陽回憶錄——風雨延平出清  
流 臺北 前衛出版社 六月 一八二頁
- 李松林等編 最高權力人物：民國歷屆總統 臺北 風雲時代出版公司  
二月 三一五頁
- 李恩涵 日本軍戰爭暴行之研究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三月 四四六  
頁
- 呂芳上 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 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八月  
五〇三頁
- 呂廷煜等編著 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 六冊 北京 紅旗出版社 二  
月 一三五五頁
- 何頻 鄧小平之後的中國 臺北 新新聞文化公司 四月 五〇四頁
- 吳文光 革命現場一九六六 臺北 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五月 三一六頁
- 吳朋等 中國民國藝術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二月
- 吳東權 陸皓東傳 臺北 雨墨出版社 一月 二二四頁
- 林恩顯 國父民族主義與民國以來的民族政策 臺北 國立編譯館 五月  
三一〇頁
- 林滿紅 四百年來的兩岸分合：一個經貿史的回顧 臺北 自立晚報文化  
出版部 三月 一五八頁
- 邱瑞穗 異情歲月——黃順興前妻回憶錄 臺北 日臻出版社 一月 三  
八八頁
- 周天度 蔡元培傳 臺北 新潮社文化公司 二月 四九六頁
- 香港利文出版社編著 中共七十年風雲錄（上）：中共崛起 臺北 風雲  
時代出版公司 二月 四八四頁

- 香港利文出版社編著 中共七十年風雲錄（下）：當代秘史 臺北 風雲時代出版公司 二月 四八四頁
- 香港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 「中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香港 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 一月 五八六頁
- 柯偉林著、陳謙平等譯 蔣介石政府與納粹德國 北京 中國青年出版社 二月
- 威爾斯著、華侃譯 西行訪問記：紅都延安祕錄 北京 中國青年出版社 二月
- 姜允明 當代心性之學面面觀 臺北 明文出版社 三月 一九一頁
- 馬凱主編 臺灣工業發展論文集 臺北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五月 七〇六頁
- 高皋 後文革史（中卷）：胡耀邦欲速不達 臺北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二月 三六六頁
- 翁元 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 臺北 書華出版公司 一月 三三九頁
- 莊練 近世學者與文人群像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一月 三二〇頁
- 莊練 清代史事與人物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一月 三〇四頁
- 郭廷以 近代中國史綱（上下冊） 臺北 曉園出版社 五月 九二一頁
- 郭蘊靜 清代商業史 瀋陽 遼寧人民出版社 一月
- 許南村編 史明臺灣史證的虛構 臺北 人間出版社 三月 三四〇頁
- 張玉法、張瑞德主編 中國現代自傳叢書（第四輯） 十八冊 臺北 龍文出版社 九月
- 張永堂 明末清初理學與科學的關係再論 臺北 臺灣學生書局 二月 三〇〇頁
- 張向敏 中國政治經濟學史大綱：1899-1992 北京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五月
- 張西堂 顏習齋學譜 臺北 明文出版社 三月 二二四頁
- 張洪濤 血祭大江：中日武漢會戰紀實 北京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二月
- 張健 于右任傳——半哭半笑樓主 臺北 雨墨文化公司 二月 二一四

頁

- 張壽安 以禮代理——凌廷堪與清中葉儒學思想之轉變 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五月 一九五頁
- 陳三井 近代中法關係史論 臺北 三民書局 一月 三〇六頁
- 陳木杉 中共編寫「中華民國史」真目探討 臺北 國立編譯館 五月 四〇〇頁
- 陳立夫 成敗之鑑——陳立夫回憶錄 台北 正中書局 六月 四五七頁
- 陳逸松口述，吳君瑩紀錄，林忠勝撰述 陳逸松回憶錄——太陽旗下風滿台 臺北 前衛出版社 六月 三一二頁
- 陳慈玉 臺北縣茶葉史 臺北縣立文化中心 三月 二四二頁
- 喬治忠 清朝官方史學研究 臺北 文津出版社 三月 三一六頁
- 游鑑明訪問、吳美慧等紀錄 走過兩個時代的臺灣職業婦女訪問紀錄 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二月 二九三頁
- 黃仁宇 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 臺北 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一月
- 黃克武 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 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二月 二一一頁
- 黃保真等 中國文學理論史：清末民初 臺北 洪葉出版社 四月 四六二頁
- 黃嘉樹 國民黨在臺灣 臺北 大秦出版社 一月 七六四頁
- 黃樹民著、素蘭譯 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後的中國農村變革 臺北 張老師月刊出版社 四月 三二〇頁
- 聞少華 陳公博傳 北京 東方出版社 三月
- 解學詩 偽滿洲國史新編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八月
- 雷飛龍等 海峽兩岸四十年（上冊） 臺北 革命實踐研究院 三月 五三六頁
- 楊益言 重慶談判 北京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月
- 楊維真 唐繼堯與西南政局 臺北 臺灣學生書局 一月 二二〇頁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 二二八事件文獻補錄 南投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二月 八三四頁
- 蔣子駿 國民革命與臺灣之關係 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 二月 二四九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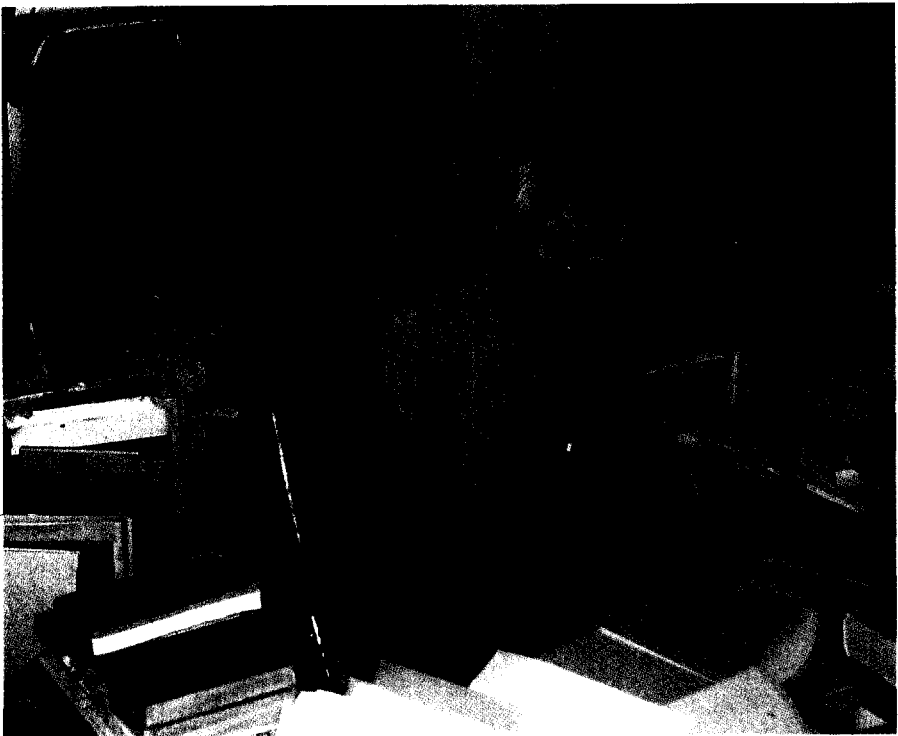
- 劉巨才 政治女強人宋美齡 臺北 風雲時代出版公司 二月 二五八頁
- 劉述先等 當代新儒家人物論 臺北 文津出版社 二月 四一二頁
- 劉廣凱 劉廣凱將軍報國憶往 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一月  
五三一頁
- 鄭樑生 中日關係史研究論文集 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 三月 一九七頁
- 賴樹明 薛毓麟傳 臺北 希代出版社 三月 三九二頁
- 賴澤涵等 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 臺北 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二月 三二〇頁
- 盧陞法 佛學與現代新儒學 瀋陽 遼寧大學出版社 二月
- 薛家柱、王月曦 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中：一個貼身侍衛官目擊記 北京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三月
- 戴國輝 臺灣結與中國結 臺北 遠流出版社 五月 三二〇頁
- 戴逸等 甲午戰爭與東亞政治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六月
- 龐毅 中國清代經濟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一月
- 王輝著、橋爪大三郎等譯 中國官僚天國 東京 岩波書店 三月 二二二頁
- 宇野重昭、天兒慧編 20世紀の中國：政治變動と國際契機 東京 東京  
大學出版會 三月 三五七頁
- 坂井洋史、嵯峨隆編纂解題 原典中國アナキズム史料集成 十三冊 東  
京 綠蔭書房
- 高田淳 中國の近代と儒教：戊戌變法の思想 東京 紀伊國屋書店 一  
月 二二九頁
- 森正夫編 舊中國における地域社會の特質（研究成果報告書） 名古屋  
友人社 三月 九八頁
- 塚本元 中國における國家建設の試み：湖南1919-1921年 東京 東京大  
學出版會 四月 二九二頁
- Bergère, Marie-Claire. *Sun Yat-Sen*.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544pp.
- Ch'en, Li-fu. *The Storm Clouds Clear over China: The Memoir of Ch'en Li-fu, 1900-1993*.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359pp.
- Chu, Samuel C. and Liu Kwang-Ching eds. *Li Hung-chang and China's Early*

- Modernization*. Armonk, New York: M.E. Sharpe, 308pp.
- Croll, Elisabeth. *From Heaven to Earth: Images and Experience of Development in China*.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371pp.
- Deng, Peng. *China's Crisis and Revolution through American Lenses, 1944-1949*. Lanham, Maryl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c., 183pp.
- Goldstein, Melvyn and Beall, Cynthia. *The Changing World of Mongolia's Nomad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oncharov, Sergei · Lewis, John and Litai, Xue.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n, Suyin. *Eldest Son: Zhou Enlai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1898-1976*. New York: Hill and Wang, 483pp.
- Kim, Samuel S. ed. *China and the World: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Boulder, Oxford: Westview Press, Inc., 304pp.
- Li, Lincoln. *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4-1949*.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Lin Zhiling and Robinson Thomas W. eds. *The Chinese and their Future: Beijing, Taipei, and Hong Kong*. Washington, D.C.: AEI Press, 554pp.
- Mackerras, Colin. *China's Minorities: Integr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ong Ko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55pp.
- Munro, Robin and Spiegel, Mickey. *Detained in China and Tibet: A Directory of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Prisoners*. New York: Human Rights Watch.
- Weller, Robert P. *Resistance, Chaos, and Control in China: Taiping Rebels, Taiwanese Ghosts, and Tiananme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55pp.
- Woodside, Alexander and Elman, Benjamin A. eds.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600-190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u, Hongda Harry. *Bitter Winds: A Memoir of My Years in China's Gulag*.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290pp.
- Zito, Angela and Barlow, Tanie eds. *Body, Subject and Power i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07pp.



↑國內大專院校首開台灣史課程的楊雲萍教授

↓畢生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島田虔次教授



## 本期要目

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

近代中國歷史檔案研討會

「東南亞華人教育」國際研討會

甲午戰爭一百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

商人與地方文化研討會

「國際亞洲歷史學家學會」第十三屆會議

台海兩岸史學發展的異同

學人簡介 楊雲萍 島田虔次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進行之專案研究計畫

中國大陸民國史研究述評

上海版《民國日報》與基督教大學史料

關於《許壽裳日記》

菲律賓華僑義山碑文的史料價值

新書評介五本

